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主之魂在雙邊

E-BOOK
内网资料 非商业

作者的话

提起托马斯·杰斐逊，知道的人恐怕不大多，但若提到《独立宣言》，知道的人肯定不少，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统、著名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制定者。“美元之父”、美国领土的最大扩疆者、美国民主党的鼻祖、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任何人只要独占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名垂青史，而杰斐逊却独兼各项，创造了人称“杰斐逊神话”的伟大业绩。

著名的杰斐逊传记作家杜马·马隆这样写道：“华盛顿是独立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林肯是维护联邦统一的主要象征，但是杰斐逊在他的丰富多采的成就方面超越了这两个人。”

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杰斐逊最终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代人。与其他英雄人物相比，惟有杰斐逊才最代表美国革命。他是美国革命精神的化身。詹姆士·罗伯逊在其著作《美国神话与美国现实》中评论说：“杰斐逊神话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连力求客观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他总是具有代表性：他被概括为一种‘主义’，这种‘主义’既包括他自己和他的政治追随者的思想，也往往包括他的政敌的思想。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他不仅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和创始人，而且不论时间、条件和事件，他都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化身。”

除了政治上的杰出贡献外，杰斐逊还是个十足的“杂家”。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他是土地测量师、建筑师、哲学家、音韵学家、文学大师。他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加上自己的母语英语，共5种语言。他还对数学、地理、历史、农艺学和天文气象以及考古学迷恋不已，因此，人们称他是。“天资最高、最多才多艺的美国总统”。他的一生虽不曾写过大部头著作，但他的著述甚丰，涉及问题甚广，后人为纪念他而出版的他的文集共20卷就是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两次划时代历史事件的伟人，一生都充满神秘与传奇色彩，以致使众多的传记作家感叹，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杰斐逊的真实生活，他“像半透明的阴影那样闪烁不定”。

著名传记作家艾伯特·诺克1926年在他的文章中就称杰斐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内森·沙克奇纳称他是美国政治家中“最个人心驰神往”而又“最让人费解”的人物。六大卷《杰斐逊和他的时代》的作者杜马·马隆在写完第一卷之后沮丧地承认：“我年轻时狂妄自大，自夸我总有一天会完全理解并弄懂他，但现在我却不敢这么断言了，我也不相信我或其他人能做到。”梅里尔·彼得森在完成《杰斐逊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杰斐逊和一个新国家》的书稿后，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惑之中。他说：“对他所有的伟大同胞而言，杰斐逊也许是最隐晦、最讳莫如深的人。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的确，杰斐逊的思想深处有很多矛盾之处。联邦主义历史学家利用这种矛盾和模棱两可之处来证明他“是非不明”，思想气质“变幻不定”。其实，正可由此探寻到他那种始终具有理性斗争的个人经历和曲折的政治经历，因而，更能使我们感到他的真实，感到他离普通人更近，并非圣人。

杰斐逊的父亲出身平民，而母亲却门第显赫。他对英年早逝的父亲极为敬仰，对母亲的社会地位却嗤之以鼻。他只是在自传中极其冷淡地提到母亲

的伦道大家族：“他们追溯家谱，远至英格兰和苏格兰，让每个人都把自己认定的信仰和荣誉归因于此。”然而，杰斐逊从一开始就既认识到上层阶级的自信，也了解出身寒微的人的真正优点和才干。

杰斐逊既是奴隶主，又是革命者。虽然他宣称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手里却握着上百个奴隶的一切权利。他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拥护者，却反对长子继承权和续嗣限定法。在宗教信仰方面，杰斐逊是自然神论信仰者，反对宗教派别和基督教的腐化，拥护先于人的本质的自然宗教。他一生周旋于富豪、学者及名士之间，却吸收了当时最为开明、却又是最不受欢迎且最受怀疑的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论等民主思想。这些民主思想，经他完善和发展之后已载入史册，永远闪烁在人类进步的记忆里。

在早期的美国政治中，他既是自耕农积极的拥戴者，也是大种植园主的领袖人物。他熟读当时最优秀的哲学文献，接受了博大的世界主义思想，同时又是坚定的爱国者。就其个人性情和哲学而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全心全意地捍卫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但又憧憬进步。

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点是如何认识杰斐逊的历史功绩。杰斐逊一生功勋累累，但往往认为最值得让人纪念的是三件大事，即：起草《独立宣言》，制定《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在亲笔写的墓志铭里，所列举的正是这三件事。

《独立宣言》不仅宣告了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更为它确立了民主政治的纲领，而且还将人权哲学昭示于全世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杰斐逊一生事业中最崇高的体现。它为美国“政”与“教”的分离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他的名言——在“政”与“教”之间筑起一堵墙。弗吉尼亚大学不仅以其优美的校舍，更以其教育思想而无愧为才智过人的杰斐逊的传世丰碑，体现了杰斐逊“知识就是力量，无知就是软弱”的深刻见解。

但笔者认为除了这三件大事之外，杰斐逊还有两件大事应着重强调：一是收购路易斯安那，其次是自动引退。

由于路易斯安那的并入，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多，这为美国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而且开了美国大规模向西扩张领土的先河，使美国疆上最终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沿岸。这对美国后来经济飞速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说到自动引退，一般人认为，只有华盛顿才称得上是自动引退。诚然，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引退的总统，开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先例。但杰斐逊是第一个效仿华盛顿榜样自动告退的总统。对他来说，虽然在第二任期快要结束之时，受到“禁运”问题的困扰，但是他如果决定参加第三次竞选的话，当选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而且当时也有要求他连选连任的强烈呼声；何况那时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还有一个情况是当时美国与英国和法国关系紧张，杰斐逊完全可以利用国家处在危机状态这一特殊情况，来为他第三次连选连任进行辩护。但杰斐逊是一个笃信民主之人，他毅然决然地效仿华盛顿，任满两届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告老还乡。可以这样说，杰斐逊自动告退之举进一步确立了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惯例。

第二点是关于杰斐逊的私生活。从杰斐逊留下的各种文件材料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杰斐逊有意地对自己的私生活涂抹了一层神秘色彩。

杰斐逊是十分有条理、心细如针的人。他坚持做日常记录，大到政治斗争、国家大事，小到家庭财政开支、奴隶的出生年月日等。他保留了朋友和熟人写给他的全部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信，共计 1.8 万余件。他自己所写的信都复制了一份留底，并把留存下来的信编好索引，成为非同寻常的《书信集》。杰斐逊还有《园艺簿》，记录其对花草植物等大自然的观察；《农艺簿》记录了他对农耕种植的观察；各种开支也一一记入流水帐目。然而，最让人不解的是，在所有这些书信、记录材料中，出现了许多神秘的空白之处，即那些涉及他的私生活、涉及他母亲和妻子的文字，有人怀疑是杰斐逊自己故意销毁了。

也许是有趣的巧合，杰斐逊与其弗吉尼亚同乡华盛顿总统一样，娶了一位寡妇，而杰斐逊的继任者麦迪逊总统娶的也是一位寡妇。但人们对杰斐逊夫人的了解却是最少的。关于杰斐逊的感情生活，早期传记作家一致认为，自妻子死后，杰斐逊就再也没有爱过别的女人。比如吉尔伯特 1928 年就写道：“杰斐逊与多个女人有联系，却从未坠入爱河。”显然，他们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

实际上，杰斐逊 21 岁时情窦初开，就爱过一个叫丽贝卡的女孩子，当然，那只是短暂、朦胧的初恋。这以后，除了妻子之外，起码还有 3 个女人先后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并引起人们的关注：（1）贝蒂·沃充，杰斐逊的好朋友和邻居约翰·沃克的妻子；（2）玛丽亚，科斯韦，英国微雕家理查德·科斯韦的妻子；（3）萨莉·赫明斯，蒙蒂赛洛的黑女奴，也是杰斐逊妻子的胞妹。

杰斐逊与沃克夫人和科斯韦夫人之间的浪漫故事，被传记作家们有意淡化，他们也竭力否认杰斐逊与黑奴萨莉有任何关系。直到 1828 年 8 月 23 日，当杰斐逊最有名的情书《头与心的对话》发表时，人们才不得不重新认识杰斐逊。

杰斐逊的继承人将另外 25 封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的来往信件一直保留在一个被啮坏的口袋中，直到 1944 年才被发现。这些充满柔情蜜意的信件，成为美国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情书。但是就在这些信件于 1945 年公开发表后，也还有不少人竭力否认杰斐逊曾有过婚外恋；有的人虽承认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有感情”，但他们坚持说，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之间没有“进一步”的关系。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浪漫故事”有损于杰斐逊神圣的“超人”形象。

我倾向于认为，尽管杰斐逊不愿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但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且富有极强感染力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于他的私生活的传言，我们既不能轻易相信，也不必随意否认，本着这样的原则，我在书中把这些故事都客观地摆出来，不是把结论告诉读者，而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不仅参考了大量资料，还受益于我国学术界对杰斐逊的有关研究成果，如刘柞昌先生的有关论著，谨向刘先生和其他作、译者致谢。邓蜀生先生提供了一些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欧阳远大、林淑康和欧阳红兵。他们无私的帮助、热情的鼓励和他们对本书倾注的大量心血，对我来说如此珍贵。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和贡献，便没有此书。最后，要感谢欧阳明天，他是催我马不停蹄的力量之源。

书中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阮宗泽

1995年8月于北京水碓子

序 言

美国独立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从此，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它以崭新的面貌在新大陆上迅速崛起，因此，当初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被尊之为美国的“国父”，受到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热爱和崇敬，在国父们当中，要数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为这个新国家所做的贡献最大，美国人称他们为“开国三杰”。

华盛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统率大陆军浴血奋战8年，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他还领导制定了一部沿用至今的国家大法——《联邦宪法》，为美国的共和制和联邦制国家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后他出任美国首任总统，为新国家的建设事业励精图治，成就斐然。华盛顿的名字已成为美国独立的代名词。杰斐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气势如虹的手笔撰写了《独立宣言》，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官方文件不仅宣告了美国正式独立，同时也是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宣言书。他还是《英属美洲权利概论》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人，为实现北美的宗教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表作《弗吉尼亚纪事》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政绩卓著；他还是弗吉尼亚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创建者。杰斐逊是美国文明和“1776精神”的杰出代表。富兰克林是一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他是电气科学的先驱，有过多项重大发明，“费城电风筝试验”的故事早已传遍全球，脍炙人口；他还是北美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述颇丰。富兰克林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革命家和外交家，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战争中代表美国出使欧洲，游说西方列强支持美国独立，建国后又为创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而呕心沥血。富兰克林从一个印刷工成长为世界伟人的经历已成为所谓“美国神话”的象征。

1996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20周年纪念日（1776—1996）。在这一日子来临之际，编纂出版一套美国人物丛书，以中国传统的史学传记形式和优美细腻的文笔，把美国“开国三杰”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业绩介绍给国人，确实是有必要的。

作者们在撰写该套书时，注意了学习汲取前人写历史传记的优点和长处，并特别注意把握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从多方位、多视角、全面而深刻地描述传主的一生，把他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写历史传记切忌把人物描绘成一幅静止的画面：呆滞，脸谱化，毫无生气。应该把人物动态化，使其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甚至使人产生可闻其声、可见其人之感。作者们在人物处理上注意了把握总体观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由表及里地写传主一生的各个侧面和层面。不仅写传主的政治、军事活动和重要功绩，而且也细致入微地写他们的生活细节——家庭、婚恋、生活情趣和轶闻琐事等；不仅写传主的政治言行、行为作派、爱好习惯等外在表征，而且还直接闯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揭示其性格特点、道德品质和丰富多采的感情世界；不仅表现传主的辉煌业绩和人生大节，而且还直笔其生活小节，甚至某些弱点和缺陷，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展示传主的“庐山真面目”，把他们各自的独特风貌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使读者感到既真实可

信又兴味盎然。

（二）把对传主们思想理论的研究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开国三杰”都是极具政治头脑的杰出政治家和博采众长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对古代希腊、罗马以来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美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精神产物，对美国和世界历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者们都注意拿出相当的篇幅对传主们的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写作中，作者们注意把传主的思想发展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阐释，与他们的重大政治实践交互穿插叙述，从而使读者看到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指导革命实践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另外，作者们还把传主的思想理论分解为若干部分：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制宪思想、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等等，并把这些内容分别放在适当的章节里进行具体分析论述，同时还注意把传主的思想理论与他们的道德情操、理想抱负融合在一起进行阐述，使其显得更加自然得体、细腻深刻。这样条分缕析、精雕细琢地处理，可以使读者对传主们的思想体系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体味到他们思想和人格的巨大魅力，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本着济世救民的精神一步一步创造出他们的思想理论的。

（三）力求用生动感人的文笔写出真实可信、高学术品位的传记著作。一部好的人物传记应该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传记如果片面强调科学性而不计其他，就会陷于枯燥晦涩，曲高和寡，读来味同嚼蜡，兴趣索然，这样便无法发挥传记的教育功能，从而大大降低其社会效益。反之，如果只重视其可读性而忽略了科学性，就会使传记失其真实而流于虚构。只有用富于文采的笔触写出以史实和科学研究为依据的真人真事，才算得上一部好的传记作品。作者们在写作时注意了对这一原则的把握。书中所叙之事都经过了认真的考证和查实，以免以讹传讹，谬误流传。另一方面，作者们又注意运用中国传统文史作品流畅优美的笔法，无论叙述过程、分析议论，还是写景状物，都力求文情并茂、恰如其分，以便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塑造出真实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以飨读者。

本丛书被列入山东省教委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查阅参考了大量中外文资料，深受许多学者惠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刘文涛 1995年10月于济南

《美国开国三杰》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刘文涛		
副主编	杨 明	阮宗泽	王建吉
编 委	刘文涛	杨 明	阮宗泽
	徐向梅	倪世光	王建吉
	张益兰	伍 清	一 鸣
	任 鹰	李 言	

美国开国三杰

民主之魂杰斐逊
阮宗泽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美国开国三杰》民主之魂杰斐逊

第一章 应运而生

伟大的领导人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领导人，是因为他以最亲身的经历和最具代表性的方式，经历了他的人民为争取其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埃里克·埃里克森

历史大变动时代往往造就伟大的思想家。本书主人公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更加证明了这一真理。

1640年后的英国革命把专制暴君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和宗教独裁统治，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光荣”地成为英国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的主宰者。然而，在北美，殖民地人民卸下了封建主义的镣铐，却仍然戴着宗主国强加的殖民主义枷锁。到18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农业和工商业已经初具规模，英国资产阶级新贵们更不肯放弃这棵摇钱树，他们对北美的横征暴敛比贪婪的前朝英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1764年的《糖税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和《叛乱法》颁布后，大批英军开赴北美，新兴的美利坚民族的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殖民地谋生存、求发展的人们终于揭竿而起，走上了民族大起义的道路。

弗吉尼亚位于现今美国的东部，东濒大西洋。那里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1570年，西班牙人曾来到此地。1607年，英国人在詹姆斯敦建立了他们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同年，第一批黑人从遥远的非洲被贩运到这里。1624年，这里成为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弗吉尼亚支持英王，并成为忠于王室的难民的避难所。为此，英王查理二世称其为“第五王国”，并授予它“老领地”的称号。到18世纪上半叶，由于以黑奴为劳动力的烟草种植园迅速发展，当地经济十分繁荣，这吸引了那些原在马里兰、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等地的德国、爱尔兰移民，他们纷纷迁至土地肥沃的阿巴拉契亚谷地。

当时，伦敦还流行着这样一出戏——《东方的锄头》，把弗吉尼亚描述为令西班牙人也十分垂涎的人间天堂：“黄金遍地，比英国的铜还要多。”当地人想要宝石时，可以随便到海边采集。弗吉尼亚的神秘、富庶，深深吸引着英国社会的冒险家和流浪汉。他们高举十字架，胸怀黄金梦，飘洋过海，历尽艰辛，试图在这块人烟稀少的新大陆寻觅自由、富庶的天堂。

托马斯·杰斐逊的祖先加入到这股移民潮中，从英国威尔士的斯诺登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弗吉尼亚。

就在弗吉尼亚居民区的西端，有一片新开垦的红土地，那里有一座不太大的木屋，看得出来，是主人经过精心选址，才在西南山脉山峡下段建造起来的。它依山傍水，周围树木葱笼，鸟语花香，美不胜收。它的拥有者便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祖父小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在其《自传》中说：“我父亲的父辈来自威尔士和英格兰最高的山斯诺登附近。”他还称在查询一个威尔士的法律案件时，发现其家族的姓名。

小托马斯·杰斐逊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另一个在罗阿诺克，结婚后生了不少儿女；第三个名叫彼得·杰斐逊，出生于1707年，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父亲。

彼得虽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是却颇有志气，喜欢读书，并且非常刻苦，因此学到不少文化知识。长大成人后，他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但为人友善，时常和他的黑人奴隶一道，干极其费力的重活。

据说，彼得能把两大桶烟叶用头顶起来，不管一桶是“560磅”还是“近1000磅”。有一次，彼得让三个奴隶把一棵被毁坏的树拉倒。这三个奴隶用绳子套住树身，使出了吃奶的劲，那树却巍然不动。他们喊着号子，一遍又一遍地努力，仍然无济于事。彼得见状，跑了过去，叫他们一齐让开。他伸手抓住绳子，只一用劲，树就被连根拔起。他精力充沛，勇猛无比，不知疲倦。他可以吃生肉，可以在猛兽嗷嗷乱叫的森林中坦然睡在空心的树上。他尤其喜欢户外活动。他是个打猎专家，还是一个游泳好手，对测量土地也很感兴趣。

凡此种种，使得他给儿子留下如此印象和记忆：威力无穷，聪明能干。

那时，整个弗吉尼亚地区俨然是一座看不到尽头的茫茫苍苍的大森林，到处古木参天，人烟稀少，广袤的土地上只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种植场。那是一片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的原野。因此，土地测量员是当地政府最需要、最受人们欢迎的人才。彼得学到一手好的测量土地的技术，当上了阿尔贝马尔县的土地测量员。1749年，他很幸运地和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数学教授乔舒亚·弗莱伊先生一起，被选派为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边界测量员。后来，他又奉命和弗莱伊教授合作，绘制了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这张地图于1751年在伦敦出版发行，比今天的地图还详细，包括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北卡罗来纳的毗邻地区。多年后，它仍具权威性。陪同彼得一起在1746年作首次探险考察的托马斯·路易斯的日记上记录着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日子。彼得的日记本是研究他本人的好资料，但它却在1770年夏德威尔大火中化为灰烬。

由于彼得有文化知识，掌握了测量土地及绘制地图的技术，而且品行端正，人缘颇佳，渐渐地成了当地公认的头面人物。他当过地方治安法官，又当过县尉。他负责在与印第安人交界的地区维持秩序，与印第安人友好相处，公平对待印第安人，从而保障了一方平安。因此，1755年，他被选进了弗吉尼亚议会。

人们还特别称道彼得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尤其是他不赞成鞭笞奴隶，善待印第安人，被印第安人看作不可多得的白人朋友。他还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他的下一代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品行。

1739年，32岁的彼得与当地一位19岁的姑娘简·伦道夫结了婚。

简·伦道夫的娘家是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富有、最有权势和最有名望的伦道夫家族。伦道夫家族的祖先和颇负名望的苏格兰默里伯爵有血缘关系。简·伦道夫的父亲艾沙姆·伦道夫是位年轻的船长，他是在英国结婚的。简于1720年出世，她是11个孩子中的老大。随后，艾沙姆·伦道夫辗转来到弗吉尼亚定居下来。他热衷于贩卖奴隶，自己也拥有100个奴隶。家里有漂亮的房子，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简·伦道夫结婚时，除了带来200英镑的嫁妆外，也把这种家庭的联系和影响带来了。

彼得和简并非门当户对，有齐大非偶之嫌。当然没人知道简是否觉得自己比丈夫优越，因为她生在英国，还有与高贵血统的联系，而彼得则对祖先的事知之甚少。由于和简结婚，彼得又增添了不少土地，奴隶也增加到100多个，这使彼得一跃成为弗吉尼亚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彼得有几个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是他妻子的胞弟——吐卡霍的威廉·伦道夫，像弗吉尼亚殖民地其他具有开拓精神的已婚年轻人一样，他们俩疯狂地占领、获取“英王的沃土良田”。他们俩部同时看上了里瓦纳河岸的那片土地。但当彼得去申请获取这 1000 公顷土地时，发现伦道夫已早在两天前就申请了 2400 公顷的土地，其中包括彼得垂涎已久的 400 公顷。伦道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把那 400 公顷土地转卖给了彼得。这使得彼得格外高兴，他早就渴望在这块土地上修房造屋，安身立命。

彼得为自己修建的房子取名“夏德威尔”，这原是英国伦敦的一个教区的名字，简·伦道夫的母亲就出生在那里。夏德威尔建在一个斜坡平整出来的坝子上，四周森林环抱，郁郁葱葱。离夏德威尔 4 英里以外是夏洛茨维尔，而距夏德威尔 1.5 英里之处便是彼得之子托马斯·杰斐逊后来精心营造“蒙蒂赛洛”的山丘。

1743 年 4 月 13 日，托马斯·杰斐逊便出生在夏德威尔。但他的大部分童年生活却并不是在夏德威尔度过的。

杰斐逊的容貌像他的父亲，而瘦削的身材则像他的母亲。也许你会认为，他作为长子生长在生活环境优美，受人尊敬、仰慕的家庭，他的童年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其实，杰斐逊真正的童年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杰斐逊曾回忆起儿时的家庭，对他的外孙谈起他早年的故事。

因为威廉·伦道夫把夏德威尔的 400 公顷土地转让给了彼得·杰斐逊，加上他们还有亲戚关系，威廉·伦道夫便成了杰斐逊家的常客和好朋友。伦道夫的妻子在 1742 年之前去世，留下二女一子。伦道夫有一种不祥之感，预感自己来日无多，便让彼得做他的遗嘱执行人，而且恳求他在其死后搬到吐卡霍去住，以便抚养他的 3 个幼小的孩子。伦道夫在得到彼得的首肯之后不久便英年早逝，撒手西去，年仅 33 岁。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1745 年彼得举家搬到了 50 英里之外的吐卡霍。正是这次骑马穿过森林的旅程成为杰斐逊最早的记忆。那年，他两岁。

到了吐卡霍，他们搬进了一幢陌生的房子。那里有两个分别是 9 岁、7 岁的女孩和一个 4 岁的男孩。杰斐逊自己的姐姐简和玛丽，只有 5 岁和 4 岁；妹妹伊丽莎白刚出生，还在妈妈的怀里。搬到吐卡霍一年后，他母亲又给他生了一个妹妹。这些变化对杰斐逊来说是难以接受和适应的，尤其使杰斐逊感到不自在的，是似乎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们所住的地方虽比夏德威尔的房子漂亮得多，但它是属于伦道夫家的；加上伦道夫家的 3 个孩子都比他大，杰斐逊似乎感觉自己“失宠”了，便急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家。但这种生活 7 年后才得以改变。

5 岁那年，他的弟弟彼得·菲尔德出生 5 周后便夭折了，这使他知道了小孩也会死。杰斐逊也知道了比他小 20 个月的妹妹伊丽莎白智力迟钝。

杰斐逊的童年生活是同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分不开的。他家有 100 多个奴隶，他小时候就同黑人奴隶一起做游戏，一块儿玩。到了吐卡霍又有 100 多个奴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 9 岁，杰斐逊的生活圈子中都总是黑人多于白人，比例大约为 10：1，而且他早年的朋友便是黑人。因此，杰斐逊称他很熟悉黑人。他 5 岁那年听说俄勒冈县附近的种植园里，一个名叫伊夫的奴隶被指控要毒死她的主人，被判以火刑处死了，杰斐逊渐渐明白了，白人和黑人是不同的，白人是统治者，黑人是被统治者，即使是小孩，也是如此。白人孩子必须上学，而黑人孩子则不可能。但他的父亲彼得对奴隶却比较友

善，不允许监工用鞭子抽打奴隶。父亲的言传身教给杰斐逊很大的影响，用他的话来说：“我对他们的感情和同情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也是5岁那年，他被安排进一间教室开始念书，同学们的年龄都比他大一些。刚开始，他不喜欢上学。一天，他悄悄地溜了出来，躲在另一间房子的后面，双膝跪地，虔诚地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求您赶快结束这堂课吧，它实在太长了！”然而，祈祷似乎不起任何作用，课并没因他的祈祷而结束。从此，他对祈祷感到失望，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对上帝期望太多。许多年以后，他还把这一思想告诉了他的外孙们。

杰斐逊9岁那年，彼得决定把家迁回夏德威尔，并送杰斐逊进入拉丁语学校学习。他的老师是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苏格兰牧师，他教授基础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杰斐逊像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彼得的藏书虽然不多，但都是些经典之作，比如《圣经》以及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作品等。

过了一段时间，杰斐逊逐渐感到只有白人孩子能上学、他的黑人朋友不能和他一起去上学的现象是不公平的。他长大后，在其《弗吉尼亚纪事》一书中提出了被视为“异端”的主张，即所有的黑人都应接受教育，学习“耕种、艺术和科学”，男孩到21岁，女孩到18岁，而国家应支付这笔费用。

希望儿子出人头地的彼得十分重视教育孩子。在杰斐逊5岁时，不仅送他到小学念书，还请来一位家庭教师，教他读书写字。彼得一心一意想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儿子。他向儿子灌输严格要求自己及勤学苦练的思想，教导儿子勤奋读书、写字、记帐和工作。他还常教导儿子：“你自己能做的事，千万不要让别人替你去做。”父亲的谆谆教导对杰斐逊后来的生活和成长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他后来负笈求学于威廉斯堡时，没有与那些纨绔子弟随波逐流，而是潜心读书，力求上进，这完全归功于父亲的教育。

彼得不但要求儿子向书本学习，而且注意培养他向大自然学习的兴趣和习惯。受父亲的熏陶，杰斐逊从小便热爱大自然，有许多荒野情趣的回忆。他时常上山或钻到森林里去狩猎，或者去溪流山涧中钓鱼摸虾。正因为如此，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比如他熟悉各种鸟兽的名称及其习性，甚至连野地及森林中的各种昆虫的生活都了如指掌；他认识许许多多的植物、花草，对它们的特性、用途等有所了解。大自然对杰斐逊来说简直是一本敞开的引人入胜的大书。他一生对勘测、建筑等行当的兴趣经久不衰，这也得益于他的父亲。当谈及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是他父亲和乔舒亚·弗莱伊一起绘制的时候，他不无骄傲之感。

父亲求知若渴的性格使杰斐逊深受熏陶。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总统像他那样对科学如此痴迷、执著。他博览群书，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升华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博学多才的人之一。

像其他望子成龙的父亲那样，彼得也教儿子骑马、打枪。当里瓦纳河涨水时，带他逆流而上。杰斐逊把这一“教导”传给外孙，他认为男孩子10岁时就应当有枪，把他们送到森林中去，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应付一切。

杰斐逊第一次到山上打猎，因没有经验，一无所获。不过他在回家路上发现了一只被困在一个小围栏中的野火鸡。于是，他用自己的吊袜带把火鸡捆在树上，然后举枪瞄准，开枪，最后把被打伤的火鸡吊在枪筒上，得意洋洋地扛回家去。

也正是在这段童年时期，杰斐逊成了印第安人的好朋友。印第安人的首

领在革命之前常常去威廉斯堡，他们常常在夏德威尔歇脚，拜访杰斐逊的父亲彼得，这样他们也逐渐和杰斐逊熟悉了。多年之后，杰斐逊在给好友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曾动情地回忆起一个名叫翁塔塞特的印第安人首领。翁塔塞特是个英勇无比的勇士，他每次去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时，都一定要在夏德威尔停留。有一次，翁塔塞特准备离开弗吉尼亚去英格兰。就在行前的那个晚上，杰斐逊有幸聆听了感人至深的告别词。杰斐逊这样追述道：月亮又圆了，他仰望满月为自己旅途的平安祈祷，为自己同胞的福祉祈祷。他的声音响亮，抑扬顿挫，说话时伴随着的动作干脆有力。他的同胞们燃起团团篝火，气氛庄严肃穆。后来，翁塔塞特的印第安人部落遭到驱赶和屠杀，杰斐逊尽己之能做了一些解救工作。

在杰斐逊的生活中，有一个阴影使他感到成为“于社会无用的人”是一种罪恶，这一阴影让他志存高远。毫无疑问，阴影便是他的父亲。杰斐逊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但他从父亲那儿获得了和身体同样重要的精神力量。他还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一些测量知识，他也开始像一名测量员那样撰写他的第一本书，也是惟一的一本书，书名叫《弗吉尼亚纪事》。在该书中，他采用了父亲所绘制的地图，只稍稍做了些修改。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杰斐逊对父亲的敬仰、爱戴和感激之情。

彼得于1757年8月17日突然去世，终年50岁。他与妻子有6个女儿、2个儿子。杰斐逊是哥哥，还有一个弟弟，父亲去世时，杰斐逊只有14岁，这无疑是在杰斐逊早年最大的精神创伤。

彼得死时留下了7500英亩土地和90多个奴隶。按照遗嘱，妻子简·伦道夫得到2500英亩的种植场、1/6的奴隶及物品。6个女儿各继承6名奴隶及200英镑现金（必须到结婚或年满21岁时才有权使用）。剩下的土地和奴隶归杰斐逊和弟弟所有。遗嘱还规定，在母亲去世后，杰斐逊还可以继承母亲的种植场，但他要负起教育幼小弟妹的责任，对姊妹的嫁妆也要负责。而且，在年满21岁以前，他在生活用度上必须听从父亲的遗嘱执行人的指示。突如其来的责任落到了杰斐逊的肩上，但却没有实权！他不仅要服从母亲的绝对权威，而且还要就很小的财政支出情况向父亲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约翰·哈维、约翰·尼古拉斯、彼得·伦道夫、托马斯·特平和托马斯·沃克汇报。这些人谁也没有成为杰斐逊的良师益友。杰斐逊一生对权力既爱又恨，他追求权力，获得权力，最终却放弃权力。对此，他的朋友们都感到难以理解。杰斐逊这种对权力的矛盾心理，恐怕最早便可追溯于此。

与对父亲的敬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杰斐逊对他母亲却格外疏远、冷漠。他对母亲只字不提，有时还间接地流露出伴随他一生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母亲没有资格“提出忠告或指导”。研究杰斐逊的所有专家学者们竭尽所能，也没能找到有关简·伦道夫·杰斐逊与大儿子之间关系的多少材料。愈是神秘，愈是使人对杰斐逊与母亲的关系感到好奇。

杰斐逊和他母亲共同生活了27年，其中只有一小段时间因他到威廉斯堡学习法律而分开。在杰斐逊的无数封信和其他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过自己的母亲，只在写给他舅舅的信和他的《自传》中提到过，但也只是片言只语，毫无感情色彩。此外，在杰斐逊的帐目本中，有4处涉及他母亲。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的解释是，杰斐逊对于描写他家里的女性感到“十分难为情”。在亨利·兰德尔看来，杰斐逊的母亲和蔼可亲，充满柔情，性情开朗。

从杰斐逊早期的记录本、帐目本中可以看出，只要他在家和母亲一起生

活，他们在拥有多少奴隶、收入、饮食和其他东西方面的关系便是复杂的。杰斐逊详细列明每一样东西，常常有不少东西是列在简·杰斐逊夫人名下的。杰斐逊的母亲可能有检查她儿子花销的习惯。杰斐逊把他自己的记录本保留下来，把妻子给他的信销毁了。杰斐逊母亲的任何手迹也都没有保存下来，有人怀疑是杰斐逊有意把它们给毁掉了。当然，它们也可能是在 1770 年夏德威尔的那场大火中被烧光了。然而，就在那场大火之后，她还活了 6 年，而这几年中，杰斐逊在威廉斯堡和费城度过不少时间。杰斐逊不可能与他母亲不通音讯。

不过，夏德威尔的那场大火似乎结束了那种依靠母亲的生活。他那时 27 岁，就在发生火灾之时，他开始在蒙蒂赛洛修建自己的房子。当一个单间修好后，他就毅然搬了进去。大火之后过了两年，他娶了玛莎·威利斯·斯凯尔顿，并把她接进自己的别墅中。

就在 1776 年 3 月 31 日那天，即夏德威尔大火之后 6 年，他结婚之后 4 年，杰斐逊在他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简要写到：“我母亲今晨 8 点去世，终年 57 岁。”在他母亲去世两个月之后，杰斐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舅舅。杰斐逊在信中只是简单地说：“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恐怕你还不知道。这事正好发生在 3 月的最后一天，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小时。我们猜想她是中风。”

杰斐逊的话如此冷漠和平静，让人吃惊。

父亲是新大陆的白手起家的移民的后裔，是反抗和仇恨英国统治的威尔士人的后代。但母亲却是生在英格兰，并与旧世界有强烈的家庭联系。这无疑在杰斐逊的心里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杰斐逊在其《自传》中对母亲的祖先含糊其词，流露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矛盾冲突心理。在其《弗吉尼亚纪事》一书中，他表露出的担心是：“倘若英国移民大批涌入美国，他们将把对皇室的感情也随之带来，并世代相传。”

如此不同的父母亲，如此不同的家庭影响，如此坎坷多折的青少年时代，应运而生的托马斯·杰斐逊，也印证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第二章 寒窗苦读

我运气颇佳，很早就结识了一些地位很高的人物。于是我便一直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托马斯·杰斐逊

英年早逝的父亲在遗嘱中仍特别嘱咐，杰斐逊应该受到充分的正规教育。天道酬勤，正因为杰斐逊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父亲的遗嘱，才为今后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言道：“少年辛苦修身事，莫向光阴情寸功。”

父亲去世后，杰斐逊进入阿尔贝马尔县一所由牧师詹姆斯·莫里掌管的小学校读书。莫里除教授他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还向杰斐逊传授了阅读方法：要靠理解、深思熟虑、评论和消化所读的作品，进入到作者的精神和作品构思之中去。由于莫里老师的学校离夏德威尔有 14 英里地，因此杰斐逊学习期间就住在莫里牧师的庄园里（杰斐逊的监护人除付给莫里老师学费和住宿费之外，每年还另外付给 20 英镑）。这使他有时间浏览莫里 400 余卷内容包罗万象的藏书。杰斐逊一生酷爱读书，恐怕便始于此。

杰斐逊尤其感谢莫里老师教他学习希腊文，这使他后来能直接用希腊文来欣赏荷马史诗，他认为读原文比读英译本更让人兴趣盎然。莫里牧师被认为是弗吉尼亚殖民地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杰斐逊对莫里老师非常尊敬，钦佩地称他是个“当之无愧的权威学者”。

詹姆斯·莫里除了杰斐逊之外还有 4 个学生，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年龄从 14—16 岁不等。他们都成为彼此的好朋友，杰斐逊直到去世之前还一直和他们中的两人保持通讯联系：一个是詹姆斯·麦迪逊（杰斐逊的后继者麦迪逊总统的表弟），后来当上威廉·玛丽学院的院长；另一个就是小詹姆斯·莫里，他后来离开了弗吉尼亚，成了一名英国富商。另一位同学达布尼·卡尔是杰斐逊年轻时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和杰斐逊的妹妹结了婚。

当时，大多数弗吉尼亚种植场都互不相连，被森林或泥泞的道路分隔。但夏德威尔种植场却靠近大路，当真是“路人歇脚之处”。那时弗吉尼亚富贵之家盛行跳舞和晚会。亚历山大·英格尔斯教杰斐逊和他的 4 个妹妹学习跳舞；还有人教他拉小提琴和大提琴，教他妹妹学习竖琴。后来杰斐逊还跟一个意大利音乐家学习小提琴。音乐成了他生活中永久的快乐之源。多年后，玛莎·威利斯和玛丽亚·科斯韦这两个演奏拨弦古钢琴的能手，都深深地吸引了杰斐逊。

由于应酬太多，杰斐逊产生了逃避这种无聊生活的想法。1759 年元旦之后，杰斐逊征询了他母亲的表兄彼得·伦道夫的意见之后，决定去威廉-玛丽学院求学。1760 年 1 月 14 日，他给父亲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约翰·哈维写信说：“彼得·伦道夫认为我应当到学院去深造，这将使我有更好的机会完成我的学业。为什么呢？首先，只要我身在夏德威尔就少不了各种应酬，它们至少占去我 1/4 的时间，使我难以安心读书。另外，在学院我还可以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还可以学数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杰斐逊对因娱乐太多而荒废学业深感内疚和不安。

当得知要孤身一人离家到外地去上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置身于一个广阔天地，置身于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朋友，没有保护人给予如此小小

年纪未涉人世的人忠告，危险处处在，你必须靠自己求得平安……”

由此，可读出他幼小心灵感受到的那种被遗弃而自己有些四顾茫然的心态。

1760年3月25日，不到17岁的杰斐逊被威廉-玛丽学院哲学系录取了。在一个仆人的跟随下，他来到了学院所在地——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当时的威廉斯堡只比一个村庄稍强，约有200间木质房屋，刷得白白生生的。街道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每年春秋两季，当弗吉尼亚议会开会时，便人满为患。

但在美国不是很长的历史中，最古老、最具有早期殖民时代特色的城市就当数威廉斯堡。

威廉斯堡静静地坐落在弗吉尼亚的东南角，宽阔的詹姆斯河从它的南面流过，四周是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外面喧闹的世界，犹如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这里是殖民时代弗吉尼亚州的首府，是“新大陆”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

威廉斯堡最古老、最有历史意义之处还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詹姆斯河上的詹姆斯岛。1607年5月，3艘英国商船载着货物和104名男子从英国来到这里。他们卸下货物，砍倒树木，建起了自己的城堡。这是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第一个安居点。他们比另一批英国殖民者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港登陆还早13年。它后来扩展为詹姆斯城，并在整个17世纪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弗吉尼亚的首府，直到这个首府于1699年迁到威廉斯堡为止。

威廉·玛丽学院这所以英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命名的学院，建于1693年，是美国国内历史仅次于哈佛大学的高等学府。学院内著名的韦恩大楼则是全美最古老、而且现在还在使用的教学大楼。威廉-玛丽学院只有4个系：文法系、哲学系、神学系和印第安人系。包括校长在内全部教师只有7人，师生总共不超过100人。全部教职员都是英国国教教士，只是到杰斐逊入学前两年，才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非国教教士教授威廉·斯摩尔。说来也巧，杰斐逊上学的头一年，伦理学讲座主持人空缺，由斯摩尔临时代理。而斯摩尔教授原本是一位自然科学家，这样，命运之神把杰斐逊和斯摩尔安排在一起了。杰斐逊所修的课程将近一半是斯摩尔教授讲授的，他在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中起了启蒙作用。

很快，杰斐逊便成为男女同学乐意与之相交的人。这位身材高挑、红色头发、脸上有雀斑、沉着冷静、友善好施、却有些腼腆——这成为他的一大弱点——的青年，虽说不上英俊，但他的眼里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谈吐得体，言之有物，幽默机智，这些都是女生所喜欢的品质。同样，杰斐逊也引起了斯摩尔教授的关注。

入学不久，杰斐逊发现，这位苏格兰博士尽管是教数学的，但也对各项有益的科学学科几乎是样样精通；他不仅是思想家，而且还是哲学家；他极善传授知识，仪表端庄，温文尔雅，并且思想开阔，气量宽宏，具有君子风度。同时，斯摩尔教授也发现，杰斐逊是个好学肯问、求知若渴的青年。他十分喜欢，常常叫杰斐逊去和他作伴，并带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年轻的杰斐逊由于结交了这位年长的博学之士而受益匪浅。杰斐逊在与斯摩尔的交谈中，首次接触到浩瀚无边的科学知识。

杰斐逊十分尊敬斯摩尔教授，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称他“就像父亲”一

样对自己，认为“是我的幸运，也许他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最让杰斐逊感激的是，斯摩尔给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乔治·威思，他后来成为杰斐逊的法律教师；另一个是弗朗西斯·福基尔，英国驻弗吉尼亚的总督。

威思举止文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品行端正，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虽然是法律教授，却对希腊文颇有造诣，谙熟希腊古典哲学。杰斐逊称威思为“我的忠实可爱的导师”。

斯摩尔和威思非常重视杰斐逊这个好学上进、有抱负的学生，他们时常带杰斐逊到福基尔总督官邸参加宴会和欣赏音乐。这些雅聚成为杰斐逊后来最甜美的卧忆之一。

福基尔约 60 岁模样，原是英国哈特福德的乡村绅士。他父亲曾是英格兰银行行长。福基尔也曾担任过“南海公司”的主管。他喜欢音乐，对科学很感兴趣。据说他还赌博成瘾，一晚上就把家当输得精光，无奈，在朋友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到新大陆当总督的差事。但他嗜赌的习惯一直没改。

有趣的是，这位新总督也有细心、认真的科学态度。他新官上任，初来乍到，发现总督官邸北面的窗户被狂风、冰雹毁于一夜，第二天地面上结满了冰块。心血来潮的福基尔翻箱倒柜，找出尺子、笔和纸，开始跪在地上测量起来，并作了详细记录，还把记录寄给了在英国的兄长。结果，这无心插的“柳”，竟被英国皇家协会出版。福基尔因而对威廉斯堡的天气坚持天天作日记。

喜欢音乐的福基尔，很高兴每个周末都与具有天赋的年轻小提琴手做伴。很快，福基尔发现其中的杰斐逊还有其他才能。来参加聚会的人群总是无拘无束，高谈阔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文学到政治，从政治到自然科学，从自然科学到音乐美术，从音乐美术到日常生活，等等。而这位年轻人不仅无所不谈，而且常常出语惊人，言辞犀利。

如饥似渴的杰斐逊在这些聚会中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知识。难怪他后来不无庆幸地写道：在那里，我“听到了我一生中所能听到的最有见地、最有理性和最富哲理的谈话”。因此，他感谢他的三位忘年之交。这三个人分别给予杰斐逊三种东西：斯摩尔意味着哲学；威思象征着法律和法典制定者；福基尔则代表雄辩和成就。

可是好景不长。斯摩尔教授于 1764 年返回英国，后来成为达尔文的好朋友，杰斐逊从此之后再也没见过他。福基尔也于 1768 年 3 月因病逝世。只有威思仍和他在一起。

这位优秀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者、弗吉尼亚最受尊敬的律师，在 35 岁时收下了 19 岁的杰斐逊学习法律。

不管从哪方面讲，威思都是影响杰斐逊的最重要的人物。杰斐逊在《自传》中称他是“年轻时最爱戴的教师，一生中最尊敬的朋友”。杰斐逊甚至叫威思“第二父亲”，说他是“我最早、最好的朋友，他对我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最有益的影响”。

开始，杰斐逊并不喜欢学法律。但后来深入进去之后，又觉得其味无穷，爱不释手。

威思是个图书收藏家。在其影响下，杰斐逊也开始藏书，并且一生乐此不疲。就在夏德威尔大火之后 3 年，杰斐逊又收藏了 1250 册书，最多时达 6500 册。

杰斐逊虽年纪轻轻，却真正做到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威廉斯堡的社会，放荡享乐成风，年轻的富家子弟整天沉溺于斗鸡、赌博、酗酒、赛马及风花雪月的风流场合之中。杰斐逊的许多同龄同学、朋友，大多随波逐流。一次，他的同学帕特里克·亨利看着杰斐逊的书架上放满的书籍说：“老兄，我借两本休姆的论文，打算这个冬天阅读。”但当亨利还书时，杰斐逊却发现他连半本都没读完。

由于所处的环境，杰斐逊时常不得不与赛马者、玩牌者、猎狐者、科学家、自由职业者及高贵人物为伍。他后来回忆说：“回想到我时常与各种不良分子交往之时，我吃惊于我没有和他们一道误入歧途，成为像他们那样对社会无用之人。我运气颇佳，很早就结识了一些地位很高的人物。于是我便一直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于是在打死狐狸或赛马得胜的兴高采烈之际，我常常们心自问：我应该选择哪一条博得名声之路，是当骑马师，是当猎狐者，是当一个演说家，还是当一个正直之人来维护我国的权利？”

杰斐逊这样勤勉刻苦学习的习惯，早在父亲去世之前就养成了，这也说明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后来说：“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勤劳刻苦的习惯。如果不是小时候，那后来就别想养成了。”

杰斐逊爱好甚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知识的孜孜以求，恨不得把所有知识全部塞进自己的脑袋，并以此为乐。他一天要学习 15 个小时，通常凌晨 2 点才熄灭蜡烛。当天边露出第一缕晨光时，他就翻身起床，重新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课余，杰斐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历史和哲学书上。当他的朋友、法律系学生本杰明·摩尔向他请教应读什么书时，杰斐逊写信作答。这封信后来竟成为美国法学系学生中最有名的信，它折射出了杰斐逊自己的过去。他说，黎明即起，闻鸡起舞，8 点之前阅读有关自然科学、伦理学、宗教和法律的书籍（并列应读的书目）；8 点至 12 点，学习法律；12 点至下午 1 点，学习政治；下午学习历史；从傍晚到睡觉前，学习修辞、演说技巧。

杰斐逊学习兴趣异常广泛：一切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和好奇之心。他既爱好希腊文法，又爱好牛顿的物理学，她不仅学西班牙语，还学习微积分。他读希腊文的柏拉图的著作，读拉丁文的西塞罗的作品，读法文的孟德斯鸠的著作。当然他还喜欢读英国小说家斯特恩、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的作品，同样也十分喜欢莎士比亚、弥尔顿及波鲁的诗歌。

杰斐逊不仅认真读书，而且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一次他把自己的笔记寄给托马斯·库珀，在对自己年轻气傲表示歉意之后，他说：“我大胆追求知识，从不害怕追求真理和刨根问底，不管其结果是否与权威相符。因此，如果你发现这一结论比历史事实和原则还要大胆的话，请你多包涵。”

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博学多才，还应归功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杰斐逊十分勤奋，他遨游书海，当他的同学、朋友们纷纷躲开或绕行那些深奥晦涩的著作时，他却执著无比，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从不放弃。

当然，杰斐逊并不是一个死用功的书呆子，也并没有“与世隔绝”。他既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又喜欢各种体育锻炼，坚持跑步、骑马等户外活动。他还养成每天清晨用冷水洗脚的习惯，即使在冬天也不间断。杰斐逊身材颀长，看似单薄，其实体质不错。据说他一生中从未患过感冒，只发过两三次高烧，他的健身之道就是一辈子坚持锻炼和每天早上“用冷水洗脚”。

教师引进门，修行靠个人。杰斐逊自身的勤勉、坚韧和执著，是他最终

成为博学者和伟人的最根本原因。

第三章 律师生涯

人人生而自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对自身拥有权利，包括迁徙自由及按照本人意志使用权利的自由。

——托马斯·杰斐逊

1762年，杰斐逊大学毕业，受威思先生的影响，决定继续学习法律。

也许从这时候起，在美国学习法律便成为通向政治之门。有这么一组数字，足以说明律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人中，17人是律师；在美国《联邦宪法》上签名的39人中，22人是律师；在美国历史上的41位总统中，24人是律师。可见，律师的参政意识是何等强烈。

当时在殖民地没有法律学校，有志以律师为职业的青年只得从给律师当实习生做起。杰斐逊专心致志地跟着乔治·威思先生学了5年法律。

由于他们早就认识，威思先生喜欢这个志向远大的青年人，而杰斐逊也十分尊重博学多才的威思先生，他们相处甚是融洽。威思先生精心指导杰斐逊，一开始就让杰斐逊阅读《英国法律学入门》一书的第一部分，即“科克论述利特尔顿”。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是15世纪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后来杰斐逊又读17世纪的法律学家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文章。科克曾是反对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民众党领袖，以起草《权利请愿书》（1629年）而名声大噪。

刚开始接触这些书本时，杰斐逊深感无聊，认为它们呆板枯燥，他曾说，“我还从未这样厌倦过”。然而，法律这东西似乎也像甘蔗一样，越往后嚼就越甜。当杰斐逊硬着头皮啃下去时，他逐渐佩服上科克那“古怪而精深的学问”了。美国独立战争后不久，杰斐逊提到科克时说：“比较正统的辉格党人绝不会写作，也不会对英国宪法的保守思想或所谓的英国自由进行比较深刻的研究。”可见杰斐逊对科克的敬佩。

读完科克的《英国法律学入门》一书后，杰斐逊开始学习威廉·萨凯尔德、罗伯特·雷蒙德、乔治·安德鲁斯等人编辑的英国高等法院审理的各种案例报告。除了阅读有关法律书籍，他还广泛涉猎了有关历史、地理、政治、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比如他读过卡麦斯勋爵的《历史上的法律论文》、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的《大不列颠封地所有权的历史》，以及伯纳德·黑尔的《习惯法历史》；还读过洛克、西赛罗、孟德斯鸠、莎士比亚、弥尔顿·拉辛、伏尔泰、马基雅维利、塞万提斯的作品以及一些百科全书，等等。扎实的基本功和广博的知识，为他后来成为美国革命思想上的领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

杰斐逊有一个习惯，即一边读书，一边作笔记，还摘录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把心得体会也写在笔记本上。所幸的是，杰斐逊的这些丰富多采的读书笔记，在1770年夏德威尔发生的大火中幸免于难。虽曾一度失踪，但后被发现，收藏在国会图书馆里，后人不仅从中可以看到杰斐逊的敬业精神何等可贵，而且可以了解到他早期的民主思想是受到哪些人的启发和影响的。

1764年，杰斐逊在威思先生指导他学习法律期间达到了法定年龄，于是他继承了父亲遗嘱中给予他的那一部分财产：总共5000英亩土地和22名奴隶。杰斐逊就要主动料理自己的财产了。他把一些互不相邻的零散的土地卖

掉，又买进一些新的土地。他在阿尔贝马尔的主要财产逐年增加和充实。

继承了这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财产后，21岁的杰斐逊完全可以靠它过上辈子舒适无虑的生活。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并不甘心干只当一个农场主。他在威廉斯堡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使他接触到阿尔贝马尔以外的世界。他深爱着故乡这片热土，但也深为更广阔的世界所吸引。

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生活的岁月里，不光是呆在大学的象牙塔里。除了和导师斯摩尔和威思先生朝夕相处，还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交往。在学业上与杰斐逊关系密切的朋友，莫过于前面提到过的达布尼·卡尔了。两个人从摩里学校开始便是同学，到威廉·玛丽学院仍是同学，在学习法律时还是同学。他们俩志趣相投，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后来，达布尼·卡尔与杰斐逊的妹妹结婚，于是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以后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然而，在当时对他有所触动的，恐怕是他首次接触到了掌管殖民地事务和管理行政的人员，这使他开始接触到不同于书本上的“政治”，眼界大开。

威廉斯堡当时只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居民只有1500人左右。但在春季和秋季州议会和州的下议院开会这段“公共集会”期间，全殖民地的领导人都涌入了威廉斯堡及其附近各庄园，这使威廉斯堡的人口翻了一倍。杰斐逊所在的大学位于格洛斯特公爵大街的一端，到州议会大厦只有一英里路程。而乔治·威思那华丽的住所就在总督宫的大草坪上，离总督宫不过几百英尺。杰斐逊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这对他与当地头面人物交往，有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身份。他结识总督福基尔后，又认识了总督委员会里几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实习生，他很注意观察州议会的会议进行程序，学习别的律师们如何进行诉讼、辩论和演说。当杰斐逊看到皇家事务律师佩顿·伦道夫（杰斐逊母亲的表兄）进行诉讼时，无疑是极为好奇的。而他认识埃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后，对聆听他们在美州最老的立法机关里的发言深感有趣。于是，杰斐逊常去州议会大厦旁听辩论，以便学习更多的东西。

1764年春的一天，他旁听了弗吉尼亚议会的辩论。当时议会正在讨论英国议会通过的向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的法案。在激烈的辩论中，突然站起一位议员，猛烈抨击英国议会的这项压迫性措施。他慷慨陈词，言辞激昂，语惊四座。这个人便是议会中最直言不讳的议员、以辩才著称的律师帕特里克·亨利。

亨利的父亲是苏格兰人，移居于弗吉尼亚的西部边疆。亨利曾学习农业耕耘和经营商业，后来改学法律，1763年，曾为维护殖民地烟草价格的法令《二便士法令》而辩护，史称“牧师案”。即在1755—1758年间，弗吉尼亚境内法币贬值，烟草价格攀升，1758年弗吉尼亚议会代表种植园主的利益，通过了《二便士法令》，规定每磅烟草价格折合为二便士，一切薪资、税率都不再用烟草支付，而改用烟草的折价支付。英国在弗吉尼亚的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纷纷向母国控诉，请求纠正。1763年，英国政府遂宣布《二便士法令》无效。这时，弗吉尼亚的牧师纷纷向地方法庭提出诉讼，请求补偿他们因受《二便士法令》执行的影响而遭受的薪资损失。在一次“牧师案”中，亨利挺身而出，辩护《二便士法令》有效。亨利大声疾呼：“一个国君，否认了这样一个对于人民有利的法令，就丧失了做人民家长的地位，降而为暴君，因此人民也就不应再对他保留什么忠诚了。”这次辩论使亨利名声鹊起。

在《印花税法》颁布后不久，1765年5月29日，杰斐逊又一次目睹了亨利的精彩辩论。当时，在弗吉尼亚议会的辩论中，亨利提出七项建议，声明殖民地人民应享有自由、特权、选举权及免税权，任何人赞同殖民地议会以外的机构有权在殖民地征税，都是殖民地人民的敌人。亨利声如洪钟地说：“恺撒的暴虐有布鲁图来对付，查理一世有克伦威尔来对付，而乔治三世……”当英王的名字从亨利嘴里说出时，议会全场响起了一片嘈杂声：“阴谋”、“阴谋”！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候，亨利镇静自若，以一种威严的神情重新站起来，以最坚决的充满火焰的目光凝视着议会发言人，用最坚定的加重语气结束他的讲话：“应当从他们的事例中得到教益。假如这就是阴谋，就尽量发扬这种阴谋吧！”由于亨利的流利的辩才，议会终于通过了七项建议中的六项，但后来行文时还是把这些议案删掉了；不过，因报纸已经把它们公之于众，弗吉尼亚的抗议呼声毕竟促进了散漫的各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它是殖民地团结御侮的第一声怒吼。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和亨利的镇定自若、冷静沉着以及那滔滔不绝的雄才辩略，深深地留在了杰斐逊的脑海里。

比起自己挥起笔来思如泉涌、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的写作天赋，杰斐逊口才欠佳。年少时，他就有些胆怯和紧张，在公众场合一张嘴，声音就似乎“沉在喉咙里”不出来。在大学里，他的腼腆是出了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鉴于自己的“金口难开”，作为一个极受欢迎的总统，杰斐逊除了就职演说之外，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作过任何演说。然而就这仅有的两次就职演讲，也是咕咕哝哝，听众几乎听不清所言为何。

因此，杰斐逊对雄辩家十分羡慕。他承认对帕特里克·亨利极为崇拜：“他的演讲在我看来，就像荷马史诗那样伟大。”

1766年5月，杰斐逊在度过23岁生日后不久，用两个月时间作了一趟旅行，去了安纳波利斯、费城和纽约。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弗吉尼亚。在路途中，他记录下在马里兰观看议会辩论的情景。他对马里兰的下院竟不像弗吉尼亚那样注重礼仪感到“吃惊”。他还对沿途所到之处的住房、庭园和公共建筑评头品足，体现了他对各地风土人情、特别是对建筑的偏爱。

这趟旅行，他还有一个目的是到费城去种痘。费城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大城市。当时费城人口已接近2万人。他对费城浓厚的文化学术气氛印象颇深。费城各种学术团体很活跃。医生已经学会为人们种牛痘。种痘，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反对的人很多；加之种痘技术还很不完善，发生过医疗事故，造成了接受种痘人的死亡，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试验，大家都惧而远之。但杰斐逊却毫不犹豫地找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摩根医生为他种了痘。这表明杰斐逊对科学的支持和信任。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起了倡导和推广种痘这项试验的作用。这次旅行也标志着他从一个学生转为一个投身于广阔天地的成年人。

如前所述，杰斐逊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在潜心学习法律期间，他开始对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了有系统的精细观察和记载。

他从1766年开始写《园艺簿》。一开头便写到：“3月20日，紫色的风信子开始开放。”去马里兰之前他又记下：“树林内的野生忍冬属植物开了花，而低地的兰花已过了花期。”杰斐逊在《园艺簿》中详细记录了29种蔬菜和7种水果栽种、发芽、开花、结果的时间。连蔬菜栽种的行列数目以及每一行列的棵数，也作了记录，有时还配以图表。杰斐逊的《园艺簿》一直记到他逝世前两年，即1824年，整整坚持了半个多世纪，只有他外出时，

才偶有中断。

杰斐逊还有一本《农艺簿》。他从 1774 年开始，坚持记了 52 年，其中的内容包括种植、管理以及一些新的农机发明革新和 100 多个奴隶的分配使用情况。在这本宝贵的记录中，记录了在何年何月把多少鱼和牛肉、多少床和毯子分发给每个奴隶，通常是在奴隶的出生之时。从这本书中，可以得知杰斐逊和他的奴仆之间的关系。但该书也隐瞒了不少问题。比如该书第 130 页上提到的两个奴隶哈丽雅特和贝韦利，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在 1822 年悄悄地逃跑了。杰斐逊的许多邻居和其他奴隶都认为这两个奴隶是杰斐逊自己的孩子。而且这两个奴隶的母亲——女奴萨莉·赫明斯一度是杰斐逊总统有名的情妇，但该书对此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叙述，就如她在杰斐逊的《记事流水帐》一书中那样。

此外，他还天天记录气象观察的结果，每天分三次准时观察。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多年，甚至在他最忙碌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

他还有一本“袖珍帐簿”，从 1771 年一直到 1803 年，上面记载每天金钱开销的细目，其中甚至包括买鞋带花费的二三便士的钱以及施舍给乞丐的找头。

杰斐逊这种条理性看来无处不在。他还有一个流水帐簿，把每天的开销都记录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使自己一身轻，他去世时，帐簿上欠下 10 多万美元的债务。

1767 年，杰斐逊 24 岁了。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操律师业。杰斐逊比同行开业要晚，这是因为他故意推迟，他不想改变作为威思的学生的角色。

实际上，从杰斐逊的性格和气质来讲，他应当是一个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建筑学家、植物学家，而不是一个律师，因为他不擅辩论，缺乏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的雄辩口才。但是，他又是一个责任感颇强的人。他的信念是：每做一件事，就得认真做好，因此他对律师工作十分认真努力。

他在威廉斯堡设立一个办事处。第二年，即 1767 年，他的导师乔治·威思将他推荐给威廉斯堡的州议会。那年 2 月，他第一次接受委托人。不久，他受理的案件从阿尔贝马尔扩大到了斯汤顿、温切斯特及其他邻县，后来又到了里士满，最后威廉斯堡的州议会也请他去了。他的记录本记载着他当律师后的第一年接受的案件为 68 件，第二年上升到 115 件，到 1769 年达到 198 件。开业第三年，他的年收入已为 370 英镑，这在当时算是不菲的收入了。这表明他的律师业务蒸蒸日上。

实际上，杰斐逊所接的案子只比当时弗吉尼亚最有名的律师乔治·威思、彭德尔顿和亨利所接的案子少。亨利偏重于刑事案件，杰斐逊则偏重于民事案件。

杰斐逊受理的案件，主要是涉及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争端。其他还有关于修建房屋周围护栏的争议、牲畜对邻近土地的侵犯、对遗嘱的争议或时有发生殴打和人身攻击，等等。在他的主顾中，既有弗吉尼亚的主要世家大族中的成员，如伦道夫家、佩奇家、纳尔逊家、伯德家、伯韦尔家等，也有草芥小民。他在案件的辩护中注重事实，以博学多闻而名声鹊起。他虽不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演说家，然而，他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理的深入研究，使得他的辩护引人入胜、以理服人、感人至深。

在杰斐逊辩护的众多案件中，有两个案件是比较有名的。第一个案件是，1770 年他免费为一个黑白混血儿塞缪尔·霍维尔的自由所作的辩护。当时作

为奴隶的霍维尔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他自由。理由是：他的祖母是一个白人妇女和一个黑人男奴隶的女儿，而按 1705 年弗吉尼亚的法律规定，奴隶的身份不是依据肤色，而是依据母亲的身份。这位祖母在 31 岁以前一直是农奴。她在不到 31 岁时生下了一个女孩，按照 1723 年的法律，这个孩子也必须服役到 31 岁才能获得自由。而这个女儿在获得自由之前生下了霍维尔，现在霍维尔也要像母亲和祖母那样，必须做农奴直到 31 岁。霍维尔希望在 31 岁前摆脱这种奴隶地位，从而获得自由。

杰斐逊接案后，查阅了大量案例，并作了精心准备。他在法庭上指出，1705 年法“只限于第一代的黑白混血儿必须服劳役。根据自然法则，它不影响子女的自由。因为按照自然法则，人人生而自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对自身拥有权利，包括迁徙自由及按照本人意志使用权利的自由”。虽然法庭最后还是否决了原告的要求，但杰斐逊在辩护中所提出的自然法则，却令法官们大吃一惊。

自然法则？人人生而自由？个人自由？这些在当时被视作危险的、具有颠覆意图的主张，从 20 多岁的杰斐逊嘴里说出来，无疑如石击水，激起层层波澜。

另一个有名的案子是关于法院对有关基督教事务的裁决权问题。一个楠西蒙德教区的名叫卢纳的牧师，受到教区委员起诉，他们呼吁高等法院撤除他的职务并给予惩罚，指控他“名声败坏，荒淫放荡”。卢纳在教堂里常常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常常不能行使其牧师之职。卢纳还常常在教堂里穿着与其身份不符的花哨衣着，而且褻渎的语言连篇，以及其他一些指责。杰斐逊代表教区委员向法院起诉卢纳，卢纳则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此案一度沸沸扬扬。

杰斐逊在辩护中，旁征博引，追溯基督教的历史，援引早在公元 854 年时的事例来加以阐述，使人信服他说明了法院“享有对于基督教事务的裁判权”。法院同意这一结论，杰斐逊胜诉，这年他 28 岁。

杰斐逊对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便始于此。此后，他一生致力于宗教改革。

1770 年春，一场大火吞噬了夏德威尔—杰斐逊的出生地。大火把杰斐逊收藏的一些书和他的一些文章化为灰烬。杰斐逊身在异乡，当他得知夏德威尔着火的消息时，担心着他的藏书和文章的命运，风雨兼程赶回夏德威尔。在山口迎接他的是一个哭丧着脸、沮丧无比的家奴，他对杰斐逊说：“我年轻的主人，书都被烧光了，但我救出了你的提琴。”

对杰斐逊来说，没有书，就像生活没有阳光。他又开始购书，并从伦敦的朋友斯基普威思那儿收到好书。之后两年，杰斐逊的藏书又有了 1250 册了。

1774 年 11 月 9 日第 939 号案，是杰斐逊所受理的最后一桩案件。1782 年杰斐逊曾一度为几位委托人写过大约 6 次法律意见。但是独立战争之后他一直没能再去当律师。

在杰斐逊当律师的 6 年中，接手的案件为 940 件左右，他应挣 2177 镑，但实际收到的却只有 692 镑。他的弗吉尼亚代理人很少有人付给他钱，许多人甚至是分文不付，以致杰斐逊和其他 5 个律师，包括帕特里克·亨利、彭德尔顿·约翰·伦道夫等共同在《弗吉尼亚报》上登文：不付钱，不办案。

26 岁时，杰斐逊已成为自己命运的安排者了。他身为大片土地的业主，

与弗吉尼亚的显赫家族有联系，受到邻居的羡慕和称赞。他天资聪明，才华横溢，对公共事务有其独特的见解。作为英国国民，杰斐逊被皇家政府任命为阿尔贝马尔县的“陛下骑兵和步兵总司令”。他还荣幸地被母校威廉·玛丽学院指定为阿尔贝马尔县的土地测量员。他的同胞还选举他为议员，使他进入弗吉尼亚议会。

这就是杰斐逊 26 岁之前的背景，作为一个爱国者，开始了他漫长一生为争取美利坚民族的权利的斗争生涯。从此，他将自己的法律天才转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一个使他一生爱恨交加的事业——政治。

第四章 情缘浅短

上帝不想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来的人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得到十全十美的幸福。

——托马斯·杰斐逊

20多岁时与众多杰出人物的交往，使杰斐逊深受裨益。这段友谊甚至成为他增长知识、立志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和科学家或律师的根本导因。因此，他不仅推迟了开业，而且推迟了婚姻。

但这位充满才气、勤奋刻苦的富家子弟，也曾经在不知不觉中，不由自主地闯进恼人的初恋港湾。

他身高6英尺2英寸，虽然显得细长，但是挺直结实，动作灵活有力，仪态文雅，直率而真诚，谈吐不凡，虽说不上英俊，却也风度翩翩。

他的面庞虽然瘦骨嶙峋，算不上是个美男子，然而却焕发着智慧、善良及活泼愉快的光辉。他的肤色红润；他的红棕色的头发光滑柔软；他的淡褐色的深陷的眼睛富有表情，像澄清的湖水映着天空的彩云，蕴蓄着内心深邃的感情。然而他在异性面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腼腆，这是他在爱情战场上失败的主要原因。

杰斐逊以前一直潜心读书，偶尔也接触过一些女孩子，但她们都如过眼云烟，一闪即逝。

在一次聚会中，19岁的杰斐逊遇见了丽贝卡。美丽活泼的姑娘刚好16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和她兄弟是孤儿，住在叔叔家。在以后的交往中，丽贝卡与杰斐逊渐渐熟悉起来，她便送给杰斐逊一张自己的剪影。

丽贝卡的出现打开了杰斐逊感情的闸门，那久蓄心中的芳情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杰斐逊无助地坠入了爱河。

丽贝卡像天使，像幽灵，像一杯美酒。杰斐逊如痴如醉，他把丽贝卡送给他的那张用黑纸剪成的侧面像，放在表壳里随身携带，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去看那张可爱迷人的脸。

第二年，即1763年，刻苦攻读的杰斐逊的眼睛感染发炎，既不能看书，更不能写字，他回到了夏德威尔老家去休养。可是时间一长，他便思念起威廉斯堡的生活，那儿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充实而又有意义的生活。他给好朋友佩奇写信，信中流露出那种“万念俱灰”的苦闷心情：“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疲疲沓沓、周而复始的。我们早上起床，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又起床，还是老一套。”

在夏德威尔这些无聊的日子中，杰斐逊对丽贝卡的思念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梦里频频出现一双清亮亮的大眼睛，一派纯真。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吃过早饭，为情肠困而又无法排遣的杰斐逊，踏着晨曦，漫无目的地往山上走去。雾霭淡淡，羊肠小道两旁还挂有露珠的小草充满生命力，耳边不时传来几声鸟啼。望着天边渐已升高的太阳，他顿觉心中舒畅了许多，不知不觉中脚步轻快起来。

站在高高的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杰斐逊每每想起第一次见到丽贝卡的情景，就禁不住热血沸腾。那一次，杰斐逊极力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但眉间却掩藏不住内心激动，鼻尖上还沁着细密的汗珠。这种感觉简直就是一种探险，充满了惊诧、浪漫、叹息。

心情稍感舒畅的杰斐逊当晚梦乡甜甜。但就在那天晚上，暮然间大雨滂沱。当杰斐逊醒来时，却发现他衣服上的怀表已完全浸泡在房顶漏下来的雨水里。杰斐逊赶忙捡起怀表，打开检查，镶放在表壳里的丽贝卡的剪影已经打湿了！手忙脚乱的杰斐逊想方设法，想把丽贝卡的剪影取出来，可该死的手竟不听使唤，反倒把它弄破了。看到残缺不全的丽贝卡像，杰斐逊心里顿时涌上一种孤寂凄凉的感觉。他想让丽贝卡再给他一张剪影，却一直不敢开口。

痛苦和幸福一样，是藏不住的。

他忍不住给好朋友佩奇写信吐露隐衷。他还请求佩奇给出主意，是就这样傻呆在夏德威尔呢，还是应当去威廉斯堡找丽贝卡，向她“表示点什么”？他承认自己认为应当去找丽贝卡，“但是理性说，你如果去了，希望落空了，你将比任何时候都会悲惨10倍”。

但是丽贝卡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杰斐逊的脑海之中。他忍不住地想她，而一想起她，脑海的宁静再也找不到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一种外来的力量主宰了。杰斐逊心事重重，茶饭不思。要不要当面告诉丽贝卡呢？她知道我的心思吗？

“我应当去告诉她，不能再这样牵肠挂肚地持续下去了，我得接受她的审判。”他自己鼓励自己。

但另一个理智的声音却提醒道：你这样去做，肯定会凶多吉少。你越是想得，想得深，受到的伤害就越深！

因此，初尝爱果的杰斐逊犹豫不定，进退维谷，并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

他甚至坐立不安，恳求佩奇和他一起坐他的船到英国去。然而丽贝卡却无处不在，以致杰斐逊把他打算乘坐的这条船取名为“丽贝卡”。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到后来，杰斐逊告诉佩奇：“再这样下去，我就快死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我已厌倦生活。当我在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已差不多失去知觉，尽管我还活着。”

然而佩奇的回信使杰斐逊下定决心去找丽贝卡。佩奇对犹豫不定的杰斐逊说，还有不少人追求丽贝卡。他建议杰斐逊赶快去威廉斯堡，“立即想办法去追求”。

朋友的忠告使杰斐逊有些难于接受，却又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1763年10月，他终于回到了威廉斯堡。6日晚，在威廉斯堡雷利酒店的阿波罗厅，杰斐逊请丽贝卡一同跳舞，精心策划并打定主意要鼓起勇气利用机会向丽贝卡求爱。但他一见到丽贝卡，预先构思好的台词却一句也记不得了。于是，他表现得张口结舌，颠三倒四，不知所云。

第二天，他的情绪极为低落。他找到佩奇，对他说：“昨晚我同丽贝卡在阿波罗厅跳舞，本以为会玩得很痛快，没想到第二天我会变得这么可怜！”他还说：“我的天，当时想竭尽全力，而所能做到的一切，便是说出几句支离破碎的话，说得语无伦次，断断续续，连不成句的话语。”不言而喻，杰斐逊一直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丽贝卡拒绝了他！

佩奇极力劝他再去找丽贝卡一次，但杰斐逊说：“再去已不可能有什么用了。”言下之意，他已完全绝望了。

为爱所伤的他，周期性头痛病犯了。

经过痛苦的折磨，他慢慢学会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

他开导自己说：“上帝不想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来的人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得到十全十美的幸福。”

情怀各异，天涯往谈。

杰斐逊实际上是单相思。丽贝卡并没对杰斐逊有多少好感。而且她也并不知道杰斐逊对她那如此刻骨铭心的思念，她只是把杰斐逊当作一位朋友来看待，并没想到过升格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杰斐逊那晚向她求爱时那种狼狈不堪的“丑态”，更使她深感失望。

物化了的生活，严然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万花筒。人人都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星座，找不准自己的星座是一种悲哀。

20岁的杰斐逊正值浮躁焦灼的季节，无奈中饮下了满满一杯初恋的苦酒。

不久，丽贝卡和杰奎琳·安布勒结婚了。

4月份，一次偶然的机，杰斐逊见到了安布勒夫人。那是在弗朗西斯·伯韦尔（后来嫁给了约翰·佩奇）的家庭晚会上，杰斐逊应邀参加。真是“冤家路窄”，当光彩照人的丽贝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恨自己没有穿地术，无处可藏！杰斐逊后来回忆说，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如坠深渊。

无论杰斐逊的热情有多高，他毕竟是脸薄、腼腆之辈。丽贝卡对他的爱慕表现出的冷漠和不以为然使他感到屈辱，他从此把爱心深深地包裹起来，甚至对佩奇说，如果丽贝卡不接受他的求婚，那么他将不再向别人求婚了。杰斐逊一生中，大多数时候对批评和拒绝的反应便是沉默，把怒火按捺在胸中；对感情的伤害，他也作同样的处理。

杰斐逊人品突出，属于弗吉尼亚的绅士，是个身手不凡的音乐家、优秀的骑手，而且是个舞星。不知道丽贝卡是真的看不上他，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也许，从杰斐逊而言，他也有一种隐衷，即还没有做好要结婚成家的心理准备。

有意思的是，就在丽贝卡结婚不久，杰斐逊取消了去英国的全部计划。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可以说明，杰斐逊在潜意识里是想以此来逃避婚姻的。两年之后，杰斐逊到安纳波利斯、费城和纽约作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旅行，部分原因是他想找一个医生给他种牛痘，其他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对丽贝卡来说，她拒绝了一个后来当上美利坚总统的人。从这点讲，她在历史上还是值得一提的。很有意思的是，她婚后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在1899年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嘲弄杰斐逊；另一个和约翰·马歇尔结婚，此公后来成为杰斐逊最顽固的政敌之一。这似乎又应验了这样一句话：冤家终归要聚头。

美国传记作家福恩·M·布罗迪在其《杰斐逊秘史》一书中称，自从向丽贝卡求婚失败后，杰斐逊多年来似乎对女人都充满仇视。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录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诗文，比如他从拉丁诗人那儿，从《失去的天堂》处抄录一些谴责女人和性的诗句。

后来他常常失眠。每当这时，他躺在床上构思或阅读“爱情和谋杀小说”。这一招挺管用，每次差不多翻过两三百页后，就很快入睡了。

杰斐逊终于熬过了因失恋而显得尤为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他又一心扑到了书本上。

在宝贵的青年时期，杰斐逊接触得最多的异性是他的姊妹。而他最喜欢的长姊简的亡故又给了他最大的刺激。

他的二姊玛丽 19 岁时就结婚了。他的小妹玛莎，也是 19 岁就和他最好的朋友达布尼·卡尔结婚了。杰斐逊和卡尔小时一块上学，一起在夏德威尔的森林和山坡上漫步，他们共同在了望处安了一张长凳。正是在这儿，杰斐逊后来修建了自己的蒙蒂赛洛庄园。他们商定，谁要是先死，就埋在一棵选好的大橡树下。

而简却没有结婚。就在她妹妹玛莎 1765 年 7 月 20 日举行婚礼那天，她刚好 25 岁。在杰斐逊的印象中，简是一个非凡的歌手，声音甜美，在清风徐来的仲夏夜，在里瓦纳河边的树林中，简放声歌唱，杰斐逊则拉琴相伴。然而，就在玛莎结婚后大约 10 周，简就死了。杰斐逊伤心极了，好几天茶饭不思，沉默不语。杰斐逊虽然从未直接写她姐姐的死和他的这一损失，但他在年老之时常对外孙们提起简，回忆起小时候他们常在教堂听唱赞美诗和音乐的情景，言罢戚戚。这是自父亲死后，他家遭受的又一次亲人亡故的打击。

后来，杰斐逊在修建他的蒙蒂赛洛庄园时，把他全家的墓地都安排在一起。虽然简死去已 6 年多，他还是把她的遗骨迁到蒙蒂赛洛。就在简的墓地之处，他计划建一个精心设计的圣堂似的洞穴，用以冥想，祭奠亡灵。

当简·杰斐逊 1765 年去世时，还有 4 个需要杰斐逊负责抚养的姊妹。露西 13 岁，另两个是双胞胎安娜·斯科特和伦道夫，都是 10 岁。只比他小 1 岁多的智力不全的妹妹伊丽莎白，日益成为一个恼人的负担，伊丽莎白 30 岁时在一次地震中死亡。地震发生在 1774 年 2 月 21 日，直到 2 月 24 日，伊丽莎白才被发现，当然她已经死了。

彼得留下的遗产中，1/4 给杰斐逊的母亲。杰斐逊每年要给他姐姐 10 镑津贴，给弟弟 6 镑。他还要负责给他的姊妹们满 21 岁时每人 200 镑。因此，有人说杰斐逊直到 27 岁后才结婚，是因为他必须照顾家里。

第五章 披坚执锐

我们将使用敌人迫使我们拿起的武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宁愿做自由人而捐生，不愿做奴隶而苟存。

——迪金森和杰斐逊

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关心政治、关切殖民地命运的托马斯·杰斐逊，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着捍卫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而多事之秋，真的给杰斐逊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舞台。

1756—1763年，爆发了英法七年战争。实际上这场战争一开始的主角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奥地利国王玛丽亚·特利萨为收复西里西亚所引起的。战争发生后，法、俄、瑞典都嫉妒普鲁士的强大，支持奥地利；英国则援助普鲁士，于是形成两大集团。英普集团中的英国维护普鲁士的力量，以对抗法国；普鲁士则利用英国的助力，以牵制法俄。

这场战争的表面现象似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然而实质上却是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

这场冲突在英法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法交恶后，两国不仅在欧洲短兵相接，在北美、印度和非洲也针锋相对。法国因海军远远落后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绝大部分被英国夺去，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战争以签订两项和约而告终。二个和约是英国与法国、西班牙于1763年2月1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据此和约，美洲的加拿大、布里敦角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土地，都从法国转入英国手中。西班牙将佛罗里达让与英国，从法国得到路易斯安那的西部和一笔补偿金。另一个和约是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于1763年2月15日签订的《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奥地利承认西里西亚归普鲁士所有，总之，通过这场战争，法国丧失了大片海外属地；而英国则扩张了自己的海上霸权。

于是乎雄心勃勃、气势汹汹的“日不落帝国”，悍然直接向殖民地征税。

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对输入美洲各殖民地的外国食糖和酒、丝、麻课征各种附加税，并撤销了各殖民地早先曾经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糖税法》的序言明白宣称：“英国议会制定该法的目的，是要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征取税收，以支付各领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费用。”

1765年，英国议会又通过《印花税法》，悍然规定北美一切报纸、小册子、证书、商业票据、期票、债券、广告、历书、租约、法律文件等印刷品，都必须附贴票面为半便士至20先令（用硬币购买）的印花税票。全部印花税收入将在英国议会指导下，用于殖民地的“防卫、保护与安全”。违抗法令，应受不设陪审团的海军法庭审判。

英国议会通过的这两项法律，加重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纳税负担，严重影响殖民地的各种经营活动；更为北美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是，北美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并无代表，英国议会无权向北美各殖民地征税，所以上述两项税法粗暴地践踏了“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准则，将北美人民置于受奴役地位。

对于北美各地众议院来说，它们自治能力已越来越强，要它们笼统地承认英国议会有权给各殖民地立法已经十分痛苦。因为这将直接削弱殖民地众议院的立法权。现在它们如果接受英国议会一项接着一项的征税法令，无异于听任英国议会一举拆毁殖民地众议院借以支配政府的武器——财政权。而

当殖民地众议院从财政上无力控制政府后，它们支配政府人事任命、监督政府活动、影响政府军事的种种力量，都将随之上崩瓦解。

因此，北美各殖民地迅速掀起了反抗《糖税法》、《印花税法》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自由之子社”到处出现，它们鼓动群众袭击征收印花税的官吏，焚烧印花税票，用暴力制止英国人征收印花税。同时，殖民地人士纷纷操笔讨伐。纽约议会向英国议会请愿说：“蠲免未经许可和并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就不可能自由、幸福和安全”。

弗吉尼亚议会走在斗争的最前面，以更为尖锐的决议宣布，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拥有“对本殖民地居民课加赋税的唯一排他性权力”，殖民地居民对于英国议会企图向他们征税的“任何法律不受屈从的约束”。弗吉尼亚的代表还与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等九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召开“反《印花税法》大会”。代表们一致宣告：“除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合乎宪法的课税。”他们抨击说，《印花税法》具有“破坏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明显倾向”。

这一期间，各地还发行大量小册子，宣传“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准则。罗德岛的霍普金斯写道：“英国政府的立身之本是契约，而英国政府颁布的殖民地特许状，保证了所有生来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力和特权，其中包括只向合法当选的代议政府纳税的权力。不经本人同意即被征税夺取财产者，将是可怜的奴隶。”

迫于北美人民如此强大的斗争，英国议会于1766年3月不得已撤销了无法实施的《印花税法》。然而，下院在就《印花税法》举行的辩论中，仍坚称英国议会在大英帝国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利特尔勋爵说，既然北美诸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就必须受英国立法管辖。格林威尔声称英国议会拥有完全统治权；“征税是统治权的一部分”。英国议会在撤销《印花税法》的第二天，立即通过《公告令》称：英国议会在任何情况下对殖民地都具有约束力。

正当北美人民还沉浸在庆祝撤销《印花税法》的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英国议会又于1767年通过了以财政大臣汤森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法》，对北美殖民地进口的玻璃、铅、茶叶、纸征收关税。这项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商业，而不是为了征税，并且以征税所得支付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的薪俸。英国殖民主义者这一换汤不换药的伎俩，当然又遭到北美人民的反对，激起了北美人民更加激烈的抗议运动。

1768年，弗吉尼亚议会开会讨论殖民地的形势，坚持了反对《汤森税法》的立场。新上任的总督波特托便解散议会，宣布举行新的选举。杰斐逊马上脱颖而出，被本县居民推选为议员候选人。他有财产，才能及文化知识在全县也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很勤勉，热心公共事务，曾经为改进里瓦纳河的航行出过力，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好评。

选举日那天，阿尔贝马尔的父老兄弟都来到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县政府。当时的选举仪式很有意思。在县政府，不动产拥有者（即拥有25英亩地及房舍，或100英亩空闲地，或有一所房屋及在镇上有一块地皮的成年白人）当着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不用动笔，更不用“无记名”投票，而是绝对“光明正大”地口头说明投谁的票，周围挤进来的无数观众都可清晰听到。选举由行政司法官主持。他坐在长桌的中央，两侧分别坐着几名治安推事、选票记

录员及候选人。候选人在选举的那天不仅要出席，而且要为选民准备一点茶果点心，选民们可以不考虑自己的政治选择而自由享用所有候选人的招待。杰斐逊的帐本中，对这次“招待”的花销便有所记载。

按规定，每一县在州下议院都有两个席位，每一个不动产拥有者要选出两人，而这次是从三名候选人中选择两名，除了杰斐逊，另外两名候选人是托马斯·沃克和爱德华·卡特，他们都是上一届的下议院议员。不知何故，卡特没有出席最后一届会议。这一情况显然对杰斐逊有利。结果沃克再次当选，卡特这位阿尔贝马尔的大地主输给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杰斐逊。

杰斐逊在4月初告别家人，动身前往威廉斯堡。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他是作为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重返威廉斯堡。正值暮春时节，莺歌燕舞，艳阳高照，坐在马车中的杰斐逊看着窗外的美景，憧憬着这即将开始的崭新的生活。从这一天起，他将正式踏上从政道路，为国家、民族，为自由，为权利而劳碌一生。

1769年，刚满26岁生日的杰斐逊宣誓就职，落座于州的下议院。

新的议会开幕那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议会大厅，就坐议员席。那场面和情景让他既兴奋好奇，又有些忐忑不安。

总督波特托乘坐着英王赐给的八匹乳白色高头大马牵拉的轿式马车来到会场，好不威风。

总督是英王在殖民地的最高代表，由英国外交大臣任命。他们或者曾长期任职于本地参事会，以其忠诚、才干和人望而为英国政府擢升；或者系英国本土官员、议员、贵族，来殖民地任总督并非他们向往之事，但是可能成为他们政治生涯中承上启下的一幕；或者是长期为英国政府效命于殖民地的高级军官，英国政府任命他们为总督，除了靠他们镇守一方之外，还有授官犒赏的意思。

总督领导本地各级行政官员，执行英王旨令，实施议会法律，监督本地的宗教活动；此外，总督作为大将军、总司令，统领本地军事力量，负责本地防务。在立法方面，英国政府赋予总督相当大的权力：他有权召集、解散议会，有权下令议会休会，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和选出的议长，有权决定新的选区，有权指定议会开会地点。这些授权使总督对殖民地议会的权力，大大超过英王对英国议会的权力。

波特托总督发表了“英王所授权”的讲话。根据当时的惯例，总督讲话之后，要由议员作答。杰斐逊被推举上台，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称赞英王和总督。这使敏感的杰斐逊倍感羞辱。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一幕，杰斐逊都似乎“不堪回首”。

这个新议会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数月前英国议会曾建议恢复一项旧的法令，这个法令要求把在王国以外的犯有叛国罪的人，召回英国国内受审。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法令，帕特里克·亨利等人人都将难逃厄运。

在开会后的第九天，弗吉尼亚议会毫不退缩地拒绝了这个法令，并警告英国当局，如果强制把殖民地上任何一个人送到英国受审的话，就会出现“危险和不幸”。此外，议会还郑重宣称，有权向殖民地征税的是殖民地议会，而非英国议会。

第二天，波特托总督一气之下解散了下议院。

当天晚上，这些“卸任不久的民众代表”在雷利酒店的阿波罗大厅聚会。

当时，四个核心人物起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他们是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刚当上下议员的托马斯·杰斐逊，他们被称为“贤人小组”。他们决定发起一个抵制英货的运动。接着，他们向“被解散了的议会”提出《禁止输入决议》，获得通过。这个文件是根据乔治·梅森所草拟的草稿写成的，而这个草稿是乔治·华盛顿和梅森二人从费尔法克斯县带去的。该决议规定：从1769年9月1日起，殖民地人民决不购买英国议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征过税的一切商品；从指定的时间起，也决不进口酒类和奴隶。杰斐逊和其他“主要的绅士们”一道签署了这个文件。似乎是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为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各项权利的斗争中去。

殖民地人民抵制英货，击中了英国的要害。英国当局意识到北美殖民地的抵制，将使英国制造业和商人损失达100万英镑。

波特托在1769年8月下令举行新的议会选举。9月选举的结果揭晓，杰斐逊再次当选议员。

1770年4月，英国政府迫于北美人民的压力，取消了《汤森税法》，只保留了茶税。但是，杰斐逊等人认为与英国的斗争远未结束，因为茶税继续保留，是对北美人的权利的侵犯。热心于维护殖民地权利的杰斐逊在1770年6月又参加签署另一个《不进口协议》：在茶税取消之前，决不进口英国的任何商品。这个协议是在议会春季开会期间，一大群议员和地方商人达成的。

1770年10月，波特托为病所扰，一命呜呼。一年之后，即1771年10月，新总督邓莫尔接任。邓莫尔是个死硬派，他试图以高压手段来镇压、对付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抗议。他一到任，就下令解散议会，重新选举。11月，杰斐逊第三次当选。1772年2月，新议会开幕。

1772年6月9日，发生了“夏斯皮”号船被焚事件。英国派来的关税巡邏船，在普罗维登斯附近遭到愤怒的殖民地民众的袭击，并被放火焚烧。调查委员会建议：凡被调查证实为肇事者，就将被押送到英国受审。这个建议使议会议员们大吃一惊，因为这威胁了殖民地的自治。此外，4月13日，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宣布此后他将从英王手中直接领取薪金，这意味着他可以乘机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这也不利于殖民地的自治。

鉴于此，塞缪尔·亚当斯在10月5日向各市镇发出吁请信，号召人们奋起抗议这些措施。11月2日，波士顿市镇大会宣布成立21人通讯委员会，负责与其他市镇及其他殖民地建立通讯联系。11月20日，该委员会向波士顿市镇大会报告了三份宣言，然后把宣言分发给其他市镇。宣言主要陈述了殖民地人民所应享受的权利及这些权利被英国侵犯的情况。

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马萨诸塞的行动。弗吉尼亚人也不例外。1773年初的一天，在雷利酒店的一间密室里，杰斐逊、理查德·亨利·李、弗朗西斯·莱特富特·李、帕特里克·亨利和达布尼·卡尔等激进分子，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其目的是想所有其他的殖民地达成谅解，把反对英国的无理态度的斗争，看作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并采取一个统一的行动。为了这个目的，每个殖民地都应该成立一个通讯委员会，这是互相联络的最好办法。而且大家还建议在某一个重要地点，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代表的会议，由这个会议负责指导共同的对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小型会议上的思想，便是后来大陆会议的体现。

这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由卡尔起草的决议。议会也通过了这个决议。邓莫尔恼羞成怒，再次解散议会。杰斐逊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第四次进入议会。

在杰斐逊等人的努力下，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终于成立了。它由 11 人组成，杰斐逊作为委员之一出席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的成立，也推动了其他殖民地普遍成立这样的组织。这样，就把分散的 13 个殖民地的人民联成一体，为了共同的目标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在通讯委员会成立之后，事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773 年，炙手可热的东印度公司由于财政拮据，请求英国政府援助，获得了向殖民地出口茶叶的垄断权。由于汤森茶税的缘故，殖民地人民一直在抵制该公司运来的茶叶。1770 年后，走私贸易风气甚盛，美洲消费的茶叶，有 9/10 是未经缴税从外国偷运进来的。

东印度公司还决定把茶叶价格压低到市价以下，由公司代理一手销售。这样，既可以使走私商无利可图，又把殖民地的个体商人排除在外。殖民地的商人不仅由于失去了茶叶生意，而且也看不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做法，便和爱国志士们联合起来。事实上，所有殖民地都已采取了行动，阻止东印度公司执行其计划。

在波士顿以外的其他港口，东印度公司的代理都纷纷被说服辞职不干了。茶叶不是退还英国，就是封存在仓库里。但是在波士顿，该公司代理却拒绝辞职。在皇家总督的支持下，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准备卸下船上的茶叶。1773 年 12 月 16 日夜，一群人化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登上了三条停泊在港口的英国船，把船上的茶叶全部倒入波士顿海港里。这便是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这一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当局大发雷霆，决定施行报复。1774 年 5 月，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性措施，宣布从 6 月 1 日起封锁波士顿港，禁绝一切对外贸易，并调兵遣将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1774 年 6 月 1 日，英国颁布的波士顿海港法令生效，波士顿被封锁之后，对外通商被割断，波士顿粮食来源受阻，人民陷于饥饿、混乱的边缘。英国殖民者这种残酷的手段，无疑把殖民地人民逼到墙角，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提出抗议。

波士顿工人拒绝为英军修筑兵营，当马萨诸塞总督向纽约征募工人时，纽约市的工人也拒绝这项工作。不仅如此，马萨诸塞通讯委员会在 1774 年 6 月草拟了《庄严盟约》。这是借用 1643 年时英格兰与苏格兰曾订下确立长老派地位的《庄严盟约》的名称。这个盟约的通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号召美洲人民坚决地进行抵制英货运动，它标志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激烈斗争的重新开始。

英国决定封锁波士顿港的消息传到弗吉尼亚，使这里的革命者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是袖手旁观，还是休戚与共，和北方兄弟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英国这个强大的敌人？

在此紧要关头，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弗朗西斯·莱特富特·李等四人，被历史的机遇推上了浪尖。他们认识到，为了“把人民从昏睡中唤醒”，最好的办法便是建议议会，指定 6 月 1 日——波士顿港开始被封闭那一天为绝食祈祷日。在这一天，发动全体人民举行祈祷，祈祷上苍促使英国国王及英国议会回心转意，对北美采取公正的态度，以便使人民避免一场战争的灾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教会对人们的影响甚深，以宗教祈祷形式容易把人们团结起来。

这个小团体推举罗伯特·卡特·尼古拉在 1774 年 5 月向议会提出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又获议会通过。这使邓莫尔更为恼怒。他马上又行使总督的权力，下令解散议会。

邓莫尔的行动并未能阻止议会激进分子的反英抗议活动。杰斐逊等人在雷利酒店集会，并发表《告人民书》称，“为了确保我们所心爱的权利及自由免于遭到权力的巨掌所破坏”，就必须采取行动。正是这个《告人民书》最后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议：由弗吉尼亚通讯委员会立即把下述内容通知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由各殖民地指派代表，每年在被认为是最方便的地方开一次总的会议，在会议上商讨美利坚的联合的利益时需要的那些措施。”这样，杰斐逊等四人首先倡议了召开大陆会议。

英国政府被北美人民的大无畏反抗活动所激怒。英王乔治三世写信给英国首相诺思勋爵说：“局面已经无法转还，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

英国议会迅即通过一系列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惩罚造反的北美人民，逼迫殖民地投降。

第六章 良缘天降

她是我生活中最珍视的伴侣，我们的爱经久不息。在过去的10年里，我生活在无拘无束的幸福之中。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情场失意使他心灰意冷。他曾一度表示不再鲁莽行事。他为生活的不公平而痛苦，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夜以继日，心无旁骛，试图从书中寻觅补偿与慰藉。

有道是，缘份可遇而不可求，就在杰斐逊27岁那年，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那双眼睛宛如盲者心中的星辰，清澈明亮，永不熄灭。杰斐逊冰凉的天空中终于出现了一轮太阳。

身为弗吉尼亚州下议院议员的杰斐逊因工作需要，常去一个名叫约翰·威利斯的家里，而且他们还有业务往来。因此他认识了约翰·威利斯的女儿玛莎。

约翰·威利斯是一位知名的律师，家道富有，有10多个种植场、400多名奴隶。威利斯先生则是公认的“勤勉、守时、敏捷”的人。

关于玛莎的情况资料甚少，没有画像，甚至连剪影也没有，只有她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埃利诺·麦迪逊的，与为革命的士兵集资、做衣服有关。字迹整齐，略显拘谨。

杰斐逊对她的亲笔描述已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信件也一封未留，显然是杰斐逊将这些私人信件有意全部销毁了，使不致泄露他最深沉的个人感情。

玛莎的身世比较复杂。她的父亲约翰·威利斯娶了3个妻子。第一个玛莎·爱泼斯·威利斯，在她女儿玛莎出生后3周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科克小姐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长大成人，她们是伊丽莎白、塔比莎和安妮。她死后，威利斯又娶了第三个妻子伊丽莎白·洛马斯，她是鲁本·斯凯尔顿的寡妇。11个月之后，她又去世了。她去世时，玛莎只有13岁。5年后，玛莎18岁，和她继母伊丽莎白的第一个丈夫鲁本·斯凯尔顿的弟弟结了婚，玛莎的胞妹伊丽莎白·威利斯（她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所生）和玛莎的母亲的外甥弗朗西斯·爱泼斯结婚。这种复杂的联姻关系反映出了早期的弗吉尼亚乡村生活，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

然而，这还没完。在其第三个妻子死后，玛莎的父亲约翰·威利斯又爱上了他的混血奴隶贝蒂·赫明斯。贝蒂已经和另外一个奴隶生了6个孩子，后来她又给约翰·威利斯生了6个。在约翰·威利斯死后，她又生了两个，其生育力极为旺盛。她的14个孩子，除3个夭折外，其余全部长大成人。贝蒂后来生活在蒙蒂赛洛，直到1807年她73岁时才去世。

贝蒂给约翰·威利斯所生的6个孩子中，有3个儿子——罗伯特、詹姆斯、彼得，3个女儿——克里蒂、萨莉和西娜。他们都随身份为奴隶的母亲姓赫明斯。其中的萨莉后来成为杰斐逊的情妇，并一直陪伴至他去世。

玛莎很漂亮，身体中等偏高，柔弱高雅，具有“优雅、女王般的仪态”。她有一双淡褐色的眸子和金棕色的头发，肌肤白皙。18岁时，她与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结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儿子，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从1766年11月20日到1768年9月30日，她的这次婚姻只有短暂的22个月。她与杰斐逊结婚时，带来一个4岁的男孩小杰克·斯凯尔顿。

说来也巧，她的丈夫巴瑟斯特是杰斐逊在威廉-玛丽学院读书时的旧识。

在频频的交往中，年轻美丽的寡妇玛莎引起了杰斐逊的注意。多才多艺的她还会演奏拨弦古钢琴，歌声更是甜美清亮。痴迷音乐的杰斐逊因此更被深深吸引。

一天，几位年轻人又在老威利斯家碰面了，其中不乏玛莎的崇拜者。交谈中，“情敌们”言辞激烈起来。闻到火药味的杰斐逊巧妙地离开了书房，坐到客厅中的钢琴边高歌起来。这一招果然灵。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引来了卓文君以身相许，杰斐逊的嘹亮歌声也引来了玛莎的“以声相和”。二人随着琴声沉迷放歌。一曲终了又和一曲，二人心领神会，暗送秋波，末了，杰斐逊会心地带着他的帽子离开了大家。也许这就叫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

杰斐逊 1770 年再次坠入爱河，这一次可是清醒的，而不像 7 年前那次是朦朦胧胧的。当年他 27 岁。

杰斐逊按当时“真正的礼仪风俗”求婚。玛莎没有立即答应，又没有明显拒绝。已有过遭断然拒绝伤害经历的杰斐逊，燃起了希望。在认识玛莎一年之后，他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在我每一个幸福的生活方案中，她都是占据突出地位的主要角色。假如没有她，它就不是我的生活方案了。”

杰斐逊的执著追求终于如愿以偿。

1772 年 1 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她家里——离威廉斯堡西面几英里的查尔斯城举行了婚礼。那是 1772 年新年元旦节。这时玛莎 23 岁，杰斐逊 28 岁。玛莎的一个姻亲兄弟罗伯特·斯基普威思在他们婚前对杰斐逊说，她是个“脾气极好”的女人，她“性格活泼，通情达理，保证你能享受到常人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幸福”。

结婚两周后，他们把儿子留下，到 400 英里之外的蒙蒂赛洛，并顺访在吐卡霍的伦道夫家。但在回蒙蒂赛洛时却遇到了大风雪天气，无法乘车，只得骑马踏上归途。虽然当时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山路崎岖难行、夜幕即将降临，但新郎官杰斐逊却兴高采烈、热血澎湃、一路欣喜。

杰斐逊的大女儿这样回忆道：

他们在黄昏时分离开了布莱海，沿着一条山路前进。雪越下越大，地面的积雪深达 18 英寸至 2 英尺，离蒙蒂赛洛还有 8 英里地。他们到家时已是深夜，壁炉的火早已熄灭，仆人都回到自己的屋子睡觉去了。我后来常常听到他们提起这次阴冷、可怕的旅行。

第二天他们醒来时，窗外苍茫大地上白雪茫茫，积雪已厚达 3 英尺。杰斐逊沉浸在新婚燕尔的良辰美景之中，享受着人生的一大欢乐。对家庭的眷恋，使他没有回到威廉斯堡下议院，整个 2 月份的议会的会期都缺席了。这是他第一次把妻子摆在比政治高的位置上，但并非最后一次。

杰斐逊的生活常常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撕裂：一方是他的爱妻；另一方是他的事业。难怪有的传记作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玛莎不死，杰斐逊恐怕难以当上总统。

杰斐逊与玛莎结婚后搬到尚在建造中的蒙蒂赛洛，他们的生活充满幸福和生气。

在此，很有必要介绍杰斐逊的“蒙蒂赛洛”庄园。

杰斐逊早就想建造一座自己的房屋，但直到 1767 年他被正式承认为弗吉尼亚的律师之后，他才开始较详细地规划未来的住宅。

在其规划中，那不是一间城市中的别墅，而是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庄

园，有精心设计的花园、果园和有鹿的猎园。

他在 1767 年 8 月 3 日的《园艺簿》中首次提到“蒙蒂赛洛”这个名字。蒙蒂赛洛离杰斐逊的出生地夏德威尔不过 1.5 英里。

杰斐逊对建造心爱的蒙蒂赛洛庄园乐此不疲，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是一种引人入胜的爱好，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创作。用他的后来说便是：“你在哪里能再找到大自然可以在我的眼皮底下展开如此丰富美丽的幕布？”想到蒙蒂赛洛，就会唤起他最深沉的感情。他深情地说：“当我的一切愿望结束时，我希望我的一生也在蒙蒂赛洛结束。”蒙蒂赛洛庄园简直成了他梦中的伊甸园、他最终的归宿。然而，晚年时，他债台高筑，竟差点连这个心爱的庄园都保不住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杰斐逊是通过自己观察和从书本上学习的建筑知识来设计的。他看不起威廉斯堡的建筑。他每到一处总是留心观察、比较当地的建筑。据记载，他在威廉玛丽学院读书时，第一次买了一本关于建筑方面的书，此后这方面的书也越积越多。一些传记作家认为他最初为蒙蒂赛洛设计时，参考的是詹姆斯·吉布斯的《建筑学知识》及其《绘图规则》，以及罗伯特·莫里斯的《建筑式样选编》。这些书一度在美洲风行，介绍的是意大利大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建筑思想。帕拉第奥的《建筑学》是杰斐逊最喜欢的书之一。

1768 年，杰斐逊让人将山顶开出并平整了土地。第二年，开始建房造屋。到 1770 年 11 月，第一座房舍已差不多完工。当年，杰斐逊决定正房建在中间，两旁建侧厅。在草图上，他画的是：正中有一两层楼高的圆柱门廊，圆柱呈两种不同的形式，以较结实的陶立克式的柱头来支撑爱奥尼亚式的圆柱。这是帕拉第奥的式样。

与玛莎结婚后的 10 年中，蒙蒂赛洛庄园一直在修。玛莎去世时还没修完。蒙蒂赛洛一直建了几十年，反正 40 年后也没有完成他设计的最后样式。因此可以说，杰斐逊一生都在修筑他的归宿。

杰斐逊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设计蒙蒂赛洛庄园上。他曾制作了 500 多幅设计图。他开始计划在小山上造房子是 1767 年，到他于 1770 年底搬进去这段时期中，他画了 21 张设计图；另有 6 张大约是 1771 年初画的。学者们考证后认为，他画的蒙蒂赛洛的建造、重建和改造的图纸、草图及测量图总共有 200 多张。

蒙蒂赛洛是杰斐逊创造的第一项工程，从弗吉尼亚种植场的标准来看，虽不是最壮观的，但肯定是最有独创性的。虽然杰斐逊参考了很多书，比如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关于建筑的 4 本书，但他并不是简单模仿。他是测绘者、设计者、工程师、制图员，直到今天，该建筑在采光、风格 and 对称方面都是杰出的。

杰斐逊一生对建筑都十分热衷，他被认为是美洲“第一个土生土长的伟大建筑师”，是一个古典派的建筑学家，但这并不是说他保守，他的建筑设计风格与弗吉尼亚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学家偶然不同。他的品味即使不是具有革命性的，也是当时美国建筑中最独特的。法国科学院的马奎斯·查斯特勒克斯在 1780 年参观了蒙蒂赛洛之后说，他被杰斐逊和这幢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称赞“杰斐逊先生是最杰出的美国人。他把美术和建筑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在这座精心设计建造的庄园中，燕尔新婚的杰斐逊给爱妻买了一架钢琴。他还邀请到威廉斯堡表演的意大利音乐家弗朗西斯·艾伯特指导他提高

小提琴技艺，并指导玛莎弹钢琴。那时，他们一天练习3个小时，夫唱妇随，其乐也哉！可见他们对音乐的痴迷。

杰斐逊在蒙蒂赛洛过着贵族生活，有娇妻美酒相伴，在绿草如茵的花园草坪上读哲学书，和妻子谈音乐，弹琴歌唱，轻谈浅醉，享受妙曼时光。但这并未阻碍杰斐逊继续踏上革命之路。

杰斐逊的外孙女为玛莎作的“画像”是：性情开朗，很有魅力，外祖父被她深深地吸引了：她随和，处事得当，是个操持家务的能手，对丈夫的朋友热情相待，她为外祖父创造了一个舒适、愉快、幸福的家。

玛莎虽是名门闺秀，却懂得如何经营农场，懂得如何管理奴隶，还会记帐，懂得如何招待客人，总之，她能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使杰斐逊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

杰斐逊还遇到了一位好岳父。在杰斐逊眼里，岳父“最通情达理，开朗，充满幽默感，是个受欢迎的人”，老威利斯也对杰斐逊很有好感，对他的为人处事、学识更是称赞不已。老威利斯还专门指定杰斐逊为他遗嘱的执行人。

和玛莎结婚，使杰斐逊的财富激增。1773年老威利斯死后，杰斐逊不仅得到了135个奴隶，而且还有11000英亩的土地。杰斐逊本来就有5000英亩土地和大约50个奴隶。但为了替他岳父还债，他卖掉了11000英亩土地中的一半，保留了3个种植场，即贝德福县的波普拉森林、埃尔克岛和古奇兰德的埃尔克山，以及蒙蒂赛洛。这使杰斐逊成为弗吉尼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

1772年6月，玛莎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小杰克·斯凯尔顿死了。遭受巨大打击的玛莎黯然神伤，郁郁寡欢。在事隔3个月后的1772年9月27日，她为杰斐逊生了第一个女儿，取名也叫玛莎，大女儿玛莎又叫帕齐，出生后没有奶吃，后来找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奴隶给她当奶妈，她后来长得结实健康。1774年4月3日，二女儿简·伦道夫出生。

玛莎在与杰斐逊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死于襁褓之中，一个死于幼年，只有两个长大成人。因此，杰斐逊一生中多次遭受丧子之痛的打击。1773年，正当杰斐逊一家过着安乐日子之时，他的挚友兼妹夫达布尼·卡尔不幸早逝。杰斐逊深感悲痛。卡尔1771年11月同杰斐逊一起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能言善辩，才华出众。他和杰斐逊有相似的政见。卡尔死后，杰斐逊为履行幼时的诺言，把他改葬在蒙蒂赛洛山坡上的那棵橡树下。杰斐逊把卡尔的寡妻及6个遗孤都接到蒙蒂赛洛家中，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

第七章 崭露头角

杰斐逊先生以神笔著称。由于他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代表，因而得以为下议院写出了一篇非常漂亮的公文，使他得到了优秀作家的美名。

——约翰·昆西·亚当斯

1774年，北美处于大革命的前夕。在英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北美人民已经团结起来，斗争的热情高涨。其中，通讯委员会起了重要的联络组织及协调作用。在弗吉尼亚《告人民书》的号召下，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都加紧活动，安排召开代表大会。在杰斐逊等少数几位领袖的倡导下，弗吉尼亚各县居民都集会选举代表，以便出席预定于8月1日在威廉斯堡举行的殖民地代表大会。

1774年7月，夏日炎炎，阿尔贝马尔县的自耕农热情高涨，他们推选杰斐逊和约翰·沃克为本县代表，并且通过了一份由杰斐逊起草的决议。决议不长，它这样写道：

英属北美各邦的居民，只服从他们在定居伊始时所制定的法律，以及自那时起根据居民自己同意正当选出的各个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任何其他立法机关，都不能对他们轻易地行使权威。这些特权是他们作为人类所享有的共同的权利；是他们分别接受的政治宪法以及国王所颁发的特许状所认可的。

该决议强调了“英属北美各邦”的独立性，初步体现了杰斐逊在北美与英国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激进的立场”。

在等待威廉斯堡代表会议开幕的这个间歇期间，杰斐逊在蒙蒂赛洛享受着家庭生活的美好时光，同时思考着北美的未来。

那时，正值7月，热气袭人，杰斐逊眺望窗外那宽旷的如茵草地，眼前浮现出一个美好社会的未来蓝图，禁不住浮想联翩，思如泉涌。他把上述决议中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展开，最后写成一篇长文。他原想把它作为“训令”发给出席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希望他们敦促大陆会议起草一份以该训令为蓝本的致英国国王的请愿书。

7月下旬，他乘四轮敞篷马车下山动身前往150英里之外的威廉斯堡。由于路面凹凸不平，加上烈日炎炎，马蹄过后，红尘四起。杰斐逊一路辛劳，不小心又感染上了痢疾，极度不适，只好半途而返。

由于不能亲自与会，他只好将他写的报告抄了两份，差人送到威廉斯堡，一份递交佩顿·伦道夫，另一份送给帕特里克·亨利。伦道夫很重视，他把这个报告推荐给其他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些议员更设法把这个报告印了出来，在威廉斯堡广为散发，题目叫《英属美洲权利概论》。

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中说，我们的祖先在移民美洲前都是欧洲英国自治领土的自由居民，拥有自然给予所有人的离开那个由于机会而不是选择而居住的国家的权利，拥有寻求新聚居地的权利和拥有在那里建立新社会的权利。据此而制定的法律和条例，最有可能促进公众的幸福……

总之，杰斐逊在其“要求英王尊重北美人民的权利”的呐喊之后，大胆而明确地列举了英国议会对北美的暴政；否定英国议会的权威，否认了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权；反对英国任意支配北美的土地。

文章还猛烈抨击了英王纵容北美奴隶制度。文章指出，北美人民一再力

图通过禁止及寓禁于税的办法，来达到禁止从非洲贩运进奴隶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被陛下运用否决权击败了”。杰斐逊谴责英王“只是袒护少数非洲海盗的切身利益，而置美利坚诸国的长远利益及人民的权利于不顾。而这个声名狼藉的勾当，深深地戕害了人性”。

阅书百纸尽，落笔四座惊。

这个报告旁征博引，从历史事实到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道德判断，逻辑缜密，掷地有声，颇具说服力和感召力。加上杰斐逊擅长“文字表述上的特殊技巧”，使之成为“英语散文之杰作”。

这本 23 页的小册子，在起初出版时并未署名，只是在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含糊的话：“一个本地人，一个州的下议院议员。”小册子不胫而走，不久在费城和伦敦也翻印发行，特别是在英国接连印发了好几版。后来，杰斐逊的名字逐渐披露了出来，因而名声大噪。原因之一，“恐怕是它的观点太大胆、太冒险了。”

正是这个报告的发表，把杰斐逊推到了捍卫美洲权利斗士的前列，赢得了普遍信任。两年后，他即被当然地选入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

在此报告中，杰斐逊除了广泛地论述各项原则外，还详细地列举了美洲人对英国议会和王室的不满意，提出一连串的指责：“我们从英国移居到此，并没有赋予它统治我们的权利，正如丹麦人和撒克逊人的移居，并没有给他们母国现政权统治英国的权利一样。”后来他将这些都补充写入了《独立宣言》。

小册子激怒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及他周围一大批阿谀奉承的臣仆们。于是有一段时间，杰斐逊被列入黑名单上。

由于这是杰斐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而且是《独立宣言》的先声，因而格外引人注目。他在这一时期头脑中各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也就特别令人感兴趣。

18 世纪上半叶，美洲殖民地已经进入了繁荣时期，城镇逐渐增多，同欧洲大陆的交往不断扩大，各种信仰的移民大批涌来，因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的新物理学、洛克的自然神论也相继传入北美。这些学说对北美的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的种种科学上的发现，特别是牛顿的物理学说所揭示的理论，即天体是按照一直不变的物理法则而运行的说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启示：人类社会也可能被种种不变的自然法则所支配。这种道德世界观意味着人们拥有“天赋权利”——人类与生俱来的某些自由权——并非由于任何国王的恩赐，而是人们生来就拥有的，这即是自然法则。

这些观念在欧洲兴起时，其中的主要思想家有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约翰·洛克（1632—1704）和让—雅克·卢梭（1712—1778）。其中，洛克关于法则观念和天赋权利的学说，对北美人民的影响最大。

洛克指出：所有人类社会都禁止谋杀。这种道德观念的普遍性，就为反对谋杀的自然法则的存在提供了合理证据。基督教义所启示的道理就肯定此点。洛克认为：如果上帝或者自然规律叫人不要谋杀，那么，每个人都有一种责任——它是自然法则所硬性规定的——不要杀人。反过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权不被人所杀。因此，洛克断定，人的基本天赋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财产对于生命是必要的。因为人既然有权活着，则他应有权拥有和利用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种种事物，并有权在认为适合的情况下使用自身劳动成果。

根据洛克的理论，按照自然法则，人本来就生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之中。不过，人们为了享受同他人一起生活的好处，故而同意去组成社会，限制某些自由并接受管理。之后，又在人们和统治者之间基于“同意”的一种社会契约上面建立起政府。人们同意服从当局；政府则允诺代表组成社会的个人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公正地实施统治。任何政府违犯社会契约并剥夺任何人的天赋权利，均不得不丧失其本身的合法性。如果一个政府变得专权和侵犯天赋权利，人民就无须对它效忠并有权去更换它。

洛克还认为：一个基于同意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其组织结构一定要容许公众表达同意或意愿。换言之，一个合法的国家必须具备代议制机构。他在孟德斯鸠（1689—1755）思想出现之前，就主张权力应按职能而分立，以防止野心勃勃而缺乏道德的领导人滥用它。

杰斐逊在撰写《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之前，即1769年12月，收到从伦敦运来的一批重要书籍，其中有《孟德斯鸠全集》、洛克的《关于政治学的两篇论文》和伯拉玛奎的《自然权利法则》。这表明，他在1774年写成《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之前，就已熟悉天赋权利的思想。

1771年，他曾为罗伯特·斯基普威思开列精选书单。在“政治、贸易”的大标题下，杰斐逊开列了8本书，前几本是：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洛克的《关于政治学的两篇论文》和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关于政治学的论著》。他认为这些书是论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杰斐逊对西德尼的著作十分推崇，称之为“共和原则的丰富宝藏，立论详尽，说服力强，并且还饰以最精湛的科学之花。这恐怕是各种文学中最好的一部根据天赋权利论述政治学原则的启蒙书”。此外，他的书单上还有博林布鲁克勋爵的五大册政治著作、孟德斯鸠的《罗马政权的兴衰》以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等。

由此可见，杰斐逊的民主进步思想是在18世纪70年代初逐步形成的。他反对一切专断权力，反对教会权威，对一切旧事物他都抱一种大胆怀疑的态度。他特别重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他否认作为人格神的上帝的存在，是自然神论者。而且杰斐逊尤其强调，人民的权力来自自然法则，而非长官的恩赐。他满怀激情地呐喊：“赋予我们以生命的上帝，同时也把自由赋予了我们。”他接受了“自然权利学说”，热烈拥护自然权利，这一学说实际上成为杰斐逊民主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北美与英国的矛盾激化之前，杰斐逊就已仇恨暴政，但在当时对于君主立宪并不反感。只是到1776年，在对英的流血斗争开始后，他才成为一位共和主义者。

他在初次接触人民主权观念时，感到它很合理，比国王的神圣权利更合理得多。杰斐逊受到洛克和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深刻影响，他对这样的立论深信不疑：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势必演成暴政。

杰斐逊的上述思想都体现在《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之中。然而，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本历史著作或政治理论著作，而主要还在于它在1775年和1776年所起的政治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杰斐逊向往美洲独立的思想是鲜明而强烈的。

这本小册子的发表，对由波士顿倾茶事件所引起的反英浪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杰斐逊和亨利为代表的弗吉尼亚议员，对英国的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他们支持波士顿的《庄严盟约》，一致认为英国对马萨诸塞的压迫，就是对

全体北美殖民地的压迫。他们主张全体殖民地人民集会，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外来压迫。他们的这一呼吁得到了各殖民地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费城、纽约等地纷纷举行集会，认为波士顿的弟兄们是为所有殖民地的共同利益而战斗，因此各殖民地应对波士顿人民加以援助。纽约建议召开一个各殖民地联合会议，来商讨解决殖民地的共同问题。于是，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联合会议在费城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就是第一届大陆会议。

这次大陆会议的会期为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除佐治亚外，其他殖民地均派代表参加，共有55名代表。这些代表的来源复杂，有些是由殖民地议会选举的，有些是由当时“非法”的群众团体选出的，有的则是由反对英王总督而组成的临时议会选出的。大陆会议代表意见分歧甚大，并不是一个革命领导团体，并没有武装抵抗的意图，更没有计划要颁布独立宣言。

在大陆会议中，进步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开始时，保守派气焰嚣张，咄咄逼人，竭力打击进步派的新英格兰代表，企图使会议无果而终。在开会之前，其他代表都警告约翰·亚当斯不得说出“独立”二字。弗吉尼亚代表帕特里克·亨利挺身而出，驳斥保守派的言论，主张殖民地团结御侮。亨利以他势不可当的辩才坚定地说：“我们不可认为我们还是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我不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却是一个美国人。”他认为必须向英国提出抗议书，列举1763年以后英国对殖民地的压迫。亨利的发言在大陆会议上引起了更大的争论。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议会中未被选入出席大陆会议的七人代表团（选举时他名列第八位），他的《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也没被弗吉尼亚代表团提交大陆会议，但这位民主权利的积极捍卫者并未作壁上观。会议之外，31岁的杰斐逊与威尔逊、亚当斯公开发表更为激烈的理论，彻底否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任何合法的管理权。他们提出：英国议会的权力在历史上并无根据，“不列颠帝国的所有一切互不相同的成员，都是彼此独立的特殊国家，只不过是因拥戴同一个国王而被联结在同一位君主之下”。

杰斐逊虽未能直接与会，但他的《英属美洲权利概论》和詹姆斯·威尔逊的《英国议会立法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探讨》一起在代表中散发。

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以羡慕的心情阅读杰斐逊的这一小册子，他们似乎预感到一颗巨星正在冉冉升起。这时，杰斐逊的名字渐渐在各殖民地传播开去。而当这一小册子传到英国时，杰斐逊的名字被列入了将被送往伦敦塔（英国监狱）的黑名单。威尔逊虽然也不承认英国议会有统治殖民地的权力，但仍主张忠于英王，这一观点在当时颇有市场。

然而，当时局势的剧变对大陆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

就在大陆会议开会期间，已传来波士顿人民和英国驻军冲突的消息。1774年9月9日，马萨诸塞进步人士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以武力抗击波士顿英国驻军，呼吁各殖民地合作，号召各殖民地成立政府，自行征税，与英国、爱尔兰和西班牙及印度断绝商业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派影响大大加强，大陆会议反英情绪高涨。最后，大陆会议还通过了一份《权利宣言和怨愤陈情书》，指出1763年以后英国对殖民地公布的高压法令“非法”，并表示，殖民地人民根据自然法则及天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以及英国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对于英国人民权利的规定，均不能遵从那些“非法”的法令。

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组织“联合会”，决定禁止输入奴隶，号召人民

彻底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代表们同意按照 1774 年 8 月成立的弗吉尼亚联合会的模式，组成一个严格的禁止输入、消费和输出联合会，要求各殖民地必须在 1774 年 12 月 1 日以后停止进口一切英国商品，1775 年 9 月 1 日以后停止出口。为实施协会决定，将在每一县、城、镇设立委员会，违反决定者将作为美洲自由的“敌人”，并将他们的名单公之于众。不服从协会决定或违反决定的殖民地，将被视为“不配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对他们的国土怀有敌意”。

阿尔贝马尔县也选举成立了委员会，由 15 人组成，杰斐逊名列第一。杰斐逊对大陆会议的各项行动都表示热情的支持。他立即将“联合会”有关文件散发给全县的地方官员。

北美人民的团结和声势日渐浩大的行动震撼着殖民统治者。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英王宣布：“新英格兰的那些政府现在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些国家还是独立。”列克星顿划破晨雾的枪声作出了回答，北美人民勇敢地接受了英国政府的挑战。

波士顿自 1773 年爆发了倾茶事件之后，已是一座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山。1774 年，数团英国新军驻扎在波士顿城，军纪很坏。奸淫妇女，酗酒滋事，更激起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者的决心。

波士顿驻军司令托马斯·盖奇在得悉马萨诸塞的志士们正在离波士顿 32 公里外的内地小城康科德搜集火药和军需品时，便于 1775 年 4 月 18 日夜，从驻防军中派遣一个强大的支队去没收这些军火，并准备逮捕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并把他们押送到英国受审。但保罗·里维尔和两个通讯员早就把这一机密情报通报了整个乡村。

奔波了一夜的英军抵达列克星顿时，在迷蒙的晨雾中，看到 50 名民兵隔着一块空地并排着。起初，双方都有一点迟疑，只是互相喊叫和下命令。喧哗之中，一声枪响；接着，双方开火，民兵后退，在草地上留下 8 具尸体。这是为美国独立战争而洒的第一滴血。

英军继续向康科德推进，“严阵以待的农民”在北桥边“打响了震动全球的枪声”。英军劳师以袭远，损失惨重。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消息飞快地传遍 13 个殖民地，从缅因到佐治亚到处都燃起了同仇敌忾的怒火。

弗吉尼亚的局势也日趋紧张。1775 年 3 月，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大会选举了原来的代表出席 5 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伦道夫由于是弗吉尼亚地方议会的下院议长，如果弗吉尼亚总督要召集议会开会，他就不能出席大陆会议，于是，会议决定推选杰斐逊在佩顿·伦道夫不能出席大陆会议时，接替他为代表出席。

4 月 20 日深夜，邓莫尔总督将原属殖民地的火药储备从威廉斯堡的弹药库里偷偷转移到约克河上的一艘英国战舰上。这一行动不仅激怒了威廉斯堡人，而且激怒了这个殖民地上所有的弗吉尼亚人。

同时，列克星顿的流血事件也正好传到弗吉尼亚，杰斐逊的判断是，该事件“毁灭了我们最后的和解希望，狂热的报复要求似乎已激荡在各阶层人民之中”。战争的来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和初衷。北美各地稳健的政治家们一直在努力敦请英国政府作出让步，缓和殖民地人民的不满，不愿让殖民地激进派把局势引向无可挽回的冲突。英国政府的明智之士，同样一再呼吁英国下院和内阁承认殖民地众议院的权利，不要强行压制殖民地，否则，将会出现“决定性的一击”。但事态的发展让人们不得不提高警惕。5 月 10 日

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立即要求各殖民地处于防守状态。

人们普遍推测，邓莫尔坐不住了，肯定又要召集议员们开会。

事实上，在这种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召开下议院会议是很不适宜的。但由于英国的诺思勋爵5月份提出的和解性建议已发给各殖民地总督，指示他们在各种会议上将建议提出，于是不出所料，邓莫尔总督在5月12日通知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于6月1日开会。

诺思勋爵的建议是2月下旬英国下院通过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提出，任何殖民地议会只要同意分担帝国的共同防务费用，支持该殖民地的市政府，英国政府就将不得向该殖民地征收其他有关的税。

弗吉尼亚议会一开始，邓莫尔就以和解的语调，在讲话中提出了诺思的这个和解性建议。但由于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几桩不愉快的事件，议员们反应颇为冷淡。州下议院在审议诺思建议的同时，通过了大陆会议和里士满大会的决议，并坚持要求调查邓莫尔从威廉斯堡弹药库偷运火药一事。双方僵持不下，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气氛越来越紧张。邓莫尔感到情况不妙，于6月8日晚，趁着夜色悄悄溜出总督官，逃到约克河英国军舰上避难去了。

对杰斐逊来说，他又一次有幸目睹了帕特里克·亨利精彩的辩论，这使他永生难忘。在这次弗吉尼亚州议会会议中，保守派就激烈反对弗吉尼亚组织民兵反抗英国暴政。亨利毅然站在革命的立场，主张向暴虐的统治者宣战。他大声疾呼：“再没有缓和局势的余地了。先生们也许还要叫嚣和平、和平、和平——但和平是不存在的。战争已经真正开始了！下一次从北方疾驰过来的暴风，就要在我们耳边响起武器的叮当声音了！我们的兄弟们已经在战场上！为什么我们还要懒懒散散地站在这里？……生命固然宝贵，和平固然甜蜜，但值得用配上枷锁和奴役来交换吗？……我不知道旁人会采取什么措施，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这响亮的词句，成为战鼓声，回响在里士满的圣保罗大教堂里。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听众席上的杰斐逊情不自禁地一边站起来，一边鼓掌。

为什么亨利的演说如此惊心动魄呢？也许从来没有人会提这个问题，或许会从其他地方寻找答案。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亨利大声疾呼自由，渴望自由，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他的心里在流血。那时他的爱妻精神失常，只好呆在地下室里。地下室有一小通道与大厅相连，亨利每天要下去喂可怜的妻子吃饭，亨利的妻子患病近一年后去世了，亨利精神蒙受了重大打击。

如何认识和判断个人心灵创伤对其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很有争议的话题。

美国历史上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原英国人托马斯·潘恩激烈鼓动、呼吁美国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这种强烈的叛逆感与他的婚姻生活有关。他的第一个妻子常抱怨潘恩每天一大早都要她起来烧饭，后来她在生产时不幸去世。娶了第二个妻子后，自认为能扬眉吐气的潘恩却发现自己已“失去性能力”，以致他妻子公开抱怨他，这使他极为难堪。潘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774年邂逅本杰明·富兰克林，于是远渡重洋来到美洲，把妻子永远留在了英伦岛上。他在1775年的《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一文，其中表露出了他在《常识》一书中所竭力主张的思想：新大陆应完全与英国脱离。

当时，杰斐逊是弗吉尼亚众议员，他主动承担了拟定对诺思和解建议的

答复稿的工作。从大陆会议匆匆赶回的佩顿·伦道夫急着要使弗吉尼亚的答复同正在举行的大陆会议的情感“保持一致”，因此一再催促他尽快起草。

杰斐逊起草的弗吉尼亚的各项决议，拒绝了诺思的建议，“因为英国议会无权过问支持殖民地市政府之事，英国建议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英国议会的所有为众人反对的法令一条也没有废除，军队仍驻在美洲，各殖民地无时不处于遭受从陆地和海上入侵的威胁之中”。决议最后表示，要维护其他所有殖民地的利益，并希望“我们将在自由、财富和与大不列颠联盟的赐福下，再一次团结在一起”。由此可见，杰斐逊写的这个决议比他的《英属美洲权利概论》要显得温和一些。但是在献身于美洲的独立事业方面，他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不仅丝毫不减，反而与日俱增。

6月10日，威廉斯堡议会一致通过了杰斐逊起草的“答复”。第二天，杰斐逊马不停蹄启程前往费城，顶替伦道夫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加入到了—场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斗争中去。

第八章 一鸣惊人

一切荣誉都归于杰斐逊——这个人在为民族的独立而斗争的紧急的形势下，以冷静的态度、深邃的预见性及明智的头脑，把适用于一切人类及一切时代的抽象的真理写进一个单纯的文件之中。这个真理是永垂不朽的，所以今天和永久的将来它将是一个对于暴政的谴责，并且对暴政及压迫的出现，将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

——亚伯拉罕·林肯

6月21日，乘坐四轮马车颠簸了10天的杰斐逊，终于抵达费城。这不仅因为杰斐逊在威廉斯堡有些要事需要处理，而且还由于杰斐逊曾试图说服乔治·梅森替他出席大陆会议，杰斐逊对梅森无比崇敬和信任。在与朋友菲利普·梅蔡的谈话中，杰斐逊称赞梅森是“由自然为了特殊目的而创造的，他坚定无比，智慧无穷，像丹蒂、马基雅维利，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特戈特、赫尔维蒂斯一样，都是天才”。

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约60人，大都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都是各地遴选出来的出类拔萃的精英。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年纪最大，已近七旬，32岁的杰斐逊是最年轻的代表之一。约翰·亚当斯在1822年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说：“杰斐逊先生是1775年6月来到会场的。他随身带来了文学、科学及写作才能方面的荣誉。他的作品以措词巧妙著称，因而到处为人传诵。”

在亚当斯看来，杰斐逊“虽然在会议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成员，但是在委员会里及交谈当中，他是那么思维敏捷、谈吐坦率、直爽而果断”。

第二届大陆会议是在5月10日召开的。佩顿·伦道夫回威廉斯堡后，由约翰·汉考克接替他来主持会议。

当杰斐逊还在路上时，大陆会议已决定将波士顿民兵改编为大陆军队，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杰斐逊到达后两天，华盛顿将军即在鼓乐声和群众热烈拥护的欢呼声中，离开费城去波士顿。那时，殖民地人民义愤填膺，群情激奋，到处都在热烈地谈论着战争。和解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孰胜孰负，唯有一战。

杰斐逊结识了与会的众多英豪名士。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却从未有机会相识。像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这些人也好奇地想见见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天才，因为他早就享有“殖民地权利发言人”的名声。特别是因为他的《英属美洲权利概论》曾在上一届会议上广为散发，使他名声鹊起。罗德岛代表塞缪尔·沃德，在杰斐逊第一次在会议上露面后说：“昨天，接替伦道夫先生的杰斐逊先生到达了……他看上去精明而有朝气，是个优秀人才。”

杰斐逊的写作才能在他参加大陆会议之后不久即派上了用场。会场上坐在杰斐逊旁边的是利文斯顿州长，他首先提议让杰斐逊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们刚刚认识，先生。”杰斐逊对邻座的信任大吃一惊，他问到：“为什么你相信我能胜任呢？”“因为我知道，你写过优秀的文章，我们当然需要优秀的作者参加。”

6月23日，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由华盛顿将军在波士顿担负起指挥军队的重任时发表。委员会将草案提交会议时，会议决定让杰斐逊和约翰·迪金森也加入委员会工作。杰斐逊于是重新起草宣言，但他的语

调远不如《英属美洲权利概论》那般慷慨激昂。委员会还不满意，将杰斐逊的草稿交迪金森改写，至7月6日将宣言提交会议讨论。会议用了一天时间逐段讨论，稍作改动便通过了。这篇题为《必须采用武力宣言》是一个妥协性的宣言，它避免提到殖民地必须进行反英的独立战争，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我们的主张是正当的。我们的联合是坚固的。我们国内的资源丰富，同时，在必要时，外援是一定可以得到的。”杰斐逊的特长受到了注目并得到了发挥，他为此而万分高兴。

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通过不太强硬的《必须采用武力宣言》的同时，还决定给英王乔治三世写第二封请愿书，49名代表签了字，杰斐逊也毅然决然地签了名。

同时，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议会向大陆会议建议，对诺思勋爵的和解建议给予正式答复。7月22日，一个写作班子正式成立，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理查德·亨利·李受命组成委员会。

由于杰斐逊曾起草了弗吉尼亚议会的答复并带来了一份，因此他被指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随后由其他委员提出建议。大陆会议对该委员会的“答复”草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后，于7月31日正式通过。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杰斐逊从弗吉尼亚下议院的文件中摘出的。这个“答复”猛烈抨击了诺思的建议毫无道理、阴险狡诈、难以接受。

杰斐逊参加大陆会议的头六周，就在起草会议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个文件在殖民地的报纸上广为刊印。虽然这两份大陆会议的文件并未公布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杰斐逊的名字，但会议代表却在此看到了杰斐逊的文学天才和论战的天赋，以及他对美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已逐渐成为大陆会议引人注目的主要人物之一，并且站到了革命者的前列。

大陆会议通过对诺思勋爵建议的“答复”后休会到9月初，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当时，作为弗吉尼亚主要管理机关的代表大会，正在里士满开会；杰斐逊是阿尔贝马尔的代表，因此他留在了那里，没有马上回蒙蒂赛洛。值得高兴的是，杰斐逊亲自看到了他再次被选为参加大陆会议的正式代表。这次他的选票名列第三，他得了85票，紧随89票的佩顿·伦道夫和188票的理查德·亨利·李，名列本杰明·哈里森、托马斯·纳尔逊、理查德·勃兰德和乔治·威思之前。帕特里克·亨利已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军队的总司令，因而不能再被选举。

杰斐逊将这次代表大会选举看作是他在大陆会议工作的信任票，因此倍受鼓舞。由于持续不断地工作，他希望能暂时完全离开公众舞台，回到自己那安静舒适的家里，去度过这个月剩下的几天。于是，他回到了蒙蒂赛洛那漂亮的庄园。

杰斐逊在蒙蒂赛洛的短暂停留期间，由于二女儿简·伦道夫的夭折而郁郁寡欢，回费城的时间也推迟了。大陆会议于9月13日召开，他到那里时已是10月1日了，代表们都在为征兵、组织军队和解决给养问题而紧张工作。大不列颠没有给予任何和解答复，前景莫测；与此同时，费城得到消息，英国将增派军队到美洲。10月，英国海军士兵毁烧缅因的法尔茅斯城。11月，大陆会议得知，英王乔治三世认为大陆会议是非法团体，拒绝接受北美殖民地的请愿书，并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号召英国人民拒绝给殖民地援助。12月，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断绝与殖民地的贸易。英王的暴虐政策将和平之门紧紧关闭了。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1738—1820）自1760年即位后就有专制野心，企图亲自统治英国。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75—1783），以及此前英国加紧掠夺北美殖民地、殖民地反英群众斗争此起彼伏的15年间，正是乔治三世在位时期。

自乔治三世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杰斐逊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给英国的约翰·伦道夫的信中，这一转变就有所流露。

过去，杰斐逊将美洲不安的主要责任归于英国议会，而他在这封信中责怪的是英王乔治三世，称他是北美“最大的死敌”，“在这种时候有了这种素质的国王，真乃整个帝国的巨大不幸”。

在攻击英王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北美独立的问题。

他写道：“他们采取的措施正在逼着我们走这一步，他们好像生怕我们不会走似的。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整个大英帝国找不出一个比我更真诚地希望同大不列颠结为同盟的了。但造我的上帝作证，要让我屈服于英国议会提出的条件来保持这种联系，我将不再生存下去，而这点，我想我说的是美洲人的感情。我们既不需要诱导，也不需要权力来宣布和坚持分离。我们只需要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在我们的国王亲手培育之下迅速增强的。一场流血战争大约会永久地决定我们未来的道路；我很遗憾地看到，一场流血战争已在所难免。”

大陆会议原定1775年12月冬季休会。可是会议继续开了下去。杰斐逊因离开弗吉尼亚3个月来，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片言只语；再说，自他9月离家后，弗吉尼亚已发生了战事，这使杰斐逊对蒙蒂赛洛家中的情况忧虑万分。因此，趁当时大陆会议没有紧迫的问题要讨论，他在12月底动身自费城返家。

杰斐逊在蒙蒂赛洛休整了一段时间，但没想到母亲于次年的3月底故去，时年57岁。杰斐逊的间发性头痛又接踵而至，他只好躺在床上一个月不能动弹。

1776年5月14日，杰斐逊回到了大陆会议。乔治三世在前一年10月的英国议会开幕式上宣称北美发生的是“叛乱战争”，“明显地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帝国而战”。英王的这一认定得到英国议会的支持，于是批准进行战争，妄图使美洲殖民地重新归顺英国。同时，英王和内阁大臣们雇用了德国雇佣军到美洲作战。这些做法迫使原来只想在帝国内部争得他们应有权利的许多美洲人考虑选择独立之路。

于是，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1月及时出现在费城，当时并未署名，它呼吁美洲人立即宣告独立。潘恩的格言是：“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我的家乡。”“世界是我的祖国。”这本激情洋溢的小册子立即成为千百万美洲人争相阅读的佳作。当约翰·亚当斯发现了《常识》作者的真实姓名时，曾这样称赞道：“他的名字叫潘恩，一位从英格兰刚到这里两年的人……他的瞳孔里闪烁着天才。”早在2月初，托马斯·纳尔逊就从费城给杰斐逊寄了一本。潘恩的这一思想与杰斐逊不谋而合。

独立的观念正在弗吉尼亚乃至美洲大陆上迅速传播。还应当指出，当时由于教会的宣传，《圣经》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源泉之一，世俗的革命领袖也巧妙地利用这一神圣工具。《出埃及记》这篇经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旧约·出埃及记》中传说，公元前13世纪，古希伯来人领袖摩西同上帝订约，率领其同胞离开埃及，摆脱奴隶境遇。摩西逝世前曾指定约书亚为

其继承人。战争年代，美国人被喻为 3000 年前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的后裔，英王是法老，华盛顿就是上帝培育的领导美国人民重建新以色列的摩西和约书亚。

杰斐逊回到费城不到两个星期，弗吉尼亚代表团就收到了弗吉尼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示他们向大陆会议提出独立的建议。

弗吉尼亚代表团遂推举理查德·亨利·李向大会提出有关独立的议案。5 月 10 日，先由李在会上提了一个初步决议案，内称，由于各殖民地已无有效政府，所以建议“各殖民地议会或代表大会设法建立按人民代表的意见认为最能导致各该殖民地以及全亚美利加之幸福和安全之政府”。

5 月 15 日，亚当斯为上述决议增加了一个序言，内称，由于英王已把殖民地居民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因此“英国之任何种类之权力施行应宣告全部终结，政府的所有权力应置于各殖民地人民的权力之下”。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上述决议和序言都获通过。但这离独立还有相当距离。

在大陆会议中，主张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和反对独立的斗争是相当尖锐激烈的。43 岁的约翰·迪金森接替了退休的约瑟夫·加洛韦，而成为反对独立的先锋人物。约翰·亚当斯称迪金森为“一个阴影，又瘦又高，像一根芦苇。你若第一眼看到他所得到的印象将是，他活不了一个月”。

迪金森的家族在 17 世纪时，从英国移居到美洲。他接受过比较严格的教育。他因写作《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而名声大振。这篇文章至今仍是美国革命时期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迪金森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声音悦耳，富有感染力。他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迪金森的领导下，宾夕法尼亚州威胁说，如果宣布独立，它就立刻退出。

除了宾夕法尼亚之外，还有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五个殖民地反对独立。但就在这几个反对独立的殖民地中，也有一些人是赞成独立的，比如宾夕法尼亚的威尔逊、纽约的罗伯特·利文斯顿、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利奇等。

与此保守力量相对的是要求独立的力量。塞缪尔·亚当斯公开要求与英国一刀两断；约翰·亚当斯表示他已放弃了最后一线和解的希望；最激进的理查德·亨利·李呼吁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为独立、为自由而战；杰斐逊呼吁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挣脱英王的统治，实现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6 月 10 日，会议决定到 7 月 1 日再讨论独立问题。但会议又决定：“为了避免丧失时间，可成立一个委员会提前准备好一份宣言，宣言应体现第一项决定，也就是这样一句话：‘诸联合殖民地有权，而且也应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萨尔曼和利文斯顿被会议指定组成五人委员会，承担草拟宣言的任务。

富兰克林 70 岁，是当时北美名声最大、威望最高的老前辈，甚至为欧洲政界所推崇。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信仰新教的圣公会教徒，1682 年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全家从英国来美洲。富兰克林幼年志愿从事航海事业，喜读书。1717 年，在他 12 岁时即跟随他的哥哥詹姆斯·富兰克林学习印刷业，充当学徒。1721 年，詹姆斯创办《新英格兰日报》，富兰克林经常为之撰稿。1726 年，富兰克林组织了“共读社”，帮助手工业者、工人、职员等进行自学。1729 年，他收买了一家印刷厂，兼营贩卖奴隶、契约奴和与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生意，不久即独自经营《宾夕法尼亚报》。由于他写文章赞成发行纸币，宾夕

法尼亚议会通过发行纸币的议案以后，即给予富兰克林发行纸币的权利。富兰克林名利双收。后来又在费城建立图书馆，发起组织美洲哲学会。富兰克林在 1749 年至 1753 年之间，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对宾夕法尼亚市政的革新、谷物和肥料的施用、新式火炉的发明、电学的发明等都有贡献。1757 年曾出使英国，达五年之久。

在宗教信仰方面，富兰克林接受了长老会的宗教信仰，但他深受自然神论的影响，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管理茫茫宇宙，是创造世界的原始，是宗教的元素。但他不参加礼拜，对各种教派同样敬重。

富兰克林的思想是美国资产阶级文化上升时期的代表。他博学多才，德高望重，颇受北美各殖民地人民的尊重。

亚当斯 41 岁，是马萨诸塞州屈指可数的著名爱国人士。他作为政治家及演说家的声誉，很久以来就引起了伦敦政府及议会人士的注意。

萨尔曼 55 岁，是康涅狄格州最杰出的爱国革命人士，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只有 30 岁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是后起之秀，但他不久在政界就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后来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时，就是由他主持宣誓的。他比杰斐逊还小 3 岁。

由谁来执笔起草这个宣言呢？据说亚当斯和杰斐逊曾相互推让：

亚当斯：“我不干。”

杰斐逊：“你应当干。”

亚当斯：“不！”

杰斐逊：“你为什么干？你就该干。”

亚当斯：“我不干。”

杰斐逊：“为什么？”

亚当斯：“理由多着呢。”

杰斐逊：“会有什么理由呢？”

亚当斯：“第一，你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人就应在这种事上打头阵。第二，我是讨人嫌、靠不住和不受欢迎的，你却正好大大相反。第三，你写的东西比我的好 10 倍。”

杰斐逊：“那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将尽力而为。”

亚当斯：“好极了。等你拟好了稿，咱俩再碰头。”

以上这段话是亚当斯在时隔 46 年之后的老耄之年回忆的。他还说，他和杰斐逊被任命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完成这一工作。后来杰斐逊听到亚当斯的这一段回忆后认为，亚当斯记错了，根本没有什么小组委员会，而是委员会全体“一致要求我独自担负起草的工作”。杰斐逊说，他已是 80 岁的人了，并非想声明自己的记忆力比 88 岁的亚当斯强。但他坚持说，他那时作的笔记证明亚当斯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亚当斯之所以记得有个小组委员会，大概是因为杰斐逊写出草案后分别交给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提建议和修改，然后才提交委员会全体讨论。

大陆会议在讨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之前，得先讨论李的要求独立的议案，并于 7 月 1 日恢复辩论。

首先发言反对独立的，是宾夕法尼亚代表约翰·迪金森。他发表了长篇大论，论述独立之不妥。亚当斯从法理和宪法角度加以反驳，陈述了“朴素和普通的道理”。

辩论过程中，会议对委员会通过的杰斐逊草案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删去了约 1/4，在措词方面作了润色，有好几处还“伤筋动骨”地进行了实质性修改。

比如，其中涉及平等和幸福的词句，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草案的开头一句话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的和不可剥夺的。”然后继续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生而独立；由此他们获得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大陆会议对这段话作了改动，这样，《独立宣言》不会因政治文体而显得冗长罗嗦，相反，读起来像诗一样明快简洁：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修改后的句子节奏紧凑、掷地有声。表示性质的定语强烈而清楚：“不言而喻的”真理，“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用语极易引起美国民众感情上的共鸣。不言而喻的真理自然无须论证，只须“揭示”。直截了当地陈述人人平等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树立高远的理想，人人平等是现实存在，是美利坚国家过去和现在立国的基础。

类似这些修改润色，使《独立宣言》的确增色不少，杰斐逊很满意。但也有他的不满之处，宣言中最重要的修改是会议删掉了杰斐逊谴责乔治三世允许继续进行奴隶买卖的一段。杰斐逊的这段用语非常强烈，斥责奴隶买卖是“反对人的本性的一场残酷战争”。据杰斐逊说，这一修改是按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愿望而作的。但他又补充道：“我相信我们的北方兄弟也认为这些指责不太成熟，因为他们的民众尽管自己拥有很少的农奴，然而贩运给别人的还不少。”大陆会议对此段缩短和修饰了一些文字用语，并作了大部分修改，杰斐逊对此十分不满。这位极其敏感的作者认为，他的原草案是一篇极为强烈的声明。为此，他将议会通过的《独立宣言》给几位朋友寄去，附上草案原文和修改之处，让他的这些批评家们自己判断修改后是好还是坏。富兰克林看出了杰斐逊的心思，并安慰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做帽商写了一句广告词——“约翰·汤普森帽子商，生产和销售，现钱现货”，他谦虚地征求邻居们的意见。在征求总结了邻居们的意见之后，这个广告变成了在“约翰·汤普森”这几个字旁边画着一顶帽子的图案。

1776年7月2日，经过各种修改、辩论，最激动人心的投票表决开始了。除纽约代表奉命不得不弃权外，所有代表团都投赞成票通过了这一议案。

杰斐逊对此喜形于色。

约翰·亚当斯的兴奋同样溢于言表。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最大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1776年7月2日，将是美国历史的新纪元，——我愿意相信，它将得到我们后代的支持。”

决议案这样写道：“诸联合州有权而且应当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州；它们解除与英王的所有的臣属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间之所有政治联系全部应当废除。”在赞成独立议案的大前提下，大会再于7月4日开始了关于《独立宣言》的辩论，并最终除纽约州外全部通过。后来，7月15日，纽约代表收到新的指示，赞成独立，于是这一议案和宣言为全体一致通过。

就在签署《独立宣言》之时，代表们心情舒畅，竟开起玩笑来。大腹便便的哈里森对又瘦又小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开玩笑说：“我将比你强，格里

先生，当我们将因现在所做之事上绞架时，从我身材的高大和重量来说，我一上绞架片刻便命归黄泉，而你将在空中悬上一两个小时才死得了。”

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是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他的签名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或约翰·亚当斯，甚至比《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字都更醒目。约翰·汉考克大笔一挥签完名字后，抬起头来说：“好啦，现在英国国王不用戴眼镜就可以看清我的名字了。”

约翰·佩奇7月20日给杰斐逊写信时说：“很高兴你起草了《独立宣言》。上帝保佑美利坚。”

约翰·迪金森拒绝在《独立宣言》上签字。

《独立宣言》以清晰的语言表述了美国早期的“立国原则”，它贯穿着一种明确的哲学思想，即当时流行于大西洋两岸的“自然法”哲学。

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卡尔·贝克尔指出，“自然权利哲学是《独立宣言》的历史前提”。而杰斐逊在1825年致亨利·李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而具体：《独立宣言》“既没有发现新的原则，也没有发现新的观点”，只是力图表达“辉格党”的思想。

《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道：“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则”，乃是一种时代精神，包括人类性质和社会关系的自然过程和原则，以及有关人类权利和正义的表达，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激荡于整个西方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武装，是人类摆脱封建桎梏转向理性时代的桥梁，也是《独立宣言》及整个美国革命借以出现的哲学依据。正是根据这一哲学，杰斐逊才敢于在《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人人平等、自然权利，确保自然权利作为政府之目的，确保被统治者的“同意”作为政治合理的原则，以及当自然权利被剥夺时进行反叛的道义权。“人人生而平等”，即人们平等地拥有自然权利，平等地在法制下表达意志，平等地参与决定政府和法律形式，以及平等地享受劳动成果。“不可剥夺的权利”，即按人的本性是合理的道义上的权利；在形成和控制政治社会时，这些权利在法律上不得被否认或取消；这种人性被认为是处于自然法下的人们任何时候都具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宣言中特别提到的自然权利，它对约翰·洛克讲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作了一个重要改动，但这一改动并不意味着否认“财产权”属于人的权利，因为财产权通常被视为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必要手段。一般地说，追求幸福以自由和生命为前提，而自由又以生命为前提，生命又以其他条件为前提。

《独立宣言》在宣布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自然权利后，按逻辑紧接着把它引向“主权在民”论，以杰斐逊那有力的笔触简明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独立宣言》写道，“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惟有这样

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是对“主权在民”论的高度概括和巧妙运用。

最后，宣言认为，这些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按杰斐逊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因为它们都是“常识性原则”，因而使用这些原则是无需证明的。然而，这些有关“人的自然权利”的常识，以往只写在宣传和政论小册子中，而美利坚人却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它写在正式文件上，被确定为美国立国的哲学基础。

《独立宣言》的宣布，成为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虽然人们都知道大陆会议在讨论宣言，但大陆会议是不让民众进去旁听的。

在宾夕法尼亚地方议会大厦的尖塔上，挂着一座大钟。这座钟是宾夕法尼亚地方议会 23 年前从伦敦进口的。钟上铸着队《圣经》上摘录的预言性的铭文：“向全国各地所有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天，在宾夕法尼亚地方议会的院子里，大会派人向等待已久的 3000 名群众宣读了《独立宣言》。宣读甫毕，听众就报以震天的欢呼声，同时军队在“公共广场”上列队前进，礼炮连鸣。从尖塔上传来的钟声一直响彻夜空，这座钟发出了欢乐的响声，它昭告，《独立宣言》通过了。这是宣告英国统治在新大陆终结的丧钟。

华盛顿对《独立宣言》的发表十分高兴，的确，它正式承认了早已存在的一种局面，而且它使妨碍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一切苟且偷安、实现和解的幻想，从此烟消云散。

7 月 9 日，根据他的命令，在下午 6 时向全军每一个旅宣读宣言。他在命令中说：“将军希望，这一重大事件能够更加激励每一个官兵忠诚英勇地战斗，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完全有赖于我们作战的胜利，而且他们为之效劳的国家现在完全有力量论功行赏，把一个自由国家最高的荣誉授予他们了。”

公众对《独立宣言》的反响是出乎异常的热烈。

心情激奋的纽约居民，除了用钟声来宣告他们的喜悦之外，还不满足。在城堡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座乔治三世的铅像。既然英国的统治已经结束，为什么还要保留象征他的统治的铅像呢？于是，当天晚上，人们就在一片呐喊声中把铅像推倒砸碎，以铸成子弹“用于独立的事业”。

巴尔的摩的革命者用烈火焚烧了英王的模拟像；在萨凡纳，英王像被埋葬起来，商店门口的皇家军队标志被拆掉，有的还干脆付之一炬，或砸碎。

当时，除大陆会议中的几个朋友外，没有人知道《独立宣言》是杰斐逊起草的。直到 1784 年，这一“内幕”才在美国报刊上披露出来。

第九章 冲破樊篱

我已在上帝的圣坛前庄严宣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压制人类思想的暴政，我都将与之斗争到底。

——托马斯·杰斐逊

《独立宣言》发表后，杰斐逊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返回弗吉尼亚。他已决定到年底即放弃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资格。

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在投票前已得知他的意见，却没有收到他正式提出退出候选人的信件，于是继续选他为代表。杰斐逊不得不要求解除此职。

杰斐逊急于放弃大陆会议席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妻子的身体状况令他担忧。他在信中委婉地提到：“家事微妙，恕我不予详述。但个人私事需要我这样做。”1776年6月，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将代表团的人数从7人减为5人，虽然保持了法定人数，但代表们不能随便缺席了。所以，杰斐逊要等到理查德·亨利·李回到费城后，才能离开大陆会议。直到9月3日，杰斐逊才得以脱身。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极想参加弗吉尼亚新政府。在他看来，新的州才是新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的真正组成部分，在这里做事要比在大陆会议做的事重要得多。革命伊始，杰斐逊正值盛年，革新的热情正旺，他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做了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些工作。弗吉尼亚的改革在他的领导下，废止了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使英国圣公会与政府分离，并禁止以宗教异见为剥夺他人权利的依据。

早在1776年7月同其他代表一起通过主要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之前，他曾埋头为弗吉尼亚起草拟议中的宪法。当乔治·威思带着杰斐逊起草的宪法草案于6月23日抵达威廉斯堡时，他看到以乔治·梅森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已经提交议会。杰斐逊的宪法草案就只能作为修改、补充的参考了。在通过的宪法草案前言里，加了一段指控乔治三世的“罪名”清单，以证明政府的改变是有道理的。这一段就是从杰斐逊的草案中吸收进去的。

杰斐逊为弗吉尼亚所写的宪法草案，记录了他在独立战争时期对政府所持的观点。他建议更广泛的选举权，主张有选举权的除拥有财产者外，成年男性纳税人也应包括在内；他主张放宽只有土地的限制，规定每一个未拥有50英亩土地的成年人有资格获得50英亩土地，或给他补足50英亩土地，杰斐逊还主张减少本州东部代表在议会中的过大比例，按照人口比例由各县推选代表。然而，新宪法保留了以现有财产的多寡限制投票权、不给予土地、继续实行每县在下议院有两名代表名额的殖民地制度。

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在1776年5月中旬除通过要求独立的决议外，还规定任命一个委员会，拟订成立弗吉尼亚政府的计划。杰斐逊对此满怀希望，他非常想参与弗吉尼亚政府的设计。于是，他满腔热情地精心写出了包括三个草案的详细计划，递交弗吉尼亚代表大会。

由乔治·梅森执笔，在宪法之前即由弗吉尼亚代表大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同杰斐逊的草案一样，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杰斐逊走得更远，建议“不得强迫任何人常去或开办任何宗教机构”，从而给予已有的英国圣公会教堂重重的一击。

总而言之，杰斐逊认为弗吉尼亚宪法在进行改革方面走得不够远，不像他想象中的革命应当实现的那样。他失望的心情表露无遗。埃德蒙·彭德尔顿还要求杰斐逊用他的才能“在砍掉新宪法缺点的同时对它进行润色”。乔治·威思也开导杰斐逊说，新制度尚须改进。朋友的这些意见，坚定了他在弗吉尼亚投入新政府筹划的愿望。

杰斐逊最感兴趣的还是修订法律。他通过《独立宣言》为这个新生国家制定了基本原则，此时他急于要把这些原则体现在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之中。当他1776年10月成为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议员时，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一项只由一个人承担的最有深远影响的立法改革”。这就是1776年秋天开始的领导争取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的斗争。

到了州众议院，他发现自己同其他大多数众议员常常不能和谐一致。他的提案有些几年都通不过，有些则一直没能成为法律。

他提倡对旧秩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扩大选举权和增加民选代表；实行开放的和个体的土地所有制，消除封建残余；制定更加合理而且人道的刑事司法法规；逐步废除蓄奴制度；建立全面的国民教育制度；解除英国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在绝对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条孪生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宗教生活秩序。这些改革中的大多数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是在独立后通过第一部弗吉尼亚宪法后的这几年来，在重大的立法活动中，没有人能起到比他更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影响。

从宗教因素来说，迫使移民前往北美的动因是不堪忍受欧洲的宗教迫害，而北美并非就是宗教自由的天堂，其宗教专制主义曾一度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北美宗教自由，指的是如果你在北美某个殖民地受到宗教迫害，你可以到另一殖民地去谋生或新创建一个殖民地；并非说信奉某一宗教的人在北美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可以畅所欲言。

实际上，宗教专制主义在北美殖民地初创之时即已露端倪。1609年弗吉尼亚的特许状规定，移民登船去美洲前，必须已宣誓忠于上帝和英国国教会。17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由于下层民众的斗争而出现了较为宽松的气氛；但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宗教专制主义又再度猖獗。

英国国教教会是在殖民地初期立下根基的，这一点本来并无特别之处。世界各国都实行政教合一，国教是唯一的正宗，不信奉国教的人虽然可能被人容忍，但是要遭受大量的痛苦和惩罚，如以死刑惩治异教徒，对亵读宗教信仰的言论严加惩罚和强制做礼拜等。此外，根据法律，一切居民，包括一切不同意见的教徒在内，都必须缴纳什一税，以供养官方教会的牧师，而官方教会的牧师都过着奢靡放荡的生活。

在北美殖民地，除罗德岛、特拉华和新泽西没有指定正统教会外，其他殖民地均设正统教会。北部殖民地的正统教会是清教教会；南部正统教会为主教教会；在中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分别以贵格会和主教教会为正统教会，殖民地当局往往把正统教会的教义作为治理殖民地和规范殖民地社会道德准则的理论依据；与正统教会的教义相抵触的非正统教会的教义，则被视为异端邪说，信奉非正统教会教义的人自然就是异端分子，遭殖民地当局的驱逐甚至无情迫害。所以，清教徒在南部遭驱逐，主教教徒在北部横遭放逐，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罗德岛之外无立锥之地。

迫害异教徒的刑罚异常残酷。中世纪式的酷刑在宗教专制时期的北美殖民地都被施行于异教徒。1631年，一位名叫菲利普·拉德利夫的人，就因“恶

意中伤政府和教会”而被判处鞭挞、割耳、罚款 40 先令，并被驱逐出马萨诸塞。1647—1663 年及 1688—1693 年间，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带领下，新英格兰地区发生了殖民地历史上极为悲惨的迫害异教徒的所谓“巫覡事件”。仅 1692 年发生的塞勒姆血案中，清教徒就惨杀了 20 名无辜的异教徒。1741 年，在纽约又发生了迫害异教徒的惨案，100 多人被捕，35 人被处死，70 多人被流放。

因此，在殖民地时代的北美，人们尽管怀着对自由、民权满腔热忱的追求，奔赴新世界闯荡天下，但新世界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自由的乐土。他们注定了还要为宗教自由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杰斐逊成为他们的旗手，为宗教自由付出了 10 年的艰苦努力，并最终取得成功。他自己也承认，那是他整个一生中最严峻的时刻。

他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是针对殖民地上的宗教压迫的。

根据 1770 年的调查，在北美 13 个殖民地中，有 9 个殖民地建立了官方教会；在北部 3 个殖民地——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公理会派教会成为官方教会；在中部和南部 6 个殖民地——纽约、弗吉尼亚、马里兰、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及南卡罗来纳，圣公会（即英国国教会）取得官方教会的地位。

只有宾夕法尼亚及罗德岛实行的是宗教自由政策。

在弗吉尼亚，圣公会派教会是官方教会，它到 1776 年为止已经统治了 100 多年。在英国和殖民地政府及法律的保护之下，圣公会的信条及礼拜仪式居于统治地位。官方教会的牧师们靠民众的纳税而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养尊处优的生活。独立战争前，官方教会的许多牧师沉溺于赛马、打牌、跳舞、看戏、酗酒的狂欢之中。

圣公会派教会的宗教迫害是骇人听闻的：父母如果拒绝让子女接受该教会的洗礼，就是犯罪行为；禁止教友派非法集会；在境内禁绝任何一个教友派，发现时必须放逐；异教徒是死罪，要被处以火刑。还有，如果一个在基督教义下长大的人否认基督教的真实性，或者否认《圣经》的神圣权威，他将不能担任宗教、民政及军队中的任何官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随着 18 世纪脱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圣公会也就随之丧失了活力、影响力和教众。杰斐逊指出，弗吉尼亚的公民大概有一半人已经不再信奉英国国教了。美国革命把这样的状况解释为人们对国教已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

1776 年 10 月，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召开之际，请愿书如雪片一般飞来，纷纷要求取消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并免除对非信教者的歧视。

11 月，杰斐逊在州众议院发表演说，扼要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主张。他先列数国教教会种种弊端的历史教训，大部分是欧洲的往事。然后又指出，甚至在弗吉尼亚，法律也规定以死刑惩治异教徒，不承认三位一体（违背第三诫）要判徒刑三年；读神法则规定得以因言论和宗教信仰而对人施加惩罚；按照弗吉尼亚的法律，进教堂做礼拜是强制性的。当然，这些法律大部分已经成了一纸空文。不过，这也不能洗刷其污点，而且也不能保证压迫和不公正行为不会卷土重来。

接着，杰斐逊便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国家在宗教问题上有没有权利采纳某种主张呢？”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没有。他为此提出的论据，远远超出了单一国教教会问题的范围。根据洛克的政府学说，即契约学说，人们组织政府是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独自无法保障的权利。但是宗教信仰与此无

关，因为它完全属于内心世界，是私人的事，并不仰赖于政府当局。实际上，宗教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因此它的特点在于依靠内心的引导。男男女女只须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负责。

杰斐逊接着说，即使不考虑权利问题，国家对宗教事务的干预也会给宗教本身造成损害。他义正词严地抨击国家支持宗教和授予宗教特权的愚蠢行径：“自从基督教问世以来，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男女遭受火刑、拷打、罚款、监禁，可是我们并没有朝着统一宗教信仰前进一寸。强制的结果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把世人一半变成了傻瓜，一半变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罢了。”

在杰斐逊看来，官方教会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国家根本不应该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特殊形式的教会，而是应该放任。杰斐逊反对教会与政府结合。他认为，宗教在它成为国家的工具时，就成为对于自由的威胁。历史证明：教会与国家结合，一定会导致暴政和压迫。他说：“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时代，教士总是敌视自由。他始终与暴君联盟，支持暴君的暴虐，以报答暴君对自己的保护。”只要教会与国家编织到同一个结构中去，建立在正义与自由基础上的自治的共和国，就成为一个幻影。

杰斐逊强烈反对英国国教向非国教教徒强征什一税和主教派教士主持婚礼的特权。1781年，他在《正告弗吉尼亚》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教观：“思想活动与身体的行为不受法律的强制。只有当我们服从执行者时，他们才对我们的自然权利行使权威，但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愿让出自己的良心权，我们只对上帝负责，政府的立法权如果扩大到这些领域，只能是对他人的侵犯。如果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或者说根本没有上帝，都无损于我的一根毫毛，我口袋里的钱少不了一分，腿断不了一条。”

杰斐逊还进一步强调，人类不得在肉体上或财产上受到强制、干扰和压迫，也不得因其宗教观念或信仰受到迫害；任何人都有权表白信仰，为自己的宗教观点进行辩护；人的信仰也绝不能影响个人公职的升降。

1776年的第一个回合取得了几个微小的胜利。议会废除了几项最具压迫性的英国法规，免除了退教者为供养圣公会缴纳的税金。但是圣公会的国教地位还是没有被废除。向教徒征收的教区费也没有废止，只是暂时停收而已。

宗教和科学一样，真理的演进有赖于自由思考的推动，有赖于个人对于政府当局和教会的强制行为及错误主张有独自判断的能力。杰斐逊宣告：“只有谬论才需要政府撑腰，真理是能够独自屹立的。”

于是，杰斐逊于1777年起草了他的《宗教自由法令》。

杰斐逊写道：“全能的上帝既然给予人类思想自由，所以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做法，无论是凭靠人世间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法律规定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始者的旨意……有些在世间的和教会中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他们本身不过是常有过失和没有得到圣感的人，而竟然肆无忌惮，以为他们有权支配其他人的信仰，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说成唯一的永无错误的真理，并强迫世人予以接受，这些人自古以来，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所建立的和所维持的，只是虚假的宗教而已；强迫一个人捐钱，用以宣传他所不相信的见解，这是罪恶和专横的；甚至强迫人出钱支持他自己所相信的教派中这个或那个传教士，也是在剥夺个人意愿的自由……我们的公民权利并不有赖于我们在宗教上的见解，正如它不依赖我们在物理学或者几何学上的见解一样，因此，如若我们规定，一

个公民，除非他声明皈依或者放弃这个或那个宗教见解，否则就不许接受责任重大和有报酬的职位，因而不值得大众的信赖，这实在是有害地剥夺了他的特权和利益，而他对于这些特权和利益，正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是享有天赋权利的。”

杰斐逊警告说：“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许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行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论的真正有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论；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危险了。”“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

过了两年，圣公会的教区费废除后，杰斐逊向议会提交了他的法案。杰斐逊的计划主张彻底根除政府当局在宗教事务上的干预，肯定宗教信仰和礼拜的绝对自由。杰斐逊的主张得到乔治·梅森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强有力的支持。

以彭德尔顿和尼古拉斯二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死硬派，站在反对改革的一边，前者坚持保守立场，畏惧改革；后者则是出于笃信宗教的感情，这两个人又都享有很高的威信，擅长辩论，还精于玩弄政治手腕。杰斐逊称彭德尔顿是他所曾遇到的最危险的敌手。一些牧师对杰斐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十分不满，斥其为“无神论法令”。在议会中，主张宗教改革的力量同反对派也是旗鼓相当。因此，这场宗教改革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路程。

1784年，国会派遣杰斐逊出使法国，于是就由他的年轻朋友詹姆斯·麦迪逊接手领导州众议院里的改革派。1785年春天，麦迪逊写下了《反对宗教摊税的请愿书和抗议书》。这份没有作者署名的文件有手写本也有印刷本，在弗吉尼亚中部普遍流传，大多附有空白的请愿书，以征求签名。

这份抗议书对杰斐逊法案中蕴含的思想重点作了出色的阐发。它同样以启蒙运动关于理性和权利的指导原则为出发点，并且得出同样的结论。麦迪逊坚持认为，对于真正的宗教来说，用税金来给它撑腰，与其说是支持它，倒不如说是败坏它的名声，这样做实际上是“亵渎歪曲拯救世人的事业”。

到1785年，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西部的民主力量上升。在这种形势下，麦迪逊趁此机会再次推出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法令》，结果只有一处略作修改，便被州众议院通过。

这项法案包括三部分：序言，执行条款和一段劝喻性的结语。序言共计约600字，占全文篇幅的3/4，雄辩地宣告人类思想活动神圣不可侵犯，其涉及范围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最广泛的心智活动。

执行条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教会，任何人都应自由地保持和履行其宗教信仰而无损其公民权力。

最后一段令人惊奇。作为启蒙运动精神的追随者，杰斐逊一贯声称他是传统的叛逆者。他认为应当允许每一代人制定适合自己情况的法律。然而，对于《宗教自由法令》的原则，他却看得极重，为此而正告后代人和后代的立法者们说：“今后如通过任何法令废除本法令或缩小其效力，该法令将是

对天赋权利的侵犯。”为这个法案的通过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麦迪逊，称这个法案“永远消灭了为了限制人的思想而制定法律的妄想”。

这项法令颁布时，杰斐逊正以美国公使的身份驻节法国。他立即安排法令出版事宜，不到一年，他向麦迪逊报喜说，该法令赢得人们的赞扬。他从巴黎来信说：“我指的不是各国政府，而是组成各国政府的人士。法令已经翻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并且送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法院……还被收入新版的《百科全书》……”

最后，他不无自豪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多少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想活动一直从属于国王、教士和贵族，如今终于看到理性的标准得以确立，令人深感欣慰；我们有幸制定第一部法律，并勇于宣告人类在形成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以理性为依据。”

《新约》中的耶稣基督早就晓谕众人：“恺撒的物当给恺撒；上帝的物当给上帝。”但事实上，上帝和恺撒始终都在争斗，都力图主宰对方，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神权政治持续了1000余年。美国人的创举，是人，神长期较量而终以人间压倒天国的胜利结晶。上帝和恺撒的分家，两者各有所司，互相协调，给予国家和教会独立发展、自由竞争的机会，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在政教分离的社会基本奠定的条件下，美国制宪会议于1791年批准公布了《权利法案》，在第一条中明确宣布：“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这是美国革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第十章 战时州长

难道大家都相信，还是不知道，我这次逃避的是一队骑兵，它的整个军团也近在咫尺，随时可来支援。可是有些人，还有党派作家，就这件事写了许多文章来责骂我，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带讽刺的？

——托马斯·杰斐逊

1779年6月1日，议会两院联合投票，选举杰斐逊接替帕特里克·亨利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帕特里克已连任三次，每年一年，不能再连任。

杰斐逊本来早已萌生了离开公职、回到书斋中、以便“恣意享受哲学研究的乐趣”的念头，虽然当时他才36岁，却似乎已厌倦了这种争斗无休的政治生活，不愿参加角逐。

但杰斐逊的朋友和追随者们都竭力怂恿他参加州长竞选，特别是西部农民民主力量，把他视为争取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领袖，都拥护并支持他成为州长的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只好默认朋友们把他的名字列在州长候选人的名单上。

在这次州长选举中，州务委员会主席兼副州长约翰·佩奇和弗吉尼亚民兵指挥托马斯·纳尔逊与杰斐逊展开角逐。而约翰·佩奇是杰斐逊大学时的老同学。

竞选紧张激烈，第一轮投票结果表明候选人无一人超过半数。杰斐逊获55票，约翰·佩奇38票，托马斯·纳尔逊32票。第二轮投票在杰斐逊和佩奇之间进行，杰斐逊得67票，佩奇得61票，杰斐逊当选为州长。

佩奇随即向他的大学者同学保证，将“尽一切力量使你感到你的政府运转顺利”。杰斐逊对佩奇讲，由于他们双方朋友的热情，他们被置于竞争者的位置上，他曾为此而苦恼。但是他又说，令人宽慰的是，他们各自得票相差无几，所以“既不会使你感到痛苦，也不会使我感到快意。”

当上州长本是荣耀之事，杰斐逊对此却处之泰然。再说，在这战争的紧要关头，弗吉尼亚又面临诸多问题，当州长要担的担子很重，谈不上值得庆贺。杰斐逊幽默地对一位前来祝贺的朋友说，吊唁恐怕更适合情况。他给理查德·亨利·李写信说：“在一个廉政的政府里，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公职对被任命者来说，是也应该是一副重担；尽管会预见到这将使他们付出紧张的劳动和造成个人很大的损失，但若是拒绝接受将是错误的。”

州长一职权力不大，但所费精力却很多。当时州长要完全依赖于议会。1776年宪法赋予议会以最高权力，而州长既无否决权，也不如英王派来的总督有解散议会的权力。他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要听取由议会选出的8人州务委员会的意见；他有时则会因4名州务委员缺席，不到法定人数而无所作为。

州长是负责执行法律的，为此必须搞好同州务委员会的关系，才能让他有些自决权。杰斐逊就任后不到6个月，州务委员会就授权他在州务会没召开并预计它会同意时，可以自行其事。这给予了杰斐逊较大的回旋余地，而当英军入侵弗吉尼亚时，他确实就这样做了。在这段时期内，州长几乎每天都要同州务委员会打交道，他与作为州务委员的詹姆斯·麦迪逊的工作关系与私人交往，都因此而日益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

杰斐逊同前任帕特里克·亨利一样，搬进了过去皇家总督居住的总督宫。

这是一所相当漂亮考究的房子，但杰斐逊从他的建筑学审美观来看，却从未称赞过它的建筑式样。回想当年学生时代，曾时常应当时的代理总督福基尔之邀，在这个总督官邸里参加各种文化、社交聚会；20年过去了，他自己竟然住进了同一个官邸，世事沧桑，物是人非，杰斐逊好不感慨。

1779年9月，杰斐逊夫人和两个女儿帕齐与波丽也搬了进来。不久，议会通过一项法案，1780年5月将州府自威廉斯堡迁往里士满。其实，这是议会根据杰斐逊1776年草拟的一项州府西迁的议案作出的决定。迁都的理由是，威廉斯堡不仅靠海，易受攻击（1779年5月这种危险性就更大了），而且远离内地。里士满地处州中心，这对当时不断西迁的居民来说更方便。

里士满居民才1800人，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州政府西迁至此，连办公楼都没有，州长也得自找住所。后来，杰斐逊从一个名叫托马斯·特平的上校那里，租到了里士满少有的雅致砖房住宅，并从威廉斯堡总督官邸运来48箱家具和陈设品。

安顿下来后，杰斐逊最关注的是规划这个未来的州府。议会任命他领导一个由9名公共建筑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他立即开始制定开发这个城市的计划。虽然杰斐逊厌倦公职生活，但初来乍到，新州政府百废待兴，城市的建设给热衷此道的杰斐逊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后来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模型，还是杰斐逊自巴黎亲自设计送来的。

州府虽迁到里士满，但战争还远未结束，前途渺茫。独立战争是由各州和大陆会议组织的联合军事力量来进行的，但组织得很差。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各州政府进行战争的任务，比在以后的任何美洲战争中都大得多。杰斐逊作为1779年至1781年的弗吉尼亚州长，就要在战争时期积极领导治理好这个州。况且，弗吉尼亚在人口和地域上都是美洲各州中最大的，它沿俄亥俄河西行直达密西西比河。战事委员会公文上都印有“威廉斯堡办公室”字样，严峻的军事形势要求州长随时随地关注征募、武器、军需、战犯等事务，还要提防敌人入侵本州。加之军事形势恶化，国家财政支出、供应缺乏，群众怨愤以及大陆会议的困难处境等，都使杰斐逊忧虑重重。

到1780年春，大陆上的战争频频失利，独立战争已处在最危急的时期。麦迪逊3月自大陆会议写信给杰斐逊说：“我们的军队马上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了：要么解散，要么求饶。财库空虚，公共信贷告罄。我还听说，所属代购机构的私人贷款也已不堪忍受，大陆会议抱怨民众索取太多，而民众则抱怨大陆会议用钱不当，而军队则对两方面都意见极大。我们的事业要求有最成熟周全的措施，但局势紧急，只允许采取临时的权宜措施，而这些措施又引发出许多新的困难。”话语间流露出失望和无奈的情绪，让人灰心丧气。

但杰斐逊仍努力工作，绞尽脑汁，全力支持抗英斗争。为了向大陆军队提供粮食，在议会的授权下，杰斐逊派特派员到各县去收购粮食。但是这些特派员态度粗暴，往往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扰民现象屡屡发生。

为了支持战争，杰斐逊在议会的授权下，向民间征用车、马等军需物资，还把蒙蒂赛洛家中的车和马匹贡献了出来。由于美洲海岸被英军封锁，难以从海外购运大炮军火，杰斐逊因此努力发展地方武器制造业，创建了好几个铸造厂，专门生产大炮及其他武器。

杰斐逊1780年6月连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这一年比上一年的情况还要困难重重。州的财政状况几乎处于绝境，通货膨胀猖獗，州的货币越发不值钱。英国在1780年5月12日占领查尔斯顿后向北推进，南方的军事形势迅速恶

化。杰斐逊急切请求大陆会议发给军需品，强调指出州的给养严重匮乏，甚至连民兵都没法武装；同时又向大陆会议保证，本州的资源将“愉快地献给共同的事业”。可是州的资源不是缺乏就是没有有效地动员出来。难怪霍雷肖·盖茨将军抱怨派到北卡罗来纳归他指挥的弗吉尼亚民兵赤手空拳，甚至连衣服都没穿够。

1780年10月，一支由60艘船组成的英国舰队开进切萨皮克湾，数队轻骑兵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面对步步为营的敌人，杰斐逊徒唤奈何，他给华盛顿将军写信说：“一个能够且热心与敌人较量的民族，由于缺乏防御手段不得不袖手站在一旁，想到此就令人感到屈辱；然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资源能保证我们进行抵抗。”

11月22日，英国军舰转而驶向查尔斯顿，方使杰斐逊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12月底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率领入侵的英军长驱直入，准备向弗吉尼亚这个老自治领地的核心推进。

杰斐逊受到各方的压力：大陆会议要他为打仗出钱，为保卫大陆出军队；南方处于危急状态的军队要求发给武器、给养和衣物；本州公民看到自己这个州在入侵敌人面前首当其冲、人心惶惶。

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杰斐逊第二任州长后半期（1781年1—6月），弗吉尼亚大难临头。一支英国舰队沿詹姆斯河驶到韦斯托弗，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入侵军送上岸，直逼里士满。

弗吉尼亚几乎没有设防。它的东海岸开阔，海岸线颇长，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没有足够的陆海军去抵抗敌人的入侵，兵力、武器都严重缺乏。它只有4艘小型战舰、60门大炮和3艘武装小艇，陆军则是由未经训练、纪律松散、装备极差的民兵组成，每5个军人才有一技步枪。而且地广人稀，兵源匮乏，平均每平方英里的土地只有一个民兵防守。杰斐逊立即召唤邻近各县的民兵，匆忙将里士满的档案和有限军需转移他处，并将他的家眷撤离该城。

阿诺德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长驱直入，派遣一个分队炸毁了西哈姆铸造厂，将一些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放火焚烧。24小时后，阿诺德军队“发泄”完毕，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杰斐逊就在离里士满不远的詹姆斯河对岸的一处民房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英军撤退后不到36小时，他回到了州府，发现丢失的物品有：州议会大厦阁楼里的150枝滑膛枪、布鲁克街上的150辆货车、弹药库内的5吨炸药、军需处的120张皮革，等等。

但更严重的损失是无形的：阿诺德的入侵影响了弗吉尼亚对南方战场上美军供应，从而有利于敌人。关于这一点，杰斐逊在给南方军统帅格林将军的信中承认：“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正把供应衣食和提供人力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他们惊人地打断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为了抵抗入侵而动员起来的民兵，把原为格林的军队准备的粮食消耗殆尽。

因此有人批评杰斐逊没有及时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事后，杰斐逊自己也承认，如果早两天把民兵召集起来，阿诺德就不会顺利地打到里士满。但是他把两天的延误归咎于错误的情报。因此，杰斐逊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为此开脱。

然而，弗吉尼亚的厄运并未结束。

到1781年春，英军在南方节节胜利，已经在南、北卡罗来纳占领了大片土地。5月1日，英军统帅康华利率领大军离开威尔明顿北上，试图一举踏

平弗吉尼亚。因为在他眼中，弗吉尼亚是南方战场美军的人力、衣粮及武器的主要供应者，从而把弗吉尼亚看成是眼中钉。

在杰斐逊聚精会神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他的周围却是一片恐慌。州务会议的成员都逃散了，只有杰斐逊一个人坚守岗位。议会本应该在5月7日开会，但是议会两院都没有达到法定人数。少数到会的议员发出一份号召书，约定5月24日在夏洛茨维尔开会，因为杰斐逊已经决定把州政府迁往这个县城，军事局的工作地点搬到离夏洛茨维尔数英里之遥的佛克点。因为首府里士满正处在康华利进军的路线上。

杰斐逊积极地从北方购买武器。在他的指示下，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在费城弄到2000枝滑膛枪，然后运往弗吉尼亚，还买了几百门大炮及数吨火药。同时，杰斐逊还向北方求援。不久，属于大陆军队的宾夕法尼亚部队，由安东尼·韦恩率领，来到弗吉尼亚与另一支由拉斐德率领的部队会合。

康华利部队侵入弗吉尼亚，与驻守朴次茅斯的英军会师，兵力增加到7000人。康华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消灭拉斐德的部队。当时拉斐德的部队兵力薄弱，只好向里士满以北撤退。康华利指挥部队穷追不舍，但由于行动迟缓，未能追上，便沿途大肆洗劫、扫荡。

随后，试图一举征服弗吉尼亚的康华利，一方面派塔尔顿的龙骑兵前往夏洛茨维尔去捕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及杰斐逊本人；另一方面派西姆科的突击队去破坏藏在佛克点的武器及军用物资。

塔尔顿奉命之后，随即率其龙骑兵朝夏洛茨维尔进发。当他们来到距夏洛茨维尔45英里的路易萨小镇时，被一名警党的美国民兵发觉。这个民兵立即悟到大事不好，情况万分危急，于是飞身上马，连夜赶往蒙蒂赛洛报信。

被突如其来的马蹄声惊醒的杰斐逊，披上衣服靠窗而观，见这位气喘吁吁的民兵连长正滚鞍下马。杰斐逊把他让到屋里，给他倒了一杯葡萄酒，请他边喝边报告军情。喝完酒之后，杰斐逊让他再去夏洛茨维尔，把英军进逼的消息告诉议员们。

杰斐逊向在家中做客的两位议长及一些议员传达了敌人即将来到的消息。客人们在早餐后便匆匆离去。杰斐逊镇静自若，他安排妻子、女儿先转移，自己则留下来整理文件，安排家务。

原来，塔尔顿的大路人马并未星夜兼程地赶路，在途中还休息了一夜。在遇到运货马车时，还停下来抢夺货物，并闯入几个“弗吉尼亚的绅士”家中，把他们从睡梦中拖走。另外，还抓住了几位大陆会议的北卡罗来纳代表。

由于事先有了防范，在塔尔顿来到夏洛茨维尔附近的里瓦纳渡口时，这儿已有人把守。但这支龙骑兵仗人多势众，横冲直撞，烧毁了军火仓库，抓到了7名议员。据说这7名议员虽然早就从勇敢的民兵连长那儿知道敌人即将来犯的消息，却将信将疑，不肯马上离开，因而落入魔掌。

在塔尔顿进入夏洛茨维尔之前，他派连长麦克劳德带领一小批人马去蒙蒂赛洛，声称要活捉杰斐逊，同时要求占领这座山庄，作为英军的了望台，因为这儿地势较高，登上此山，可以“一览众山小”。

当杰斐逊正在家中捆包文件、仆人们正在收藏珍贵物品时，一名军官慌慌张张上山来报，说一批英军正在上山。杰斐逊“相当沉着”，收拾完最后一批文件后，他才不慌不忙地去找他的马。在上马之前，他还用望远镜远眺夏洛茨维尔，发现街上都是英军骑兵，这才上马离去。

5分钟后，麦克劳德的骑兵蜂拥而至，把蒙蒂赛洛团团围住。大门口，

一名士兵用枪口顶着杰斐逊仆人马丁的胸口，厉声说：“如果不说出主人的去向，就开枪打死你！”马丁回答说：“那么就开枪吧。”连长麦克劳德便叫马丁陪他去搜查屋内。在走进这位州长收藏文件的书房后，麦克劳德环视了几分钟，然后把门关上，又把钥匙交还给马丁。这支英兵在杰斐逊家“秋毫无犯”，这是因为塔尔顿有令在先，不许他们损坏任何东西。这些人在此逗留大半天后随即离开。

但是主帅康华利却不这么“客气”，他亲率的军队所到之处，士兵烧杀抢夺，为所欲为，遍地狼藉，阴风凄凄。当来到杰斐逊在詹姆斯河畔的种植场时，康华利下令放火烧掉仓房、栅栏，破坏正在生长中的玉蜀黍和烟草，把奴隶、牛、羊，猪、马都“一网打尽”。

杰斐逊任州长最后时日的烦恼几乎也就自此开始。塔尔顿在6月4日席卷夏洛茨维尔时，杰斐逊的州长任期实际上已于两天前即6月2日届满，但是最近的一次议会全会还没有选出继任人。

杰斐逊6月4日自蒙蒂赛洛出逃时，并未奔向议会重开全会的地点斯汤顿，而是同全家一起逃往波普拉森林。这是他妻子继承的一个农庄，位于距蒙蒂赛洛西南90英里的贝德福县。

一天，他骑马外出时，不慎从马上跌落，虽然伤势不重，却也不得不休养一个多月。后来，他的政敌便造谣说他在逃难中由于丧魂落魄才从马上掉下来的。

杰斐逊早已声明不打算再干一年州长，而且他的任期已满，所以他没必要去斯汤顿。但是，议会于6月12日才选出托马斯·纳尔逊任新州长，在这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这么多天都没有一个全州的首脑出来主事。尽管杰斐逊事先已清楚表示引退的决心，可是在这危急时刻忽然不见其踪影，势必会引起众人的批评。杰斐逊没料到的一场攻击已经来临。

1781年6月12日，乔治·尼古拉斯在州众议院提出动议，在下届议会会议上，应该调查政府领导前12个月的行为。由帕特里克·亨利支持的这个决议案在同一天通过。亨利这时已不仅是对手，进而变成敌人了。杰斐逊一辈子也忘不了亨利的这一行动。众议院秘书约翰·贝利克立即给杰斐逊发出一份材料，但直到8月7日，杰斐逊才收到。在此之前，杰斐逊从参加会议的朋友们那里就已得到这一消息。有些朋友支持调查，还信心十足，认为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荣誉”。7月下旬，杰斐逊从波普拉森林回到蒙蒂赛洛后。立即给尼古拉斯写信，问要调查哪些具体事件。尼古拉斯回信称“不是具体指哪件事办错了”，不过他列出了几件事，认为应当交待解释清楚，第一件是“阿诺德第一次进军里士满时为何我方毫无抵抗”，其他一些指责都是有关民兵和武器弹药的损失，等等。

尽管决议案提出的是调查政府领导而非州长一人的行为，因而也包括州务委员会成员，可是矛头看来主要是针对杰斐逊的。他立即着手准备为自己辩护。年轻时做律师为别人辩护的经验，这时又能用到自己身上了。此时，一名来自阿尔贝马尔县的众议员辞职去州里担任职务，杰斐逊立即去谋这一席位，并且当选。于是在预定开始进行调查的1781年12月12日这一天，杰斐逊也就以众议院议员的资格出席了议会会议。此时，康华利已在约克敦投降，会上没有人提出动议要进行调查。乔治·尼古拉斯甚至未在众议院露面坚持他的指责。实际上，辩护已不必要，委员会的报告所说，除了谣言之外，并没有其他依据。

可是，认真执拗的杰斐逊却站了起来，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是他开列的可能会受到的指责，比尼克拉斯给他的还要详细。于是他当众自问自答起来。

在他落座后，会议一致通过一项表扬和致谢的决议案，解释说：由于有些尖锐的指责在民众中引起种种谣言，还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人们的相信，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行为进行调查，致使他本应早就得到的荣誉——公众感谢之情，迟至今日才得以表达；这种行为既已成为公开审查的对象，因而经过冷静深入的讨论后得到满意的结果，其价值就会增添 10 倍。

经参议院修正后的最后决议，歉意之词有所删节，但最后的结论是清楚明白的。它写道：“决议：大会真诚地感谢前任州长托马斯·杰斐逊先生，感谢他在任时的公平、正直和精心的理政。大会愿郑重宣布高度评价杰斐逊先生任本州主要行政长官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严正和忠诚，并且为此公开声明，消除和取消一切不实的指责。”

名誉虽然已经得到公开维护，但杰斐逊对这些基于谣言的指控竟然得以在会上提出深感伤心。尽管如此。他还是确认这件事已经了结。没想到若干年后当他竞选总统时，有些人又把此事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为由头对他进行卑鄙的攻击。

任州长的两年是令人沮丧的。1816 年，即他卸任总统后 7 年，他还对 35 年前的这段州长经历耿耿于怀，足见他逃离英军在当时成了一个多么大的政治问题，那些指责对他的伤害又是多么地深。他这样写道：

“难道大家都相信，还是不知道，我这次逃避的是一队骑兵，它的整个军团也近在咫尺，随时可来支援。可是有些人，还有党派作家，就这件事写了许多文章来责骂我，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带讽刺的？诗里面唱、无聊的议论文里也说，什么忘掉了拉曼英雄和他的风车的崇高范例，不愿单枪匹马地同一队士兵开仗，这要是得胜岂不是十分荣耀？他们自己同时忘了，没有人给我准备好骑士的神妙武器，甚至连他的马布里诺头盔也没有。这些纸上谈兵的英雄们，看他们真的不屑往树林中躲避，甚至敢独自一人徒手跟一个军团的武装敌人打仗吧！”

虽然他忘不了当州长的艰难岁月，但这并没有阻挡他日后回到政界，回到公共生活中去。

第十一章 痛失爱妻

我生来就注定要失去所爱的一切。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深感对官场的厌倦。在他看来，官场是一个充满忧患、使人心力交瘁的场所。因此，他决心解甲归田，回到蒙蒂赛洛庄园，去享受那种心驰神往的“静谥的生活”。娇妻爱子和蒙蒂赛洛的吸引力在他一生中永远是强烈的。许多朋友对他的决定都不理解，甚至连詹姆斯·麦迪逊这样的密友都表示不解。他说：“我是非常偏袒杰斐逊先生的，但他的情绪好像是决心要报复家乡对他的不公正，这在我看来既非出于哲理，也非出自爱国主义。”

杰斐逊在蒙蒂赛洛庄园读哲学，思考问题，生活稍稍安定下来。

1782年5月8日，玛莎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露西·伊丽莎白。杰斐逊有两个女儿取了这个名字，其中第一个是为纪念杰斐逊的两个姐妹而取的。这两个姐妹，一个是只活了8岁的露西，另一个是智力迟钝、死于地震的伊丽莎白。

当露西第一不幸夭折时，杰斐逊正外出在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直到他回到蒙蒂赛洛才得知女儿的死讯，禁不住彻心哀痛。玛莎也因她已生的5个孩子中有3个先后夭折而变得意气消沉，无限悲伤。她在这种忧郁的心情下又熬了17个月。

露西第二在露西第一死后一年多出生。这是玛莎给杰斐逊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玛莎·杰斐逊接连不断地怀孕，导致经常性流产，结果在生露西第二时难产。本来身体就很孱弱的她，更加弱不经风，从此卧床不起。

就在女儿出世的这一周，阿尔贝马尔县在没事先征得杰斐逊同意的情况下，把他选进了立法机构。那时有一条规定，如果一个代表没有在里士满会场出席会议，或没有请假而缺席的话，他将可以被逮捕。虽然杰斐逊已在5月6日的信中拒绝当选，但还是受到这种可能被逮捕的威胁，而就在这时，杰斐逊的妻子已处于弥留之际。

杰斐逊与妻子玛莎情深意笃。他告诉妻子，此后他绝不会再离开她去接受任何官职，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大女儿玛莎（爱称帕齐）在1782年已经10岁，次女玛丽（爱称波丽）3岁。

杰斐逊精心护理妻子，一刻也未离开病榻。当不在她的床边时，就在离她床头最近的一间小屋里写东西，随呼随到。

这一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玛莎似乎已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她拿起一本丈夫心爱的书，颤颤巍巍地抄写一些令人心酸伤怀的句子，以此表示她的感情。她从《特里斯特拉姆诗歌》中略加修改地抄录着这样的句子：

时光飞逝，
每写一字，
它都告诉我
生命随笔尖迅速消逝。
生命中的每一天，
每一刻，
都像风中的云彩

悄然飘走，
一去不返。

在玛莎弥留之际，几个亲近的女奴贝蒂·布郎、萨利、贝蒂·赫明斯、南希、厄休拉都在场守着，杰斐逊就坐在她旁边。她告诉他还有许多事要做。当谈到孩子们时，她已泣不成声。最后她伸出4个指头，然后艰难地说，如果她想到为她的4个（应是3个）孩子娶来一个继母的话，她将死不瞑目。杰斐逊握住她的手，心领神会地点头答应。杰斐逊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受人尊敬，而且富甲一方，是完全可以再婚的。但是他没有食言，果真鳏居一生，没有再娶。

1782年9月6日中午时分，天空阴沉，凄风卷着落叶，蒙蒂赛洛庄园一片悲戚。杰斐逊眼着自己心爱之人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自己毫无办法，伤心欲绝，昏倒在地。妹妹把他扶到屋外，须臾，玛莎便溘然长逝。几个月来，杰斐逊一直眼看妻子在死亡线上挣扎，虽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但死神真的降临到妻子头上这一可怕的时刻来到时，他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重重的一击，似乎将他推进了一个万丈深渊，如置冰窟。丧妻之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心。

苏醒过来的杰斐逊，一连3个星期没有出屋门半步。他几乎日夜不停地在那间小屋里走来走去，精疲力竭时才不得不躺在小床上。悲痛笼罩着他的全部身心，他已经不能自己了。

好不容易他才渐渐地离开了那间小屋，开始骑着马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大女儿帕齐说：“从那时起，他不间断地骑马在山间林里到处走，走的都是不常走的路，常常穿过森林。在这些忧郁的浪迹中，我是他经常的陪伴者，是他许多次悲恸失声的目击者……”

整整半年，痛不欲生的杰斐逊沉浸在无尽的悲哀和孤独之中。往日的欢笑已经沉寂，显得格外空旷的蒙蒂赛洛像主人一样被深深的悲哀笼罩着。正如他在后来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言：“她的死使得我陷入了一种心神恍惚的状态之中，简直和死人一般。”

玛莎被安葬在蒙蒂赛洛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在墓前平放着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

玛莎·杰斐逊
约翰·威利斯之女；
生于1748年10月19日；
1772年1月1日与托马斯·杰斐逊结婚；
卒于1782年9月6日。

下面还附加了杰斐逊抄录的拉丁语诗文，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2章中的两句话：

如果人们在冥间会忘却他们已故的亲人，而我却不会；即使在那里，我也要怀念我的亲爱的伴侣。

爱妻的亡故，改变了杰斐逊生活的整个节奏和方向，彻底粉碎了他想长期隐居的美梦。蒙蒂赛洛是与过去10年的“风平浪静的幸福”密切联系着的，所以他现在无法形单影只地置身于这个处处有亡妻遗迹的地方。未来的行踪终于被朋友们所决定，这些朋友们从未放弃诱使他返回政治舞台。他们一直认为，杰斐逊应当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妻子已去，杰斐逊也不可能再在

家庭生活和政治活动之间摆动，这两者也不会再发生冲突了。玛莎死后两个月，杰斐逊就回到了公共生活中来，直到他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总共 26 年。尽管他对蒙蒂赛洛的感情依然强烈，从政期间历经风风雨雨，也曾有过隐居的念头，但终究还是没能实现。

母亲去世时，长女玛莎·华盛顿·杰斐逊只有 10 岁。妻子死后，杰斐逊成为 3 个孩子唯一的看护人了。他渐渐把对妻子的爱转移到对女儿的爱中。长女帕齐现在成了父亲所不可缺少的掌上明珠，她和父亲形影不离，常常陪父亲骑马外出散心。实际上，帕齐一生都在陪伴着父亲。父亲管她叫“小傻瓜”。而这个“小傻瓜”从此变成了父亲家中的女界首领，这个地位她一直保持了下來。人们形容她总是生气勃勃、勤奋好学，相貌、举止都与她那个子高高的、一头红发的父亲相似。

多愁善感的杰斐逊每当想到女儿终究有一天要结婚、离开他时，便会无限伤感起来。但他还是继续让女儿接受教育，希望女儿们在学习和事业上都能为人楷模。他给女儿开列了阅读书目，要把女儿教育成美国最有学问的女人。

即使杰斐逊独自在安纳波利斯、把女儿留在费城时，也不忘专门为帕齐找了“最好的法语、舞蹈、音乐和绘画老师”，他相信她在这里一定会比同他在马里兰州府要进步得更快。

然而，一旦离开女儿，杰斐逊又放心不下，于是又把女儿接来，培养她对诗歌、音乐、绘画等的欣赏能力，而这在弗吉尼亚，由于条件所限，是不易做到的。

杰斐逊是位好父亲。他把对女儿的厚爱溶入对女儿的负责中。当他独自一人呆在安纳波利斯时，他常常想到的是女儿的未来，甚至还有尚未出世的外孙子女的未来。在这段时间中，杰斐逊和女儿之间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通信。这些信多方面地显示了他们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他对女儿的舐犊情深及对女儿寄予的厚望，从中也可窥见这位伟人内心丰富细腻的情感。

杰斐逊从安纳波利斯给女儿写的第一封信，就为她订了一个作息时间表：

上午 8—10 点，练习音乐

上午 10 点—下午 1 点，轮换着一天绘画，一天跳舞

下午 1—2 点，在跳舞的那天画画，而隔天写一封信

下午 3—4 点，学法语

下午 4—5 点，在音乐伴奏下做操、运动

下午 5 点到睡觉前，阅读英文，练习写作

作为一个乖觉的女儿，“小傻瓜”对父亲的要求言听计从。她学习各种功课，以致达到了她那个时代的妇女中很少有人能达到的文化水平。

杰斐逊在信中说：“我为你请了很多老师，我希望你在他们的教导下学到各种知识，这将表明你没有辜负我对你的疼爱；你要好好学习，我会更疼爱你，切不可让我失望。”信的结尾又是：“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你好，学到不少知识；我最大的烦恼就是你令我失望。如果你爱我，就要努力在一切情况下、在每一个人面前做个好孩子，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成事全在你自己，这将保证你会得到你亲爱的父亲最热情的爱。”

杰斐逊要求女儿一周给他写一封信，要她学拼写，“决不做坏事或说坏

话”。有一次，两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他便坐卧不安，心急如焚。杰斐逊在给女儿的信中无所不谈，乃至教育到吃饭穿衣的琐碎细节。在一封信中，他要女儿注意穿着，要干净、合身，要面带微笑，并说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穿戴整齐。杰斐逊还告诫帕齐：“保存好我的信，时常拿出来读一读，这样可以对信中写的事常记不忘，会使我更加爱你。”的确，帕齐一直珍藏着父亲给她的每一封信，在父亲漫长的一生中，她一直是这么做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代伟人也不例外。

在妻子去世后到他去法国之前的 20 个月里，挚友的友谊对悲伤孤寂的杰斐逊尤为重要。而这段时间杰斐逊与 3 个人来往密切。这 3 个人都比他年轻得多：詹姆斯·麦迪逊，31 岁；詹姆斯·门罗，24 岁；威廉·肖特，23 岁。他们也都并非等闲之辈。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都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詹姆斯·麦迪逊是个小个子，可能是美国历任总统中个子最矮小的一个，身高只有 5.4 英尺，比杰斐逊矮 10 英寸。他在离杰斐逊家农场不远处的农场里长大，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患有癫痫病。他与杰斐逊是在 1776 年弗吉尼亚议会上认识的，当时他 25 岁，杰斐逊 32 岁。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杰斐逊在立法、司法改革方面最坚定的支持者。后来成为美国宪法的奠基人，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

詹姆斯·门罗 16 岁时进入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独立战争爆发后，他热血沸腾，中途辍学，投笔从戎，成为该学院“学院连”中的一员。1776 年 9 月，在哈勒姆高地的战场上首次负伤。21 岁时，因在战场上再次负重伤，以少校军衔退役，重返威廉-玛丽学院攻读法律。他得到当时任弗吉尼亚州长的杰斐逊的赏识，并师从杰斐逊学习法律，两人从此结为忘年之交。

威廉·肖特曾就读于威廉-玛丽学院，1783 年进入弗吉尼亚政界。杰斐逊曾推荐他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参加国会会议。后来他成为杰斐逊在巴黎的私人秘书。在巴黎时，约翰·亚当斯 18 岁的女儿称肖特是“很有教养的人”。

这 3 位好朋友的相伴，仍然无法代替杰斐逊对妻子的思念。1784 年在安纳波利斯参加国会会议的 6 个月，是他自在威廉-玛丽学院毕业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生活的最长时间。这时他的头痛病又复发了。但就是在这 6 个月中，他起草了 31 个文件，比谁都忙，比谁都多产。

在安纳波利斯，杰斐逊还拒绝了朋友们劝他再婚的好意。许多像他这样年纪的男人，可能很快便要另娶新欢，或为幼小的女儿找个妈妈，或找个伴侣驱走孤寂。杰斐逊却拒绝了许多诱惑，有意回避女性朋友。他远离晚会，常以身体有病为托辞，婉言谢绝一些社交活动，直到 1809 年好朋友麦迪逊继任总统，他才参加了舞会。这时他妻子已去世 27 年了。

他在后来写给玛丽亚·科斯韦（在巴黎相识的情人）的那封有名的《头与心的对话》中，流露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他说：“生活的艺术在于避免痛苦，回避痛苦的最佳途径乃是退隐，自寻快乐。”

说来也有意思，杰斐逊对已婚女性总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好几个名花有主的女士对这个年轻的鳏夫有好感。比如后来在巴黎时有玛丽亚·科斯韦和露西·帕拉迪索；在其当总统期间又有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等，其中，伊利莎·豪斯·特里斯特是第一个向杰斐逊抛绣球的女人。当她去密西西比看丈夫时，给杰斐逊写的信称：“如果能成为你的伴侣，那将是我生

活中最让人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得知她丈夫去世的消息时，杰斐逊写信给她以示安慰。后来他们多年都只保持一种微妙的却也是君子式的联系。特里斯特再没结婚，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外孙和杰斐逊的外孙女结为连理，最后她也搬到蒙蒂赛洛住了一段时间。

就在杰斐逊在安纳波利斯期间，华盛顿正式辞去了大陆军总司令职务，因为他担心自己变成专制的恺撒。杰斐逊领导了安排他辞职的委员会，并起草了对华盛顿演说的答词稿。华盛顿的告别宴会于1783年12月23日在曼斯塔韦举行，有两三百人参加，杰斐逊也在场。在国会大厦还有舞会，每个窗前都燃上蜡烛。华盛顿将军兴致甚高，每支曲子都翩翩起舞，女士们都为能和他共舞而倍感荣耀。最后，将军作了声情并茂的告别演说。一位在场的议员说：“每一个听众都潸然落泪，将军捏着演讲稿的手在颤抖。”杰斐逊仍旧避开漂亮兴奋的女士们，没有参加舞会，却听了将军的演说，并高度称赞华盛顿智慧超人、刚毅无比。他认为华盛顿自动退出权力，无疑对年轻的美利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象征性姿态”。后来有那么一天，他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第十二章 出使法国

为了国家，我愿进地狱。

——托马斯·杰斐逊

1782年美国邦联国会在费城准备与英国订立和平条约，这就使杰斐逊的朋友们想起了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在国会里提议重新任命杰斐逊为缔结和约的美方代表之一，他认为这是让杰斐逊重返政治舞台的大好机会。1782年11月，国会确认原来的任命有效。

原来，早在1776年9月26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法国的支援是最急需的，大陆会议便急于寻找能出使法国的人选。大陆会议首选了三人，即本杰明·富兰克林、赛拉斯·迪恩（他已经在私下做争取法国援助的工作）、托马斯·杰斐逊。而杰斐逊的语言技巧和对法国的了解，以及他的才智和判断力，都被认为是很合适的人选。其任务是跟法国谈判，订立一项条约，并争取法国的援助。

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给在威廉斯堡的杰斐逊写信，征询他的意见，并发来邀请函，敦促他接受这个任务，并告知一旦收到他的回信，就立即派船接他去法国。这时杰斐逊好不容易说服了妻子玛莎跟他一起到威廉斯堡，正满怀信心地计划通过司法改革来对陈旧的专制体制进行改革。在威廉斯堡，他们住在乔治·威思给他们提供的舒适的房子里。

杰斐逊让汉考克的信使等了三天，考虑他该怎么办。这项使命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汉考克写信的口气是认定他会接受的。但他刚回到弗吉尼亚还不到一个月，妻子的身体状况又令人担忧，况且妻子来到威廉斯堡只有一个星期，他能这么快又离开她吗？这个任务肯定是旷日持久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不接受。“无论从我本人的愿望来说，还是从我个人的事业来考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项工作，”他写信给汉考克说，“但是现在我家庭的情况很特殊，不允许我离开，也不允许我接受这项工作，所以我不得不请求你们原谅，我不能接受这项光荣而重要的工作。”

当理查德·亨利·李（他的妻子当时已病入膏肓）从汉考克那儿得知杰斐逊拒绝出使法国的消息时，十分不满：“我听说你拒绝了出使法国和在大陆会议的议席，深表遗憾。凭心而论，没有人比我更对个人幸福的拥有和失去感觉深刻的了。”在李看来，杰斐逊是为了个人家庭的快乐而置重要的革命事业于不顾。

本杰明·拉什早些时候曾给杰斐逊写信，试探他能否去法国的意向。杰斐逊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为了国家，我愿进地狱。”杰斐逊对关于他拒绝赴任的批评极为敏感，但面对朋友的责备和不理解只是沉默。当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玛莎的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更为重要的是，她又怀孕了。这便是杰斐逊不愿公开的隐衷。

现在国会再提这个任命，对杰斐逊来说，是天赐良机。

对妻子情深似海的杰斐逊，因妻子的病故而伤心得发了狂。蒙蒂赛洛给他留下的深刻而清晰的记忆，使他简直无法承受。为了避开妻子去世的地方，为了淡忘痛苦，他很快接受了出使法国的公职。

就在接受国会任命的当天，他便给朋友写信说：“我曾想洗手不干，回归故里，管管家务，写写东西，就此幸福地度过一生。只是一件事把我的全

部计划给毁了，留给我的是一片空白，而我已没有精神去填补它了。”显然，这“一件事”指的是爱妻的亡故，打乱了生活的安排。现在国会给了他勇气去填补那片空白，他毫不犹豫地抓紧了这个机会。这位18个月前绝望地离开州长职位的人，又回到了公共生活中，他的生活再次充实起来。

1782年12月19日，杰斐逊把两个最小的孩子留下，托妻妹伊丽莎白·埃普斯照管，自己携带大女儿帕齐离开蒙蒂赛洛。一周之后他们到达费城。他本来决定在巴尔的摩乘法国船“罗姆拉斯”号赴法，但运气欠佳，“罗姆拉斯”号在巴尔的摩下游受到冰阻。杰斐逊只好在费城等候消息。这期间，他去外交部学习，阅读文件，参加美国哲学协会的会议，并与詹姆斯·麦迪逊重温友谊。

1783年1月末，他在费城得知可以航行了，便赶忙南下乘船。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英国巡洋舰封锁了切萨皮克湾，准备截留法国船连同船上的美国使节。同时，来自欧洲的消息说，美英双方已草签了一个预备性和约。国会于是决定他不忙去了，要他回费城静候消息。4月1日，杰斐逊的这项任务被免去。

尽管他非常欢迎和平的消息，但他渴望的法国之行没能实现，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他现在对回到公共事务中来已适应了。不久他回到弗吉尼亚，投身于起草该州新的宪法提案。6月，议会选他为国会议员，兼弗吉尼亚代表团团长，任期自11月开始。

杰斐逊本来计划带女儿帕齐去法国，但因旅行取消而未能如愿。这次他要带她去费城，开会期间就让她在那儿上学。当他准备在费城过冬时，得知国会决定在普林斯顿开会。尽管如此，他还是按原计划安排帕齐留在费城。他们于10月到达费城，然后他独自前往普林斯顿。刚到那里，会议又决定休会，三周后改在安纳波利斯召开，真是变化无常。

这是和约签字后召开的第一次邦联国会，会议的会址和新国家首都的所在地都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事，也是在政治上需要费一番斟酌的。会址移往安纳波利斯也是出于一部分考虑，想将政府所在地定在费城以南更中心一些的地方。但这只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的开始，直到通过了新宪法，乔治·华盛顿被选为总统之后才最终敲定，将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杰斐逊在其中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当杰斐逊于11月底离开费城去安纳波利斯时，他将帕齐托付给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的寡母托马斯·霍普金森太太。弗朗西斯也是《独立宣言》的签字者，他的孩子可以同帕齐做伴，帕齐后来还结识了戴维·里顿豪斯的孩子。里顿豪斯天文知识渊博，深为杰斐逊所敬佩。

杰斐逊于1783—1784年在安纳波利斯参加国会会议。在最后几个月中，做出了几项重大贡献。1784年3月1日，他提交了一份委员会报告，内容是在已由或将由各州向合众国让予的西部土地上建立政府的计划。这一报告成了1784年《土地法令》的基础。国会同意在各块土地上建立政府的计划，规定分阶段进行。先是移居者有权采用原属各州的宪法和法律来组成临时政府。当土地上的自由居民人数达到2万后，国会即授权召开制宪代表大会，建立永久性共和政府。一旦自由居民达到了原13州中人口最少一州的人数，该州即可准许加入合众国，其权利与原13州相同。

但这一法令一直未实行，直到1787年由《西北土地法令》取代。然而，它确实为这项著名的法令奠定了基础，并为美国的土地政策确立了基本原

则。这一原则是：西部土地应各自建成共和州，然后在与最早的 13 个州处于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加入合众国。诚然，这些思想并非杰斐逊的专利，不能全都归功于起草报告的他，但他也是早期的倡议者。他提供这种思想，说明在他心目中有着一个由共和政体各州组成的版图宽广的国家，说明他对西部移民自己管理自己有充分信心。早在 1776 年为弗吉尼亚起草的宪法中，杰斐逊便写进了类似的条款。并且 1780 年大陆会议初步通过了约瑟夫·琼斯和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载有同样原则的弗吉尼亚议案，但当时未获最后通过。

1784 年，杰斐逊建议在西部创立十几个新州，但报告中未具体说明数字，只提到了 10 个州的名字。他的计划是将大西洋沿岸各州至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新州分成两排，每个新州从北到南占两个纬度。按照这个设想，俄亥俄河就不再是最西一排各州的州界了，河南北两岸的所有土地都将据此重新划分，由于 1784 年法令适用于西部所有的土地，因此委员会关于 1800 年后废除那里的农奴制的提案，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然而这项规定在国会未获得通过。南部的代表中，只有杰斐逊和北卡罗来纳的休·威廉森表示支持。

后来在 1787 年的《西北土地法令》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一原则，并且规定在俄亥俄河以北的土地上实行。

写毕关于西部土地的报告之后不久，杰斐逊又为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债的报告，说明他后来在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此事的论战中，不是像人们有时看到的那样毫无准备。同时，他还在起草使美元成为美国货币单位的提案，以及有史以来第一次货币采用十进制制的提案。

杰斐逊还被称为“美元之父”。自从独立以来，大陆会议和后来的国会从来都没有铸造过任何货币，以致货币不足，外国硬币乘虚而入。英国、法国的金市畿尼，西班牙的金币皮斯托尔，以及葡萄牙的银币乔伊同时流通，价值因地而异。这种情况很容易助长交易上的欺骗，而且更妨碍州际贸易。杰斐逊进入国会后，向国会提出《关于为合众国建立一个货币单位及货币铸造的备忘录》。杰斐逊的建议是：以当时在美国广为流通的、体积大小很方便的西班牙银元作为美国货币单位，这个银元与不同的硬币之间的比率，一律采用十进制制。同时他主张取消镑、先令、便士及小钱。

1785 年，杰斐逊已不在国会，在豪厄尔的积极推动下，国会采纳了杰斐逊的计划中的基本原则，决定实行以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的十进制货币制度。又是几年之后，美国联邦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于是，杰斐逊在美国货币史上也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杰斐逊在国会的立法工作中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会里，实际上他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委员会，起草不下 31 项文件。在他当国会议员的半年中，国会在立法方面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都与他的努力紧密相连。

杰斐逊在国会的工作突然中止，原因是国会于 1784 年 5 月 7 日任命他为全权公使，去欧洲参加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谈判友好条约和贸易条约的工作。他第三次获得去法国的机会。4 天后，他便离开了安纳波利斯，从此结束了他 15 年来的立法生涯。这 15 年为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也使他为弗吉尼亚和美国这个新国家做出了某些永不泯灭的贡献。

任命后不到一星期，杰斐逊便匆匆回到费城准备带帕齐同赴法国。他没有再回蒙蒂赛洛，只叫人捎信到弗吉尼亚，让他的黑白混血的“仆人”（农奴）詹姆斯·赫明斯来费城同去法国。他还写信给一个受过他教诲的弗吉尼亚年轻人威廉·肖特，要他来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同时他还寄了一份委托

书给阿尔贝马尔县的尼古拉斯·刘易斯和弗朗西斯·埃普斯，后者是他亡妻的妹夫，自妻子去世后，他将两个小女儿一直寄养在他们家。3年后，他才又看到二女儿玛丽（当时叫波丽），她来到巴黎与父亲团聚。但最小的女儿露西他却再也见不到了，因为就在他离美后没几个月，她便死于百日咳。

杰斐逊决定从波士顿启程赴欧洲，以便顺路看看新英格兰州。他从未到过纽约城以北的地方，他深信谈判贸易条约前，先到东部各州去看看，能使他更好地代表它们的利益。到纽约和新英格兰之后，他大量收集资料。去波士顿途中，他在纽黑文停留，拜会了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斯泰尔斯发现杰斐逊是个“最有独创性的博物学家和哲学家，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学识渊博的人，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杰斐逊一路转转悠悠，到达波顿时已是6月26日。

7月5日一个清风薄雾的黎明，杰斐逊终于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色列斯”号船，他深知此行的责任重大，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洲大陆，想到即将投入到另一种崭新的生活中去时，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久久伫立在甲板上，船尾掀起的阵阵浪花，似乎在不断地提醒他，美利坚——他为之不懈奋斗的祖国正离得越来越远。

杰斐逊随身除带有国会的指令和20份递交各国的他与亚当斯、富兰克林的委任状外，还带了一本自己以前写的《弗吉尼亚纪事》抄本和他的图书室目录。当然，还有其他不少行李，包括四轮敞篷马车、一张美洲大狮皮（据说这是为了说明新世界的动物绝不比旧世界的小），还有约瑟夫·赖特最近画的一幅乔治·华盛顿肖像的油画。

帕齐是第一次乘船，更是第一次乘这么长时间的船在海上航行，一路上兴奋不已。她写道：“我们坐在一艘漂亮的新船上，它只下过一次海，航行得美透了。船上只有6名乘客，都是爸爸认得的人。一路上都出太阳，海水平静得像条河。要是再来一次航行也同这第一次一样愉快，我绝不反对。”

杰斐逊有观察天象的爱好。他每天中午都要记下经纬度，并计算前24小时走了多远，还要测风向和温度。他广泛的爱好及旺盛的求知欲、过人的充沛精力，总是让人望尘莫及。

“色列斯”号船航行顺利而迅速，19天后便到英国港口西考斯。杰斐逊本不想在英逗留，但帕齐上岸前得了病，于是他们在朴次茅斯呆了几天，他也趁机看看英国。

8月6日，杰斐逊一行到达巴黎。他们首先住到王宫附近的奥尔良饭店，4天后搬到小奥古斯汀路的另一家奥尔良饭店。

杰斐逊的法语是在弗吉尼亚学的，不过他刚在勒阿弗尔上岸时，讲出来的法语几乎没人能听懂。他乘上带去的非同寻常的马车，招摇过市，格外耀眼夺目，一路上引来不少人观望，还常常被一群乞丐包围。他们在里昂呆了两天，然后沿塞纳河北上巴黎。

初来乍到，法国巴黎风光旖旎，帕齐的上下眼皮几乎没合上过。她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我们经过的是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的美丽农村，是个美极了的大花园。”杰斐逊也为塞纳河畔碧绿如茵的乡村景色所吸引。他说：“没有哪儿能比这更富饶、耕种得更精心、搞得更漂亮的了。”

入乡随俗，一到巴黎，杰斐逊就给女儿买来漂亮的服装，也给自己买了一副褶边饰带，不久又买了一把佩剑和一副腰带，把自己重新装饰起来，“打扮成巴黎式样”。

杰斐逊时刻不忘对女儿的教育。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又设法让帕齐进入一所女修道院学校，即有名的庞特蒙皇家修道院。帕齐对法语一窍不通，刚进去时倍感孤独。但帕齐很聪明，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很快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1784年10月，杰斐逊在歌剧院附近的泰布特巷租了一所房子，在那儿住了一年左右后，又搬进了挨着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朗热阿饭店。那是一座宽敞华丽的大楼，他在法国的最后4年一直住在那里。同住的还有美国使团秘书戴维·汉弗莱斯。汉弗莱斯是乔治·华盛顿的副官，是一位年轻的诗人。杰斐逊又付租金，又买家具，增加了一些人员，还请了马夫。一算帐，他的“第一笔花费或者说是安家费”就大大超过了他第一年的全部薪金。

刚到巴黎的第一个冬天，对杰斐逊来说是漫长而寒冷的。他的头痛病又复发了，只得足不出户，一连6个星期卧床不起。次年1月，又传来留在弗吉尼亚的小女露西·伊丽莎白不幸夭折的噩耗，使杰斐逊又一次蒙受丧子之痛，心情格外沉重。

1785年5月，他的身体已大为好转。这时，他接到国会的指令，任命他为驻法公使，以接替79岁的富兰克林。年迈的富兰克林7月载誉归国。杰斐逊一直对这位外交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敬佩不已。他认为，富兰克林博学多才、思想深刻、经验丰富，没有人能真正“代替他”。

两周之后，杰斐逊到凡尔赛宫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递交国书，国王照例举行了隆重的召见仪式。杰斐逊对仪式只简单地说是“通常的礼仪活动”。

担任驻法公使职务后，杰斐逊不但继承了富兰克林的职位，而且继承了他的政策。他和前任一样，相信在欧洲只有法国重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如果美法联盟破裂，美国就会回到殖民地时代的从属地位。因此，加强美法关系是外交日程的优先。

杰斐逊驻法期间有两大使命：一个是促进与欧洲各国的商业往来；另一个是对付北非伊斯兰教各国海盗的掠夺行径。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经济景况暗淡，百废待兴，货币短缺，贸易停滞。英国决定把政治上已获独立的北美13个殖民地变成其商业的附庸。1783年，英国枢密院恢复了“航海条例”，并颁布命令，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属西印度。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也限制美国与它们在美国的殖民地的贸易。

针对这个现实，美国国会才决定委派外交使团同欧洲国家谈判缔结商业条约的问题，力图为美国经济打开一条出路。国会授权外交使团与英国、汉堡、萨克森、普鲁士、丹麦、俄国、奥地利、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突斯坎纳、萨丁尼亚、热那亚、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等16个国家订立商贸条约。结果却是广种薄收，只有普鲁士一国在1785年与美订立了商业条约。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使团的这场失败与3位使节缺乏主动性有关，他们要求各国代表到巴黎来，自己却在巴黎坐等，而不是采取积极态度，亲自前往谈判。

国会还要求他们与除埃及之外的北非诸国就海盗问题达成协议。两个多世纪以来，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等北非国家，以海盗事业立国。它们派出的海盗，在海上拦截来往商船，烧杀抢夺，为所欲为，十分猖獗。

1784年10月，美国商船“贝特西”号成为摩洛哥海盗魔爪下的牺牲品。为了解救商船上的船员，美国使团与摩洛哥方面多次谈判未果。后来，经别

人指点迷津，美国使团才如梦初醒：需要交纳大批贡品，才能换得被扣留的船员。

杰斐逊四处活动，积极做工作。摩洛哥皇帝在法驻摩洛哥公使的游说之下，突然表现出友好姿态，释放了“贝特西”号船的船员。为了不失时机，杰斐逊遂安排了美国驻巴黎总领事托马斯·巴克利前往摩洛哥交涉纳贡事宜。他带去了各种各样的贡品，如一双嵌金的手枪、青色瓷釉金制鼻烟壶、一把红丝伞、香水、一把剑、火柴、座钟，等等。巴克利终于与摩洛哥在1786年谈妥并订立了一项令人满意的条约，对方没有要求年贡，答应给予美国船员和公民以最惠国的保护，而且订立这个条约只费了3万美元。

然而，海盗横行的基本问题并未解决。北非各国仍习惯于向航行于地中海的大多数国家勒索钱财：扣押船只和货物，扣押水手作为人质，以此索要高额赎金。

1785年，两艘美国船在葡萄牙附近水域遭阿尔及利亚海盗袭击，被俘21人。杰斐逊立即派刚从国内到法的拉姆去阿尔及利亚谈判。由于对方要价太高，拉姆无功而返。

就在拉姆与巴克利受命赴北非进行交涉期间，和杰斐逊同期任命的英国公使亚当斯，在伦敦开始与黎波里和葡萄牙会谈。1786年，杰斐逊应亚当斯的要求也赶赴伦敦参加这一谈判。杰斐逊甚至还抱着一线希望，想同亚当斯一起，在他们两年任期届满之前，同大英帝国谈判一项贸易条约。然而，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同黎波里的谈判无果而终；同葡萄牙大使倒是签订了一个条约，却被葡政府否决了；英国连谈都不愿谈。

杰斐逊在英国呆了6个星期，这是他在祖先的土地上逗留最长的一次，但印象很差。当他被引见给国王和王后时，他感到“他们对亚当斯先生和我的接待很不礼貌，冷淡极了”。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的第一次会谈中，他就发现英方故意含糊其词，推倭应付。

由于英国方面对谈判一再推脱，这倒给杰斐逊不少间歇时间。他居然有了闲情雅兴坐了下来，让马瑟·布朗给他画像。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画像。此外，他还和亚当斯结伴而行，去参观英国的名胜古迹、著名花园。杰斐逊历来对栽花种草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一路上对花木园林尤其兴趣盎然。而且，对伦敦的建筑评头品足，认为伦敦的园林比巴黎漂亮，而那儿的建筑却是“最糟糕的式样”。

杰斐逊在离开英国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仇恨我们，他们的内阁大臣恨我们，而他们的国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杰斐逊越是这样想，就越是觉得有更好的理由同法国扩大和改善贸易关系，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在伦敦，杰斐逊还结识了两个年轻的朋友。一个是美国驻伦敦使馆的秘书威廉·史密斯，他后来与亚当斯的女儿结婚。另一个是约翰·特朗布尔，他是康涅狄格州州长之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画家。通过这个画家，杰斐逊结识了一名叫玛丽亚的妇女，她使杰斐逊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引出了一个令人一唱三叹的爱情故事。

1787年2月，杰斐逊开始了他一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直到6月中旬才回到巴黎。这次施行的直接原因是杰斐逊骑马摔伤了胳膊，几个月来他的右手腕除了写字，其他什么事也做不成，医生建议他去普罗旺斯，用矿泉水治伤。当然，他的这次旅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那便是要更广泛地接

触欧洲的实际，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参观朗格多克运河，以便了解运河的航行状况，以探讨扩大对法贸易的可能性；实地调查各地的市场现状，以便为美国农产品寻找出路。

他的这趟旅行是孤独的。在旅行结束时，他写道：“全部旅途我都是孤独一身。”他甚至没有带仆人同行，只在必要时临时雇佣人员。他说：“找来的仆人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这使我感到很自在。”

一路上，为了节省时间，他吃饭睡觉都不甚规律，有时两顿当作三顿吃。杰斐逊还不耻下问，常常求教于园林工、葡萄园工、制桶工、农民等，“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问个不停”。他从里昂给威廉·肖特写了第一份旅行报道，他说，他对这次旅行非常满意和愉快，他的期望也不过如此，“建筑、绘画、雕塑、古迹、农业、劳苦大众的情况，简直目不暇接”。

3月25日，杰斐逊抵达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遵照医生的建议试了四天水疗后，认为这水对他的手腕伤无助，于是来到马赛，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其间游览了波利城堡和迪夫城堡。他发现马赛景色迷人，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像伦敦和费城一样，充满了活力”。他还调查了美国航运业的状况，但令人失望的是它很不景气。他认为这主要是阿尔及尔海盗猖獗的结果。

杰斐逊是个有心人。他在巴黎时就听说意大利人用的脱粒机与众不同，碎米比美国的少，于是就决意到北意大利去了解那儿的大米生产情况和脱壳情况。

他雇了一头骡子，跨越滨海边疆的阿尔卑斯山，这是次冒险的经历。那是一条人工劈山修成的山路。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丽使杰斐逊为之倾倒，满目树木葱浓，周围岩石嶙峋，遍地长满橄榄树、葡萄藤；还有成群结队的牛群、羊群，它们不时发出的叫声回应在山谷；头上是湛蓝的天空，镶嵌着朵朵白云，简直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杰斐逊在都灵和米兰作了停留。他的旅行札记中着重记载的是对乡村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他对意大利的干酪制作几乎同对法国的酿酒一样感兴趣。他还对意大利的建筑、油画和雕塑极为注目，“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农业，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对我们很有好处”。

当杰斐逊在维切利附近发现了要找的稻田，而且也观察了那儿的脱粒机后，惊奇地发现这同爱德华·拉特利奇与他讲过的在南卡罗来纳使用的机器一样。因此他认为是稻种不同，而导致美国的米脱粒后易碎。由于当地法律规定禁止稻种出口，否则处以死刑，杰斐逊只好偷偷地抓了两把维切利的稻种放在大衣口袋里，把它们带了出去。

杰斐逊最后来到了米兰，遍游各处名胜。他取道热那亚回法国，因没能去罗马而遗憾。5月4日，杰斐逊回到了马赛，这次是乘船，在大风大浪中颠簸了两天，他还专门去参观了朗格多克运河，为的是为美国收集资料，将来可能也要建运河。实际上他有一个想法：把美国詹姆斯河和波托马克河以及俄亥俄河凿通！

杰斐逊自地中海的赛特进入运河水道，在水上完成全部200英里的航程，直到运河的西端终点图卢兹，运河在此接加龙河直入大西洋。他这次航行花了9天，记载了船闸的建造细节、它们之间的距离、过闸水流量，等等。6月10日，他回到了巴黎，记录的东西足够写一本书了。杰斐逊对这次探险活动满意极了，还对秘书威廉·肖特说：“你这位弗吉尼亚老乡要是不去这么旅行一遭，就不应急着回美国。”杰斐逊认为自己“从没有这样愉快地度

过 3 个半月 ”。旅行归来的杰斐逊精神大振。

第十三章 情路苦旅

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令人心醉的时光。

——托马斯·杰斐逊

热爱美术的杰斐逊在伦敦时认识了一位颇有抱负、客居伦敦的美国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共同的兴趣使他们有相见恨晚之感。

特朗布尔曾在华盛顿将军手下服过役，立志要用绘画艺术来再现美国革命的伟大事件。与杰斐逊相识时，正计划把与独立革命有关的一系列动人事迹和人物、场面绘成一组画，借以激励和教育下一代。

1786年夏，客居伦敦的特朗布尔应邀到法国，就住在杰斐逊家里，得到了杰斐逊的热情帮助。正是在这个朗热阿饭店里，特朗布尔画出了有关《独立宣言》的第一批草图。杰斐逊粗略地画出了独立大厅的房间布置图，并给特朗布尔详细描述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起草和最终签署《独立宣言》的情景。特朗布尔原本打算找到所有在世的签字者当面作画，然后把他们的形象搬上签署《独立宣言》的大型图画之中。这意味着将是一项浩大的旷日持久的工程，但他信心十足，杰斐逊当然就成为他所描绘的第一人。特朗布尔于1787年末到翌年初，首先为杰斐逊作了画。于是，在特朗布尔的画布上，留下了一个风华正茂、头发未加修饰、精力充沛、目光敏锐的高个弗吉尼亚人。这一肖像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不可磨灭的形象。

特朗布尔于1818年完成的画中人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签署《独立宣言》的油画，则永久挂在美国国会的圆形大厅之内。

然而，杰斐逊之所以对特朗布尔记忆最深，并不因他是历史画卷的画家，而是因他介绍了玛丽亚·科斯韦，玛丽亚·科斯韦的出现，搅乱了杰斐逊有条不紊、平静如水的生活，但也使他重新充满生气和渴望。

杰斐逊和玛丽亚·科斯韦是在哈勒奥布莱兹共同度过了他们第一个在一起的下午，由此开始了他们浪漫的爱情之旅。

这个地方其实并不适合谈情说爱，只是一个新的、大型的、嘈杂的巴黎粮食市场，农民和商人并肩叠背，于草、亚麻、大麦味混杂一体。然而此处却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其巨大的穹窿形建筑有130英尺宽，为木质结构，里面采光很好，明亮无比。外面一古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圆柱与屋里的环形阶梯相连，观光客可以沿此阶拾级而上到圆顶。据说这是为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修建的，她常常与占星学家爬到顶上占卜星象。

本来，那天杰斐逊不是很愿意去游览。他对约翰·特朗布尔说：“也许在我还没看到它之前，哈勒奥布莱兹就塌了。”约翰·特朗布尔劝他去，允诺说有两个好伴。他们便是从伦敦来的理查德·科斯韦和他的妻子。杰斐逊转念一想，好歹可以去看看那个建筑，看看是否可以把它移植到里士满去。于是便同意了。去了之后，杰斐逊深有感触他说，那是“世界上最精妙绝伦的建筑”。然而，他此行的收获与其说是对建筑本身的欣赏，不如说他的心被同去的科斯韦夫人勾走了。

杰斐逊被站在面前只一步之遥的科斯韦夫人吸住了。他甚至忘了去吻科斯韦夫人伸给他的手。科斯韦夫人身上散发出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悄悄地、轻轻地便把杰斐逊困在情网之中。

去游览那天，本来杰斐逊还要参加一次宴请，后来他不得不取消了。那

天，他们共进午餐之后，一起观看画展，路过花园中像瀑布一样的喷泉，回到巴黎观看焰火表演。

杰斐逊得知玛丽亚会弹竖琴和拨弦古钢琴时，更是爱慕万分，不愿分手。杰斐逊劝他们到约翰·巴鲁茅斯特·克伦菲尔兹家去坐坐，这家女主人朱莉是个出色的竖琴演奏家。他们一起弹琴歌唱，深夜方罢，杰斐逊与玛丽亚依依不舍，后来给玛丽亚写道：“当我晚上回来，却急切盼望着天明，真是夜长如水啊……”

杰斐逊常常沉浸在第一次见到科斯韦夫人那种感觉之中。他从她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女性的全部美好气质：音乐、谦和、美丽，还有女性特有的温柔性情和魅力。当时，尽管已是深夜，他还想方设法和他们多呆些时候。但这时差人来告，说有急件，需要马上处理，杰斐逊只好万分遗憾地离开了。这一天，他终身难忘。

第二天，杰斐逊就去找特朗布尔，要同他一起去科斯韦夫妇家。科斯韦夫妇也喜欢这个新认识的、学识渊博的朋友。此后，杰斐逊和特朗布尔常常陪伴科斯韦夫妇出入巴黎各种文化娱乐场所，欣赏音乐，观摩画展，游览巴黎附近的名胜古迹。

在他们相遇的最初几天，杰斐逊并没写信，只是和特朗布尔陪科斯韦夫妇整天转卢浮宫、凡尔赛宫等，转得头晕眼花。

人逢喜事精神爽。杰斐逊情不自禁地写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努伊利港、塞纳河沿岸的山峦、彩虹、城堡、花园……无不令人赏心悦目，时间不知不觉地与车轮一起飞逝，每当晚上一个人对月回忆时，感到幸福何其丰盈！”

这位43岁的美国驻法外交官完全被秀外慧中的玛丽亚征服了。腼腆的杰斐逊曾自称是“来自弗吉尼亚的乡下人”。他整日穿梭于外交官、政府官员、学者之间，现在却发现他也像艺术家一样过着漫不经心、豪放不羁的生活。一种阔别多年的冲动搅得他坐卧不安，他恨不得没有夜晚，永远是白天，这样，他便可以和玛丽亚在一起，享受美好时光。

27岁的玛丽亚，父母虽是英国人，但她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并在那儿接受教育。

玛丽亚的母亲在生玛丽亚之前生了5个孩子，其中4个都在晚上莫名其妙地猝死。他们怀疑是护士所为。因此，在玛丽亚出生后，她父亲查尔斯·哈德菲尔德就雇佣了一个保姆来监视护士。

有一天，一个女护士来到保育室，把小玛丽亚抱在怀里，嘴里喃喃念道：“可怜的小东西，我已送了4个上天堂去了，我希望你也跟他们一起去吧。”这话碰巧被保姆听到了，她冲进玛丽亚父亲的房间去叫她父亲。小玛丽亚这才死里逃生。那个女护士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玛丽亚眼里，父亲不仅是救星，还对艺术和科学知识有很深的了解。玛丽亚对父亲的慈爱感激不尽。就这点而言，玛丽亚的父亲与杰斐逊对女儿的舐犊之情十分相似。

从小长在意大利的玛丽亚，幼时就深受音乐和艺术的熏陶，而且在这两方面都颇有天赋。她讲起英语来，带有意大利口音，杰斐逊反而觉得非常悦耳动听，还有一种一般英国妇女没有的“异质”。

玛丽亚的父亲去世后，家景衰败，母亲带着她回到伦敦老家。玛丽亚想进女修道院，但她母亲是新教徒，坚决不同意。不久，她就在艺术家安杰莉

卡·考夫曼的保护之下，接受熏陶，并很受尊敬。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很欣赏她的绘画，同时也被她的文雅单纯所吸引。她还从师于艺术家亨利·图西利，据说她曾和作曲家帕森斯博士订婚。但最后是科斯韦使尽浑身解数，花了2800英镑把她买了过来，科斯韦还答应照顾她母亲直至去世，22岁时，漂亮的才女玛丽亚嫁给了有钱有地位的理查德·科斯韦，但婚后生活并不愉快，玛丽亚“总是看不起他”。科斯韦却使玛丽亚的英语和绘画技艺得到了提高。

44岁的理查德·科斯韦是英国著名的徽图画家，个子比玛丽亚稍矮。科斯韦有所成就，常给英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包括威尔士亲王画像，他衣着浮华，喜欢自吹自擂，感觉良好。玛丽亚却认为他虚伪，喜欢谄媚。据说科斯韦有时还悄悄在鼻烟盒上作一些黄色图画，以此谋求暴利。

科斯韦夫妇朋友甚多，他们的家是人人向往的文艺沙龙，玛丽亚的“时尚沙龙”是当时伦敦最有名的。科斯韦在寓所舍恩堡挂满了欧洲名画，摆着异国家具，铺着波斯地毯，常常聚集着不少精莫名流。特朗布尔与他们关系密切，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客。

1786年，奥尔良公爵邀请已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理查德·科斯韦去巴黎，给公爵夫人及子女画像，27岁的玛丽亚也一同前往。

对玛丽亚来说，她似乎期望有人能“解救”她。她对朋友说，当她第一次看到科斯韦时，都有些害怕，后来才逐渐爱上了他。但当她后来发现丈夫有外遇、而且还是同性恋者时，彻底失望了。她曾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快乐何在？我的愿望总是第二位的，总是服从于你，而你却三心二意，先是和阿弗特沃兹小姐，后来又是哈默史密斯把你的心占据了。你的所为使我们的幸福走向了尽头。”可见，玛丽亚与科斯韦的感情早已“风雨飘摇”。

玛丽亚和杰斐逊心有灵犀，她对杰斐逊的孤独很敏感，杰斐逊对玛丽亚的不幸福也很敏感。加上27岁的玛丽亚像玛莎·威利斯一样，身材瘦小，眼睛碧蓝，肌肤雪嫩，一头金黄卷发，仪态优雅，女性味十足，又是音乐爱好者，杰斐逊似乎在她身上看到了亡妻玛莎的影子。

由于理查德·科斯韦忙于作画，无法脱身，而特朗布尔又到德意志旅行去了，杰斐逊和玛丽亚这时便可单独在一起。作为公使，杰斐逊公务繁忙，但却挤出下午的时间与玛丽亚相会，只在星期天才见到女儿。有道是：日久生情。何况杰斐逊第一次见面就被玛丽亚迷住了，现在又是天赐良机，杰斐逊简直乐不可支。有了玛丽亚在身边，他看什么都心醉，做什么事都喜气洋洋。

1786年8月9日，他在给朋友呵比盖尔·亚当斯的信中流露出这种包藏不住的幸福，那是他和玛丽亚相识还不到一个星期。他说：“我们歌唱，跳舞，嬉笑，作乐。没有暗杀，没有背叛，没有造反。”

于是乎，金秋9月，良辰美景，杰斐逊和玛丽亚双双坠入爱河。

1786年9月18日，在杰斐逊和玛丽亚相识后的第六周，他们依旧来到塞纳河畔，并肩漫步向西而行。阳光照在清清的河面上，翻起鳞鳞波光，河边偶尔还蹦出几只松鼠，警觉地、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秋日的太阳已不像夏天那么烈，岸边的树木已开始飘落凋零的黄叶，踩在树叶上，沙沙作响，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和甜美。杰斐逊完全沉浸在忘我的甜蜜之中，又蹦又跳，又说又笑，情绪极高。甚至忘了自己已人到中年。然而，正应了“乐极生悲”之说，一阵风过，玛丽亚的披巾被吹了开去，杰斐逊猛地跳过围栏，想去把

披中捡回来，却不料重重地摔倒在地，右手腕旋即脱臼，后来发现骨折，虽经多方治疗，但接得不好，部分肌肉萎缩，右手肿了一年多，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残疾。他称这是自己干的一件“蠢事”。

玛丽亚看到杰斐逊摔伤后，很痛心，却碍于难找借口离开丈夫去看杰斐逊。第二天，她只好写了一纸字条：“我本想一天见你两次，但我现在鬼怪相缠，脱不开身，不知你怎么样了？”显然，她原打算早上去看杰斐逊，丈夫却不让她去。不过她晚上仍到杰斐逊那儿去了，并答应第二天一早再去看他。

两周后，即10月5日，科斯韦夫妇突然决定离开巴黎，返回伦敦。杰斐逊是4日才从玛丽亚那儿得知此事的。尽管玛丽亚认为还没做好准备，还需要些时日，但她丈夫却坚持立即就走。

在这段时间里，杰斐逊常常一个人选择抄录或背诵诗词，想以此表达其炽烈的情感。他阅读和抄录弥尔顿、格雷、柯林斯、申斯顿和波普的诗。有些诗是反映他对亡妻的怀念，但绝大多数却是对新欢的赞美。

当杰斐逊得知玛丽亚·科斯韦要返回伦敦时，他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这样几行令人伤感的句子：

我哀
我叹
我燃烧
我毁灭
别让我们分开
让我们相互拥有
你的拒绝
将使我心碎万段

杰斐逊很难过，想挽留，却又感到回天乏力。他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便条给玛丽亚：“我整夜疼痛，难以入睡，很遗憾，再也得不到你可心的相伴……如果你执意要走，愿上帝保佑你，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代我向科斯韦先生问好，平安到达英国之后，望来信。如果你今天不走，请一定告诉我。”

科斯韦夫妇的确推迟了一天。

杰斐逊忍痛到科斯韦家去道别，还送了他们几英里路，在圣但尼斯才最后分手。

目送玛丽亚的马车渐渐消失在远方，杰斐逊仿佛失去了什么。转眼之间，一切又变得如此暗淡无光，毫无生气。他感到“无精打采，郁郁不乐”，孤零零地回到了巴黎。只要他一闭上眼睛，玛丽亚那可心的笑容便浮现在眼前，将近两个月的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便到此戛然而止。

杰斐逊后来回忆说：“与其说活着，还不如说已死了。”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他的心已死了。

玛丽亚走后，杰斐逊情绪十分低落，那种似乎早已忘却并不再习惯的无人相伴的生活，又恢复如昨。玛丽亚的情影，特别是她那双盛满忧郁、渴望拯救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杰斐逊的眼前晃动。他相思成疾，度日如年，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给玛丽亚写信。由于右手尚动弹不得，他只好用左手写，尽管很吃力，但相思之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极端的痛苦之下，这位才子一气呵成，写了密密麻麻的12页长信。

这封信的体裁很特别，它采用了“头”与“心”之间对话的形式。“头”代表理智，“心”代表感情。这封信的原稿已找不到了，现在所见的是杰斐逊自己复印留下的那份。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夫人，在圣但尼斯驿亭旁怀着悲痛的心情扶你上车，看到轮子开始转动，我就转身向我自己的车子走去。当时仿佛感到自己已不再活着，而是已经死去了。……当我孤独地、悲伤地在人炉旁边坐下来时，在我的“头”和“心”之间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头”说：

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随随便便生活的地方。为了避免你不断地为我们招致外来苦难，你必须学会迈步之前看看是否平安无事。要小心谨慎地前进，这样你就可以掌握决定权。既要把任何一个事物带来的快乐放在一个天平盘上，也要把随之而来的痛苦放在另一个天平盘上，然后看看天平向哪一方倾斜。

交友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当一个新的朋友被介绍给你时，要仔细周密地考察他。要考虑他会带来什么益处，以及他会招致什么样的麻烦。在你弄清楚下面有没有钩之前，不要去食诱人的鱼饵。

生活的艺术便是避免痛苦：能够绕过包围自己的岩石和浅滩的人，才是最高明的舵手。欢乐始终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不幸也在我们身旁；在追求欢乐时，痛苦也在向我们袭来。防止痛苦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反求诸己，满足于自己的乐趣。

那些自足的东西，是聪明人所指望的唯一乐趣，因为别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

因此，知识上的乐趣是无法估量的价值，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始至终把我们导向某种新的事物的乐趣，也不要享受过分，以致感到烦腻。这样我们就可以清醒地、庄严地前进，而能超然于尘世的忧患之外，就可以细心地观察真理和自然。物质和运动，观察把它们的生存连结在一起的法则，以及创造它们并且靠这些法则把它们约束起来的那位永恒的神。……友谊不过是与愚蠢、荒唐以及与他人的不幸建立起来的一个同盟的别名罢了。

可见“头”从理智出发是冷静的，它对感情与友谊产生怀疑，认为这些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

“心”则不然，“心”认为友谊是可贵的。杰斐逊通过“心”追忆起那如梦一般短暂的与玛丽皿在一起的欢愉光阴。他这样写道：

阳光灿烂，大自然欢快异常。山丘、溪谷、城堡、花园、河流，到处都生机勃勃，色彩斑斓。它们何以这般绚丽多彩？

是因为有了我们可爱迷人的伙伴。它们高兴快乐，是因为她开心喜悦。如果她不存在，只有它们，一切都会黯然失色，毫无生气：她一出现，万物复苏，生机盎然。让与世隔绝的愁闷和尚到他隐居的小屋里去寻求圣洁的快乐吧！让这个理想升华的哲学家在追寻穿着真理外衣的幽灵时，抓住梦幻般的幸福吧！这些幽灵的智慧就是极度的愚蠢；它们把仅仅没有痛苦错当成幸福。要是它们有幸体验过一次心灵巨大震撼的真正快感，它们宁愿以对自己生命的全部无味的思索来换取这一刹那。

信中“头”与“心”的对话，实际上是“两个杰斐逊”之间的对话，是

杰斐逊内心深处，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猛烈冲撞。

《头与心的对话》这封信，是了解杰斐逊内心隐秘的重要窗户，对它的解释是最有争议的，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虽然光阴荏苒，但他对玛丽亚的思念却没有淡季。1786年圣诞节前夕，他写信给她，假如他能飞，就将飞到她身旁再也不离开。“如果我不在现实中与你相聚，我将在想象中与你厮守在一起”。

回到伦敦之后，玛丽亚患了忧郁症，“失魂落魄，情绪低落，焦虑不安”，她抱怨杰斐逊迟迟不给她写信，说这是“宙斯之子的惩罚”。

约翰·特朗布尔从德国回来后，在安特卫普与科斯韦夫妇不期而遇。在得知杰斐逊手腕骨折之后，特朗布尔立即以同情之心给杰斐逊写信，并详细描述了他的德国之行。玛丽亚·科斯韦用意大利语顺便写了几句附言：

“我顺便加几句，问问你好不好。我希望到圣但尼斯的旅程不致使你因对我们的思念而痛苦。我想很快会收到你痊愈的消息，这将使思念你、爱你的朋友玛丽亚·科斯韦无限欣慰。科斯韦先生向你问好。我们是星期天到这儿的，到这儿已是凌晨3点。”

当杰斐逊收到特朗布尔的信之后，他很快瞥了一眼，并满心欢喜，以为整封信都是玛丽亚写来的。但当随即发现只有四行字的附言时，他极为失望。

于是杰斐逊又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封《头与心的对话》，一并寄给了伦敦的约翰·特朗布尔，要他亲自交给玛丽亚。杰斐逊和玛丽亚早有约定：把信交给特朗布尔，让他亲自或再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转交，以免他们的信落入她丈夫或邮局间谍之手。杰斐逊怀疑他的信常常受到邮局的检查。但他对特朗布尔完全信任。当有一段时间特朗布尔不在时，杰斐逊就不得不通过邮局，但把他的封缄掩盖起来，并省掉了他的签字。而特朗布尔确实是一个忠实的、讲义气的同谋，即使在50年后，当他的自传要出版时，这一时期的日记本中有关杰斐逊和玛丽亚在巴黎约会情况的内容，全部被撕了下来或干脆“丢失”了。

1786年11月17日，当玛丽亚好儿周没收到杰斐逊的信时，便给杰斐逊寄去了一本她自己谱的曲和二重唱的歌曲集，并不耐烦地问道：“你的沉默意味着什么……我每天都焦虑地等待邮差，但每次都是空等一场。我很担心……分手的痛苦过去之后，我的生活依然充满忧虑……这儿的天气很糟，凄风苦雨……火炉前，我思绪万端，现实却使我如置冰河。”

11月19日，杰斐逊回信，这是他受伤后第一次用右手写信。他在信中说：“你下次来巴黎，我们便不再分开，但你会来吗？我期待着你的回信，对我多说说，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这将是我的精神食粮。”

杰斐逊也是相思成疾，他慨叹：“我的生命之烛在燃烧，没有欢乐，漫无目标。”

虽然1786年杰斐逊在英国小住，被英国式花园深深吸引了，但他讨厌英国人，发誓再也不回英国。他满怀欢喜地期盼着春天玛丽亚会去巴黎，因此也就没找别的借口去英国。他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来年的相会。他说：“我宁愿受骗也不愿不抱希望地活着。多想想我，热情一些。把我摆在你的心上，同那些你最爱的人放在一起；给我写信吧，我需要你的安慰。”他等得已有些不耐烦了，12月24日，他写道：“至此你应该制定你的行程计划，收拾行装了吧？”

然而玛丽亚却不得不推迟其行程。当玛丽亚写信告诉他夏天才能去巴黎

时，杰斐逊便决定到意大利——玛丽亚的出生之地去旅行。

他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后，给玛丽亚写信道：“但是我生来就注定要失去所爱的，你为何没有与我在一起呢？如此之多美不胜收的风景，只需你用铅笔把它们描绘下来……来吧，我亲爱的夫人，我们每天早上一起用餐，忘掉我们要再次分手。”

这时玛丽亚正在为其丈夫取消夏天这趟法国之行而苦恼不堪。她说：“我不知今年何时才能去巴黎，我大夫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我老想去巴黎？去巴黎恍如梦境一般，我现在真希望它是真的。”

最终玛丽亚还是去了巴黎，而且是她一人去的，并在那儿呆了3个月。也许他们都期待着重温前一年夏天的欢乐。然而，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情况的发展并未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科斯韦夫人终于在1787年8月28日到达巴黎。由于担心丈夫生气和牧师责备，她搬到卢博米尔斯基公主的别墅去住。这个地方离杰斐逊的朗热阿饭店有相当一段距离。卢博米尔斯基公主是波兰国王的表妹，有一个十分时髦的沙龙。传出的话说，玛丽亚到巴黎是为作画而来，于是很快她便在追随者的簇拥下出入画廊。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显得冷冷淡淡的。

在她12月回伦敦之后，杰斐逊就抱怨他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只是“偶尔几次，而以前我们常常半天或一整天地呆在一起”。关于这一变化，有名的杰斐逊传记作家们各有看法。纳森·沙赫纳说：“这与上一次全然不同。也许正是因为科斯韦夫人的丈夫不在，使他们两方都更加小心谨慎。”而梅里尔·彼得森则认为是“杰斐逊的感情冷却下来了”。马隆的看法则是：“他们双方没能重温第一次那无忧无虑、销魂夺魄的美好时光。看起来他们谁也不真正愿意那样。”

事实上，这个秋天是令人沮丧的，而不是让人感到满足的。

玛丽亚担心失去丈夫。因为她在经济上完全依靠科斯韦。一旦她在巴黎找情人的秘密公之于众，科斯韦肯定要被嘲笑为戴绿帽子。随着时间过去了几周，玛丽亚越来越对自己是否在扮演私奔妻子的角色表示怀疑。她面临着很可能失去收入的结局，她害怕怀孕，害怕受到“上帝的惩罚”，因为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于是她的行动越来越与她内心的忏悔相一致。她后来向杰斐逊道歉说：“我留下一个糟糕的印象，我简直不能自己。”

杰斐逊却对玛丽亚内心的这些冲突和不安一无所知。他依旧沉浸在热恋之中，甚至抱怨说：“你使每个人都爱你，你被朋友包围着。”

杰斐逊希望的是单独和她在一起，而不满足于成为她沙龙中无数羡慕者中的一个。

还有杰斐逊的两个女儿（小女儿后来也被接到巴黎了），除了星期天，每天都在修道院学习。她们见过科斯韦夫人，敏感的和嫉妒的大女儿玛莎深知她父亲移情别恋的后果。

11月份他们见面更少。科斯韦夫人写信告别杰斐逊，她将很快回伦敦。杰斐逊邀请几个朋友为玛丽亚举行告别晚宴。玛丽亚也邀请了几个朋友参加。

12月6日，杰斐逊和她在巴黎共同度过最后一夜，而且答应和她共进最后一次早餐，并送她上路。就在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发生了玛丽亚后来描述的“困惑的和心烦意乱的事”，因此她很早就不辞而别了，临走时给杰斐逊留下一张冷冰冰的短笺：

“明天早上我不能和你共进早餐了；再次向你道别是令人痛心的，因为我留给你的的是伤感。你已把你所有的话都告诉了特朗布尔先生，我得到的反馈是我对你已不再有用，你对我够客气了。”

杰斐逊深感受到伤害，既恨又悲，5天里他没写过任何信件，直到7个星期过去后，才给玛丽亚写了信。在这之前，他收到两封科斯韦先生写来的信。与前面那些情意绵绵的信相比，杰斐逊的回信冷若冰霜。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谁也不能肯定，但一种猜测是玛丽亚在性生活方面“遇到了困难”。

玛丽亚·科斯韦看来希望找一个父亲，而不是情人，当杰斐逊却拒绝做父亲时，她就不知所措了。

从她留给杰斐逊的便条上看，杰斐逊委托特朗布尔给他画像，而不是她。她的父亲鼓励她作画，说她有天才；而杰斐逊需要的是她，需要她的倾慕与爱，而不是她的艺术才能。但她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情妇。当他认为她的艺术无关紧要时，她的形象被进一步粉碎了。

一旦回到伦敦，她又被愤怒、引诱以及杰斐逊以前信中的脉脉温情所包围。她希望特朗布尔为她画一张杰斐逊的画，特朗布尔最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一直珍藏着杰斐逊的画直到去世。她还保留了一个杰斐逊给她丈夫写信的信封，里面是她画的两张愁眉苦脸的男人像。

玛丽亚在1787年圣诞节那天写的条子上，再次反映出她意识到她与杰斐逊的恋情已走入死胡同。

科斯韦在伦敦的一个好朋友是美若天仙的安杰莉卡·斯凯勒·丘奇。她是一个英国议员的妻子，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杰斐逊的政敌）的弟妹。当得知安杰莉卡要去巴黎、而且肯定会见杰斐逊时，玛丽亚在便条中写道：“你见到了漂亮的丘奇夫人了吗？……如果我不如此爱她的话，将担心她与我竞争，但是现在我允许你用你全身心去爱她。如果我还能占据你心目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你音讯杳无，我认为我已不再可能收到你的信了。”

杰斐逊最后在1788年1月31日的回信中写道：“我如期前往与你共进早餐，但你在早上5点就不辞而别。这的确使我深感分别之痛。但它也让我有幸免除回忆那一痛苦。”他以一种故作镇静的、一戳即破的借口，解释为何7个星期没有写信，他说没能找到能亲自捎信的人，他怀疑邮局的“不忠”。他的确见到了丘奇夫人，他冷酷地说：“我看到世界所给予她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我并不想在乎你们之间的喜好。我对她了解甚少，就如对你的了解一样。”随后的3个月，杰斐逊没再给玛丽亚写信。

事实上，并不像科斯韦夫人想的那样——丘奇夫人会在杰斐逊的感情中取而代之，或许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来自蒙蒂赛洛的小女奴，他们之间的爱慕之情早在1788年就如花绽放。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之间的隔阂和鸿沟日益扩大，直到最后他们已不再希望再次见到对方。这段情缘就此宣告终结。

第十四章 心系故园

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人们。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于 1785 年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后，短期内已不可能返回美国了。他的大女儿帕齐在巴黎上学，小女儿波丽留在弗吉尼亚他的妻妹伊丽莎白和她丈夫弗朗西斯·埃普斯家却已两年多了。他十分想念波丽，于是写信请他们想办法把波丽送到法国。

杰斐逊是个十分细心的人，他为此作了极为详细而明确的要求。比如他要求波丽应从弗吉尼亚出发，搭乘 4 月、5 月、6 月或 7 月才开航的上等船。这条船必须在大西洋至少跨海航行过一次，而且船龄不能在 5 年以上。因为在杰斐逊看来，大多数的失事船只不是第一次跨海航行，就是船龄太老，超过了 5 年。

由谁来照看路上的波丽呢？这也是一桩颇费斟酌的事。杰斐逊要求把波丽托付给来法国或英国的“某位有身份的妇女”，或托付给“某位细心的先生”；如果是托付给先生的话，还得有一个出过天花的女人侍候女儿。

波丽当时已经 7 岁。虽然两年没见到父亲了，但她却并不想就此离开姨妈、姨父和表姐妹。她已习惯在姨妈家的生活，感到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一直过得很快活。她写信给父亲说：“你让我去你那儿，我很难过。我宁愿不去法国，我宁愿同埃普斯姨妈他们住在一起。”

伊丽莎白·埃普斯只好写信给杰斐逊，希望他放弃要波丽去法国的要求。但杰斐逊回信说，如果波丽继续同他和她的姐姐分离下去，将来一辈子都会将他们视若路人。杰斐逊就只有两个女儿，何况妻子去世后，他更是把爱全部转移到女儿身上，怎会不思念她呢！

最后，在大家的哄骗下，波丽于 1787 年 5 月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她的表姐妹在船上陪她玩了几天，趁她熟睡之时才悄悄溜下了船。波丽被托付给了船长安德鲁·拉姆齐，拉姆齐是个幽默风趣、经验丰富的船长，很快便赢得了波丽的喜欢，以致到下船时，波丽大哭不止。一路上陪伴波丽的是 14 岁的名叫萨莉·赫明斯的小女奴，她的哥哥就是随杰斐逊去巴黎的詹姆斯·赫明斯。此二人皆为杰斐逊岳父与其黑奴所生，是杰斐逊之妻玛莎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波丽到英国是阿比盖尔·亚当斯（杰斐逊的好朋友、当时的美国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去接的。波丽在亚当斯家住了 3 个星期，很快又爱上了这一家，他们对波丽都关怀备至。亚当斯太太称她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爱上一个小孩子。杰斐逊并没有亲自去伦敦接波丽，而是由一名仆人代劳了。

1787 年 7 月，波丽终于到了巴黎。她见到父亲和姐姐时，都不认识了。不过，很快他们便亲密起来。杰斐逊把波丽送到帕齐所在的修道院学校一起上学，一周回来一两次看爸爸。在新学校里有姐姐做伴，波丽很快就适应了。波丽聪明伶俐，不到一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然而，波丽的到来和她对弗吉尼亚的眷恋亲情，无疑也重新燃起了杰斐逊对家乡的迷恋和向往。到 1788 年夏天，杰斐逊便开始盘算回美国的事。

杰斐逊虽然身在他乡，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祖国的情况。

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 1786 年岁暮发生的谢司起义。

小农阶层是受到 1785—1786 年经济萧条打击最大的阶层。几年来，他们一直因为战时繁荣的崩溃而遭受痛苦。由于军队复员以及英国对于美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贸易所加的限制，农产品价格从 1783 年起一直在跌落。面对日益缩小的市场，农民们被迫举债度日。到 1786 年，他们已负债累累，以致有一大部分农民濒于经济破产。要避免更大的灾难，就需要采取断然行动。

因此，债台高筑的农民联合起来，要求政府通过法律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们主张制定法律以废止因负债而监禁，削减抵押品的票面价值，中止收取债款，大量发行货币，这是无痛清偿过去所负债务的一种办法。1786 年当经济萧条最严重之时，一些州被迫通过法律发行纸币，在罗德岛、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在实现大量发行货币以抵偿欠债的目的上是非常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提倡“稳定”货币的人们则在六个州内取得胜利，而在另外两个州内，他们限制纸币的发行，对农民所提的要求断然否决。

在新罕布什尔州，武装农民包围了州议会，只是在民兵出动后才被驱散。这次骚动是规模大得多的抗议运动的前奏。

在马萨诸塞州，由于大资产阶级所实行的短视而自私的政策，最终造成 1786—1787 年的谢司起义。这些政策使得该州的财政濒于破产。由于需要有大量款项来支付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偿付州债的利息，不得不征课重税。控制着该州事务的富有商人，将捐税负担转移到土地和人头税上，这对已经贫困不堪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 1785—1786 年的经济萧条使农业收入骤减，农民们实际上已不可能缴付重税和偿还大量债务了。

就在该州领导人不顾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强制实施其征税措施时，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力量正在组织起来，以保护自身利益。如同在革命前的那几年一样，1786 年人民也召开会议以采取行动。在新罕布什尔大会上，发言者声称，他曾和其他人一道为争取自由而战，因此决心要维护它。

1786 年 8 月 26 日，约 1500 多名马萨诸塞州愤怒的农民，在前陆军上尉丹尼尔·谢司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占领了北安普敦法院，以制止要强制偿付税收和债务的法律诉讼。该州其他各地的农民也纷纷效仿，他们中许多人就曾是革命战争中的退伍军人，这次又重新武装起来，一场大起义爆发了。

领导这一农民起义的人是丹尼尔·谢司，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是一个勇敢的军人。谢司已一无所有，甚至不得不将拉法叶特将军赠给他的宝剑拿去换了几块钱。谢司的一个朋友鲁克·戴伊，也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军人，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他们俩志同道合，合谋起义造反。

1786 年秋，谢司和戴伊集合了一批武装农民，企图袭击波士顿。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派遣了一大批军队由林肯率领。结果双方发生了一场酣战，谢司因寡不敌众而败北，被迫撤至马萨诸塞边境以外地区。

随后，谢司率领余部又回到马萨诸塞州，围攻在斯普林法特的联邦军械库，结果又被击败，政府军命令民兵穷追杀尽“叛乱者”。但是民兵却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暗地里同情这场农民运动。因此，谢司和另一些人逃了出来，企图在马萨诸塞州边境之外，再度把他们被击溃的军队集结起来。但这时起义的骨干已被冲散，只有少数人响应武装起义的号召，谢司失望之余逃往纽约。

谢司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美国朝野的“震动”是巨大的。

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后，仰天长啸：

“仁慈的主，人为何物？”

而当阿比盖尔·亚当斯把这一消息传给托马斯·杰斐逊时，杰斐逊则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我喜欢不时有一场小暴动。”他又补充道：“启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杰斐逊还冷静地警告说：“上帝不允许我们能在20年中没有一次这样的叛乱。”杰斐逊的这一态度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祸兮，福之所倚”。

这次起义促使美国领导集团决定于1787年夏在费城召开一次代表会议，目的是建立一个能真正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更强有力的全国政府。

1787年美国国内另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则是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废弃了《邦联条例》，代之以《联邦宪法》。麦迪逊是这个制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把《邦联条例》视为文职政府出现危机的预兆，担心邦联“根基动摇”。

《邦联条例》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于1777年11月由大陆会议通过的，1781年3月经各州批准生效。根据条例，解散了原来的大陆会议，建立了邦联政府，但邦联政府仅具有各州联盟的性质，权力极为有限。

麦迪逊早就一心一意想废弃“软弱无力”的《邦联条例》，用一部体现中央集权的宪法去代替它。1787年春，在启程赴费城出席代表会议之前，麦迪逊就写信给杰斐逊，向他的老朋友表达了他的这个意图。他认为，医治“现存宪法的致命的痼疾”最有效的灵丹妙药，便是授予“联邦首脑对于地方立法机关以在一切场合的否决权”。简言之，麦迪逊主张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行使绝对的控制。他认为，把权力全部送给联邦政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看到在《邦联条例》下面，“诸州的立法主权”不断地阻碍了联邦的权力。

这年6月，杰斐逊在回信中明确反对麦迪逊的主张。他不同意麦迪逊把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充到极限，他坚持要维护州的主权的原则。然而，杰斐逊客居异乡，鞭长莫及。

1787年9月17日，费城会议终于废弃《邦联条例》，通过了一部新的《联邦宪法》，改邦联为联邦。麦迪逊因其在宪法制定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出众才华，赢得了“宪法之父”的美称。

这部宪法是在强化政府权力的要求下，也是在谢司起义的震动下制定的。它同时也是奴隶制南部与商业的北部。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妥协以及保守派对于人民力量让步的产物。因此，它不仅满足了保守派的要求，调和了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色彩。

杰斐逊是11月初收到约翰·亚当斯从伦敦寄去的宪法抄本的。

杰斐逊看完文件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其中有不少很好的条款；也有不少很糟糕的条款。我不知孰多孰少，”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他阐述了对这个新文件的看法：

“我很喜欢如何组成政府的总构想。它应当自己平和地运转，而不必不断地去依赖各州的立法机关。我喜欢政体由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组成。我喜欢授予立法机关征税的权力，因此，我赞同扩大由民众直接选举的议院……特别吸引我的是对大州和小州对立要求的折衷解决办法，即小州要求的是平等，而大州要求拥有相称的影响。我也对以个人投票取代州的投票方

法感到十分高兴；我还喜欢行政首脑经国会两院中一院 1/3 同意，便拥有否决权，但是我更希望司法机关也可参与或拥有类似的单独权力。”

在杰斐逊不喜欢的条款中，有两点：第一，他反对没有《权利法案》。他对一位朋友说，没有此法案令他吃惊。在杰斐逊看来，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有压迫人民的倾向，任何统治都有趋向暴虐的可能，所以人民的权利需要法律上的保障，而《联邦宪法》上保障人权的条款一条都没有。杰斐逊不满地写道：“缺乏显明的法案！它确定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它制定人身保障法不受任何干涉，以保障人身自由，在民事及刑事案件中规定一律由陪审官审判……。”第二，他深为惋惜宪法中竟然放弃了轮换任职的原则，特别是使总统能无限制地连选连任，他的担心是，总统如一直连选连任一辈子，便可为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

然而，到 1788 年初，他对于修改宪法。把总统轮换制写进宪法一事不抱希望了。因为在这年 2 月 7 日给友人的信中，他只是谈到争取《权利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尽管他仍表示继续反对宪法之容许总统连选连任。显然，因为美国人普遍信任注定当选为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所以没有希望在总统任期问题上修改宪法。因此，从那时起，杰斐逊就集中全力去争取《权利法案》。

1787 年 12 月 20 日，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力陈把《权利法案》加到宪法中去的必要。用詹姆斯·门罗的话来说，杰斐逊的意见受到“很大的注意和普遍的尊重”。有的干脆称他是争取《权利法案》运动的精神上的领袖。麦迪逊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杰斐逊站到他这边而竭力活动。由于麦迪逊的积极推动，《权利法案》以头 10 条的修正案的形式被采纳，于 1791 年 12 月 15 日开始生效。

《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建立国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完成了教会与国家政权的正式分离。第二条保障人民有携带武器、组织民兵的权利。第三条保障人民有居住自由的权利。第四条至第八条保障人身自由，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权；非依一定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在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方面均建立陪审员审判制度；在一切案件中，保释金、罚金不得过重。第九条保证人民保有宪法所未列举的其他权利。第十条确定各州或人民保留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利。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美国的“人权法案”。

《权利法案》的制定并获得通过，是美国人民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成果，是以杰斐逊为代表的美国早期民主志士努力奋斗的结果。它巩固了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所获得的成果，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权利法案》的制定，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美国处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国人民，也仅有运用民主斗争的方式，来争取一些有限的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权利。

杰斐逊之所以一开始就注目《联邦宪法》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如加强政府控制，个人自由受到约束，强调权力集中等，是因为这一文件与由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的主题有不尽相同之处。如果把《联邦宪法》与《独立宣言》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文件——它们都成为“塑造美国的文献”——之间的不同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宪法的签署者中，只有 6 人签署过《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战争深受杰斐逊和潘恩著作思想之影响，而《联邦宪法》也曾

获益于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詹姆斯·麦迪逊的作品。独立战争以自由精神为主题，而《联邦宪法》则以树立权威力本旨。

独立战争的目的是要削弱；日政权的权威性，并限制甚至消除其权力；而《联邦宪法》的目的却与此相反，是要扩大新政权的权威，并使这一集权政府的职能合法化。

《独立宣言》强调个人自主及个人为本的价值，强调那种演变为“个人自由主义”的精神，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个体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联邦宪法》则突出强调人的弱点，并主张要依靠并存的政治派别建立起能保障自由和财产的强力政权。其理论基础是后来发展成为所谓“自由主义多元论”的分权思想。杰斐逊与潘恩在美国政治中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异端传统的先哲和守护神。与立法者不同的是，他们始终坚持权力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得等到一切权威都出自人民大众自己的时候。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一切压迫力量都主要来自旧的世界；他们深信他们能用自己的思想和笔，把真理变为一种实际力量，靠揭露强权来维护自由的权利。而亚当斯和《联邦主义者》的作者们却持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压迫力量源于社会存在的根本特性，并认为由政权来防止个体的人的相互残害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新的《联邦宪法》需要一种构造精密的“制约与平衡”机制。麦迪逊说，在组建这样的“自然”政府时，必须“使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相互关系，以此互为制约，各司其职”。麦迪逊还有一个绝妙的陈述：“必须以野心抵制野心。……观人类之天性，似应当用这类方法制约政府的弊端。然而政府本身难道不正是人性之最强烈的反映吗？若人人均为天使，则无需再设政府。……设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困难莫过于必须首先使政府可控制受统治者，其次必须使其自律。”

杰斐逊憧憬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反对专制制度，主张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不断的改革促进社会的进步。他主张给人民以适当的民主权利、政治自由与教育的机会。杰斐逊说：“对于社会进步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人类在科学、道德和政治制度各方面的成就都可能向前进步与发展。我们是赞成制度的改良和科学的进步的，我们认为进步是不能用什么固定的范畴来限制的。”

后来，杰斐逊逐渐减少了对这部宪法的批评，并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宪法“是一幅优秀的油画，惟有某些笔触需略作修饰而已”。但他仍时时警惕专制和暴政的出现。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宪法会议里大多数人的意旨和人民本身的意旨。我们和人们有同一的信念：人类是理性的动物，由自然赋予了权利、内在的正义感；我们更相信，仅靠温和的力量，人就可以被约束住不去为恶，而保证择善而行；这种温和的约束可以交给人民自己所选出的代表，依照人民的意旨来执行职权……我们深信：人民，如果能够在舒适与安全中享受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更以全副兴趣来遵守法律和秩序，习惯于独立思考和追求理智的领导——这样的人被统治起来，会比那些欧洲的，受着无知、贫困和压迫的损害和败坏，心灵为错误所麻痹的人民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因此，爱护人民是我们的主张，害怕和怀疑人民是反对党的见解。”

宪法获得通过后，在合众国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制政府的工作正在稳步进展。此时，杰斐逊的注意力日益集中于法国迅速发展的事态。就在杰斐逊任期届满之前，他有幸目睹了法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即法国大革命。

早在 1787 年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召集贵族院开会，这是 160 年来的第一次。杰斐逊看到贵族聚集开会，认为变革大有希望，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会议的进展。

国王政府召开名流会议的目的，是想让有免税特权的贵族、僧侣纳税，以利于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但是这些贵族拒绝纳税，结果贵族会议在 5 月份被国王解散。

到 1788 年夏，法院与政府之间在纳税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

1789 年 5 月 4 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杰斐逊作为美国公使出席了引人注目的开幕仪式，到了 6 月，他被会议的进程深深吸引住了，以致几乎每天都去凡尔赛。杰斐逊还给他的法国朋友拉法叶特出谋划策，私下同他及其他人频频会面。拉法叶特（1757—1834）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1777 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华盛顿军中任将军；后在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积极热心的杰斐逊做得太出格了，竟然为法国国王起草了一个“权利宪章”，并将草稿送交拉法叶特和圣·埃田，另附上一封信，在信里，他希望国王能在王家会议上“自告奋勇接受这个权利宪章”，而他自己和三个等级的代表都在上面签字。

这个“权利宪章”草稿，就是杰斐逊对于法国革命的建议，它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 三级会议每年 11 月 1 日一定要集会，且只要他们认为有理由，就一直开下去。2. 只有三级会议才有权向国民征收税款并且拨款。3. 三级会议有立法权，法律只有三级会议才能制定，但必须得到国王的同意。4. 实行人身保护。对于任何人都不拘禁，除非依靠合法的程序。5. 军事当局应该从属于民政当局。6. 实行出版自由，7. 废除任何人所享受的金钱上的特权及豁免权，8. 国王所欠的一切债务成为国民的债务，必须在适当时间予以偿付。9. 授予国王以 8000 万铊，这笔钱靠借债筹措，由国家偿还。10. 三级会议现在予以解散，在 11 月 1 日再开会。

然而，连拉法叶特等人也没采纳这些意见。

6 月 17 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6 月 27 日，教士和贵族突然参加第三等级会议，这就实现了第三等级此前所提出的要求。国王和宫廷异常沮丧，而人民群众欢喜雀跃。

1789 年 7 月 14 日，一场酝酿已久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像人山一样爆发了。巴黎人民被迫拿起武器，一举攻下象征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杰斐逊当时虽未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全貌，但是他知道他所目睹的“这些事件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上”。这时，在春天就打好行李、焦急等待回国休假的杰斐逊却不再急着离开了。这里的形势“大有意思了，目前离开是不适合的”。他认为自己有幸“能在 14 年中两次目睹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真是上帝对他的偏爱。

杰斐逊在法国不仅仅是个旁观者。他是拉法叶特的一个顾问，因此还是事件的参与者，这本是通常不允许外国代表干的事。当然，那是个非常时期，一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待人权的杰斐逊，毫无疑问地要协助人权在一个外国的领土上获得进展，特别是曾在美国革命取得的胜利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这个国家。拉法叶特在起草提交国民议会的“权利宣言”时，频频与杰斐逊商议。在提交之前，拉法叶特要求杰斐逊给他一份《权利法案》，并附上他的评论。在向国民议会提交之前，拉法叶特又要杰斐逊再研究一遍，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很难确定杰斐逊对拉法叶特 7 月 11 日提交国民议会的“权利宣言”到底

起了多大的影响。因为在议会 1789 年 8 月 26 日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前，许多人都曾参与起草。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有部分像是采用了拉法叶特的草稿，但是美国《独立宣言》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起草法律、法令这些事，促使杰斐逊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代人是否有权去约束另一代人？

据有关学者研究，杰斐逊这个思想大概开始萌生于 1785 年在枫丹白露附近与一位贫妇的谈话。这位贫妇的诉苦引起了他的怜悯之情，并且使他第一次看到欧洲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悲惨情景。回巴黎后，他和朋友共同探讨造成人民贫困的终极原因，于是他发现法国人民的贫困，归根结底是上一代人所制定的法律所造成的，这种法律侵犯了这一代人的自然权利。

他思考的这个问题，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都没有人提出过，他却一头扎了进去，并成为他一生研究的政治原则中最理论性的探讨。

法国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封建政权，消灭了特权，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波涛，使大洋彼岸的年轻的美利坚也受到了感染。美国广大民众以高昂的热情来欢迎法国革命，认为法国人民在革命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美国人民狂热地庆祝法国革命中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 月 14 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9 月 22 日，法国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到处都传唱着法国革命歌曲和美国通俗歌曲《扬基嘟嘟歌》。激荡着革命热情的美国民众戴“自由帽”，种“自由树”，还把纽约的英王街改称为“自由街”，把波士顿的皇家交易巷改为“平民巷”。

美国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热忱和同情，在一封致全美人士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光明的火焰在法国燃烧着，这火焰是我们点燃的，难道我们，曾经点燃了自由火花的美国人民，可以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法国自由的火花被扑灭吗？……现在全世界暴君联合起来对抗自由的法国人民了，难道我们自由人民就不团结起来对抗暴君吗？”

由于法国革命的鼓舞，美国国内争取民主的斗争更加激烈了。杰斐逊认为法国革命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是和美国的民主不可分割的，他说：“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凭借法国革命来巩固的；如果法国革命的人民失败，就会影响我们争取民主斗争的前途的。”

1789 年 8 月，杰斐逊获准回国。9 月 1 日，他打点行装，作好记录：带什么，不带什么。9 月 2 日，他向约翰·特朗布尔道别。特朗布尔去伦敦后数小时，杰斐逊的周期性偏头痛又犯了，这次犯病持续了 6 天。

在这几天中，里卡德·吉姆大夫一直给杰斐逊治病。杰斐逊后来把吉姆大夫称做他所遇见的最能干的大夫。72 岁的威尔士人吉姆，是法国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和妻子已分居 30 年，他的儿子在军队中丧生，因此他和杰斐逊除了思想上的共同点外，在个人生活中也有某些相似的悲剧色彩。就是在这段时间的谈话中，产生了杰斐逊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之一，即“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人们”。

9 月 6 日，杰斐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没有权利来约束下一代。他认为，哪个社会都不能订出一部永久性的宪法，甚至也不能订出永久性的法律。下一个世代的人有权利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现世的不平等意味着死者对于生者的暴政。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民主理论。

9 月 6 日，杰斐逊将 38 只大箱、提篮及几大捆行李送往勒阿弗尔，等待

装船启航。箱子里有书、一架大键琴、艺术品、家具、植物等；提篮里装的是酒和航行所需的食物及其他用品。有一只箱子里装了6支新产品——滑膛枪，零件是可以互换的，这项新发明对杰斐逊很有吸引力。他急切地想把这种枪引进美国。

在运往蒙蒂赛洛的几箱绘画中，有他托特朗布尔在英国买的培根、洛克和牛顿画像的复制品——“三位空前最伟大的人物，这点毫无异议”。此外，他还带了哥伦布、阿梅里卡斯·韦斯普奇乌斯、科泰兹和马杰兰的画像，这些是他请人在意大利临摹下来的。他说：“我们的国家不能没有那些首先发现它的人物的画像。”离开巴黎前，杰斐逊付给乌东（法国著名雕塑家）1000里弗尔，购买了几件艺术品，大约有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拉法叶特的半身像；他还购得乌东制作的伏尔泰、蒂戈特和约翰·保罗·琼斯的半身像，以及乌东给他雕塑的几个石膏像（他曾在1789年坐着请乌东为他塑像）。乌东技术精湛，塑像与杰斐逊本人无异，使后人得以瞻仰美国的一代开国元勋的尊容。

杰斐逊的行李太多，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两个仆人和两辆马车，因此他希望找到一条由勒阿弗尔直开弗吉尼亚的船，几经周折，才在约翰·特朗布尔的帮助下，找到一条从伦敦开赴弗吉尼亚的船。船长不肯在勒阿弗尔停靠，但他同意杰斐逊在英国口岸考斯上船。杰斐逊一行只好赶到考斯，终于在10月22日中午登上了驶往诺福克的“克勒蒙特”号，结束了他5年的出使法国的生涯。

第十五章 仓促受命

汉密尔顿和我像两只公鸡，整天在内阁里斗来斗去。

——托马斯·杰斐逊

当杰斐逊最终得到同意他回国休假的消息时，内心深处又不愿离开，并希望很快重返巴黎。

玛丽亚·科斯韦得知杰斐逊要回美国的消息后，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杰斐逊，恳求他经过英国时去看她。对难以割舍的这段藕断丝连的爱，杰斐逊回信说：“春天我们会再次相逢在巴黎，记着我，爱我。”

然而，杰斐逊在他离开的6周前即9月份，就意识到他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巴黎了。他收到老朋友麦迪逊8月6日写的信，信中说：“我受命询问阁下是否同意国内的任职。”杰斐逊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邀请他加入新宪法下以华盛顿为总统组成的新政府。他回信道：“我的目标是退休，因此无论何时从目前的职务上退下来后，我将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工作了。”

但是他真的能直截了当地对华盛顿说“不”吗？

1789年11月23日，“克勒蒙特”号抵达诺福克。5年多了，杰斐逊又重新踏上美国国土。本来这次是回国度假两个月的，假满后应重返巴黎，然而当他一下船登岸后，却得到突如其来的消息：他被任命为华盛顿政府的国务卿了。

华盛顿很希望杰斐逊参加他的工作班子。杰斐逊于12月11日收到华盛顿邀请他担任国务卿的信。过了几天，杰斐逊回信，一方面感谢总统对他的信任，一方面表示关心国务卿的职权范围。国会最初曾设立了一个外交部，但后来在建立了财政部和陆军部以后，决定将外交事务和其他所有国内事务合起来，统统由国务院管理。

杰斐逊从诺福克到蒙蒂赛洛花了整整4周。一路上走亲访友。途中他又给华盛顿写信，坦率地表示他不愿当国务卿，而愿回法国去工作，除非总统坚持要他留下，并愿意接受总统认为最符合公众利益而指派给他的工作。

麦迪逊和华盛顿都竭力劝说杰斐逊就任此职，麦迪逊还特地前往蒙蒂赛洛去游说。华盛顿也反复表示：“据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情况看，最近对你的任命极令公众高兴和满意。”1790年2月14日，颇感盛情难却的杰斐逊终于通知总统，他决定接受任命。

但杰斐逊还不能立即动身赴任，这是因为他刚满17岁的大女儿玛莎即将订婚。

杰斐逊回到阔别5年的弗吉尼亚时，所受到的“文化震动”不亚于1784年他到达法国时所产生的那种异样的感觉。

巴黎那种文化氛围、那种浪漫情调在这儿荡然无存，地域文化差异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他突然间有点无所适从。

他发现弗吉尼亚相当保守、落后，道路泥泞不堪。从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突然置身于一个村庄，他总觉得自己与这种环境格格不入，很不自在。弗吉尼亚的状况使他怀念法国的生活。杰斐逊给留在巴黎的威廉·肖特这样写道：“我们像外国人回到美国，需要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美国化。”

但他也欣喜地看到，弗吉尼亚新议会大楼建起来了，罗马式建筑显得异常壮观，多多少少体现了杰斐逊设计的方案。

当他同女儿和杰克·爱泼斯坐着马车到达蒙蒂赛洛时，正值1789年圣诞节之前的两天。奴隶们倾巢出动，夹道欢迎。他们把杰斐逊的车团团围住，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并且不顾杰斐逊的反对，把马车停下，解下马缰，自己拉着马车进庄园。

此情此景使玛莎异常感动和兴奋，马车的门被打开，家仆、奴隶争先恐后地亲吻杰斐逊的手和脚，简直是又哭又笑，热闹非凡；杰斐逊像一个中世纪王子一样远征后凯旋。这使杰斐逊早就想解放奴隶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但人们注意到，杰斐逊却从未使他的黑女奴萨莉获得自由，萨莉也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

每次回蒙蒂赛洛，杰斐逊都要给奴隶们带上一些小礼物，吃的、玩的都有。这次也不例外。奴仆们对杰斐逊也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

17岁的玛莎对从熟悉的环境重新回到一个她12岁就离开的地方，心中不免有各种顾虑和失落感，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回到家，整个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回弗吉尼亚3个月后，她就结婚了。丈夫是隔了两代的表兄伦道夫，21岁，正在爱丁堡读书，与玛莎青梅竹马。

这时的玛莎已出落成大姑娘了，虽说不上很漂亮，但她有一种别的女孩没有的魅力与气质。

杰斐逊一家在勒阿弗尔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时，曾结识了一个名叫纳撒尼尔·卡廷的美国青年，他们一起跨海去考斯。卡廷对玛莎一见钟情，认为她“很可爱”，“身材修长，非常斯文”；虽然受些法国习俗的影响，可是“非常纯真迷人，性情温柔含蓄，明显表现出她天生的美德和快乐的性格”。这一切，在卡廷看来，都是美国妇女同其他国家妇女的不同之处。然而，卡廷与玛莎只是萍水相逢，苦于无缘，像两根平行的枕木，难有交点。

由于杰斐逊急于去纽约履行新职，玛莎·杰斐逊和小托马斯·曼·伦道夫于1790年2月23日在蒙蒂赛洛完婚。

杰斐逊对女婿很称赞，说他“聪明，正直”，对这桩婚事也满意。伦道夫的父亲答应给他们一个在瓦里纳的种植园。杰斐逊债务缠身，苦干没有现钱作女儿的嫁妆，于是划了1000英亩的森林和25个奴隶给女儿。

杰斐逊对女儿的婚姻极为关心，要女儿好好待丈夫，使他快乐、幸福。杰斐逊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你生活的全部快乐，现在都取决于你能否持久地使一个人（丈夫）快乐。与这一目标相比，其他都是次要的，甚至包括你对我的爱。”3月1日，杰斐逊便启程去纽约。杰斐逊与长女感情至诚至深，一旦分离不免深感失落，万分思念。自从妻子亡故，杰斐逊不论在何处公干都将玛莎带在身边，并且精心指导她的学业，指导她的为人处世，对她寄予厚望。与之相比，他同次女波丽之间的感情联系，就远远没有发展到同玛莎这样深的地步。

当然，对玛莎来说，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

玛莎结婚5个月后，发现她55岁的公公在其妻子死后，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加布里埃尔·哈维，她公公还指望哈维给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玛莎看不惯，杰斐逊只好写信劝女儿，安慰她，并让玛莎对公公和他新娶的妻子应“加倍去爱”。杰斐逊在给女儿的信中，要求她“成为家庭里的爱、团聚、和平的纽带”。

杰斐逊依依不舍地告别新婚的玛莎，直到3月21日才抵达纽约。杰斐逊到达临时首都时，华盛顿的新政府已运作了近一年。

华盛顿的祖先是英国人，1657年作为移民来到美国的弗吉尼亚。他的父亲奥古斯廷·华盛顿，是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一个大农场主。1732年2月22日，华盛顿就出生在这里。

华盛顿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749年5月，他去威廉斯堡，在威廉-玛丽学院的测量短训班学习了几个星期，结业后正式成为库尔佩珀县的测量员，华盛顿与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劳伦斯相差14岁，但两人感情很好。1752年劳伦斯去世，不久他的女儿也病歿。根据遗嘱，华盛顿继承了劳伦斯的产业，其中包括弗农山庄。此后20年中，华盛顿的生活大都是以弗农山庄为背景度过的。

1759年1月6日，华盛顿与玛莎·丹德里奇结婚。生于1731年6月的玛莎是个寡妇，前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1775年6月17日，第二届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89年2月4日，美国举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选举。10个州的138个选举人进行投票，一致选举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在1789年4月30日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派堂堂大丈夫气概的华盛顿将军，径直走到俯瞰着纽约市华尔街的阳台上，庄严宣誓：“余谨誓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之职务，并尽余能力以维护遵守合众国之宪法。”他从弗农山庄来到纽约的那一趟旅程，简直就是一次凯旋式的行进。在联邦首都，他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船舰和炮台礼炮齐鸣，全副武装的民兵列队接受检阅，平民欢呼雀跃，各处房屋彩饰缤纷，俨然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

然而，华盛顿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首先，联邦政府要创建自己的运作机构。旧美国邦联所遗留下来的，不过是十几个办事员、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一大堆债务而已。既不见有税款或其他现款解送进来，也不存在收税的机构。新国会很快便制定了一套关税税则，又过了好几个月，才得以建立一个行政机关，在南北相距2000英里、联系松散的国土上征收关税。以美国大富翁著称的华盛顿，竟不得不向一个朋友告贷600英镑，作为移居纽约的费用。

华盛顿为人谦逊，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禀受了“低劣天赋”的人。事实上，他具有使人尊敬他和信任他的力量。他为人坦率却欠圆通；刚毅有余而灵活不足；有能力对事物作彻底的思考，而理解力却欠敏锐；有一种很自然的仪态和威严，但毫无对次等人物常常予以较大的政治影响的那种断然自是。他那冷静的外表之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一旦受到撩拨，便会爆发为无节制的狂笑、令人震惊的咒骂或奥林匹斯式（天神式）的愤怒。

华盛顿最大的幸运就是，新政府是在一片同意的大海上启航的，不曾出现任何专门致力于推翻宪法的组织，并且有一帮极其能干的饱学之士辅佐。华盛顿挑选了当过驻法公使的托马斯·杰斐逊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掌管财政部；华盛顿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在邦联时期原任陆军部长，现仍继续担任此职；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被任命为总检察长。

《联邦宪法》创设了一名副总统，以便一旦总统亡故或不能行使职权时，无须举行特别的选举即能有一个代理元首。为了给副总统一点事情做，特规定他为参议院议长，遇院内双方票数相等时有决定权。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原驻英公使）认为，他的这项职务乃是“人类的发明才能历来所设计出的、或其想象力所构思出的……最无足轻重的”一种职务。亚当斯感到自己没有受到适当的赏识，为此而饮恨终身。

第一届联邦国会建立了行政机构，但行政部门的许多机构还在不断改进。杰斐逊上任时，发现这个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人员不过是两名主要办事员、两名协调员和一名翻译。他的全部预算，不包括驻外机构的费用，不足 8000 美元，其中 3500 美元是他的薪金。

华盛顿总统指望各部门首脑和司法部长给他出主意，有时也去征询约翰·亚当斯副总统和首席法官约翰·杰伊的意见。在华盛顿看来，各部门首脑只是他的助手，而不是独立的部长。他一上来就说明，这个政府是由他负责的，希望一切有关政府的事务都要提交他批准。华盛顿曾任总司令，陆军部长诺克斯在独立战争时期曾在其麾下服务，因此华盛顿控制着陆军部的一切。他对国务院的控制稍松，不过仍保留对一切外交政策有最后的决策权。他对财政金融事务了解不多，因此他给予汉密尔顿制定政策的自由比给他班子里的任何成员都要多。

杰斐逊到纽约的第一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天。3 月的纽约还残留着一丝寒意，但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临，到处洋溢着冬去春来的欢快气氛。杰斐逊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灰尘，一到纽约就立即向华盛顿总统报到，开始工作。然而刚上任一个多月，他的周期性头痛病就复发了，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杰斐逊的头痛病还没痊愈，就出席了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这是他第一次在会上露面，就总统指导外交关系的权力作证。他坚持认为，这项权力应包括确定外交官的职别和任命、他的薪俸以及国会在联邦领导下规定的其他事宜。

威廉·麦克莱参议员在 1790 年 5 月 24 日的日记中，对这位 47 岁的国务卿的第一印象作了如下描述：

“当我进入大厅时，杰斐逊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均已入座。

杰斐逊是个瘦高个，态度有些生硬，衣服似乎显得小了一些，一肩高一肩低地侧身斜靠在椅子上，普普通通，整个人显得松松垮垮，还有点拘谨，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完全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国务卿或部长在场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镇定。

我想寻找看他是否有严肃庄重的表现，却只看到他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发起言来几乎没有停顿，声音小，不太容易听清楚。他的讲话同他的举止差不多：松散、漫无边际。然而不论讲到什么，他都显得知识渊博，有些观点甚至闪耀着才华横溢的光芒。

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 4 人像走马灯似的，围绕着华盛顿总统转来转去。杰斐逊因在巴黎呆了 5 年，只是新宪法诞生后直到 1790 年 3 月才返回国会的。对他来说，要得到华盛顿的宠信，也许太迟了。亚当斯虽然当上了副总统，却不能算是华盛顿的密友，而汉密尔顿则跃跃欲试，欲争取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超过亚当斯，并且他已代替麦迪逊成为华盛顿的心腹和捉刀者。麦迪逊因起草《联邦宪法》而成为明星，变得越来越激进，而且也加入杰斐逊的轨道，成为杰斐逊最亲密的顾问。

自从汉密尔顿 1790 年 1 月向国会提交他关于公共信贷的报告后，国会在他提出的关于付国债本息和承担独立战争期间各州所欠债务的问题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定关于偿还所有外债的规定上，大家意见一致；但在内债问题上，一些议员反对让那些以低价购进债券的投机者大发横财，因为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按照债券的票面价值偿还，还要加上拖欠的利息。争论更大的是汉密尔顿关于承担各州债务的议案，使负债多的几个州同负债少的

几个州争吵不休，国会会议几乎陷入僵局。

汉密尔顿寄希望于杰斐逊运用他对南方各州议员的影响，帮助打破僵局。最后，按杰斐逊的意见搞的一项妥协方案于1790年7月大功告成，偿债、承担债务和首都选址方案全在国会获得通过。

然而，在杰斐逊当国务卿期间，在他政治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他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不共戴天”的争斗。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5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尼维斯岛。当他在1789年被华盛顿任命为财政部长时，年方34岁，年少气盛，春风得意。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在美国人中是无与伦比的；其判断力之圆熟精到，也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他在英王学院（后改称哥伦比亚学院）当学生时，曾为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进行过出色的辩护。22岁时，他在华盛顿手下供职。在27岁那年，他曾指出邦联的致命缺点，写过一篇论述公共财政问题的卓越论文，还曾在约克敦指挥过一支突击队。他在缔结和约时取得在纽约当律师的资格，并很快在法律界显露了头角。

在智能方面得力于自我训练的汉密尔顿，很热心于充当政治教师的角色。他总在别人保持着谨慎观点和暧昧原则的地方，提出大胆的计划 and 明确的政策。当国会正在考虑人民将会说什么时，汉密尔顿就已告诫国会议员和人民，他们应当做什么。他有不倦的精力，热爱繁重的工作，并乐于承担责任。

财政部是国会而不是宪法所创设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成为最重要的和最有权力的炙手可热的一个联邦部门。财政部长有责任对公共信用作出估计；收进、保管和付出合众国货币；征收关税和国产税（即对本国产品课征的国内消费税）；管理灯塔业务；建立辅助航运的各种设施；着手进行合众国土地测量。在国会于1792年设立邮政部以前，财政部还兼管邮政事务。有人认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失和，是因为杰斐逊“心怀嫉妒”。杰斐逊派的人，将财政部比拟为乔治三世送来“扰害我们的人民并吸光他们的财富”的“成堆官僚蜂群”。因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财政部的雇员是最多的。

有的传记作者认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不和的原因有二，一是汉密尔顿权力欲很大，在华盛顿内阁里，他力图缩小国务院的权限和扩大财政部的权限，甚至在外交方面也不惜干预国务院的工作。二是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按票面价值偿还战时发行的公债，由联邦政府承担州的公债的偿还，实行消费税，把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等政策——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本家、投机商人、股票经纪人等发了横财；另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蒙受惨重的损失，加剧人民的贫困。原来在民众中有许多人是公债券持有者，但是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钱出卖这些公债。了解政府准备以票面价值偿还公债这一内情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大金融资本家、投机商人，便赶紧抢购公债。结果，当然是原来的公债券持有者吃亏，而抢购了公债的那些人却大发横财。再者，到联邦政府成立时为止，有些州（如弗吉尼亚州）已经把州的公债还得差不多了；有的州根本没有发行公债，现在由联邦政府负责偿还州债，也使得这些州吃了大亏。

杰斐逊对汉密尔顿这种通过财政政策而使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与联邦政府坑灌一气的做法深为不满。

早在汉密尔顿提出他的财政纲领前很久，第一届联邦国会在诸如宪法修

正案、首都选址和总统的决断范围等问题上，就出现了亲政府与反政府的两派。

1789年，新宪法已正式生效，联邦政府成立，领导过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任第一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时，围绕如何解释和执行宪法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主张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要求从宽解释宪法，即信奉所谓“联邦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汉密尔顿、亚当斯等，而中小资本家、南部某些种植园主以及广大小农则希望实行分权，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分享到较多的权力，因此主张从严解释宪法，也即信奉“共和主义”。杰斐逊是此主义的积极捍卫者。

联邦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政府，而不是一个政党；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将是在政府内部组织的历史，而不是企图影响政府机构的外部组织的历史。

于是，他们急于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和拥有广泛决断权的强有力的执行机构。这一立场促使他们反对大部分宪法修正案，其中有关于保护根据良心而拒绝从事某项工作的人的权利、禁止各州侵犯良心的权利、陪审团的审判和新闻自由等方面的修正案。心情沮丧的詹姆斯·麦迪逊不得不与他在制宪会议上的盟友们分道扬镳。

但联邦主义者也觉察到，他们的政策需要公众的支持。为此，他们就逐步想出了政党这种工具，最终成立了联邦党。

作为华盛顿国务卿的杰斐逊，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同汉密尔顿针锋相对。他认为，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超越了宪法所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对共和制度的一种威胁。而且，杰斐逊还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同情法国，主张美国应履行美法联盟条约，帮助法国。1792年，他与麦迪逊等人建立了共和党，1794年又改称民主共和党（现在的民主党的前身），跟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分庭抗礼。这样，美国的两党制度初露端倪。

传统的解释，是把早期的党派说成是两个伟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身影的延伸。追随他们的事业，就是在党派发展过程的荆棘丛中寻找出路的一个好办法。

但事实上，假如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汉密尔顿这个人，那也仍会有联邦主义这种信仰；假如杰斐逊作为美国驻法公使而度过他的一生，那也仍会出现一个反对派。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间的党派斗争越来越激烈，两党的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政见分歧也就越来越深，但双方都赞成由华盛顿总统连任。华盛顿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属于哪一党派，但他的内外政策表明，他是与联邦党人站在一起的。

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之间两种观点经久不息的竞争，代表了当时美国生活中两支强大的对立力量。通过对照与比较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美国革命理想主义和美国国家主义中存在的许多矛盾，都得到了调和、解释和论证。

杰斐逊比汉密尔顿年长12岁，深思熟虑，且有哲学素养，经验丰富得多。科学、文学和艺术对杰斐逊有着无比的魅力，而且他毫不费力地就成为了他那一代人之中第一流的美国建筑师，他自己设计的弗吉尼亚蒙蒂赛洛庄园，巍然高踞于面对蓝岭山的一座丘岗之巅，至今仍是美国最值得赞美的乡间府

第一。位于其附近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的那一组全国最佳的学院建筑物，也是杰斐逊的得意之作。杰斐逊撰写过一些漂亮文章，论述新柏拉图主义、希腊语发音法、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蒸汽机的未来以及美洲考古学。还写过有关有神学的神学的著作。但是，有一门学科他一无所知，那就是汉密尔顿所擅长的财政学。他反对这位财政部长提出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

汉密尔顿是一位浪漫型的人物：华盛顿的骁勇的军事助手，与财富结下不解之缘，在社会上拼命向上爬的英俊之辈，才华横溢的政治组织者（只有杰斐逊和麦迪逊才能与他相提并论），卓而不群的政府决策者。他是一位令女人神魂颠倒的人；但他自己是一个私生子。他试图在新兴的民主社会中建立贵族秩序。他曾建议华盛顿称王。美国刚刚屏弃了英国议会和大臣，他却企图把美国政府变为议会制政府，由他自己做首相。他企图在一个日益民主化的国家里，把既得财富和社会地位作为政党的基础。当美国人坚持建立一个弱小而分散的政权、坚持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时候，他却主张建立一个强大而活跃的政府，让政府积极参与美国经济的发展。他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里，主张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和制造业。美国人恐英症日剧，而他却建议恢复与大不列颠亲密的经济和商业来往。汉密尔顿同时又是一个暴发户。他致力于保护新的财富。他希望人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一切不致丧失。他企图让新生国家的权力和成果，遵循传统社会的模式而走向正统化。

杰斐逊心目中的小农关心的是能否保住获取财富的机会，而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关注的是利用和增加财富的机会。杰斐逊认为，美德都在耕种土地者的胸怀里；而汉密尔顿则笃信，只有商人和制造商等富贵者和城里人才具有最大的美德。杰斐逊信任人民，怀疑有权力和有野心的个人，因而他千方百计地试图限制政府的权力，并极力纵容各种势力和利益在政府机构里互相牵制。相反，汉密尔顿对大众持怀疑态度，而信任有权力、有影响的个人，因而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将这些人推荐到政府中，让他们控制政府，使政府成为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汉密尔顿的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机构；而杰斐逊的最高目标，则是给个人以更多的自由，他深信“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群人，都有自治的权利”。汉密尔顿害怕无政府状态，处处讲求秩序；而杰斐逊害怕暴政，处处为自由着想。

在国家诞生的神话里，两位英雄赋予杰斐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即政治国家主义的两个方面之间的斗争以生动的意象，甚或典型。美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约翰·菲斯克在19世纪末写道：“自此以后，美国历史就沿着由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对抗而形成的两条线索发展。”1925年，克劳德·鲍尔斯在他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书中写道：“在美国，还没有哪一次斗争在重要性上能与两位巨人之间的斗争相提并论。”莫里森和康马杰在他们的1970年版的著名教科书中写道：“杰斐逊颇具魅力的秘诀在于，他诉诸并表达了美国的良心：理想主义、单纯、饱满向上的精神、充满希望的憧憬，而不是汉密尔顿推崇的追求实利的荣耀的野心。”尽管敏锐的历史学家极力向人们阐述，美国历史实质上并不是以杰斐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之间的冲突为主线，但是，民主论和精英统治论之间、经济自由论和经济控制论之间、多数统治论和少数权利论之间的抉择主宰着美国的政治生活。这一神话思想仍然很活跃、很实用，而且，即使在历史学家看来，那些革命英雄也严然是做出这些抉择的主角和典型。

这时，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对立情绪与日俱增，已到了针锋相对的

地步。

假如杰斐逊说：“这是黑的，先生！”

汉密尔顿就肯定会说：“这是白的！”

从1792年开始，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间的党派斗争激烈到连总统本人也卷了进去。

华盛顿对抗乱国家安宁、损害内阁和谐的政治纷争和分歧，从内心里感到厌倦，因此，逐渐觉得政府的重任沉重不堪，令人难以忍受。此外，他对杰斐逊说，他的确感到自己日渐衰老，身体情况大不如过去了；他的记忆力本来就不好，现在就更差了，工作起来疲惫不堪。或许在别人看来，他在其他方面的才智也都有所衰退，而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他说，他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渴望摆脱这副担子，遏制不住地想回到乡下去呼吸新鲜空气，修身养性，自由自在地安享田园生活的乐趣，在此之前，他就表示过，一旦总统任期届满，他就决心退出政坛。然而，如果由于他退休的缘故而引起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也跟着辞职，则势必会使公众大为震惊，以致产生危险后果。所以，鉴于他的任期还有最后一年，他还得耐心地再等一年。就在他抱着这种想法自我庆幸之时，1792年，杰斐逊向他表示，他也正打算辞职。

华盛顿对杰斐逊的这一决心感到非常不安，用“激动的口吻”竭力劝他不要这样做，华盛顿总统说，至于他自己，则有许多理由要退休。他是在别人一再恳求之后，才同意参加新政府的，为的是帮助政府走上正轨。如果他继续干下去，别人可能说他尝到了当官的甜头，舍不得放弃职位。

杰斐逊回答说，他当初投身政界时就很勉强；在他接受内阁职位时，他就决定总统卸职之日就是他自己辞职之时。现在，他对工作已经从内心里感到厌倦。不过，他认为他在政府中的同僚并没有任何人想辞职。

华盛顿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早就察觉到了，但他还是竭力挽留杰斐逊，并对杰斐逊劝慰说，财政部是一个职权有限的部门，只分管岁税收一项事务，而国务院却要管理政府的差不多所有事务，比财政部要重要得多，因此，国务卿的去职会更加引人注目；况且，新政府刚刚开始施政，百废待举，虽然人民群众相当普遍地感到满意，但不满的征候之多也远远超过所料，如果政府人事再发生重大变动，不满情绪会达到何种程度，后果难料。

由此可以看出，华盛顿以主管人和调停人的身份，孜孜不倦地竭力平息正在扰乱这位热诚的政治家的心灵的种种猜疑和疑惧心理，尽量调解他邀请来的两位知名人士之间日益增长的嫌隙。他看到这种纷争日益变本加厉，为此不胜痛心，觉得有必要加以干预，要求双方相互作出让步。他说：“这种办法会给我们的内阁带来和谐，因此，也会给我们的内阁带来好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混乱和严重的损害。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人们的想法不可能一模一样，但是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一目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要坦率而郑重地宣布，我认为你们俩的用心都是纯洁的、善意的；只有经验才能决定这次争执所涉及的措施是否有益。……我对你们两位都怀有极大的真诚的敬意，并且热诚地希望能为你们俩找到一条共同的路线。”

杰斐逊和华盛顿进行了好几次机密而有趣的谈话。华盛顿对杰斐逊的才干、外交事务知识和爱国主义给予极高的评价。两人还达成一项折衷解决办法：允许杰斐逊在秋天暂时离职，回来后一直任职到次年1月份。

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杰斐逊难堪的事。

1793年，华盛顿连任美国总统后，法国大革命步步深入，最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上台。这年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已向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同时，法国革命政府派来的新任驻美公使埃德蒙·夏尔·热内抵达美国。

针对这一国际情势的剧变，美国政府开始商讨对策。汉密尔顿基于反法立场，反对援助法国，主张与英国联盟。杰斐逊却同情法国革命，希望能援助法国，对抗英国。但又感到这个主张不可能被接受，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一建议得到华盛顿总统的首肯。

热内来美，负有特殊使命。当时，法国吉伦特派政府在训令中授权他在美组织反英活动：利用美国港口装备武装的私掠船，以便袭击英国船只；在美国募兵夺取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并怂恿美国参加反英战争，热内到达美国后，受到民主共和党人以及人民的热烈欢迎，热内利用美国人民的支持，在查尔斯顿港口装备了4艘私掠船，到近海袭击英国船只，并把捕捉到的英国船只当作战利品，扣留在查尔斯顿港口。

热内的这些行动已远远超出公使的职权范围。美国政府下令让法国这些私掠船离开美国海域，同时把战利品留下来。

热内对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大发雷霆，他利用民主共和党人的报纸攻击美国政府，特别攻击华盛顿及汉密尔顿等人。华盛顿在1793年8月要求法国政府召回热内，而这时法国吉伦特派垮台了，热内深恐被押回法国治罪，便在美国躲起来。后来与当时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女儿结婚，成为美国公民，老死在美国。热内的上述表现，使同情法国的杰斐逊感到分外尴尬，在政府内处于孤立地位。

3年多的政治斗争，本早已使杰斐逊感到厌倦，现在又发生这一事件，更让他觉得日子难熬。但他遵守与华盛顿达成的君子协定，留任到1793年12月底，并于1794年1月回到蒙蒂赛洛庄园。

1794年，汉密尔顿的《国产税法》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宾夕法尼亚西部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威士忌酒起义”。这个地区的农民拒不缴纳威士忌酒税，并举行武装起义。汉密尔顿立即请求总统下令派兵镇压。华盛顿认为：“如果少数人可以践踏国会通过的法律，并左右多数人的话，共和国政府岂不如同虚设了。”于是他下令调兵遣将，对“反民”进行征讨。但联邦党所促成的武力镇压，激起了城乡劳动者更大的抗议怒潮，他们越来越多地站到了民主共和党一边。

1794年11月，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下，签署了对英妥协的《约翰·杰伊条约》。这个条约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代表美国在1794年同英国签订的，它把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几乎全部断送。它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论，同时也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汉密尔顿不得不在压力下辞职。

第十六章 无意争春

如果能让亚当斯先生按照政府的真正原则来管理政府，并放弃对英国宪法的偏爱，那么在他这次大选得胜后，为了公众的利益，总的来说不是不能与他达成很好谅解的。或许他还是挡住汉密尔顿插足的唯一可靠屏障。

——托马斯·杰斐逊

如释重负的杰斐逊于 1794 年 1 月 5 日告别费城，中旬抵达梦牵魂绕的庄园——蒙蒂赛洛。杰斐逊尽量避开一切公务活动，谢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似乎决心不再涉足政坛。他曾悄悄地对一个朋友说，他已决心“从可憎的政治行当中解脱出来”，回到他的“家庭、田园和书籍的怀抱中去”。

回到蒙蒂赛洛之后，杰斐逊的心情逐渐舒畅了起来，继续记录他的《园艺簿》。他写道：“2 月，一群野天鹅向纽约方向飞去。3 月，杏花、桃花含苞待放”。

杰斐逊离开蒙蒂赛洛一晃就是 10 年，土地交由监工管理，回来后才发现土地因使用不当，比他想象的还要贫瘠。他很早就想搞一套作物的轮作制，现在终于有时间付诸实践了。他将可耕地分成 7 块，轮流种上小麦、豌豆和土豆、黑麦、苜蓿等。他认为，他的土地地力大差，需要精心整治使其恢复。为了美化环境，也为了生产水果，他在每一块田地的四周都种上桃树作为田界，共种了 1157 棵。

杰斐逊在阿尔贝马尔县拥有 10000 英亩土地，但其中可耕种的大约只有 1200 英亩（亦说 2000 英亩）。他给他的法国朋友沃尔尼写信说：“这些山是美国的伊甸园。”

1794 年 11 月，杰斐逊对他的农奴作了一次统计，居住在蒙蒂赛洛的有 64 人，塔夫顿 15 人，夏德威尔 11 人，莱戈 15 人——在阿尔贝马尔县总共有 105 个农奴，为他耕种那 7 块田地。此外，他在贝德福县还有 49 名农奴。

从 1794 年 1 月至 1797 年 2 月，即从杰斐逊回到蒙蒂赛洛到重又启程去费城接受副总统之职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杰斐逊生活中最神秘的阶段。他退隐山中，不看报纸，书信减少，沉浸在田园生活的怡然自得之中。大女儿和丈夫搬到外地去了，亲朋好友只是夏天才到山上来走动，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杰斐逊俨然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多数时候是和他的 100 多个黑奴在一起。这让人想起他那与黑奴为伴的童年时代。

他曾拒绝了华盛顿派他去西班牙当特使的美差。他给华盛顿回信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回到公共生活中去。”政治似乎已完全从他的脑海中排除出去了，现在的他追求的只是宁静与淡泊。

杰斐逊想解甲归田，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但有些事情偏偏就是这样，想躲躲不开，想甩甩不掉。他虽退出了公职，却未能摆脱政界事务。他曾一再表示厌恶政治，但思想上却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1796 年 2 月底，麦迪逊对门罗说，华盛顿不想任第三届总统已成定局，尽管他还没有公开宣布。在华盛顿表露其意图之前，各党领袖是不愿公开自己的候选人名单的。但是无论是联邦党还是民主共和党领袖都预料华盛顿要引退，因此都各自私下忙碌起来。

麦迪逊对门罗说，亚当斯很可能成为联邦党的候选人，而“民主共和党

人知道，只有杰斐逊出山才有获胜的希望，因此想去促他一下”。然而麦迪逊并没事先直接去找杰斐逊，而是与民主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瞒着杰斐逊干起来，准备来个“先斩后奏”。麦迪逊整个夏天都在弗吉尼亚，却一次也没去看过杰斐逊，为的是不让他有机会提出异议。

当麦迪逊给杰斐逊写信、透露说他肯定将会被民主共和党人提名来作为华盛顿的继承人时，杰斐逊写了一封长而严肃的回信，说麦迪逊本人便是很好的候选人，并说：“我年轻时的一些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了。”连一位法国朋友邮给他的书，他也说：“这是关于政治的书，我已不再热衷，而是恨这个话题了。因此，我恐怕难以读完。”

杰斐逊不愿去当总统一职的角逐者，但他的支持者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发表了致他的同胞的演说《告别词》，提出了著名的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他说：

“欧洲有一种与我们无关、或者关系非常微小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必然经常陷于其起因基本上与我们不相干的纷争之中。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人为的纽带，把我们牵连进它通常的那些政局变幻中去，或者卷进与它为友或为敌的那些通常的结合和冲突中去，那必定是不明智的。我们超然远处在局外的地位，使我们可以遵循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的正确政策，乃是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永久结盟。……永远注意采用适当的编制，使我们自己保持一种可敬畏的防守态势，我们便可以安然信赖暂时的结盟以应付非常的事变。”

华盛顿把自己“比作要寻找一个休息之处、并正在屈身倚伏其上的疲惫旅客”。

华盛顿在1797年3月3日——他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招待各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如亚当斯先生和夫人、杰斐逊先生等男女名流。在快要撤席时，华盛顿把自己的酒杯斟满，然后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是真心诚意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幸福无量。”言罢，宴席间的欢乐气氛瞬间一扫而空，大家都感黯然。英国公使的夫人利斯顿太太十分激动，竟忍不住泪流满面。

本来，多年来杰斐逊与副总统亚当斯及总统华盛顿在工作上合作较好，私人间的情谊也甚深，但几年隐居似的生活，使相互间联系减少，加上他们所属的不同党派的政见不同，以及两党间的不断争斗，竟使他们间产生了矛盾。1799年，杰斐逊与亚当斯失和最终公开。同年他与华盛顿之间宝贵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而亚当斯这时与华盛顿也失和了。

当华盛顿1799年12月14日因喉咙感染而意外去世时，杰斐逊正在蒙蒂赛洛。国会宣布12月26日为全国哀悼日，却没有让杰斐逊在哀悼会上讲话。在哀悼会上讲话的人是亨利·李，此公是杰斐逊的死敌。杰斐逊确信亨利·李在华盛顿生前进馋言，使他失信于华盛顿。杰斐逊似乎受到当众侮辱，他有意推迟了两天才去费城，以便能错过哀悼仪式。

一俟华盛顿宣布引退，竞选活动就从幕后转到了台前。

尽管竞选运动姗姗来迟，然而却来势凶猛。这是第一次两党竞选总统。报纸上充斥着没完没了的竞选活动文章、政治声明和活动报道。

由汉密尔顿发挥重要作用参与起草的华盛顿的《告别词》，在1796年遂

成了联邦党人的一个竞选文件。华盛顿尽管厌恶政党，却是一个机敏的政治战略家。《告别词》中论外交的那几段，就显然是针对着民主共和党人想要把对外政策建立在与法国结盟的基础上的那种愿望而发的。联邦党人非正式地决定，让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来接替华盛顿。1796年初，亚当斯踌躇满志地对妻子说：“正如你所说的，我简直是一个宠儿，我今天又要去参加宴会。你知道，我已成了继承人，很快就要即位啦！”亚当斯沾沾自喜，感觉异常地好，离总统之位似乎就一步之遥了。然而，汉密尔顿却玩弄手腕，想把联邦党人副总统人选——南卡罗来纳的托马斯·平克尼推上总统宝座。汉密尔顿此举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祸根。

集中在国会内的民主共和党人，没有同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商量，便提名他充当民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杰斐逊得知后发表声明：“我的名字……又被提出来了，既未经我同意，也非我所预期；我凭自己的灵魂得救来宣布这件事。”

在选举过程中，文章和报刊辩论的主题是两位竞选人的品德。民主共和党人吹捧杰斐逊是“民众权利的坚贞不渝的朋友”，“一贯主张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同时指责亚当斯是“世袭权力的吹鼓手”，“拥护等级、称号和世袭封位”。民主共和党宣传“托马斯·杰斐逊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约翰·亚当斯是公开表白的君主主义者”。民主共和党人称，亚当斯有儿子，他们可能想继承父业；而杰斐逊同华盛顿一样，没有儿子，民主共和党人还不厌其烦地提醒选民：“杰斐逊首先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他有当总统的一切必要条件——品德一贯良好，坚忍不拔，而且有渊博的政治知识。”

亚当斯的支持者、联邦党人则称杰斐逊“学问不少，然而主要是科学方面，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没多大用处，因为政治家要做的是判断行为而不是著书立说”。有的还认为从杰斐逊的公职表现来看，他是个“软弱、动摇、优柔寡断的人”。杰斐逊在应该采取行动时都顾虑重重，而当他确想去干时，又常常缺乏沉着和判断力，或坚持不下去，总是在执行一套空想的、往往又是自相矛盾的理论；像大多数人一样，杰斐逊偏爱听恭维话。因此，联邦党人认为杰斐逊“适于当大学的教授、科学研究会主席，甚至当国务卿，但绝不能当一个伟大国家的第一把手”。

由于宪法和国会都没有规定如何推选总统投票人的办法，各州就自行决定。联邦党人在东北部势力较强，民主共和党人的势力则是在南部。1796年，有6个州采取或由区、或在一张总选票上进行民众选举的方法，各州的投票选举时间也不尽相同。杰斐逊在蒙蒂赛洛静候着缓缓而来的消息，密切注视着竞选的进展。

选举结果是联邦党人的一次险胜，亚当斯获71票当选总统，杰斐逊获68票次之，托马斯·平克尼获59票，艾伦·伯尔获30票。亚当斯在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获全票，在马里兰10个区的7个区里获胜。杰斐逊在宾夕法尼亚的15张选票中得14票，在弗吉尼亚21票中得20票，在北卡罗来纳12票中得11票，且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肯塔基和田纳西诸州获全胜。从收回的选票中可以看出，亚当斯的险胜靠的是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3州的那3票。

1804年以前，宪法没有规定分别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是规定得票居第一位的候选人为总统，得票居第二位的候选人任副总统。杰斐逊就是根据这条规定当上副总统的。1804年通过的《第12条修正案》，才开始规定

对总统和副总统分别投票。

选举结束后，联邦党人欢呼“法国党垮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对民主共和党人来说，他们真正担心的却是杰斐逊是否会接受副职。麦迪逊为此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其中不乏劝慰之词，说如果副总统一职果真落到他头上，请一定不要拒绝。杰斐逊倒挺坦然，刚一接到麦迪逊的来信，得知他的副总统地位已定，便旋即回信说他不会因获得副职而难过。他说，当可敬的亚当斯的副手，不存在面子受挫的问题。在他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中，杰斐逊说，有理由相信亚当斯“与汉密尔顿已经分手，他的政治观点多少可能会有些转变”。

1797年3月4日，就职仪式在相互友好的气氛中举行，在联邦党新总统及民主共和党副总统之间并未显示出任何党派分歧。即将过54岁生日的杰斐逊在参议院会议厅宣誓就任副总统，并发表了简短讲话，然后前去众议院会议厅；身佩华丽宝剑的亚当斯在那里宣誓就任总统后，发表了和解性的就职演说。

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和平移交权力，是华盛顿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最后一笔遗产。有一位南卡罗来纳人曾这样写道：“执政者的更迭在这里很容易而又很宁静地便完成了，甚至使我们之中那些对政府和我国公民一般的良知向来甚表嘉许的人都感到惊讶，机器一直是毫无异响地在运转。约翰·亚当斯在3月4日安安静静地宣誓就职，华盛顿以平民身份参加了典礼。几天以后，他安安静静地返回弗农山庄去了，他的继任者也同样安安静静地接替了他的职位。”

约翰·亚当斯，1735年10月30日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布伦特里（后改名昆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父亲名叫约翰·亚当斯（亚当斯总统与父同名），当过总统选举人和民兵官员，在当地颇有威望。

亚当斯6岁开始上学，16岁毕业后考入哈佛学院。1755年7月，亚当斯在哈佛学院毕业后，先在马萨诸塞的伍斯特担任小学校长，后来在波士顿当律师，并创办了律师事务所。

1765年英国议会颁布《印花税法》后，亚当斯提出了反对方案，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亚当斯因此闻名于北美殖民地。

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了1774年9月5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和次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1776年6月，亚当斯被大陆会议选为《独立宣言》五名起草委员之一，与杰斐逊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后来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在伦敦任职期间，他写了《捍卫美国政府的宪法》一文，从理论上对宪法进行了论述，受到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重视。

他与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四人一起被称为美国“开国五大元勋”。

对杰斐逊来说，比他就任副总统更有纪念意义的是，就职前不久，他还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后不久，他接到通知，他被选举接替已故的戴维·里顿豪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接班人）任这个全国最重要的科学和哲学研究会的主席。他一直非常珍视这一荣誉，直到1815年才交出去。

杰斐逊素来喜欢“安安静静地去从事科学研究”，从政并非初衷，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政治事务成了他主要关心的事。

约翰·亚当斯上台后发现，他面临的局面比华盛顿在 1794 年所遇到的更为凶险。《杰伊条约》使美国同那个比当初派遣热内来美时更强大、更富侵略性的法国发生了纠纷。法国大资产阶级于 1794 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雅各宾派专政以后，于 1795 年 11 月建立起新政府，处在通称为“督政府”的统治之下。该政府显然把《杰伊条约》视为英国与美国协约的证据，因为美国既然接受了关于中立权利的英国观点，就得要命令法国私掠船离开它的借口，并允许英国人捕拿驶往法国的运粮船只。驻法公使詹姆斯·门罗作为美国公使，在法国上一届政府当政时，曾受到过热情演说和友爱拥抱的接待，而在新的形势下已不能保持镇静和发挥作用，1796 年便被华盛顿召回了。

不仅如此，法国督政府将它的那些海盗船放出来拦截美国商船队，使主要为联邦党人经营的美国海运业遭受重大打击。就连法国领事派往法属群岛去的美国运粮船，也遭到捕拿和没收。1797 年国务卿报告说，已有 300 多只美国船被人在法国当局掩护下截夺而去。

督政府拒不接见美国驻巴黎的门罗后任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而且对美国使用的语言也日益傲慢无礼，带有挑衅性。

到 1797 年夏，美法关系已剑拔弩张，如箭在弦了。

这时，美国政府内党派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敌对情绪十分强烈。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原是平生至交的人走过大街都避不相晤，还把头扭向一边以免非打招呼不可”。

杰斐逊在思想上毫无建立一个政党的野心。他曾写道：“如果我非同一个政党一起就不能进天堂，我宁愿永不进天堂。”然而，他的名字和声誉，却不可分割地同他注定要来领导的那个政党联结在一起。从 1794 年以来，在党派斗争中，他一直起着一种较为被动的作用，现在却不得不从麦迪逊和加勒廷手里，把对党的控制权接过来。

民主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对形势的不同认识和估计，更是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在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看来，亚当斯的内阁充塞着诸多的汉密尔顿分子，这个内阁对外明目张胆地倾向与英国结盟，以反对法国；对内则仇视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就十分担心亚当斯要与法国兵戎相见，因此联合其他民主共和党人，试图挫败亚当斯总统的这一图谋。

在联邦党人眼里，法国是令人恐惧和憎恶的。汉密尔顿在评述“法国革命令人作呕的景象”时，对他坚决认为在巴黎仍受到官方支持的自由恋爱和理性崇拜哀叹不已。地理学家杰第迪亚·莫尔斯牧师甚至散布说，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个称为“先觉社”的秘密宗派所策划的一场反对政府、宗教和道德的阴谋，而杰斐逊则是他们颠覆美国社会的最高代理人。

联邦党人断言，法国是对世界的威胁，并举例说法国督政府力图征服领土，把在国内加以查禁的雅各宾主义输出国外，借此在边界上扶植起一些亲法的卫星共和国。联邦党人进一步推论说，到了 1797 年底，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就只有不列颠和美国没有同法国和好。参议员乔治·卡伯特这样写道：“如果英国坚持下去，它就将会拯救欧洲并拯救我们；但如果它屈服，那就一切都完了。”“它现在是我们同我们的宝贝盟友送命的拥抱之间唯一的一道屏障——是普遍的不信教、不道德和抢劫掠夺，同残存的秩序、正直、美德和宗教之间唯一的一道屏障。”当然，抉择就成了是站在英国一边进行战斗呢，还是以后孤军作战？不过，法国对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计划，却甚至要比联邦党人所猜想的还更为确定而危险。为督政府执行一项秘密使

命而去到西部地区的维克托·科洛，不打自招地承认：“法国必须用谈判取得路易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并用武力取得加拿大，以此作为唯一的手段，将合众国遏制在和平的界限以内，打破它同英国的排他性关系，以确保我们的各殖民地为我们所独占……以及最后，在两半球恢复我们天赋的优势。”

接着便发生了一场喜剧性的交易谈判。法国督政府外交部长塔列朗派了几个门下食客（在发回美国的公函中被称为 X、Y、Z），利用美国使者们的忧虑来挖空他们的钱袋。要进行谈判，先决条件是送给法国外交部长一大笔贿赂，并提供一笔贷款，作为对亚当斯总统发表“侮辱性”咨文一事的补偿。

美国使者们详细记述他们在巴黎与法国人进行接触的情况的公函，由亚当斯提交给了国会，并在 1798 年 4 月予以公布。这一“对法外交的第一手观察”，使公众深为激动，联邦党声望顿时看涨。而在民主共和党里，杰斐逊却认为“保持沉默是自己应尽之责”。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低估了他的老相识塔列朗，以为法国政府会被公布上述公函一事激怒而对美国宣战。汉密尔顿还自以为是地建议，美国应采取武装中立的政策，指望法国一宣战，就会使所有正直的人都团结到他们的旗帜下面来。国会创设了海军部。在 1798 年年底，海上已有 14 艘美国军舰，还有约 200 艘商船领取了海上捕拿和报复特许证，法国海盗船完全被扫出了西印度群岛海域。1799 年 2 月，在舰队司令特拉克斯顿指挥下的“星座”号，于尼维斯附近的海面上捕获了法国的头等快速战舰“起义者”号。美国海军有几艘美国私掠船，曾同法国的一些武装三角帆船开火，取得了胜利。

在 1798—1799 年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人赢得了强有力的多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胜利。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收获，约翰·马歇尔（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在弗吉尼亚被从里士满城选进国会的。杰斐逊和他的党看来似乎已由于其亲法的倾向而彻底丧失了信誉，但是，时间正在为他们进行报复做准备。在联邦党内，塔列朗已把一个楔子慢慢打进去了：总统和汉密尔顿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

目标和气质方面的那种差异造成了麻烦。亚当斯总统的目的，是要教训督政府循规蹈矩。如果法国宣战，他是会接受战争的，但他自己却希望避免战争。汉密尔顿和新英格兰联邦党人则与此相反，把同法国的纠葛不看作是一次须求了结的事件，而看作是一个应加以利用的机会。它应成为一个出发点，以便利用来加强联邦政府，团结美国人民，败坏民主共和党人的声誉。为此，联邦党人简直像是应付一场迫在眉睫的法国人入侵战争：扩充了正规军，建立了训练新军的干部队伍，并任命华盛顿为陆军中将，汉密尔顿为他的副手。亚当斯对这些做得太过火的军事准备深表不满，但还是睁只眼，闭只眼。

看来已万事俱备，只欠公开宣战这一东风了，而法国却尚无成全此举的那种好意。塔列朗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对于自己的贪财行为被揭露以致遭到全欧洲哗笑一事十分懊恼，但他却看出了真正的要害问题：对美国开战就意味着让英国有一个新的同盟者。才智过人的杰斐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似乎早已觉察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于是写信劝告塔列朗保持冷静，不要落入圈套。塔列朗也就以此转告督政府。

与此同时，塔列朗想出一个更好的计划：把美国从英国的圈子里分化出来，拖进法国的圈子内。那就是要迫使西班牙把当时还属自己的殖民地路易

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法国，并策动加拿大革命。到那时，就连联邦党人也得跟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为实现这一计划，塔列朗施放烟幕弹，对美国大谈和平友谊，特宣布私掠船的海上捕拿特许证一律作废，并命令驻西印度群岛的法国代理人尊重美国船只以示诚意。对于“XYZ”那一插曲作出如下的官方解释：美国使者们大概是遇到了骗子！法国督政府原曾打算同他们进行谈判，但他们却把自己关在旅馆里，而且不等能够受到接待便不辞而别，一怒而走了！这样一种解释无疑是美国国内已被挫败的反对派一直在期待着的。民主共和党人的每一家报纸立即大叫大嚷，说“XYZ事件”是联邦党人的一场骗局。

法国这些显示和解精神的明证，使主战的联邦党人猝然失惊，但国务卿皮克林却在1799年1月警告说：“老虎总是先俯伏下来，然后扑食的。”他当时决定：将法国的建议作为无诚意来对待，仍继续备战，一俟国会开会立即对法宣战。

联邦党人一面筹备国防和鼓动战争热情，同时也并未忽视他们的国内敌人。1798年的《归化法》、《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既是针对着外来的危害的，也是针对着国内的不满的，尤其是针对民主共和党人的。这些法令激起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护宪州权运动，并有助于使杰斐逊被选举为总统。它们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持偏狭态度而“自食其果”的显著例子。

联邦党代表们曾在全国会议上说过，决不要“那些自称为世界公民的学者绅士来参加我们的各级议会”。可是，法国革命却把一大批这种人送到美国来了。比如日内瓦的艾伯特·加勒廷（在1798年时领导着国会中的少数派）、被指控试图运用化学公式“分解教会和国家”的原英国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托马斯·库珀（他创办了一份民主共和党报纸）。联邦党人对这些人的到来疑虑重重。约翰·亚当斯说：“我们已经有了过多的法国学者，而且我确实开始想到，或者不如说开始怀疑，那些渊博的学会……已使这个世界解体，它们原是与社会秩序不相容的。”

而那些既非学者、又非绅士的移民，给联邦政府带来了甚至更多的麻烦，吵吵嚷嚷的雅各宾党人开始到来。法国的代理人在西部策动叛乱。从联邦党人的观点看来同样不受欢迎的，是那些参加过1798年反英起义的爱尔兰难民。国会的对策就是1798年的《归化法》和《客籍法》。《归化法》将取得公民权的居住时间由5年提高到14年；《客籍法》则授予总统运用行政命令驱逐外国人的权力。《惩治叛乱法》有一条宣布，任何“意图中伤”总统或国会、或对他们“加以轻蔑或丑低”的言论或文字，均构成一种应受罚款或监禁之惩处的罪行。实际上被施行的，仅仅就是这一条。在联邦党人看来，民主共和党人几乎无异于叛乱分子。在执行《惩治叛乱法》的起诉案件中，每一个被告都是民主共和党人，每一个审判官和几乎每一个陪审员都是联邦党人。约有25人被拘捕，其中10人被定罪，他们大部分是民主共和党的报纸编辑，都被任意加重罚款或处以监禁。某些起诉案件简直就是胡闹。有一个四处浪游的“叛乱使徒”，曾说服马萨诸塞州得达姆地方的“雅各宾党人”，在费希尔·艾姆斯的住宅前树立一根刻有挑衅词句的自由柱，因而被判处4年徒刑。新泽西州纽瓦克地方有一个常在酒店厮混的人被投入监狱，因为他曾表示，希望为向总统致敬而鸣放的礼炮能射中亚当斯的屁股。

当时的副总统杰斐逊称这一时期为“联邦党人的恐怖统治”时期。民主共和党人并非坐以待毙，也开始奋起反击。由麦迪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决议

案》和由杰斐逊起草的《肯塔基决议案》，都将这几项法令宣布为违宪。

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所依据的理论，是杰斐逊 1792 年曾在其对《银行法案》的意见中约略提出过的那种关于宪法的“契约”论或“州权”论。《肯塔基决议案》宣称，无论何时，一当国会显而易见地越出它的权限，例如制定《惩治叛乱法》的这种情况，各州就都“有平等的权利，就违宪之处及其补救的方式和方法自行作出判断”。它号召各“姊妹州”“一致……宣布这些法案无效”，并联合起来“要求废除它们”。《弗吉尼亚决议案》则暗示各州有权在被迫害的公民及其政府之间“进行干预”。

由于受到来自民主共和党越来越大的压力，亚当斯总统越来越对汉密尔顿和“上层”联邦党人的行动和野心感到惊惶不安。直到 1799 年春，汉密尔顿一直是亚当斯政府幕后的实权人物，因为国会议员和总统内阁的 3 位成员都是听从他的意见的。实际上，汉密尔顿在构思一个“宏伟的计划”：他将率领新成立的美国陆军由陆路进攻新奥尔良，英国人将以封锁密西西比河口来进行合作。攻陷路易斯安那和东、西佛罗里达以后，汉密尔顿将进军墨西哥。与此同时，南美爱国者米兰达在英国人援助下，将解放西属南美大陆北部。汉密尔顿将头戴桂冠，亲率他的得胜兵团归来，成为美国“第一公民”，就像波拿巴已成为法兰西“第一公民”那样。而杰斐逊的党，连同该党所拥护的一切，将会声誉扫地。

但是，汉密尔顿犯了一大错误，在他的这一切计划中，似乎忽视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总统是亚当斯，而不是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哲学家。1799 年 3 月他突然从梦中惊醒，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觉察到了国家这只大船即将漂流进一片未知的充满危险的水域。于是，他不对任何人透露他的意图，便任命了一个派驻法国的全权公使。此举无异于向参议院扔了一颗炸弹。这一来就使开战的计划完全停顿下来了。汉密尔顿和上层联邦党人怒不可遏，但是，他们不敢反对这一任命，害怕予人以口实而受到指责，说他们在总统看出和平尚有可能之时力求开战。

亚当斯作出了妥协姿态，把任命一个专使改为指派一个 3 人使节团。但国务卿皮克林设法阻止他们启程，致使 3 位使节迟至 1800 年才抵达巴黎。这在时机选择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 1798—1799 年时，督政府原是急欲同美国言和的，但波拿巴于 1799 年 11 月 9 日（雾月 18 日）发动了“雾月政变”，改督政府为执政府，自己当了第一执政而且毫无安抚美国的愿望。谈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 7 个月，这期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在马伦戈对奥地利人再次加以痛击。他拒不承担为法国人的海上劫掠赔偿损失的责任，除非美国承认 1778 年的各项条约，而这些条约早已被美国国会在反高卢人（这是对法国人的谥称）情绪达到高潮之时宣布废除了。不结盟，不给钱！3 位美国人不敢重订一份有牵累的盟约带回国来，便只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而对于；日有的条约和海上劫掠，则双方各自保留权利。当时确是正该同法国言归于好的时候，因为就连英国也即将与法国言和了。1801 年春，英法代表开始在亚眠谈判；1801 年 10 月 1 日，双方在伦敦草签条约，停止战斗；1802 年 3 月 27 日，双方签订《亚眠条约》。

在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第二天，即 1800 年 10 月 1 日，法国秘密地向西班牙收回了路易斯安那。1763 年，法国在英法战争中失败，将路易斯安那让与西班牙。条约规定西班牙不得将路易斯安那再行转让给该国。因此 1800 年这次转让是秘密进行的，至 1802 年始予公布。

由于联邦党内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之间出现裂痕，为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人的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杰斐逊巧忍成局。

第十七章 入主白宫

我认为，杰斐逊先生的品性，可望保证有一顺时应势的体制，并无生成狂暴体制的可能……况且无充分理由推断他有堕落的可能，因此可断定他必不致越轨妄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假如法国人哪怕只派一个班登上美国土地，假如有某个“煽动叛乱的外侨”在一场真正的阴谋事件中被捕获，那么，1800年总统选举的进行情况就可能大有不同。但是，历史是不容许“假设”的。时间向前推移，敌人并未出现，却开征了新的直接税，1798年的那种爱国热情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同英国又发生了关于强征美国船员的新矛盾。民主共和党的报刊编辑们正撒开大网，瞪大眼睛到处探寻政治上的殉难者。

1800—1801年选举中的总统候选人，是由国会内的党团会议选定的。党团会议是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分别召集全体党员议员举行的秘密会议，推选两院党的领袖，讨论本党对重要议案的政策和策略，1804年以前还推选总统候选人。民主共和党人仍像在1796年那样，决定继续支持杰斐逊。杰斐逊对在联邦党把持的政府中毫无实权一直忿忿不平；如今，他已不再像1796年那样不愿当候选人、被动应付了，而是准备竭尽全力去拼搏一场。

早在1799年初，杰斐逊从费城写信给弗吉尼亚的麦迪逊说，即将到来的夏日是“有计划地大干一场和做出奉献的季节。发动机就是报纸。人人都必须掏出腰包和拿起笔来做贡献”。他敦促麦迪逊为报纸写些东西，给他寄到费城来。

这次竞选中的杰斐逊主动出击，四处游说，支持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亲自散发政治小册子（1799年间他给门罗寄去一打这样的小册子，让他送给本地区“最有影响的人士”），号召支持者给报刊写文章，并有组织、有计划地从各方面促进民主共和党的活动。1800年春，他给刚成立的州民主共和党委员会主席送去了8打托马斯·库珀著的《政治算术》，让他给每个县委员都送一本。这表明，在1800年大选中的杰斐逊与1796年时判若两人。事实上，杰斐逊在这次的竞选中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志在必得。

杰斐逊不知疲倦地阐述选民所面临的各项问题，他的这些见解后来成为民主共和党的政策纲领。1799年初，杰斐逊给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写信，宣称自己一贯维护“各州按其真实意义通过的”宪法，并且有义务来阻止其“君主主义化”。他还“主张各州保留未交与联邦的权力”，而“不是将各州的所有权力都移交给大政府。再由政府将一切权力转给行政部门”。他强调他“主张精简政府，厉行节约，节省国库岁入的每一分钱来偿清国债”。

杰斐逊还认为，美国应同“所有国家自由贸易，但不同任何一国发生政治关系”。针对最近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质问，杰斐逊说他“反对一切企图以武力而不是道理来封堵我国公民对其代表的行为提出或公正或不公正的不满和批评的违宪做法”。谁都明白他所指的是《惩治叛乱法》。他认为他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我国同胞公民这一伟大团体的各项原则”。

杰斐逊表述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在整个竞选期间一再出现在民主共和党的报纸、船车两侧及党的传单上。杰斐逊将反对的矛头对着联邦党政府的原则和政策，而不是针对亚当斯总统本人。

双方利用各自掌握的传媒来作为引擎的做法，使这次大选的气氛更加紧

张了。全美主要的民主共和党报纸——费城的《曙光报》声称，由联邦党人当总统就会出现战争，而若由杰斐逊当选总统就意味着和平。“因此，和平之友将投杰斐逊的票，而战争之友则会投亚当斯或平克尼的票”。

联邦党人在选举中则宣传说：民主共和党人都是些没有财产的人，假如他们获胜上台，有财产的人就会遭殃。马萨诸塞州的费希尔·艾姆斯劝说联邦党人要在报纸上不断“敲响提防杰斐逊的警钟”，旨在“证明一个雅各宾式总统会做出令人担忧的各种可怕的坏事”。他们还列举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同大不列颠打仗、同法国结盟、掠夺和无政府状态。“我们担心杰斐逊的事还多着呢！”反对杰斐逊的人说他是政府对稳定的威胁，是个破坏民众道德的人。“一个基督教徒的联邦党人”甚至嚷道：“严肃负责和善于思考的人，如果看到杰斐逊当选和雅各宾派分子掌握了权力，他们难道不会怀疑那些保护我们生命免受杀害、保护我们妻女的贞操免遭诱惑和暴力、保护我们的财产不受掠夺和破坏以及保护我们的宗教不受蔑视和亵渎的道德不会从此受到践踏和被推翻得一干二净吗？”联邦党的《合众国报》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一个“每个美国人都要把手放在心口上来回答的”有关这次大选的关键问题：“我是继续忠于上帝——和一位虔诚的总统；还是不要上帝——和不虔诚地表态支持杰斐逊——和不要上帝！！”不仅如此，联邦党人还企图利用宗教问题来攻击杰斐逊。他们指责他“不相信《圣经》”，或说他“抵制基督教并公开宣称信奉自然神论”。于是有人警告说：“全国要求一个自然神论者就任第一把手的呼声，必须被看作不啻是对上帝的背叛。”

民主共和党人则不厌其烦地提醒选民，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有一位作家要求大家都来支持杰斐逊，称颂他“毕生都按其生活格言行事，始终如一地按照建国初衷来追求国家的伟大幸福”。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委员会在其向选民发表的正式演说词中说：“作为自由之友来看，我们认为杰斐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维护自由方面也只有他才能提供好的经验教训。”

联邦党人占了执政党的便宜，在他们的竞选文章中，将国家的繁荣景象都归于“流芳百世的华盛顿首建的政府及其德高望重的继任者坚定不移地奉行政府的各项贤明准则”。联邦党人发言说，没有理由要改变这一航向。

民主共和党是在野党，不像执政党那样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但他们想方设法来弥补这一点。民主共和党人特别注意从党的组织能力、竞选运动的方法等方面来争取选民。在弗吉尼亚，民主共和党控制的议会改变了选举法，从按地区选举总统投票人制改为一张总候选人名单。4年前，杰斐逊在老家这个州曾丢掉过一个地区的选票。而根据总候选人名单制，他将保证获得全国最大一州的全部选票。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抗议民主共和党人的做法，但是在别处，只要对联邦党人有利，他们也就如法炮制。在约翰·亚当斯的家乡马萨诸塞州，联邦党控制的议会将由各地区选举投票人的选举法，改为由州议会选举。

待选举法都改定了之后，1800年民选总统投票人在16个州中实际上只有5个州，它们是：罗德岛、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因此，亚当斯总统的小儿子托马斯·博伊斯顿·亚当斯作了如下评述：“两个候选人竞争联邦总统的力量有待揭晓，但这不由民众推出的投票人来选择，而是由各州立法机关的状况和性质来决定。”

杰斐逊和亚当斯之间第一次力量较量是在纽约市，不过真正出马的是经

办民主共和党竞选运动的艾伦·伯尔和联邦党的头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目标都是争取控制州议会，因为州议会将推选总统投票人。杰斐逊本人认为民主共和党人在此取胜十分关键。而亚当斯 1796 年也曾在此州获胜。

纽约市里的竞争十分激烈，伯尔巧妙地提出了一张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将一些著名的民主共和党人列为州众议院的候选人。这一战略果然出奇制胜。在纽约城的胜利，使议会中的砝码向民主共和党倾斜，新选出的众议院可望挑选出的总统选举人，都保证投杰斐逊的票。然而汉密尔顿也不示弱，他立即给约翰·杰伊州长写信，催促他在联邦党人尚处于多数的老议会，于 7 月 1 日期满前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改变该州选举总统投票人的办法，来挫败民主共和党人的计划。但汉密尔顿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已经辞去合众国法院院长一职而成了纽约州州长的杰伊的拒绝。

4 月底，民主共和党在纽约进行的选举中初战告捷。民主共和党人兴高采烈，普遍认为这一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伯尔。纽约的结果传到费城一周后，国会的民主共和党议员召开秘密会议，提名伯尔为副总统候选人，获一致同意。这样就为总统选举双提名开了先例，民主共和党一直到 1824 年都是这么做的。

纽约的选举也刺激了国会里的联邦党人。他们旋即召开秘密会议，很勉强地提名约翰·亚当斯，另配以曾参加 XYZ 事件使节团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二人不分正副同为联邦党的候选人。由于选举总统的人投票时是不能分投总统和副总统的票的（即只能在最终选定的两人中，由得票多少决定正副总统之位。之所以采取这一办法，为的是要给联邦党多一次机会来赢得总统席位），因此，有些州的投票人可能有投杰斐逊的，也有投一名联邦党候选人的。比如 1796 年新英格兰的投票人曾投了杰斐逊和平克尼的票，这次他们也可能同样地投杰斐逊和本地人平克尼的票，然而，在这一系列决定背后，隐藏着汉密尔顿派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策划使平克尼当选为总统，其办法是说服一两个总统选举人放弃他们原本会投给亚当斯的选票，以报复亚当斯阻止对法开战的行动。关于亚当斯，汉密尔顿曾写道：“我将永不再用我的直接支持来为他负责，哪怕其后果是杰斐逊当选也罢。如果我们非有一个敌人来居政府首脑之位不可，那就让他是一个我们能够反对、而且不为他负责的人吧！这样一个人将不会把我们的党卷入他采取蠢笨措施的那种耻辱之中去。”

当然，汉密尔顿派也不愿把权力宝座拱手让给民主共和党人，因此，汉密尔顿强调：“同时支持亚当斯和平克尼这一做法，是唯一有可能将我们从杰斐逊的利爪下解救出来的办法。”

总之，这时期历次竞选运动的特点，是情绪非常激烈。从 1793 年至 1815 年，联邦党人一直认真相信，民主共和党人的目的是要消灭财产和宗教，并使美国成为共和制或帝制的法国的一个卫星国。民主共和党人则认真相信，联邦党人的目的是要使全国屈从于北部的豪门政治，并最后屈从于充当英王乔治三世附庸的某个小帝王。这就是为什么杰斐逊认为他是在从危亡中拯救他的国家的缘故。

此次总统竞选气氛异常紧张，直到最后一州选定的总统选举人结果报告上来，才能确定选举结果。从 4 月至 12 月初，全国都在注视着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选举结果揭晓。杰斐逊也在不断地计算着自己的得分，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结局，在这几个月中，杰斐逊的一言一行都分外小心，唯恐私下里写

的信会被捅到报纸上，成为联邦党人用来攻击他的把柄。

11月底，仍有3个州的情况不明，它们是：宾夕法尼亚、罗德岛和南卡罗来纳。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共和党的众议院同联邦党的参议院在用何种方法挑选总统投票人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几天后传来的消息说，联邦党在罗德岛获胜。这一结果即意味着亚当斯得58票，杰斐逊得57票。如果宾夕法尼亚不投票，南卡罗来纳的8张选票将最终决定大选结果。在支持联邦党的南方各州中，南卡罗来纳是最卖力的，查尔斯·平克尼一直在那里积极活动。所以，许多联邦党人有理由对大选最后结果感到乐观。

11月底，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哥伦比亚开会，12月2日选出该州的总统投票人。这时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两院终于达成了妥协，州的选票分两拨，8票投给杰斐逊，7票投给亚当斯。因此，南卡罗来纳的结果仍然是决定大选胜负的关键。南卡罗来纳投票人在一起投票时，8人都投了杰斐逊和伯尔的票。

在此之前，有些联邦党人认为已是稳操胜券了，过早地庆贺了“杰斐逊落选”。当南卡罗来纳的最后选举结果出来时，许多联邦党人大为震惊。一个叫托马斯·罗宾斯的牧师在听到杰斐逊当选的消息时十分沮丧，说他“不相信上帝会允许一个嚎叫的无神论者当上这个国家的首脑”。约翰·亚当斯后来听人说他失去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是因为在那些德裔居民中间，曾有过一场流言蜚语运动，据传他曾经从国外弄回来两个情妇，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德国人，后来竟把那个德国女人打发走了！

然而，联邦党人还没有完全失望，各州的选举结果陆续出来，还给他们闪烁出一线希望。毕竟杰斐逊还没有最后获胜。

由于没有一个选举人胆敢放弃他的第二人选票，致使杰斐逊和伯尔不分伯仲，各得73票而同居首位，亚当斯获得65票，平克尼获64票。

1801年，以州为单位进行表决的众议院，得在杰斐逊和伯尔两人之间作出选择，须获得过半数的票才算当选。

杰斐逊感到惋惜：“由于最初的安排缺乏远见，我们的命运仍然被攥在敌人的手心里。”这是指民主共和党人没有规定从伯尔那里扣除一票，像亚当斯的支持者那样拿出一票来给杰伊，这样就不致两个票数相等了。

事先，民主共和党人确实想到了可能发生的尴尬局面。弗吉尼亚的投票团曾考虑少投一张伯尔的票，其成员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就对同事说，他得到伯尔密友的保证，“某方面”的票将不投给伯尔，以保证杰斐逊获得多数票。但是究竟获得什么保证一直来得到证实。这一漏洞给联邦党人留下最后一个反击杰斐逊的机会。他们看到了用支持伯尔的办法来挫败他们的敌人的机会，便宁愿选一个柔顺无耻而腐败的政客，也不要一个“危险的激进派”。

1801年2月11日，众议院开始投票。16个州中每一州都只有一票。投票过程是旷日持久的。当天投票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一共投了19次票，每次投票的结果都一样：8个州投杰斐逊的票，6个州投伯尔的票，有2个州（马里兰和佛蒙特州）内部意见分歧。杰斐逊和伯尔二人没有得到2/3的多数。12日又投了9次票，结果依然如故。13日、14日及16日，众议院又分别投了6次票，结果还是一样。联邦党人似乎决心拼个鱼死网破，非击败杰斐逊不可。

这时，亚当斯暗中向杰斐逊提出做一笔交易，声称选举的胜负取决于杰斐逊自己，只需杰斐逊表示将公平地对待债权人，维持海军；并且不打搅控

股机关，“政府将马上被放到你的掌握之中”。

但是杰斐逊表现出毫不妥协的立场，平静地回答：“我决不靠投降进入政府。”显然，杰斐逊极不可能放弃原订计划或就此而言牺牲原则以换取职位；但他确实在使联邦党人确信，他是在同他们已达成某种谅解之后才进入白宫的。

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只要考虑一下杰斐逊当时所处的困难地位就不难相信，对他这样一个气质温和的人来说，基本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汉密尔顿体制到这个时候已经实行了12年之久，已经成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部分。如要整顿汉密尔顿的偿债基金、银行和税收体制，就会引起尖锐的斗争，扩大阶级裂痕，并把温和派赶出民主共和党人的队伍；这样做还可能造成萧条，甚至使联邦解体。何况，冲突结束之后，总还需要同从事商业、银行业和制造业的阶层讲和。因此，杰斐逊明智地使自己仅限于小心翼翼地修整汉密尔顿体制的边边角角。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形势下，有两件事情促使形势向有利于杰斐逊的方面转化。

首先，拥护杰斐逊的中部诸州公然宣称，假如众议院投票选伯尔为总统的话，中部诸州要宣布脱离联邦。

其次，虽然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都仇视杰斐逊的民主主义纲领，但是对于他的人格却很尊重。相反地，他们二人都认为伯尔“人品不端”，而且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倘若真的让伯尔上台，美国前途将不堪设想。鉴于这种考虑，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给众议院的一些联邦党人施压，汉密尔顿还接二连三地向联邦领导人写信，详叙伯尔个人品德欠佳，缺乏政治原则等等。对汉密尔顿派来说，选择杰斐逊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汉密尔顿在写给一位联邦党众议员的精彩信函中，对杰斐逊的品性作了锐利的评价。他承认这位老对手的观点“极富狂热色彩；对其民主主义主张热衷有余”。但他同时也指出，若杰斐逊不惜一切以推行他的原则，“那将和他的声望或利益不相容”。汉密尔顿说：“实则这个人同我所知之任何人一样能够顺时应势——斟酌如何有利自己的名声或利益；这种气质的可能结果，是使体制得以维持，这一体制原来虽然遭到反对，但既已确立，要想推翻势必危及推翻者。”

1801年2月17日进行了第36次投票，局势异常紧张，却终于有了结果：若干联邦党议员投了空白票，使伯尔一直保持的6州票减为4州，而杰斐逊增加2州票当选为总统。这时离亚当斯任期届满的3月4日，只有两周的时间了。

1801年3月4日中午，当选总统杰斐逊在一队亚历山德里亚民兵军官、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执行官及国会议员代表团的护送下，从寓所步行到附近的国会大厦。当他来到新国会大厦唯一完工的参议院会议厅的人口处时，列队门外的亚历山德里亚步枪连立即闪出一条通道，当选总统进入时，他们举枪致敬。

杰斐逊朴素的平民风格，与前两任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是坐着高头骏马拉的华丽马车去参加就职仪式的，而且参加典礼的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峨冠博带，佩着长剑；而杰斐逊既未着高档特制的服装，也未佩剑。“他的服装同平常一样，一身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一名目睹当时情形的记者这样写道，新总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职位标记”。杰斐逊这样

做，是为了实践他曾作出的建立一个节俭而贤明的政府的允诺。

杰斐逊成了第一个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的新首都宣誓就职的总统。这位新总统在其第一届政府的处境方面很是幸运。他的党在国会两院中都占多数，没有一个敌对派领袖力求取而代之。《亚眠条约》（1802年）使欧洲战争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就让他得以全力处理国内问题。约翰·亚当斯所移交的行政机构和国库井井有条，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混乱局面。而且联邦政府已从贵族气派的费城，迁到新首都华盛顿这个与共和制的纯朴性相适应的环境里来了。

国会是在1790年作出决定，要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联邦哥伦比亚特区的。当时由华盛顿总统选定的地址，就在河的上游距离蒙特维尔农数英里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内，正位于大瀑布的下方。首都华盛顿市规模宏大，由法国工程师朗方少校负责设计。国会大厦和白宫的位置是杰斐逊所建议的。出生于维尔京群岛的美国人威廉·桑顿，与在英国出生的拉特罗布共同设计了国会大厦。现仍屹立的两侧内翼（1959—1960年时曾加以扩建，以致失去对称），即是他俩的创作。10年已经过去了，但1801年的华盛顿却还是一片旷地，只在荒野与河流之间稀疏地散布着几幢建筑。国会大厦的一翼，是位于高地之上的一座优美的帕拉第奥式建筑，已可供使用，另一翼也接近于竣工；但圆形大厅顶上还露着天。附近有几所供工人和黑人居住的砖房和木屋，还有几间货物贫乏的小商店。宾夕法尼亚大街是一条宽阔的空地，满布着材桩和赤杨丛。由国会大厦通往西北。穿过一片泥淖，直达简朴而典雅的行政大厦——白宫。

白宫是都柏林的詹姆斯·霍本设计的。周围地势较高之处有房舍数百间，大都是木构建筑，成为日后市内住宅区的中心。距此以西两英里的乔治城，是一个舒适的小小学院市镇，为政府官员们提供了一点惬意的生活变化，使他们不致仅限于相互往来和与女房东交际，华盛顿地面上的红色粘土，天气干燥时变成微细的灰尘，雨天则成为泥浆。成群的蚊子在新来到的人们中间散布疟疾。几丛优美的百合树，就是这个都市所在之处仅有的美好自然景色了。杰斐逊的一大愿望，就是要保住这些树，不让居民们侵越产权，砍伐它们当柴烧。除了抱轻蔑态度的联邦党人和怨言啧啧的外交使团以外，人人都不把困难当回事，盼望着会出现某种魔术变化，把他们这个位于内地森林区的首都变成商业和艺术的中心。正如1804年托马斯·穆尔在访问美国以后所写的：“虽然除了树木和杰斐逊他们别无所见，那地方却必将街衢纵横、普降大贤。”后来，这个“远景宏伟的都市”（葡萄牙公使语）终于按照它的计划成长起来了。但直到南北战争以后，它同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或北部各城市相比，仍旧是不整洁的。

1801年3月4日，一名观察者写道：“今天上午我亲眼得见一个自由的民族历来所能见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场面。执政当局的更迭在任何政府和任何时代，向来多半会成为混乱、逞凶和流血的时期，在我们这个幸福的国家里却进行得绝无任何骚动和紊乱。”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当权的政党接受了选举上的失败，夫把政府移交给了它的反对者。

当天，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新总统宣了誓，声音不够洪亮地发表了就职演说。

杰斐逊感觉锐敏，但并不感情用事。他喜爱花鸟，缺乏幽默感，厌恶流血。他跟大多数弗吉尼亚人不同，除了骑马外一般不从事户外运动。他鄙视卢梭的浪漫主义，但认为人类可以达到完美境界。这位遇事挑剔的绅士更是一个很精明的政客。

杰斐逊的首次就职演说，乃是被实际政治这面罗筛筛过的 18 世纪的理想主义。他没有斥责联邦党人是君主主义者，而是着眼于安抚，吁请他们回到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庙堂里来，尽力弥合 1789 年至 1800 年间激烈斗争造成的伤口，争取温和的联邦党人的支持。他说：“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希望解散这个联邦，或者改变它的共和制政体，那就让他们不受干扰，留在那里作为对安全的纪念碑吧。有了安全，错误的意见就可以受到宽容，理性就得以自由地去同它作斗争。”这个政府是“世界的最好的希望”，决不能“由于在理论上和幻想中担心”它不够强有力而抛弃它。“有时人们说，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不能信赖的。那么，还能信赖地去管理别人吗？”“大自然和一面广阔的海洋，使我们远离全球 1/4 地区那场毁灭性的浩劫（指当时欧洲在法国革命之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拥有一片得天独厚的国土，幅员足供我们千百代子孙”实践社会美德，唯一“需要用来凑成我们的全福”的东西，就是“一个贤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应能制约人们不使互相倾轧，应能容许他们自由管理自己所从事的实业和进步活动，而不应从劳工口中夺走他们所赚得的面包”。他确认尊重各州的权利，维护大政府，继续举行民众选举和“完全默许多数人的决定，这是每个共和国的最重要原则，这样就不至于诉诸武力，而使用武力则是专制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和直接根源”。他最后说，这些原则“形成了明亮的星群，一直照耀着我们，并在革命和改革的年代里引导着我们前进……它们应当成为我们政治信仰的纲领、公民教育的课本，是考验那些我们所信任的人服务成绩的试金石”。

杰斐逊上台后不久就给杜邦·德·尼莫尔写信，信中所言证明了汉密尔顿对他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

“本政府初创之时，本有望依据真正的原则行事，然而汉密尔顿以他约略的一知半解的英国思想，摧毁了这个希望之萌芽。我们可于 15 年内偿清他欠下的债务，但决无法挣脱他所建立的金融体制。要加强我视为极其恶劣的原则，实在令人痛心；但这种弊害乃是最初之错误留给我们的。希望能在政府的其余部分逐渐推行健全原则并使之蔚然成风。需常以切实可行的办法制约纯理论的议论。”

托马斯·杰斐逊数年以后回想其毕生忙碌的往事，认为自己当选为总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如同 1776 年时的革命一样。他把国家从君主制和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使它恢复了共和制的纯朴。这场革命“不是由刀枪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理性与平和的改革方法，由民众投票来实现的”。

有趣的是，虽然杰斐逊是第一个在白宫宣誓就职的总统，却并不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人。

前任总统亚当斯在任期只剩 4 个月时，于 1800 年 11 月与其夫人搬入这栋既潮湿且未完成的官邸。他颇感不悦，亚当斯夫人对此短时间的居所也表示沮丧。她在给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女儿的信中，描述这栋房子真是“好到家了”，只可惜主要的楼梯未建，没有一间房子完成，而且还缺乏使唤侍从的铃。

亚当斯夫人在寒冷中由于壁炉缺乏薪柴，风湿症复发了。“……好冷啊！”她抱怨道，“……虽然四周环绕的都是树林，但你能相信这里缺少薪柴吗？就是因为这里的木材是不准人民随意砍伐的。”

亚当斯夫人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家务问题和她的解决之道，在白宫中的许多集会里都成为耐人寻味的话题。比如，她因为室外没有围墙或其他遮蔽之处，不得不把总统所穿的内衣晾在宽敞而未完工的东厅里，而这里竟是后来招待嘉宾最正式的大厅，即为一例。

白宫内正式大厅的来访者，无论是观光客还是政府首长，都莫不赞同铭刻在国宴厅内壁炉额上的祝祷词，这是取自约翰·亚当斯入主白宫后第二夜所写的一封信，并由小罗斯福将它们刻上，以供过往者观赏：

我祈祷上苍
降福于
白宫
和所有在此地的人
只让诚实和聪明者
在这屋顶下从事统治工作

白宫的第二位主人杰斐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绅士，他曾使那些预言他的平等信念会导致混乱和灭亡的北部联盟难堪。在这并不很舒适、更无多少温馨的“家”中，他经常保持节制的态度和一种舒适的、充满知识趣味的生活方式。这个新兴的国家是在充满敌意的君主政体中产生的。为了要减轻管理它的重责大任所带来的烦恼和压力，这位已失妻多年的总统，又重拾他在蒙蒂赛洛家乡所享受的各种嗜好：或者拉提琴，或者做各种熟悉但鲜见的植物试验，养鸟，等等。

杰斐逊极为腼腆，还有点口吃，自己觉得无法像华盛顿和亚当斯那样在国会亲自宣读致词，也不具备鼓动家的气质，因而从未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还取消了一些繁杂的仪式，希望加强平等与民主的理想实现。他“取消了总统正式招待会、生日宴会和盛大的游行项目”，而以两项主要的白宫招待会取代，即在新年和7月4日国庆日时间开放给每一位国民的招待会。

杰斐逊不喜欢隆重仪式，却欣赏平易近人和慷慨大度，显示了他的风范和嗜好。在他举办的招待会上，不但供应上好的酒，而且请了一位法国厨师来做最好的食物，招待那些由他邀集的、围绕在精巧且非正式的餐桌边的宾客，其中包括在这城市内或欲访问此年轻首都而刚到达此地不久的名门淑女、才俊之士和知识识理者。

杰斐逊在学识和成就上，对周围的人而言是无出其右的。他的兴趣广及音乐、历史、农业、天文、人类和建筑。就为了他的如此博学，肯尼迪总统在为庆祝1962年29位诺贝尔获奖者所举行的晚宴上，对杰斐逊大加赞佩。肯尼迪夫人也曾说过，除了杰斐逊独自吃饭的时候，他所有的宾客将造成人类和知识与才能在白宫中罕见的大融合。

杰斐逊总统还以随和的握手方式代替了传统的鞠躬。不论数以千计的手给予特权阶级的痛苦压力有多大，这种致意的方式已被证实为最受欢迎，以至于没有一位后继者能够废弃它。

杰斐逊总统由于他两位已婚的女儿玛莎·伦道夫和玛丽·爱泼斯的经常造访，使得他的8年总统任期非常愉快。在1805年的冬天，玛莎生下了她的第八个孩子，取名为詹姆斯·麦迪逊·伦道夫，这是第一个在白宫出生的婴

孩。杰斐逊不仅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而且也是一位慈爱的祖父，他喜欢与小孩子在草地上追逐或在屋内嬉戏。在记者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夫人的早期华府生活记载中，曾追述杰斐逊谈及儿童所能带给人们的乐趣。杰斐逊说：“只有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片刻，方可使人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第十八章 睿智谋国

这只大航船经历了种种考验。今后，我们将仪她航行在共和的航线上，她那美丽的举止，可以充分表现出造船者的英明才干。

——托马斯·杰斐逊

1801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一些人因联邦党人的宣传而感到惊惶失措。

联邦党人费希尔·艾姆斯曾预言，有了一个“雅各宾派”的总统，美国就会遭受一次真正的恐怖统治。他甚至危言耸听地称，他很快将闻到“祭坛上人类供品令人恶心的汗气”。可是，随后的4年却是民主共和党最平静的一届执政期，其特征不是激烈的改革或民众的骚乱，而是和平地取得了面积相当于又一个合众国的领土。1800—1801年选举所带来的，是人事变动多于政策变动，是联邦政权从哈得孙河移往波托马克河，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以利于各州。其后的1/4世纪，一直总是由一位弗吉尼亚人在白宫实行统治：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每人任职8年，而且都是由其国务卿继任的。因此，在美国建国之初的5位总统中，除了约翰·亚当斯之外，其余4人均来自弗吉尼亚，这便是美国历史上的“弗吉尼亚王朝”。人杰地灵的弗吉尼亚州也因此有“总统之州”的美称。

1801年杰斐逊当选为总统，预示了一个更广泛的民主时代的来临。在联邦党人统治时期，虽然选举权很普及，许多人却不愿行使它，而且除了像宾夕法尼亚州那样的若干例外情况，政治都是被绅士阶层把持着的。在杰斐逊时代，选民人数有了惊人的扩大。杰斐逊整个一生便象征着那种对自由和平等追求的不懈精神。他曾在他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所有的眼睛都已经或正在向着人权睁开。科学之光普遍照耀，已使人人得见这一明显的真理：人类并非广大群众生来背上带有鞍座，而少数人穿着带刺的长靴、独蒙上帝恩准可以合法地来乘骑他们的。”

杰斐逊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有奴隶的乡绅，他受过古典教育，趣味高雅，好奇心很活跃，并深信人类可以达到完美至善之境。这样的人属于18世纪，而不属于19世纪，他是一个基督徒，但不是教士；他神志清朗沉静，是圣灵常常乐于与之交谈的那种人。他受到普通人民出自内心的爱戴，并不是因为他善于演说、卓具武功或投合庸俗的偏见。杰斐逊坚强有力的秘密在于，他激发并表达了美国较优良的那一部分德性，即它的理想主义、纯朴风习、青春心性和满怀希望的憧憬，而不在于汉密尔顿所代表的那种物质方面和帝国野心。杰斐逊在政治上的目的，乃是要证明美国人已经成熟，能够建立“一个不是基于人的恐惧和愚昧，而是基于人的理性，基于人的社会情感优于其非社会情感的政府”。他曾在致友人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写道：“我们是代表全人类行事的。别人未能得遇而我们适逢其会的时势，责成我们来证明，一个社会可以容许它的各个成员享有何种程度的自由和自治。”

杰斐逊获得了广大农民、店主和工人的支持。在1800年选举期间，他曾给朋友写信称：“这只大航船经历了种种考验。今后，我们将使她航行在共和的航线上，她那美丽的举止，可以充分表现出造船者的英明才干。”后来，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要成立“一个贤明而节俭的政府”，这个政府要维

持社会秩序，但并不“妨碍人民发展事业的自由”。杰斐逊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正是这样去努力的。

杰斐逊在得知众议院决定他当选后，就立即组织自己的班子。他任命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为国务卿，民主共和党内著名的财会专家加勒廷为财政部长。杰斐逊还吸收了两位新英格兰人来平衡他顾问班子里的地区代表性。他选中了亨利·迪尔伯恩为陆军部长，利瓦伊·林肯为司法部长。这一做法还有另一目的，就是想在民主共和党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争取支持、扩大影响。在就职典礼日之前，杰斐逊曾三次提名海军部长，每次均遭提名人拒绝。直到7月，他向众议员塞缪尔·史密斯的兄弟、巴尔的摩的罗伯特·史密斯提出了这一职位，终于为其接受。于是，组成了他的五人内阁。

杰斐逊上任伊始，遇到的头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政府里的联邦党人官员。他从未因《惩治叛乱法》和联邦党人加于他的侮辱而施行报复。他曾给利瓦伊·林肯写信说：“我决不采取其他报复手段，只是要坚定地实行节约和保持和平……使联邦主义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言而有信，唯有他对联邦法院的态度可能算是例外。

他的前任约翰·亚当斯知道自己落选后，连夜任命了一大堆官员，半夜12点任期届满，而到夜里9点他还在拼命签署任命书。这就是亚当斯最受人指责的“午夜任命”。这与其说是发泄私愤，不如说是为联邦党保存一点实力。

让杰斐逊最感头痛的是，亚当斯把他的政敌约翰·马歇尔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亚当斯还将各级法院都填满了联邦党人，许多法官都是根据1801年的审判员法任命的，此法是在他任总统时威信不断下降的几个星期内通过的。杰斐逊谴责亚当斯的行动是“不光彩的做法”。由于总统不能免除法官之职，因此杰斐逊决定将所有由联邦党人担任的法院执行官和地方检察官，都换上民主共和党人，“以保护同胞公民中拥护共和政体的这部分人”。围他认为，这部分是民众的主体。许多民主共和党人劝杰斐逊把联邦党人全部革职。但是门罗从里士满来信，劝告杰斐逊在罢免官吏问题上要谨慎从事。他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只是由于政见不同而被免职……让他们留任可以证明你宽大为怀、温和和克制的精神。”

杰斐逊提出“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这一说法，在他自己的阵营内引起了不小的惶惑。加勒廷的岳父曾质问，是否仍要那些敌人“当官来作践我们”。弗吉尼亚的威廉·贾尔斯提醒总统，人们都盼望“对官员好好地普遍清洗一回。驱除坏人，找一个好人来代替他，这是永远不会失民心的事”。没有什么人认真指斥美联邦的文职官员无能或腐化，但他们几乎全是联邦党人，因为华盛顿和亚当斯从来不曾有意任用反对派的一个成员，官职早已被看作是为政党服务所应得的酬赏，而杰斐逊的党徒们都是极想在公共秣槽中就食的。可是，正如他所抱怨的，现职官员很少有人死去，更从来没有辞职的。这样，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总统的免职特权，来造成空缺。杰斐逊“企图一只手诱招羊群，另一只手痛击牧羊人”。第一步是宣布亚当斯1800年12月的一些任命无效。结果有17个治安法官被免职（1800年12月任命的治安法官有42名）。第二步是罢免联邦政府的一般官员。总统可以任免的联邦政府官员有316人，而这些人都是联邦党人。到1802年年底为止，杰斐逊一共免除105人的官职，其中有关税人员、联邦法院执行官、地区检察官及驻外国领事。在免职的105人中，只有9人是纯粹由于

“政治见解”被免职的。杰斐逊任用一些卓越的民主共和党人，全部更换了亚当斯的内阁，他这样做就意味着政党政府的到来。他和麦迪逊还竭力“照顾”那些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民主共和党人，授予他们联邦官职。杰斐逊在任命联邦高级官员方面，适当地作出了一个开端，力求用人唯才而不同其社会阶层，尽管那些人大部分都还是来自社会“上层”。

不过，杰斐逊对于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是终身的。有趣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便是从这一斗争中确定的。根据《联邦宪法》第三条的规定，美国在1790年设立了最高法院，同年2月2日在纽约首次开庭。最高法院享有“终审判决权”。不仅如此，它还享有对宪法的解释权，它可以裁定国会或总统的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因“违宪”而无效，这就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也是最高法院最重要的权力。

美国历史上所谓的“马伯里起诉麦迪逊”一案的审理，便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的具体体现。

威廉·马伯里是亚当斯卸任之前才任命的哥伦比亚特区治安推事，但他没有收到亚当斯总统在任期快满之前几个小时签署的委任状，根据杰斐逊废除亚当斯“午夜任命”的决定，行政当局将未送出去的委任状扣下不发，马伯里和其他3名被扣发委任状的治安推事皆不服。马伯里发现1789年国会颁布的一项法令授权最高法院审理他这类案子，于是他上书最高法院，要求最高法院颁布强制执行令，命令国务卿麦迪逊将委任状发给他们。

在第七届国会开会的第九天，即1801年12月17日，他们将申请提交法院。在亚当斯卸任之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马歇尔，同意下次开庭听取陈述理由。杰斐逊立即抗议说，联邦党人“退守司法界作为他们的据点……他们从那里发难，想打垮和消灭民主共和党人的所有工事”。于是，国会里的许多民主共和党人都对此忧心忡忡。

实际上，马伯里使联邦党人控制最高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

马歇尔能做什么呢？一方面，如果最高法院发出执行令，麦迪逊和杰斐逊很可能不予理睬。最高法院将无能为力，因而它本来已经很低的威望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拒绝发出执行令，法官们便似乎是支持民主共和党的主张，即最高法院无权干涉行政部门。马歇尔会不会签发执行令呢？大多数人认为他会这样做，愤怒的民主共和党人甚至谈起弹劾来了。

1803年2月24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它的意见。意见的第一部分正如人们所预料。马歇尔说，马伯里应该获得他的委任状，麦迪逊应将委任状发给他；有关的法院可以向即使是像国务卿这样的高级官员发出执行令。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出人意料。马歇尔说，虽然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似乎给予最高法院对于像本案一样的案件以初审司法权，但此条款违反宪法第三条，宪法第三条规定：最高法院仅仅对涉及大使或其他外交使节，或以州为一方的案件有初审司法权。尽管这是涉及初审司法管辖权的案件，但马伯里既非一州也非外国使节。马歇尔写道，如果遵循司法条例第13款，我们有管辖权；如果遵循宪法，我们没有管辖权。

接着，马歇尔以更尖锐的方式表述这个问题，即：最高法院应该不应该执行一项违宪的法律？当然不能。宪法是最高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法院不能执行国会的任何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宪法是法律，法官的职责就是执法，因此最高法院法官在解释宪法方面有着最后、最权威的发言权。

这样，马歇尔不仅巧妙地解决了面对的难题，保住了最高法院的面子和

地位，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开创了最高法院判决国会法令是否符合宪法的先例，从而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和干预行政的权力。虽然此后争论一直不断，而且没作明文规定，但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实际上已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正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然而，“马伯里起诉麦迪逊”一案的终结，并没有减轻杰斐逊对最高法院，特别是对马歇尔的仇视，坦率地说，杰斐逊反对马歇尔是政治原因多于宪法原因。

解职也好，罢免也好，这位聪明的政治家仍有意识地化解与联邦党人之间的分歧。他在就任后不久写信给友人霍雷肖·盖茨说：“我们如能正确行事，安抚被称为联邦党人中的诚信之士，并公正地对待那些长期被冷落而未被授予官职者，就可望消除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的分野，或者将二者联合起来。”因而，在政治上，他的策略是和解；在经济上，他的策略是妥协。

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关于偿还国债和保持“全国政府的全部宪制活力”的保证，在联邦党人阵营中引起了欢乐。汉密尔顿原曾预言，他的这位对手将要推行一种顺应时势、而不趋极端的制度。现在他认为，这篇就职演说“实际是坦率地撤回过去的误解，并向社会保证新总统将不致力于任何危险的革新，但在要点上将蹈循前任的旧步”。大体上这正是杰斐逊所实行的。他接管了“正处于成功的实验的高潮”的华盛顿行政机器，但却加进了一种略为不同的原料。

他选任的艾伯特·加勒廷财政部长，出身于日内瓦贵族家庭，年轻时即来到这个乐土之国，在宾夕法尼亚内地森林区独自谋生，依仗个人的品格和才干取得地位，成为众议院内的反对派领袖。他和杰斐逊都把国债视为应当如期清偿的抵押券。加勒廷甚至主张保留对私酿酒类课征的国产税，他从前在宾夕法尼亚地区的选民们原是一直反对这种税的。但是，杰斐逊坚持要清除联邦主义的这一遭人痛恨的遗迹，他的名字因而得以在那些山区流传不朽。这一措施使政府比先前更须依赖关税收入，因此，1812年战争前夕对外贸易停顿，便使联邦财政遭到严重的困难。

过去一直是汉密尔顿理财方法的严厉批评者的加勒廷，如今却无所变更地继续采用那套方法，使汉密尔顿得享荣誉。在亚当斯执政的晚期，曾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财政部长编制并呈交年度报告。这导致了会计方法的改进。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惯常总是由国会向各部拨付一笔总款，任其自由支配使用。反对派很自然地不喜欢这种做法，并曾提议实行零项专用拨款。但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在这方面仍无大的进展。

联邦党人所创立的其他一些制度也被保留下来了。但杰斐逊主张“小政府”，他认为政府应当节简、朴素。他还主张与所有国家开展商业上的往来，但不发展政治关系。和平时期不要军队，只留一部分海军力量来保护海岸和港口。对欧洲大陆的关系，他说：“我不赞成通过签订新的条约把我们与欧洲的争吵联在一起，卷进他们的屠杀中去，保持他们的平衡……我心中的首要目标是我的祖国。”然而很离奇，杰斐逊第一届政府最出色的成就，却正是在战争和外交方面。

经过杰斐逊所称的“纯洁改编”，陆军由3500人减至2500人；国会并于1802年在纽约州奥兰治县的西点设立了军事学院，即后来享誉全美的“西点军校”。民主共和党报纸曾在选举前和选举期间恶毒地攻击海军，称它是

浪费和腐败的臭水坑，是模仿英国，等等。对于船舰一无所知的杰斐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抱有同感的。上一届联邦党人国会原有一项法案，允许总统把为求对法作战而建立的相当大的海军，裁减至 13 艘快速战舰。杰斐逊不仅这样做了，将其余的海军舰只出售改充商船，而且停止建造新舰，辞退所有造船技师，还把保留下来的快速战舰大部分拖曳上岸，以节省薪饷和给养。自然，这些船后来都破碎腐烂了，木船是不能像现代钢铁战舰那样“防蠹珍藏”的。

杰斐逊不但是一位政治领袖，也是一个勤于工作的行政首脑。他在担任总统后明确表示，打算完全掌管政府，负责它的各项行动。他说要做到每天的办公时间很长，密切地关注着行政部门的工作进程。他做事井井有条，要求部下也一样。

上任伊始，杰斐逊就给各部门首脑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将他们一天内所收到的信件，连同他们对信件的答复草稿，一并送给他一阅。当然，他所指的并非日常事务的信件，而是所有需要作出判断的重要信件。由此，他能对各部门的事务了如指掌，并且能在部门首脑向他请示问题时，提出颇有见地的意见。所谓“杰斐逊是个哲学家，对管理政府这种世俗工作不感兴趣”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是他的反对党派制造出来的形象。

由于时时要注意人们对政府有什么要求，杰斐逊不得不仔细地安排时间。他自己形容他每天的行政工作是个“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过程”。他说：“我每天工作 10—12 或 13 个小时，4 小时骑马、吃饭和小憩。”他每天 5 点起床，办理公文到 9 点，然后开始接见内阁成员或有事要与总统商量的其他人。国会议员可以随时来我总统，不需预约。他一般将内阁会议订于中午召开。下午 1 点通常是到外面骑马转一圈，这也是他的主要锻炼方式。3 点半用午餐，有时他请个客人在饭前半小时来找他私下里谈些问题。

他还不得不老守在华盛顿，只能在春天国会休会后回蒙蒂赛洛呆上两三个星期；还有就是每年的 8 月和 9 月，在例行的夏休日里，将总统办公室迁往蒙蒂赛洛，在家里办公。邮政部长安排了一项特别邮政服务，使总统能在两天后即收到华盛顿的情况，一周内即可给予答复。同时，杰斐逊还可随时与各部门首脑取得联系，不论他们人在何处。麦迪逊住在 30 英里以外的蒙彼利埃，所以杰斐逊最亲近的顾问近在咫尺。

杰斐逊从来都是事必躬亲。他有计划地将他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咨文草稿，送交全体阁员传阅，请他们提修改意见，但他决不让哪个顾问来起草初稿。华盛顿总统却不然，他有时给汉密尔顿送去一大包文件，要他写一篇国会的咨文，还找过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给他起草告别演说。

杰斐逊起草国家文件甚至写信全部亲自动笔。他的第一个私人秘书是梅里韦瑟·刘易斯。在任命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时，杰斐逊对刘易斯说，他将成为他的“内阁大家庭中的一员”。刘易斯及其几名后任的秘书，起初的任务是接待来总统府拜访的客人、向国会递送咨文，有时向内阁成员传递机密信件、报告国会议事进行情况以及当副官的其他一些职责。杰斐逊的秘书也曾誊抄过他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修改草稿和其他文件，但是杰斐逊主要还是靠自己写，并用活版印刷复印自己的信件和其他文件副本。复写机器发明出来后，他非常乐于使用，他把自己所写的信都复写一份留底。因此，他为后人、为历史学家留下的记录，比前面的任何一位总统都要详尽。

杰斐逊使内阁成为他总统任期内制定政策的主要机构。他在描述他的管

理制度时解释说：“每天的日常事务由总统与有关部门的首脑商议后办理。如果遇到重大的或棘手的事项，就召集各部门首脑在一起商讨，或是分别找他们面谈，或是书面联系征求意见。”最常用的办法，是将顾问们都找来，召开一次内阁会议，这是不定期的，视情况需要而定。当时的政府不大，各部的办公地点都靠近总统府，所以总统一旦需要就能迅速召集起内阁会议。

杰斐逊的目的是在他的内阁中培养意见一致的气氛。诚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杰斐逊手记中就记载了内阁会议上几次意见分歧的投票情况。不过，同他的前两任总统的内阁相比，这是一个政治观点比较一致的、和谐的集体。作为第一任总统内阁的成员，杰斐逊深知华盛顿政府内部分歧巨大不利于工作。作为副总统，杰斐逊亲眼看到他的前任亚当斯面对的是一个忠于汉密尔顿甚于总统自己的内阁。因此，他迫切希望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团结的政府。而且他的领导作风是说服式而不是命令式的，他的顾问们皆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会遭到报复。事实上，他的4个主要部领导一直同他一起共同工作了8年，唯一的变动是司法部长。

杰斐逊总统利用午餐时间进行他的主要社交活动，以此作为他进行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国会开会期间，他一周举行3次午宴，分批邀请议员（每次约12人），请他们坐在椭圆形桌子的四周，无所谓首长座、荣誉席之类，请他们饮好酒，品尝美味佳肴，以此帮助他体察民情，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

杰斐逊的好客使他常常入不敷出。他的这些招待费用都是从他的25000美元的年薪中支付的。白宫的餐肴由一名法国厨师烹调。就任的第一年，光酒水一项就花了近2800美元，他的家用和办公费用加起来超过了16000美元。到了年底，他不得不借款4000美元来平衡个人预算。然而，这些开支并未使他缩减他的招待，因为他将这种做法看成是管理过程中必不可缺的环节。用餐过后，一般到晚上6点之前，客人们纷纷告辞，而杰斐逊又回到书桌旁，通常要忙到晚上10点。

华盛顿在当时乃是实验节俭政府的一个合适的处所。国会议员们每年在召开国会的那三五个月期间处理公务，不得不把妻子撇在家中，寄居到拥挤的公寓宿舍里来。总统书面咨文取代了每年一度的“宝座致词”。国会两院也取消了致答词。杰斐逊是个鳏夫，他可以不受拘束地树立一套共和主义新礼仪。白宫每天早晨都对所有的来访者开放。

杰斐逊认为总统无需太拘于礼仪，他将华盛顿创立和亚当斯保持的总统礼仪砍去不少。他终止了曾由华盛顿、亚当斯主持的总统正式招待会，屏弃了有关外交礼节的正式规定，因此使外国外交官们很不愉快。他在给他的政府官员的备忘录中写道：“当大家聚在一起时，人人都完全平等，不论是外国人或本国人，不管有无头衔，也不必考虑在不在职。”

一次，英国全权公使安东尼·梅里礼服笔挺、披挂齐全地前来晋谒，递交英国驻美国公使的全权证书。而当时接见他的杰斐逊总统未更晨装，仍穿着敝旧褪色的上衣、红背心和灯芯绒裤，趿拉着一双拖鞋。讲究礼仪的英国公使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当应邀与总统共餐时，梅里看到杰斐逊向国务卿麦迪逊的夫人伸出手臂，而不是挽着自己这位英国公使的夫人请她入座；看到杰斐逊按照平常的做法，让客人在桌旁乱哄哄地自己找座位，梅里简直气疯了。他不知杰斐逊实行的是先到者先入席而不论座次的做法。对这种做法，杰斐逊不仅自己采用，而且还建议阁员们效仿。梅里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大英帝国的冒犯，差点把它搞成一次国际事件。其他外交使团对此也有意见，但

华盛顿自那以后，已变成西方世界最讲究座次的首都了。

对杰斐逊总统的穿着感到震惊的，还不只是外国外交官。普卢默参议员第一次拜访总统时，吃惊地看到“他一身完全是家常便服，一件古铜色旧外衣、红背心、一件旧的灯芯绒衣服和挺脏的一双毛袜，脚上穿的是一双无跟便鞋”。杰斐逊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个人外表的穿着没有国家大事或热情待客重要。

此外，杰斐逊还去掉了不少繁文缛节。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 1790 年 2 月在纽约首次开庭以来，法官们都要穿上深黑和猩红二色的长袍。杰斐逊看不惯这种繁琐且毫无意义的“礼仪”，建议“把那种英国法官看上去像是透过一绺绺乱麻筋向外窥视的老鼠似的丑恶假发扔掉”。

杰斐逊出现在白宫，大大地促进了民主作风的发展。他认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最高的官员一样，都应当受到尊重。他告诫部属，要把自己当作受人民之托的公仆。

杰斐逊还坚信美国的象征就是白天有云彩指引、夜晚有火炬导路的茫茫荒原上的以色列子民。因而，他在 1785 年曾建议在美国国徽上绘制古以色列人的形象，以表明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深信美国是受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因此，他提出了一项开明的规化法律，对外国移民实行“规化”，使他们成为美国人。

此外，杰斐逊还被认为美国民主党的开山鼻祖。

如前所述，美国有组织的全国性政党，是在最初几届联邦政府活动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即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麦迪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

开始，联邦党人在联邦政府中取得了控制权。声称反对任何党派活动的华盛顿，实际上是赞成和支持联邦党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是一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掌握的政府奉行亲英的外交政策，在经济问题上则实行设立合众国银行，由联邦政府十足偿付国债、征收高额进口税等项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遭到了民主共和党的反对。

当托马斯·杰斐逊把伦巴第白杨树引进美国时，联邦党人嘲笑说，这种质地松软、易遭虫害、寿命短的树木，是杰斐逊本人政治生涯的精确写照。其实，用这一比喻来形容联邦党人似乎更贴切。

1801 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当选总统后，民主共和党保持了较强的政治影响，连续 24 年占据了总统职位。

在民主共和党政府期间，美国于 1812—1814 年间进行了第二次反英战争。这次战争胜利后，联邦党由于其亲英政策的失败而瓦解了。这样，美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民主共和党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这就是 1816—1824 年间出现的“和谐时期”。这其中，杰斐逊劳苦功高是无可非议的。

第十九章 大收购

美国扭过身去，背对着大西洋，而将它的脸朝向太平洋了。

——汉斯·科恩

似乎在对外发展关系方面不感兴趣，似乎受到华盛顿总统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杰斐逊在外交方面执行孤立政策。在他看来，美国虽处在一个盛行暴政的世界之中，但它得天独厚，因为海洋把它与暴政的欧洲隔开，这就使得美国这个自由的孤岛有了安全的天然屏障，所以用不着与旧世界发生关系。为了推行孤立政策，他把驻外使节一个一个地召回美国，只剩下驻英法两国的公使。

说也奇怪，杰斐逊任期内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在外交方面，失败也是在外交方面。

杰斐逊任总统时，每年约有 200 万美元，即岁入的 1/5，作为赠款、赎金和贡赋缴纳给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北非国家，以求美国商船能被许可航行地中海。杰斐逊裁减了海军以后，极力寻找有利的途径来使用那些仍留在海面上的战舰。他所找到的就是对抗的黎波里的帕夏。这位帕夏对自己所分得的贡金感到不满足，于 1801 年 5 月对合众国宣战了。这一场海上战争杂乱无章地、断断续续地打下去，直到 1804 年，才由舰队司令爱德华·普雷布尔率领以美国旗舰“宪法”号为主导的一支相当大的特遣舰队，在的黎波里附近的海面上，对帕夏的战船进行了一系列的炮轰。在普雷布尔到达之前，快速战舰“费拉德尔菲亚”号在的黎波里附近触礁搁浅，被敌人将它拖曳起来弄走了。帕夏囚禁了班布里奇舰长和舰上的人员，并打算将这只战舰装备起来，用以补充他自己的海军。但是，斯蒂芬·德凯特上尉夺乘一只名为“无畏”号的双桅三角帆船，趁黑夜驶入港内，登上“费拉德尔菲亚”号，将它掳获并纵火烧毁后，安全逃走。

在这次战争中，德凯特还另有许多英勇事迹。但最了不起的一件功勋，是美国驻突尼斯的领事、前陆军军官威廉·伊顿所建立的。

伊顿非常憎恨那些满身恶臭的海盗王公，他认为美国采取封锁和炮击的策略万难奏效，便说服驻地中海区的美国海军司令，对当时流亡在埃及的一个的黎波里“王位”觊觎者的事业加以支持。伊顿将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口城市纠集了一支队伍，其中包括一名美国海军少尉试补员、1 名海军上尉、14 名水兵和海员、40 名希腊人，以及一队由当地酋长率领的、纠集了 100 名乌合之众的阿拉伯骑兵队，还有一支骆驼队。在他统率下（并由他出钱）的这支杂凑的远征军，横越利比亚沙漠，行军 500 余英里。尽管遭遇重重困难和阿拉伯兵士的哗变，还有那个王位觊觎者的背信弃义，但他们终于设法抵达德尔纳。于是，百折不挠的伊顿在 3 艘美国双桅战舰配合下，率众进攻并占领了该城。他的这一功勋，导致美国同的黎波里缔结了一项有利的条约，负责谈判的是被俘的班布里奇舰长。而伊顿和争位的帕夏都被屏弃了。对杰斐逊深感痛恨的伊顿，被联邦党人当作“义士”而大加“捧抬”，这乃是历史上颇为常见的一种政治手法。

杰斐逊在第一任期内最辉煌的业绩，便是购买了路易斯安那。

当时的路易斯安那是一个“荒野乐园”，只稀疏地住着几千个印第安人和少数强悍的白人，风景优美，资源丰富。自 1763 年和约以来，路易斯安那

就一直处在西班牙主权统治之下，只有不到 1% 的地区有移民定居。克里奥尔人连同他们的奴隶，在 1800 年时约共有 4 万人，集中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两岸，在河的西岸新奥尔良和圣路易斯之间，有几处卫戍要塞和贸易据点，雷德河岸边还另有几处，其余的地方都被印第安人占有着。甘蔗和棉花新近已从西印度群岛引进来。1800 年 10 月，这片广阔的领地易主，根据一项密约，拿破仑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了路易斯安那及邻近的佛罗里达。此项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用一个新的法属北美殖民帝国来取代加拿大，并阻遏合众国的扩张。

这块土地的门户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新奥尔良，而密西西比河则是美国西部商业的生命线。谁控制新奥尔良及密西西比河，谁就可以决定美国西部居民的命运。由于西班牙国势衰弱，美国西部人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利用这条河与外界做生意。但是假如新奥尔良落入强国之手，美国就马上受到威胁，贸易就将受到种种限制。

所幸法国并未立即接管路易斯安那，对领地易主的条约保守秘密达一年多。

当杰斐逊在 1801 年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路易斯安那易主一事的真相，对法国仍充满了友好的感情。5 月，杰斐逊对路易斯安那易主之事已有所耳闻。这个使人为难的“谣言”一下子打破了杰斐逊孤立的美梦。而更加令他心烦的原因，是杰斐逊曾坚信在一个适当的时期，美国将以某种方式至少把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从西班牙的衰微的主权中承继过来。然而，风云突变，波拿巴的不祥的阴影已经突然落在“希望之乡”上。

杰斐逊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立刻商讨对策。他们的设想是，假如法国已经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就从法国购买；假如法国没有得到它，就从西班牙购买。杰斐逊指示驻西班牙的新公使查尔斯·平克尼和在法国的罗伯特·利文斯顿去摸底，弄清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到底订立了什么协议，如果法国人还没履行该协议，就要设法说服他们不要履行。杰斐逊采取的是间接建议的方式，来劝阻波拿巴对路易斯安那的占领。

到 1802 年春，杰斐逊政府确信，尽管法国人一再否认，但转让路易斯安那之事即将进行。于是就加紧了外交活动。在给美国驻巴黎公使利文斯顿的私人信件中，杰斐逊总统回顾了法美之间的友谊，他现在看到友谊正受到威胁。“地球上只有一块地方的占有者是我们的天然宿敌，”他写道，“那就是新奥尔良……法国让自己站到了那个大门口，这是对我们的挑战。”虚弱的西班牙或许可以不声不响地占有新奥尔良数年，但“法国与美国在这样敏感的情况下相遇，是不可能继续保持它们的长久友谊的。法国占领新奥尔良之日，就是我们与大不列颠和大不列颠舰队联合起来之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发展海上力量”。杰斐逊生怕这一外交策略同政策声明有所混淆，所以特别挑选了一个让他信得过的信使。

皮埃尔·杜邦是驻在美国的一个法国籍火药制造商，从杰斐逊在路易十六王朝担任驻法使节时，他们便认识了，后来，当杰斐逊当上总统时，杜邦一语双关地对他说：“你一生中只有一个 viceo，现在你终于丢掉了它，为此我向贵国以及东西两半球表示祝贺。”当时杜邦正因事要到法国去，杰斐逊便托他带给利文斯顿的信，在封口之前允许杜邦看了信的内容。

vice 意为“缺点”、“罪恶”等；又可用作构词成分，意为“副职”。

这位新总统决意不让法国占领刚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的路易斯安那。他对杜邦这样说：“……要使法国政府知道他们占据路易斯安那必将引起的后果。”杰斐逊对国家前途的整个政治见解围绕着这样一个信念：美国的民主与繁荣取决于自由民移居自由土地的能力。西部，包括路易斯安那，就是这个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上述准则，杰斐逊早就拟订了《1784年土地法令》，从而打开了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开拓扩展的大门，划出即将予以自治权的10块较大的区域，并规定，其中任何区域，只要它的人口同原来13个州中最小的一个州的人口相等，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州。

杰斐逊指望杜邦把信的内容转告法国势力的人：塔列朗或者波拿巴本人。杰斐逊公开表示，“我在此表示，割让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对我们来说将只是一种姑息手段，我相信不过如此而已”，但这件事总有一天会给法国招致一场被消灭在海上的灾难性战争。当然，外交辞令仍旧要讲，在信的末尾，杰斐逊也说他的政府对塔列朗怀有最友好的感情。

杜邦在启程去法国的时候写信给杰斐逊，提议由自己去同法国磋商，把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让给美国，交换条件是保证法国永远占据密西西比河西岸，并且帮助法国在下一次同英国的战争中夺取加拿大；或者他还可能向法国提出购买新奥尔良——这比起利用战争手段来，对双方都有好处。

到此为止，杰斐逊的路易斯安那外交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发生了另一件事，几乎逼得他摊牌。1802年10月18日，西班牙驻新奥尔良总督取消了美国商人的“存栈权”，即美国商人在新奥尔良存放货物的权利。这种特权在1795年平克尼所签订的条约中，仅获得为期3年的保证。但是，俄亥俄河流域的居民，每年要在新奥尔良转运价值100万美元的农产品，他们认为已可永远享有这种权利。因此在西部，群情激愤，怨声载道。反对派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杰斐逊是11月下旬得知这一消息的。他仍然保持镇定。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和路易斯安那州长对美国方面解释说，这是新奥尔良行政长官未经授权擅自作出的决定，其后，这一命令来自马德里。麦迪逊国务卿立即发快函，指示驻马德里的平克尼去通知西班牙政府：“无论此举源于何处，总统希望西班牙政府不失时机地予以取消，并毫不犹豫地修复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麦迪逊给驻巴黎的利文斯顿写信的语气更加好斗，他说已有或很快就有“2万民兵出现在密西西比河水域；他们一得到警报，全都会立即行动起来，搬掉阻拦出海的障碍。他们全都认为，自由使用该河流是天赋而不能取消的权利，并且知道他们有能力可随时去实行”。

杰斐逊在1802年12月致国会的第二个国咨文中，丝毫未提这些外交活动。在路易斯安那将会让给法国的问题上，杰斐逊只说了一句话，这一事件将会“使我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发生变化”；而对不让在新奥尔良存放货物的危机问题，他则连提也没提。难怪失望的议员们都同意汉密尔顿将咨文称为“催眠曲”的说法。众议院立即通过决议，要求总统提供有关新奥尔良被关闭的文件。联邦党人更是大声疾呼，要求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任何措施，来对付在新奥尔良出现的问题。

杰斐逊反对在争取谈判前就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如此，他的政府还是在悄悄地进行军事准备。陆军部长迪尔伯恩加强了防务，在西班牙属地边境以北、密西西比河上的亚当斯堡，集结了4个步兵团和3个炮兵连。密西西比准州州长威廉·克莱本称，2000名“组织良好”的民兵正在纳齐兹待命，并

说 600 名民兵即可拿下新奥尔良。

1803 年 1 月 11 日，杰斐逊为回答联邦党人调门越来越高的批评和缓和民主共和党支持者的情绪，向参议院提名任命詹姆斯·门罗为特使，赴法国和西班牙谈判解决这些爆炸性问题。杰斐逊写信给门罗说，虽然提名他出任特使一事未同他事先商量，但交给他的任务是不能拒绝的。

参议院内的联邦党人虽然表示反对，但仍以 15 票对 12 票迅速确认了对门罗的任命。杰斐逊很担心联邦党人利用路易斯安那危机，来获取国内的政治资本。他在写给门罗的信中说，联邦党人的目的是：“只要有可能就迫使我们进入战争，想打乱我们的经济，如果办不到，就去拉拢西部地区，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以期重新掌权。”门罗在西部很受赞扬，还受到各地民主共和党人的信任，因此最适合于担任此项工作。杰斐逊的言行使门罗无法拒绝，于是打点行装匆匆赶赴巴黎。

在此之前，杰斐逊已得到消息，法国愿意进行协商谈判。杜邦曾为杰斐逊把那封 1802 年 4 月 18 日措词强硬的信带给利文斯顿，他看到信中充满了威胁口吻，于是立即建议美国何不在拿破仑取得路易斯安那以前，就提出给他一笔钱来诱他出售新奥尔良和西佛罗里达。其实，杰斐逊和麦迪逊早就想买西佛罗里达了，曾指示利文斯顿去摸底。杜邦在法国呆了 6 个月之后，再次提出他的方案，并且提出 600 万美元的具体数字作为开价。杜邦甚至还附上了一份拟议条约的简要草案。

杰斐逊在决定派遣门罗赴法的 10 天之前，即 1802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杜邦的信。在批准门罗使命的同一法案中，国会拨款 200 万美元，作为“支付合众国与外国交往时的费用”。其实，这次拨款是为了谈判购买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的，但这只是在秘密会议上才有所透露。3 月 8 日，总统委派詹姆斯·门罗为特使前往法国，随身携带着对他和驻法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的有趣的训令。

首先，他们将可在 1000 万美元的限度内任意出价，以购买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这样就会使合众国拥有密西西比河的整个东岸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东部地带。如果法国拒绝，则应出价此限额的 3/4，仅仅购买新奥尔良岛，或者购买东岸之地，以供建立一个美国港口。如仍不得手，则必须施加压力，以求对航行权和存栈权作出永久性的保证。这乃是杰斐逊的最后通牒。若遭拒绝，门罗和利文斯顿奉命应即“同英国政府的公使进行秘密接触”，以期“与大不列颠取得坦率的谅解和较密切的联系”；互相约定不同法国单独媾和，将不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甚至超过了汉密尔顿曾经大胆提出的建议！

在门罗动身以前，利文斯顿已开始了谈判，但经过一段时间却几乎毫无进展。然而，1803 年 4 月 11 日，当利文斯顿去求见法国那位外交部长、准备重提他照常的出价以购买新奥尔良时，塔列朗突然问道：“对整个路易斯安那你们愿意出多少钱？”这话使利文斯顿这位耳背的、毫无思想准备的美国人吓了一跳，差点从椅子上滑倒，以为自己又听错了。

其实，利文斯顿并没听错。就在那天早上，拿破仑召见他的财政部长巴贝·马布瓦，对他说他决定向美国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拿破仑在收回圣多明各的努力失败后，已放弃在美洲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帝国的想法，他估计不久将与英国开仗，而路易斯安那是最易受攻击的。此外，他的国库枯竭。因此，与其让路易斯安那落入英国手中，不如卖给美国，既做了个人情，又

可以得到一笔钱，充实战时国库。当时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拿破仑放弃路易斯安那，那就是拿破仑 1800 年向海地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大举派兵 35000 人，次年几乎全军覆没——图桑·卢维吐尔领导下的黑人，打死了那些侵入内地的法军，突如其来的黄热病则消灭了其余的人。没有伊斯帕尼奥拉岛，路易斯安那就大大丧失了它对于法国的价值，不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抵抗英国。

法国的善举对杰斐逊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他说：“我没有指望他（拿破仑）能够让步，除非法国和英国打起仗来；我的希望是姑息和忍耐，假如罗斯·莫里斯先生（联邦主义者在国会的发言人）等人在事变——就是说，一次新的欧洲战争——发生之前不过早地强迫断交的话。我相信那个事变不会过很久就发生，但我承认我没有想到它会来得如此之早。”

但是利文斯顿说，美国政府只是希望购买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而塔列朗表示，法国只愿意出卖整个领土，而不愿单独出卖新奥尔良。翌日，门罗到来，又开始谈判。4 月 30 日，双方草签了协定，美国出 6000 万法郎得到路易斯安那，并赔偿法国的损失 2000 万法郎，最后总共以 1500 万美元成交。条约于 5 月 2 日签字。转让给美国的土地以西班牙让与法国时的边界为准，佛罗里达并不包括在内。但是新条约对界限规定十分模糊，怪不得有人怀疑拿破仑是想让美国同西班牙发生冲突。

这一倘来之喜，没法不让杰斐逊总统高兴，一夜之间得了这么大一块土地，简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条约签字的消息于 1803 年 7 月 3 日传到华盛顿，《全国通信者报》首先在第二天宣布这一功绩。该报后来又报道说，7 月 4 日“对总统来说是值得骄傲的日子”，他受到“万民拥戴，欢呼这一事件将成为一项最辉煌的业绩载人史册”。利文斯顿在条约签字后，马上通知杰斐逊总统，劝他督促国会立即批准这项协议，以免拿破仑后悔变卦。

但是，美国历史上这笔最大的交易——购买路易斯安那，却给宪法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难题，因为宪法并未言及获得外国领土之事，更没有期许这种领地日后建州。杰斐逊全力以赴，要使《路易斯安那条约》获得批准和执行。他认为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有一重大障碍：“大政府拥有的只是宪法给予的权力；而宪法没有给予它拥有外国领土的权力，更谈不上将此领土并入联邦之权。”

杰斐逊开始认为要将路易斯安那并入美国，必须有个宪法修正案，他立即为此起草修正案。但当利文斯顿向他提出拿破仑可能会改变主意的警告时，杰斐逊觉得言之有理。他想，通过修正案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万一中途节外生枝，岂不是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吗？

于是杰斐逊决定对宪法采取一种广义的解释，认为由于情况特殊，国会可以不必通过修正案即可采取行动。事实上，当时参议院的对阵形势对民主共和党是有利的，1802 年的中期选举之后，两院中民主共和党人的队伍更强大了。1800 年人口普查后有了新的席位分配，俄亥俄加入联邦后，众议院内民主共和党人占 103 席，联邦党人只有 39 席；参议院内民主共和党人有 25 席，联邦党人只有 9 席。有关路易斯安那的条约和协定于 10 月 17 日提交参议院，3 天后，以 24 票对 7 票得到批准。联邦党内只有 1 人同 23 名民主共和党人一起投赞成票批准条约。

总统在年度咨文中要求议员们马上行动，准备执行这一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去占有路易斯安那和组成临时政府，将它并入联邦。参议院批准条约后，1803 年 10 月 20 日立即与法国公使进行了换文，第二天总统

就要求国会制定必要的授予权力的立法。180年12月20日，在新奥尔良举行仪式，法国正式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

路易斯安那的获得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当时在美洲大陆流行的理论：“欧洲的灾难是美洲的利益。”

将路易斯安那并入美国不仅需要授予权力的立法，而且还需要组织大量的行政活动。在接管8000人的新奥尔良城市时，美国不得不将整个外国人口以及法国人与西班牙人创立的行政结构也一并接受下来。杰斐逊在得知购买到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后就说：“我们肯定要努力在那里推行美国的法律，除了将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起带头作用美国人迁往那里居住外，别无他法。”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要尊重非美国居民的愿望、权利和传统习惯，因此于1808年认可了《奥尔良准州现行民法汇编》。该汇编将法国和西班牙的民法传统都编入了路易斯安那法。这一妥协换来的是，在路易斯安那居住的移民承认了美国的永久统治。

购买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杰斐逊总统又派科学探险队到西部从事科学考察。这又为美国西部开发铺平了道路。

路易斯安那的边界不清楚，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情况也无人知晓。早在1802年11月下旬，杰斐逊便询问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卡萨·伊鲁霍侯爵，如果国会主要为了增进地理知识，批准派人去探险调查密苏里河流向，他的政府会不会反对。伊鲁霍对总统说，这种探险活动“肯定会使”他的政府“感到不快”。实际上，西班牙对美国可能进一步向西部扩张的意图已有所警觉。

尽管西班牙没有同意，杰斐逊还是加紧实施他的计划。1803年1月18日，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秘密咨文，要求拨款2500美元，资助一支小型探险队去调查密苏里河的源头和寻找可与密苏里河联运的、流向太平洋的河流。他在咨文中强调这是为了扩大与印第安人的贸易，并建议为了不引起注意，国会可以说该款系用于“扩大美国对外贸易的目的”。国会悄悄地通过了这个请求，总统于1803年2月28日签了字。

向国会提出这个请求之前，杰斐逊曾跟自己的私人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讨论过这一计划，因此他立即任命这位28岁的陆军上尉领导这次探险活动。杰斐逊选中刘易斯当他的秘书，部分原因是他们都住在阿尔贝马尔，相互认识，另外是因为刘易斯对美国西部地区的情况很了解。

国会批准后，刘易斯立即着手准备，收拾了旅途所需的给养和装备，还请威廉·克拉克中尉来共同领导，答应总统授予他多少权，克拉克也就有多少权，完全平等。杰斐逊本来一直对横贯大陆的远征颇感兴趣，这次他亲自编写了详细指示，并于1803年6月20日签了字。

1803年10月，美法两国签订的《路易斯安那条约》得到参议院批准。第二年春，刘易斯和克拉克才出发溯密苏里河而上。又过了一年，到1805年，杰斐逊才收到他们直接写来的第一批进展情况报告。

路易斯安那并入美国一事受到公众的普遍赞扬，杰斐逊对自己未卜先知地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去探索一大片尚无人知晓的土地很为得意，这些预示着即将在1804年大选中接受工作审查的政府获得成功。

远征队的第一个目标，乃是要在合众国领土内寻找“横贯本大陆的水道”。亚历山大·麦肯齐早在1793年，就已在加拿大领土上进行过这种探

苏格兰探险家，曾于1789年率领探险队，经陆路向西探查北美大陆。

查。他从阿萨斯卡湖上溯皮斯河，越过不列颠哥伦比亚（即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大陆分水岭，由狄安海峡进入了太平洋。刘易斯和克拉克两人此行另外的目的，是要取得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领有权，并使苏族和其他部族的印第安人获得印象，相信他们的“伟大白人父亲”住在华盛顿，而不是住在温莎（英国王室所在地）。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业余科学家，并且熟知怎样对付印第安人。

探险队终于在 1804 年 5 月 14 日从圣路易斯出发，全队有 32 名士兵和 10 名平民，共乘一只 55 英尺长的平底船和两只独木舟，扬帆摇桨，上溯密苏里河，远抵今蒙大拿州境内的南福克。9 月里在特顿河口，他们悍然面对一群易怒的苏族印第安人，设法通过了那个地区。1804—1805 年那个冬季，他们是在北达科他的曼丹族印第安人中间度过的。1805 年 6 月，他们在大瀑布以北割制了一批独木舟，乘坐着它们抵达今爱达荷州境内的落基山麓。在这里，他们的译员、斯内克族印第安人少女萨卡贸韦亚，同肖肖尼族印第安人进行了友好的接触。这些肖肖尼族印第安人，还给他们提供了乘骑用的马匹和驮运行李的印第安妇女。大队人马穿过莱姆亥山口北行，直下比特鲁特河谷，进入内班塞族印第安人地区，到达了向西流去的克利尔瓦特河，它是斯内克河的一个虽然湍急、但可通航的支流。他们在这里又割制了一些独木舟，驶入哥伦比亚河，克服了险岩和急流的重重难关以后，于 11 月 7 日到达潮水区。克拉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宿营地上群情欢腾，我们望见了……这么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渴望看到的、这个雄伟的太平洋。”他们在雄伟的太平洋浪涛喧啸可闻之处，修建了克拉特索普堡，在这里度过了又一个冬季。

这儿沿岸一带的印第安人使用着一些短语，如“投下铅锤”（行船测水深时的用语，在俗语中转义为“装病”或“吹牛”）和“狗娘养的”（新英格兰粗鲁水手的谩骂语）之类。刘易斯和克拉克由此得知，新英格兰的贸易船曾经到过哥伦比亚河。因此他们希望能乘上这样的船回家去，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不见有船到来，探险者们于是决定由陆路回去。刘易斯走了较短的一条路，从今天蒙大拿州密苏拉所在之处前往大瀑布。克拉克则循原路返抵密苏里河的三个岔口（他曾把这三个地方分别命名为杰斐逊、麦迪逊和加勒廷），登陆取捷径到达黄石河，由此顺流而下，驶过被他命名为庞贝塔的、景色如画的台地，抵达黄石河与密苏里河汇合处，即今天的尤尼恩堡所在地。在这里，刘易斯和克拉克会合，探险队于 1806 年 9 月 23 日返抵圣路易斯。此行仅有一人丧生，而且不曾同印第安人发生过一次战斗。

杰斐逊对于他们的报告、行动和带回华盛顿来的实物感到高兴，随即任命梅里韦瑟·刘易斯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总督。他们并未找到横贯落基山脉的水道，因为根本没有那样一条水道。但是，他们所发现的那些陆上的和河上的通路，对日后的拓荒者们很有帮助。他们在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方面，则是令人赞誉不尽的。

探险工作始于 1804 年 5 月，结束于 1807 年 1 月 10 日。探险行程达 9000 英里。刘易斯把探险的经历及成就写成报告，数年后出版，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此外，杰斐逊还派泽布伦·派克深入密西西比河的河源，后来又西南地区进行勘探。在西南地区，派克绘制了落基山脉的地图。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第 33 任总统哈里·杜鲁门的女儿根据杜鲁门生前的口述，编了一本题为《更多的直言》的书。其中谈到杜鲁门认为的美国历史上 8 位最伟大和 8 位最差的总统。杰斐逊被列为“最

伟大的 8 位总统”之第二位，次于华盛顿，其评价是：“敢于做该做的事，比如尽管有许多反对意见，他仍然决定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那么，当时的这个路易斯安那究竟有多大呢？它大致包括了现今的阿肯色、密西西比、文奥瓦、俄克拉荷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兼现今的路易斯安那、明尼苏达、北达科他、科罗拉多、蒙大拿、怀俄明的大部。

路易斯安那的购入使美国的领土由 1790 年的 80 万平方英里增加到 260 万平方英里。从密西西比河口到落基山脉，到处飘扬着杰斐逊的星条旗，州的数目当时已是 16 个（最初有 13 州，加上 1791 年佛蒙特加入联邦，1792 年肯塔基加入联邦，1796 年田纳西加入联邦），路易斯安那领土的一部分又组成了俄亥俄州（1803 年加入联邦）、路易斯安那州（1812 年加入联邦）。由此，州的数目增加至 18 个，另还有 5 个地域，它们是密歇根地域（1805 年组成）、伊利诺伊地域（1809 年组成）、印第安纳地域（1800 年组成）、密西西比地域（1798 年组成）和奥尔良地域（1804 年组成）。其中前 3 个地域是自西北地域中分解出来的。

美国领土的扩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生活面貌的改变。1790 年，美国的定居地带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人口总数仅为 392 万余人，其中 94% 定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山脉以西的人口只有 22 万人。1800 年，美国人口已增加到 530 万人，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已增加到 63 万，由于路易斯安那的并入，1810 年，美国人口激增至 723 万，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增加到 150 万了。与此同时，农业基地扩大了，市场扩大了，自然资源增加了，这就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蓬勃发展，使它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为头等现代化工业强国。

关于这次购买的无尽益处，杰斐逊自有他的说明：

“密西西比河及其水系的财产权和主权，不但为西部诸州的产品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出口，及一条贯穿整个河道的不受控制的航路（这条航路可以避免与其他强国发生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我们和平的威胁），而且这片土地的肥沃、它的气候和地域的广阔，在适当的时候肯定对我们的国库是一个重要的帮助，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充足的粮食，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之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场地。”

杰斐逊还在 1803 年底写信感谢杜邦：“祝贺你能在有生之年，在为千百万未出世的人们造福的一笔交易中作出贡献。这笔交易将使地球上的一部分区域变得辽阔广大，我指的是当今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土。”

路易斯安那的购人是美国扩张领土的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美国西扩的“里程碑”。美国历史学家丹纳在《美国历史中的边疆问题》一书中，给予杰斐逊的这一“功绩”高度评价。他说：“路易斯安那的购入，使密西西比河流域获得了政治上的完整，其后果是意味深长的。它是美国摆脱与外国订立纠缠不清的同盟的羁绊、作为世界强国采取独立事业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从此以后的西扩，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灭顶之灾。在他们的故乡——路易斯安那的大平原上，美国进行的向西扩张过程，便是对印第安人的强暴、屠杀、欺骗、掠夺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美国早期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

“先生，太平洋才是我们的天然边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弗朗西斯·贝利斯在 1823 年说，“西进的人流如汹涌澎湃的浪潮涌向太平洋，势不可当，浩瀚的太平洋才是我们的广阔领土的界限。……教给荒野生活的真谛，

使科学的光芒照射荒野，将福音传播给荒野，这一切不违背上帝的戒律；野蛮人在大片荒野上游荡，他们从未开垦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因而占领这些土地不是侵犯人权。……从万能者的宝座流淌下来的福祉之溪不应该受到阻碍。”

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形象地总结说：“美国扭过身去，背对着大西洋，而将它的脸朝向太平洋了。”

第二十章 如影随形

我母亲在法国逗留了 18 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母亲成了杰斐逊的情妇。

——麦迪逊·赫明斯

杰斐逊和所有的名人一样，享受不了所谓的隐私权。他的私生活总是成为人们乐于争论的话题。

托马斯·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在首都华盛顿就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风言风语：杰斐逊有几个奴隶长得非常“像总统本人”。这些传闻都和杰斐逊的一个黑女奴有关，她就是萨莉·赫明斯。

萨莉·赫明斯是杰斐逊岳父约翰·威利斯家的一个家奴——贝蒂·赫明斯的女儿。她父亲便是约翰·威利斯，同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实质上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但她的母亲是奴隶，她也就是奴隶，并只能随母姓。

玛莎·威利斯·斯凯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结婚 18 个月后，她的父亲去世了，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135 个奴隶，其中包括贝蒂·赫明斯和她 12 个孩子中的 10 个。这些奴隶大都成为杰斐逊家受宠的奴仆。贝蒂·赫明斯 1775 年搬到蒙蒂赛洛，就在那一年又生了一个儿子约翰，据说孩子的父亲是约翰·内尔森——蒙蒂赛洛的白人木匠。1777 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露西，这个女儿的父亲是一个奴隶。她的孙子麦迪逊·赫明斯说，外婆“与白人男子生了 7 个孩子，另外 7 个是与有色人生的，总共 14 个”。

萨莉随母亲贝蒂·赫明斯搬到杰斐逊家时才 9 岁，“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简直近乎是一个白人”。

她们俩一起接受了照顾杰斐逊病痛缠身的妻子玛莎·威利斯·斯凯尔顿·杰斐逊的任务。萨莉成了家庭病房的管理者。一听到那个“叮叮当当的银铃”的响声，萨莉就在家四处奔跑，传递各种信息。这个铃子在赫明斯家人手里传了四代之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送给哈佛大学保存了起来。

萨莉 14 岁时，已显示出一种发育成熟的美来。1787 年 6 月，她陪着杰斐逊的小女儿波丽越洋跨海，千里迢迢到巴黎寻父。

也即在 1787 年 12 月，杰斐逊向他爱慕的女人玛丽亚说了再见，但是他却为与玛丽亚通奸而深感内疚和不安。他迷惑，他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停止去爱她、需要她。现在，与他同一个屋檐下，又出了一个迅速成熟的年轻少女，不仅漂亮、聪明伶俐，还善解人意，代表了在杰斐逊小时候所有的诱惑和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离开亲人的小姑娘萨莉在巴黎时的确感到孤孤单单，而她每天又都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男人对所有女人来说都是十分体贴和有骑士风度的。对任何蒙蒂赛洛的童奴来说，杰斐逊严然是上帝的化身。由于她的父亲约翰·威利斯在她出生时便死了，对她来说杰斐逊兴许是她所知道的最接近于他父亲那样的人。有趣的巧合是，杰斐逊还有一个重要的榜样，那就是他的岳父约翰·威利斯在他的 3 个白人妻子死后，便爱上了一个女奴。而萨莉同样有一个榜样，那是她的母亲贝蒂·赫明斯，她显然左右着约翰·威利斯的私人生活和感情，直至他去世。

萨莉·赫明斯何时开始成为杰斐逊特别注意的对象呢？一种说法是，1788 年 3—4 月他到法国、德国和荷兰的 7 周旅行时就有了迹象。当他 1788 年 4 月 23 日回到巴黎时，杰斐逊收到玛丽亚·科斯韦写给他的愤恨交加的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萨莉的出现无疑成了一种“补偿”。

萨莉刚到巴黎，杰斐逊便给她买了新衣服，全身上下焕然一新。1787年11月6日，杰斐逊又花了240法郎为萨莉接种牛痘苗，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在萨莉到达巴黎之后不久，杰斐逊为她雇了一个法语家庭教师，至少教了她20个月。从1788年1月起，杰斐逊开始向他的奴仆开工资，24法郎一个月，元旦节另加12法郎作为礼物。萨莉那个月得到了36法郎。但随后直到1788年12月，她才又按月得到工资。1789年4月，杰斐逊开始为萨莉的衣服花大笔的钱。

杰斐逊外出时是否给萨莉写过信？迄今为止，从杰斐逊43年的书信集中没有发现任何杰斐逊与萨莉之间的通信。涉及1788年的一册丢失了，这是唯一丢失的一本，因此怀疑有人是否有意将杰斐逊与萨莉之间的信件毁掉了。

在杰斐逊的《农场帐目》上，记录在萨莉·赫明斯名下的有5个孩子，其中4个有详细的出生情况：“贝韦利，1798年；哈丽亚特（第二），1801年；麦迪逊，1805年；还有埃斯东，1808年。”至于记录在案的哈丽亚特第一是否是萨莉的孩子，却不敢十分肯定。

这一认为杰斐逊是这些孩子的生身之父的公案，是基于以下几点判断的：

首先，这本《农场帐目》没有按正常情况提到这些孩子们的父亲。

第二，哈丽亚特出生于1801年5月，而埃斯东生于1808年5月，这两个时间都碰巧是杰斐逊每年8月定期在蒙蒂赛洛度假的9个月之后。

第三，麦迪逊生于1805年，也正好是杰斐逊到蒙蒂赛洛参加他女儿波丽的葬礼之后9个月。

麦迪逊和埃斯东分别被送到萨莉的哥哥那儿去当木匠学徒，他是杰斐逊的木匠头头。哈丽亚特成了一个很得宠的家奴。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他在遗嘱中给了麦迪逊、埃斯东和萨莉的哥哥——约翰·赫明斯以自由。杰斐逊逝世时，萨莉·赫明斯53岁，她从此在所有的文件记录中销声匿迹。

麦迪逊·赫明斯娶了一个奴隶的女儿，并且在俄亥俄州工作，他成为黑人社会中一个受到公众尊敬的成员。他的姐姐哈丽亚特和哥哥贝韦利则搬到华盛顿去了，他们都和白人结了婚，作为白人社会的成员而生活着。弟弟埃斯东和麦迪逊差不多，娶了一位黑人女子，生了3个孩子，并且在搬到威斯康辛州后不久就去世了。

麦迪逊·赫明斯详细地记录了他母亲和杰斐逊之间的关系：“我母亲在法国逗留了18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母亲成了杰斐逊的情妇，当杰斐逊被召回家（国）时，她已经怀孕了。他希望把我母亲带回弗吉尼亚，但她拒绝了。她刚刚开始懂得法语，在法国她是自由的，如果她返回弗吉尼亚，她将重新变为奴隶。因此，她拒绝了和杰斐逊一同返回美国。为了劝她回国，杰斐逊答应给予她非同寻常的特权，而且庄严地发誓——她的孩子将在21岁时获得自由。由于杰斐逊信誓旦旦，而她也深信不疑，于是她和杰斐逊同回弗吉尼亚。刚到家不久，她就生产了，托马斯·杰斐逊便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实际上，萨莉·赫明斯在巴黎住了差不多26个月，而不是18个月。萨莉出生于1773年，她到法国时正值14—15岁之间，回到弗吉尼亚时是在16—17岁之间。

关于女奴情妇的故事，首先由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在其1802—1803年的《里士满纪事》一书中详细披露。随后几年中，联邦党人的报刊也回应

关于杰斐逊在蒙蒂赛洛有“有色孩子”的说法。

卡伦德被称为一条“反咬主人的狗”。他专挑别人的毛病，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癖好。此人开始是在英国诽谤乔治三世，受到指控，便于1793年逃到美国，很快和雅各布·克林曼结了婚。1797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民主共和党人加入到杰斐逊的阵营中。他谴责华盛顿是个“秘密的叛徒”，谴责亚当斯是“流氓”。1800年，他因造谣中伤而被判刑。在监狱中，他偶然看到杰斐逊曾有一个黑奴情人的消息，于是出狱后他便四处走访，收集各种材料。从杰斐逊的邻居处，他得知杰斐逊与萨莉有5个孩子，而且大儿子汤姆“据说与杰斐逊如出一辙”。就这样，他的书问世了。将杰斐逊的“私情”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使杰斐逊极为难堪和被动。

卡伦德刚到美国时，失魂落魄，穷困潦倒。杰斐逊曾接济过他，认为他有才。后来，卡伦德便从杰斐逊写给他的信中摘取片言只语，说杰斐逊如何如何称赞他，还给他钱花。而卡伦德此前还竭力调查和披露有关汉密尔顿和雷诺兹夫人的“私情”，以致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样一来，公众便得出印象，作为副总统的杰斐逊花钱雇卡伦德这样一个“鸡鸣狗盗”之徒来揭露汉密尔顿的丑闻，这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件事让杰斐逊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卡伦德还没完没了地披露杰斐逊的“绯闻”。他称“萨莉一共生了5个混血儿，如果弗吉尼亚8万个白人男人都以杰斐逊为榜样的话，弗吉尼亚将多生出40万个混血儿”。

杰斐逊对报纸上所刊登的关于他“丑闻”的文章一概不予理会，这是他从汉密尔顿的经历中学到的经验。汉密尔顿在其与雷诺兹夫人的绯闻披露出来后，便竭力辟谣、否认，结果自己掉进了一张硕大无比的蜘蛛网，越是想挣脱，蜘蛛网越是纠缠得紧。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说不清。杰斐逊已明白这个道理，他对朋友说：“我从不对报纸的评论做任何答复……因为一旦答复了一个问题，又会新出现20个问题。”尽管有人把杰斐逊的沉默当成他有罪的证据，认为他是在默认，但这也比与蜘蛛网去做徒劳的抗争强得多。

杰斐逊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从未对与萨莉的事做具体的否认，也未做出过任何直接回答。因此，他成为其私生活被政敌用来攻击的第一位总统。

关于萨莉的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禁区，惟恐有损杰斐逊的形象。但黑人历史学家却接受这个故事是真的、属实的，他们将他视作英雄，因为他与其黑女奴有暧昧关系。

有的人甚至说杰斐逊的一个黑人情妇和两个与奴隶所生的女儿在新奥尔良被卖。这是威廉·韦尔斯·布朗的小说《总统的女儿》（1853年）中的故事。

杰斐逊的女儿玛莎对有关萨莉的事缄口不言，只有一两次她向自己的儿子提起过，却断然否认她父亲与萨莉的暧昧关系。

杰斐逊让不少奴隶获得了自由，但萨莉却一直和杰斐逊生活在蒙蒂赛洛，似乎她也没有要求杰斐逊给她自由。

有的杰斐逊的传记作家的看法是，如果杰斐逊使萨莉自由的话，就将失去她，萨莉也会失去他。

杰斐逊的有关黑萨莉的故事，让人想起华盛顿的一则类似的传说。据说，英国曾有人为了损害华盛顿的形象，编造出华盛顿描述他在弗农山庄的女奴

如何漂亮的信，但从未有任何史学家读到过这样的信。直到华盛顿去世时，美国人才得知他暗恋着邻居的妻子萨莉·费尔法克斯。

比起华盛顿来，杰斐逊要不幸得多。

杰斐逊刚当上总统一年多，即从1802年起，在投身于国家、民族的自治斗争中，在声名鹊起、一展宏图的同时，除了黑萨莉的风流事外，早年与朋友之妻的事也被抖了出来，更加引人注目，而这些攻击几乎毁掉了他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机会。

1763年，20岁的杰斐逊曾因追求丽贝卡遭到拒绝而度过了一个“黑色的10月”。第二年，即杰斐逊21岁时，他的老朋友约翰·沃克与伊丽莎白·穆尔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杰斐逊应邀担任了这对新人的伴郎。杰斐逊与沃克早在就读于摩莱校长的小学校时就已是同窗好友了，两人的父亲又是通家之好，沃克的父亲是杰斐逊父亲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而且新娘的兄弟又是杰斐逊在威廉-玛丽学院的同学。

沃克在威廉·玛丽学院时，是个有名的刺头，因太捣蛋而被“处罚暂时停学一个月”。但自结婚后便学乖了。他们搬到一个叫贝尔沃的种植场，那里离夏德威尔的杰斐逊家只有五六英里，所以彼此往来甚密。1768年；他和杰斐逊都打算竞选弗吉尼亚众议员。这年，穆尔生了一个女儿。

当年夏天，杰斐逊不知不觉地滑进了又一个感情的漩涡。

沃克到斯坦威克斯堡去帮助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于是他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杰斐逊。他甚至立下遗嘱，指定杰斐逊这个单身汉为其遗嘱执行人。他离开了4个月。

然而，孤男寡女永远是一个不倦的话题。杰斐逊承担起照看朋友妻女的责任，这对还是单身的杰斐逊来说，无疑是一个苦差事。杰斐逊已是25岁的精力充沛的男人，对异性的向往和需要，使他情不自禁地向伊丽莎白·穆尔求爱。伊丽莎白·穆尔大吃一惊，立刻拒绝了杰斐逊。但传闻随即沸沸扬扬，说杰斐逊和沃克的妻子通奸。当时，沃克并不知道此事，而且他的妻子对他说，杰斐逊照顾她们母女可谓尽心尽力了。

不料，差不多过去了快20年，穆尔却向她丈夫抖落出那尘封已久的往事。又过了10多年，到了1802年，沃克才被杰斐逊的政敌煽动起来，对新闻媒介指责杰斐逊勾引他的妻子。1805年，他给杰斐逊的政敌亨利·李（此人娶了沃克的外甥女）写信。

沃克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于1764年6月6日在切尔西——我岳父的别墅结婚。我在威廉-玛丽学院接受教育，杰斐逊也在那儿上学。

我们一起在一所私立学校长大，我们的友谊在上大学时得到加强。我们互敬互爱。

我父亲是他父亲的遗嘱执行人之一，是他的保护人，为他的学业预先付钱……

我把杰斐逊当成至交，让他参加我们的婚礼，他是我的男宾相之一。

1768年，我应召于斯坦威克斯堡，担任弗吉尼亚代表团的秘书或职员，去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代表团由威廉·约翰森率领，包括盖恩·路易斯和我父亲。

我把妻子和小女留在家中，依靠作为我的邻居兼好友的杰斐逊先生照顾，保留我离开前立下的遗嘱，指定他为我的第一位遗嘱执行人。

我是 11 月份回家的，离家 4 个多月。

在我离开期间，杰斐逊先生对我夫人行为不检，以致她抱怨说为什么对他如此信任。

1769—1770 年时，在夏德威尔他家里，我们常串门，这对邻居来说是常有的事。但他企图拥抱我夫人，长外衣袖子里有一字条，试图让她相信他对错位的爱的无知，我夫人一瞥之后就把字条撕得粉碎。

这之后又有一次，我们拜访一个住得较远一些的邻居，杰斐逊也正好在场。当女士们回到房间之时，杰斐逊诈称不舒服、头痛，而离开了我们也在场的屋子。但他并没像生病似的去床上休息，而是悄悄溜进我妻子的房间，她当时正在宽衣解带或已经躺在床上了。

他遭到断然拒绝。

1772 年，杰斐逊结婚了，然而他还继续毁灭我们的平静的生活，直到 1779 年底。

我还记起另外一件事。

我的老房子有一楼梯通上二楼，楼上两边各有一个房间，两门相对而开。

杰斐逊和他妻子睡一个房间，我和我妻子睡另外一间。

在通道的尽头有一小房间，是我妻子的私房。她一早一晚都要去她的小房间。一天早上，杰斐逊先生在了解她的习惯之后，在过道上堵住了她的去路。杰斐逊只穿了一件 T 恤，想抓住她——其行为极端猥亵。

1783 年，杰斐逊先生在他妻子去世后去巴黎。

从 1779 年起，杰斐逊先生才停止骚扰我们平静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是这样对他的。我也一直坚持让他作为我遗嘱的第一执行人，就如对过去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在他去法之后不久，沃克夫人重新提起我的遗嘱，我便征求她的意见，她这才把这些事一一告诉了我，并对她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表示道歉，她担心其后果也许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杰斐逊从未在公开场合对这一指责做出回答。然而，他却在 1805 年对自己的总统秘书威廉·伯韦尔说，这件事早已不是秘密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威胁杰斐逊说，要把此事公之于众。杰斐逊告诉伯韦尔说，那次勾引或试图勾引——伯韦尔不清楚所指为何，只是一次孤立的企图，并非“有预谋”的或“巧合”。另外，伯韦尔未出版的备忘录中记载，杰斐逊曾承认有过一次不检行为。杰斐逊在 1805 年写给其海军部长罗伯特·史密斯的信中说：“我得承认他们对我的指控中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在我年轻、单身一人的时候，我向一个漂亮女人求爱。我承认这一做法欠妥。”

著名的杰斐逊传记作家杜马·马龙称沃克的信是“令人厌恶的莫须有的故事，任意夸张，简直不可信”。

此故事中令人好奇的是，沃克夫人为何要等着她 40 岁时才承认杰斐逊曾在多年前引诱她呢？

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大都认为这是因为亨利·李在 1802 年设下的政治圈套。而在威廉·伯韦尔看来，则是 1805 年时，沃克夫人本人为支持汉密尔顿的报纸《纽约晚邮报》才发表此事。而此报又添油加醋，对此事大加渲染。这或许表露出这样一个阴谋：沃克夫人极想让全国都知道，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曾经疯狂地追求过她。历史上曾有无数的女人把自己虚构成总统的情人，其中的确有些把这种虚构变成了现实。当然，沃克夫人是否曾是杰斐逊

的情妇最后并不重要；但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她可能是。如此也就可以说她的阴谋得以实现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沃克在 1809 年弥留之际，他和他的妻子暗示杰斐逊的好朋友詹姆斯·门罗，他们想请杰斐逊去看他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知他们是想对杰斐逊表示歉意，还是表示要捐弃前嫌？但是，杰斐逊那时刚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没有亲自去，却派人送去一篮无花果。也许这是巧合，无花果在古代与爱和罪相连。

第二十一章 伯尔事件

截至这个时期，还不曾有任何一届政府是比杰斐逊先生的政府更为卓越的。我们确实是处于“成功的实验的高潮”。杂税废除了，公债连本金带利息均有充足的保证，干薪闲职一律取消，路易斯安那业已取得，公众的信任无限高涨。

——约翰·伦道夫

杰斐逊执政的业绩并未使联邦党人减少或停止对他的攻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和一小部分牢骚满腹的联邦党人深信存在着一个“杰斐逊阴谋”——使民主共和党人永远当权。当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这些人挺而走险，走上分裂联邦的危险之路，策划要让新英格兰脱离联邦。

杰斐逊极想使新英格兰从它那些乖张的联邦党人的路线上转变过来。他知道，一个地区性的党派企图统治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是十分危险的事，并指望以他的温和稳健来使新英格兰人相信，他们的那些商业和海运方面的利益并不会受到威胁，在民主共和党人手里是安全妥当的。民主共和党人在1802年的国会选举中得势，说明他的这一和解政策正在获得成功。但那些联邦党人领袖权势日衰，他们就日益心怀怨恨和不顾一切了。

在那些新英格兰教士和政党领袖看来，杰斐逊的胜利就是民主制的胜利。他们认为，民主制必将导致恐怖主义、无神论和独裁政治。费希尔·艾姆斯写道：“民主制的各项原则不论在何处，也都就是曾在法国实现过的那些原则。”新英格兰迄今原是很纯洁的，但它的美德的屏障逐渐崩溃了。还是那位皮克林认为：“难道我们必须袖手等待这种结果吗？我们当初革命的原则明指出挽救之道：实行分离。”

像约翰·泰勒那样的一些弗吉尼亚人，在1798年当汉密尔顿的魔影笼罩着弗吉尼亚时，就曾有过这种想法。杰斐逊在当时以胜利相期许，才使他们没有节外生枝。联邦党人却没有这种期望足资慰藉。他们的多数派势力正在削弱，而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1803年被批准加入联邦的俄亥俄州，尽管大部分定居者是新英格兰人，却是仰望着弗吉尼亚行事的。今后由路易斯安那分建的各个新州，将会遵循同样的路线；而且联邦议员名额分配比例，将会增加这些新州在政治上的分量。合并路易斯安那打破了联邦内部的权力平衡，从而解除了新英格兰顺从联邦的义务；至少，联邦党人们是如此推论的。在1803年结束以前，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帮会”和康涅狄格州的那些“河神”就已开始策划组织一个“北部邦联”。用皮克林的话来说，它将可“免除南部贵族民主派的那种腐败及其腐化影响和压迫”，亦即成为一个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的邦联。

获知这一密谋的，仅限于新英格兰联邦党内的核心人物，以及对此加以怂恿的英国驻华盛顿公使。他们想拉汉密尔顿入伙，请他当司令。汉密尔顿在性格上是不屑参与阴谋诡计的，他当场拒绝。密谋者们便转向了当时的副总统艾伦·伯尔。

伯尔曾在1800年的选举中使纽约州投了杰斐逊的票，若无该州选票，杰斐逊是不会当选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使杰斐逊在1804年把他从总统候选人名单上抹掉了。伯尔于是决定，要同民主共和党的正式候选人争夺纽约州州长的职位。联邦党人把伯尔与杰斐逊的分道扬镳视作天赐良机，他们积极支持伯尔竞选州长。作为回报，伯尔曾同意事成以后使纽约州加入“北部邦联”，

并自任该邦联的总统。但大部分联邦党人领袖反对这个交易。汉密尔顿竭力反对伯尔竞选，阻止其竞选活动，他支持约翰·亚当斯的女婿竞选州长，伯尔遭到了惨败。实际上，即使没有汉密尔顿的反对，伯尔也赢不了。这下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汉密尔顿身上，对汉密尔顿满腔仇恨。联邦党人的密谋也随即告吹。这一密谋当时取得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1804年的总统选举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选举中，杰斐逊囊括了除康涅狄格和特拉华以外的所有各州的选票。他所赢得的选举人票与平克尼相比，为162票对14票。

年方48岁的伯尔，已成为一个前程毁弃的政客。他既已同民主共和党人决裂，又大负联邦党人所望。在伯尔眼里，汉密尔顿对此是有责任的。这已不是汉密尔顿第一次对他作梗了；但必须成为最后一次。1804年6月18日，即纽约州的选举已过去6周以后，伯尔写信给他的对手汉密尔顿，要求“立即并且无条件地承认或否认”报界所传说的对他品格的诽谤。汉密尔顿拒绝收回成言，认为伯尔咎由自取，并回答说：“我相信，你多想一想，对这件事就会与我有同样的看法。否则，我只能对实际情势表示遗憾，并只得承受后果。”

按照美国当时南部和纽约的绅士们所遵从的“社交礼法”来说，这种言词等于要求进行决斗。果然，恼羞成怒、怒火中烧的伯尔向汉密尔顿挑战，提出决斗。汉密尔顿原本没有必要接受挑战。他无须证明自己的勇敢；他有一个妻子和一大家人靠他养活，而且他的悲剧还在于他认为，在决斗中击毙对手无异于谋杀。可是，他的心胸高尚这一“弱点”，却迫使他接受挑战。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使人想起他儿子的悲剧。

汉密尔顿的大儿子菲利普，早在1801年11月就死于决斗场。菲利普年轻气盛，极像父亲；他聪颖、英俊、机敏。1801年7月4日，民主共和党人乔治·埃克在讲演中指责汉密尔顿企图举兵造反。血气方刚的菲利普顿时拍案而起，怀恨在心，从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同年11月，菲利普·汉密尔顿和一个朋友看演出时，突然发现他们坐在和埃克相邻的包厢，于是双方怒目而视，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埃克站起来揪住菲利普的领口，破口大骂“流氓”、“恶棍”。是可忍，孰不可忍！旧恨新仇一涌而上的菲利普，第二天就和他的朋友一起向埃克提出决斗的挑战。尽管菲利普的叔叔得知后竭力劝阻，但决斗还是发生了。第一轮，菲利普的朋友对埃克，却都没有击中对方，惟也没受伤。但第二轮是怒不可遏的律师埃克对怒形于色的菲利普，枪响之后，菲利普应声倒下。在决斗前，菲利普就曾对他的朋友讲，他不会真朝对手开枪。

菲利普为了维护父亲的荣誉而以身相许，可谓舍身成仁。汉密尔顿的大女儿安杰莉卡接受不了兄弟之惨死，一气而疯，直到73岁时才去世。这双重悲剧使汉密尔顿的家庭生活整个颠倒了。汉密尔顿夫人生下她的第八个孩子，是个儿子，便取名菲利普，以纪念死去的大儿子。

汉密尔顿回首往事，发现自己别无选择。自己以背叛宪法遭民主共和党人诅咒；被联邦党人指责为背叛党。他悲哀万分地说：“也许美国没有人为了当前的宪法，像我这样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然而，我所得到的回报是朋友的抱怨和敌人的诅咒……每一天越来越向我表明，这个美国并非为我而生。”

可怜的汉密尔顿已陷入了理论和野心交织而成的双重罗网。他可能在矫正民主政治方面同那些新英格兰联邦党人有所分歧，但他却是运用他们那种

阴郁的公式来推测将来的：危机已迫在眉睫。美国的 1804 年相当于法国的 1791 年。杰斐逊将会像米拉波 和拉法叶特一样消失踪影，分崩离析的局面和无政府状态将会接踵而至。那时美国就需要一个救星。汉密尔顿有意随时挺身而出，但是，一个被怀疑为懦夫的人是不能拯救他的祖国的。这样，汉密尔顿便走上了他的死亡之路，决定要证明自己勇敢，而又不使对方丧命：保留发射第一枪的权利，然后放弃它，指望伯尔会开枪失误，从而得到荣誉方面的满足。但这一切并不为他的对手所知。

汉密尔顿预感自己的死对妻子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此他给妻子写了三封信，称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女人”。7 月 10 日，他在绝笔信中坦露心迹：“我愿清清白白地去死，而不愿负罪地活着。”和儿子一样，汉密尔顿决定决斗时并不真朝对方开枪。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手，把死的厄运留给自己，这种决斗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1804 年 7 月 11 日，就在那个明媚夏日的清晨 6 时，汉密尔顿和他的助手渡过哈得孙河，来到河边断崖下一处树丛中，那位副总统和他的朋友们正在那儿开辟决斗场地。双方的距离经商定为相隔 10 步。当“举枪”的信号发出时，伯尔缓缓抬起手臂，细心瞄准，随即扣动扳机。悲剧又一次重演了，汉密尔顿胸腔下部被枪弹射中。他倒下时，手指痉挛地动弹了一下，漫无目标地扣动了扳机。他经历了 30 小时剧烈的痛苦，才溘然长逝。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由于对他曾经协力组成的政府缺乏信心，并由于对他曾如此优异地为之服务的人民缺乏信心，就这样殒命了。

艾伦·伯尔事后逃到了华盛顿，总统杰斐逊却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并将路易斯安那领地三个最好的职位给予了他的友人，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并不是杰斐逊想要奖励杀害汉密尔顿的人，而是他有用得着伯尔之处。因为伯尔身为副总统，必须充当合众国参议院的议长，该院当时作为弹劾法庭正在举行会议，审讯最高法院法官蔡斯。

这次审讯乃是民主共和党人的部分意图，其全部意图则是要清除联邦司法机关中那些带有派性的联邦党人。1801 年 2 月，当国会增设联邦法院时，亚当斯总统把他那一党的许多成员安置到新的职位上，并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一职给予了他的亲戚约翰·马歇尔。这个人是杰斐逊深感受其屈辱、深恶痛绝的。在 1796 年总统选举中，马歇尔曾拒绝支持杰斐逊，后又曾在 1797 年“XYZ 事件”中揭露法国，使当时身为副总统而一向亲法的杰斐逊感到为难。

杰斐逊现在鼓动他在众议院内的几个亲信采取行动，来反对某些联邦法官。有一个联邦地方法官嗜酒无度，神经错乱，遭到弹劾被免了职。第二个牺牲者将是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蔡斯。蔡斯是《独立宣言》的一个签字人。他在法官任上曾预言，一旦杰斐逊执政，“我们的共和宪政将沦为暴民政治，变成可能有一切政体中最坏的一种”。这样他就格外招怨于民主共和党人。众议院作出了纯属派性的表决。根据蔡斯在任职期间的若干不法行为和滥用职权，对他提出了弹劾。说来奇怪的是，尽管人们曾经讲过许多关于仿照英国先例如何有害的话，参议院竟还是只能模仿英国上议院对弹劾沃伦·黑斯廷斯一案的处理方法。1787 年在伦敦，黑斯廷斯因被指控在印度总督任内犯有严重罪行而受到弹劾，英国上议院审讯此案历时 7 年，最后于 1795 年宣布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立宪派领袖之一。1790 年接受王室贿赂，四处为宫廷奔走，次年病死。

免于追究对黑斯廷斯的一切控诉，成为当时著名的案件。副总统伯尔主持了弹劾会议。虽然蔡斯任法官时态度粗暴，但对他提出的那种严重指控却并无实据可证。到了1805年3月1日进行表决时，有相当多的民主共和党参议员同联邦党人联合一致，开脱了这位犯有“罪行和过失”的法官。

如果根据已提出的证据断定蔡斯有罪，那就很有理由相信，整个最高法院都会遭到清洗。这次审讯乃是杰斐逊的激进主义发展的高潮。联邦党人在首席法官马歇尔领导下重整旗鼓，并由最高法院发展出来一种思想观点方面的巧妙攻势：国家至上和财产神圣。杰斐逊曾经满心怨恨地写道：“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联邦党人退据司法机构，他们盼望能从那道防栅发炮，轰垮民主共和党人的一切堡垒。”

杰斐逊本来打算一任总统届满之后，就回到蒙蒂赛洛庄园宁静的生活中去。但是，联邦党人的攻击，却使杰斐逊对原来的决定重新进行了思考：“联邦党人无节制的诽谤，使我不得不让国家来作出判决。”因此，杰斐逊称联邦党人的攻击，是他谋求1804年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民主共和党支持者也积极鼓动他去竞选，他们知道只有他才是无人能与之抗衡的候选人。

国会的108名民主共和党议员，在1804年2月25日的一次秘密提名会议上，一致提名杰斐逊竞选连任总统。现任副总统伯尔由于行为不端，已被大家唾弃，所以，他们还一致同意将伯尔从党的候选人名单上一笔勾销。在会上对6个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结果纽约的乔治·克林顿获得多数。

1804年的总统选举，正是在杰斐逊一生中政治上最春风得意的时刻举行的。当时，国泰民安，万民拥戴，杰斐逊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正当杰斐逊由于获得第二次提名而兴高采烈之际，4月份传来二女儿玛丽生病的消息。杰斐逊立即返回蒙蒂赛洛。父亲的到来，并没能留住女儿的生命，杰斐逊到家不久，玛丽便死了，这对杰斐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他毕竟已是61岁的人了，已两鬓生灰。

联邦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为查尔斯·平克尼和鲁弗斯·金。1804年夏季的竞选活动，远不如4年前的那次紧张、热烈，因为人人都知道，杰斐逊之当选已是铁板钉钉的事。

果然，杰斐逊大获全胜，在17个州中，杰斐逊得到了15个州的支持。在复选团的176票中，杰斐逊得到162票。

1805年3月4日星期一下午，杰斐逊在参议院会议厅里再次宣誓就任总统。这次总统就职典礼气氛平淡，人们也对之无所期望；甚至连礼仪也没有4年前的那样庄严。杰斐逊没像4年前那样步行去国会大厦，而是从总统府乘马车前往，陪同他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和一名侍从。没有任何壮观的场面。一名英国外交官回忆说，杰斐逊当时穿的是黑色服装，甚至还穿上了黑色丝袜，但总统的服装也好，就职庆典也好，都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多大注意。

杰斐逊仍旧腼腆，仍旧不擅演讲。参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借用评论杰斐逊第一次就职演说的措词说，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声音很小，在拥挤的听众席上，恐怕谁都是连一半也没听到”。

杰斐逊在演说中首先感谢全国同胞又一次对他表示的信任。而后接着说，他问心无愧，实践了他4年前宣布的各项原则。他回顾了第一任期内的重大成就。在国内政策方面，他着重提到裁减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取消国内税收，以及在偿清债务方面的进展。他不无骄傲地指出，

政府是用课征外国货物的消费税收入来维持的，是由那些买得起奢侈品的人们付的税。在外交方面，他承认获得路易斯安那有些人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担心取得这块领土会危及这个联邦。杰斐逊重申：“我们的联盟越广，就越不会受到强烈的地方情绪的摇撼。”

“土著居民”问题是杰斐逊演说中讲得最多、最富于哲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土著居民具有人的各种能力和各种权利，热爱自由和独立”，“人性要求我们去教他们学会农业和持家技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继续生存，并及时为他们去适应一种社会形态做好准备”。

杰斐逊在演说快结束时大谈新闻自由。他说他的重新当选表明，一个根据宪法的精神实质行事的政府，是不可能被谎言和诽谤击垮的。

就职典礼以后，杰斐逊在住所举行了一个开放性的招待会，类似他通常在元旦和国庆节举办的招待会，体现了他那种不拘小节的作风。

杰斐逊的第二任期是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开始的，但是不久就遇到了麻烦，最后在困难重重中结束。

杰斐逊指望继续推行 1801 年的“贤明和节俭”的政策。不料，他的政党却开始按选区分裂为许多派别：力图扩张领土的西部人、新英格兰的受压抑者、弗吉尼亚只重原则的民主共和党人，以及中部各州不重原则、但很计较官职大小的民主主义者。欧洲的和平曾经是杰斐逊早期成功的条件，但今后 10 年欧洲将无和平可言，在 1805 年结束以前，拿破仑在陆地逞雄，不列颠称霸海上不可一世：双方极力使用大陆封锁或海上封锁的办法，以求置对方于死地。对美国政府说来，这是一种比 1792 年至 1801 年期间各次战争还更难于应付的局面：成为双雄之间的“夹心饼干”。

对杰斐逊的时运盛衰起决定作用的一年，是以伯尔阴谋案这一插曲告终的。伯尔心中早已清楚自己政治上再无发展，便想在金钱上大捞一把，甚至不惜分裂国家。他在副总统任期届满、行将离开华盛顿之前，曾同英国公使梅里接触，提议若英国皇家海军予以合作，并付他 50 万美元，他就可以使路易斯安那联邦分离出去。梅里先生认为此事可行，便向伦敦报告，伯尔愿意“协助陛下政府。尤其是在努力促成美国西部从位于大西洋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土地上分离出去方面，助一臂之力”。梅里还力促他的政府付款。但英国唐宁街的权贵们似乎无意推动美国的分离运动。

不甘心失败的伯尔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先到俄亥俄河上游，然后带着几个友人，乘坐一只豪华的平底船顺流而下，沿途到处停泊，向各地兜售另一套计划。生性好斗的西部人都被纽约州的这位文雅绅士迷住了。有一个想入非非的爱尔兰亡命者哈曼·布伦纳哈斯特，神魂颠倒地竟打算征服墨西哥，扶持伯尔当皇帝，由他充任大摄政。在田纳西，伯尔会见了安德鲁·杰克逊，并赢得了他的友谊。杰克逊建议，如果伯尔移居该地，他将使他当选为参议员。身为路易斯安那总督和美国陆军高级将领的威尔金森将军仍接受西班牙津贴，但他并不满足，私下早就同伯尔讨论过一项方案，想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墨西哥，并使路易斯安那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伯尔来到新奥尔良时，便同那些不甘心被拿破仑出卖的克里奥尔人进行了接触，并同一群急于入侵墨西哥的美国海寇取得了联系。新奥尔良的天主教主教和厄休拉女修道院院长，都对伯尔极力支持和祝福。伯尔在经由陆路的回程中，又发现所到之处的西部人无不切望同西班牙开战。一趟下来，伯尔深受鼓舞，认为自己很得民心。于是返抵华盛顿以后，立即从西班牙公使那里得到了

2500 美元，公然准备夺取当时停泊在波托马克河上的美国海军船只，用以发动一次海寇远征，“解放”路易斯安那！

1806 年夏，这位前副总统挺而走险，在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成立总部，积极开始招募人员进行他的远征。表面上，他是要去接管和垦殖他早先购得的、位于路易斯安那西部的一片广大的土地。而那些据称“深知内情”的人，则预期他会进入得克萨斯并“解放”墨西哥。史料充分证明，伯尔确是觊觎着墨西哥。但他首先是要促成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分离，并在该地自任总统，然后举兵南下。

早在 1805 年 12 月，杰斐逊就被告知要警惕伯尔。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费城的手工印刷的匿名信，提醒他警惕伯尔的阴谋。该信称伯尔在西部各州的活动是“异常行为”，并说伯尔同英国公使安东尼·梅里的联系密切，他是“领英国津贴的”。几天后，写这封信的人再次给杰斐逊写信，他自称是杰斐逊的朋友，并进一步提醒他伯尔阴谋推翻政府。

杰斐逊对这些匿名信并未给予特别的注意。而美国肯塔基地区检察长约瑟夫·戴维斯于 1806 年 2 月初给杰斐逊的一封私信倒引起了杰斐逊的重视。戴维斯在信中称：“我们中间有卖国贼，其目的就是要分裂联邦，让西班牙得利。”戴维斯特别告诫总统提防陆军指挥将领、路易斯安那总督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他怀疑此人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津贴。

杰斐逊让麦迪逊、加勒廷和迪尔伯恩传阅了这封信，但他们似乎无法相信威尔金森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叛自己的国家。不过，杰斐逊还是立即给戴维斯回了信，要求把他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他，包括参与这桩密谋的所有人的名字和任何有关证据。戴维斯又很快回信，并开列了一些人的名单，如威尔金森和伯尔，还有一些民主共和党要人，如杰斐逊的司法部长约翰·布雷肯里奇、威廉·亨利·哈里森和亨利·克莱。戴维斯后来在名单上划掉了布雷肯里奇和克莱的名字。

杰斐逊还从其他来源收到有关伯尔活动的报告。乔治·摩根上校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写信给总统说，伯尔曾设法招募他的几个儿子去参加一项军事征讨，伯尔还谈到有关西部独立的问题。但是，杰斐逊仍静观事态发展，按兵不动。1806 年 10 月 20 日，他收到邮政总局局长格兰杰发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信中透露，去年冬季，伯尔曾向威廉·伊顿提出请他任威尔金森的副手，指挥旨在把西部诸州从联邦分离出去的征讨军。关于这一事实，格兰杰从伊顿那里获得了证实。

两天后，杰斐逊召集了内阁会议，传达了这个报告以及此前他和麦迪逊都收到的有关伯尔行动的几份报告。几次会议之后，内阁决定派遣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奥尔良准州州务卿约翰·格雷厄姆调查伯尔的行踪，并授权他可以自行决定同西部诸州州长秘密商议，如伯尔有公开的犯罪行为，有权将其逮捕。

这时情况已万分危急。1806 年 10 月 8 日，伯尔的一名助理塞缪尔·斯沃特沃特抵达位于纳奇托切斯的威尔金森总部，呈交了一封未署名的密码信，该信是 1806 年 7 月下旬写的。信上说，资金已到位，可望英国的海军援助，行动已经开始。伯尔于 8 月 1 日动身西行。部队将于 11 月 1 日在俄亥俄会合，第一批 500—1000 人将预期在 12 月 5—15 日之间抵达纳齐兹，在那里希望见到威尔金森。这封信还说，威尔金森将仅次于伯尔，任第二把手。威尔金森认定，此信为伯尔手笔。

几乎就在政府要对伯尔和威尔金森决定采取措施的这一关键时刻，威尔金森将军回心转意，决定弃暗投明，揭露伯尔的阴谋。他派托马斯·史密斯中尉，带了一包秘密文件，十万火急地奔赴华盛顿交给总统。11月25日，史密斯中尉到达总统府，呈交了威尔金森的密件。威尔金森举报了要肢解联邦的“一桩隐蔽、黑暗、邪恶而流布广远的阴谋”。同一天，杰斐逊召集了内阁会议，他们一致同意总统发布文告，向各军事部门和文职官员下达命令，无论这项计划在哪里进行，都必须立即加以阻止。两天后，总统发布文告，告诫全体公民团结一致粉碎这个阴谋。

伯尔直到1807年1月10日才得知威尔金森已出卖了他，总统已发布文告，密西西比准州的代理州长已下令逮捕他。一星期后，伯尔别无选择，只好自首。伯尔被解往里士满，以背叛合众国之罪受审。

杰斐逊在1807年1月22日向参众两院提交了特别咨文，宣布伯尔的“罪行是无可置疑的”。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赞扬了威尔金森。此外，他还向国会递交了那封引起轰动的密码信的复制件。第二天，这封信在《全国通信者报》上发表了。

对犯罪者来说很幸运的是，主持审讯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极力主张，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对叛国罪所下的定义，即：“与合众国作战，依附……合众国之敌人者”，以及宪法所规定的“经该案证人二人证明”这一保障。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仅仅招募人员意图谋反并非叛国。伯尔获得开释，随即流亡法国。他无疑很后悔当初一枪打死的是汉密尔顿，而不是杰斐逊。背叛了自己所参与的每一桩阴谋的威尔金森，仍得保高位和总统的信任。

杰斐逊对这一结果既失望又气愤。他在得知这一审判结果时说：“这等于是宣布任何勾结起来破坏联邦的叛国行为都可不受惩罚。”杰斐逊认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对这场审判的判决是有政治动机的。

这是1860年以前最重大的一桩分离阴谋，如果伯尔到达新奥尔良，这一阴谋极有可能搞成。伯尔背后有数以百计有身份的人物，还有许多冒险家，尽管其中大多数人并未明确了解他的意图。即使雨过天晴，这一事件仍给杰斐逊的第二任期带来许多麻烦。伯尔在流亡中访问了英国和法国，使许多重要人物对他的各种计划发生了兴趣，诸如策动墨西哥革命，为法国夺回加拿大，动员失业的美国水手推翻杰斐逊，调停英法和解并使它们共同反对合众国，等等。但他一直不曾赢得官方的支持。1812年，他设法弄到护照返回纽约，开办了兴隆的律师业务。1833年他77岁时，同一个风韵动人的寡妇结了婚。这位寡妇经常自夸她是世界上唯一曾被乔治·华盛顿和拿破仑·波拿巴两人拥抱过的女人。

第二十二章 禁运风波

禁运不仅会起保卫我们资源的作用，而且还会强制我们的敌人改变从海上赶走我们从事商业的恶毒政策。

——约瑟夫·迪沙

杰斐逊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卷进了纷繁复杂的欧洲事务之中。杰斐逊派门罗去马德里，设法让西班牙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中有争议的边界线问题上同他进行谈判。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西班牙大为光火；美国要求将琅迪多河（今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之间的界线）作为路易斯安那的东部边界线，西班牙政府对此更为不快。另一方面，由于路易斯安那的购入，杰斐逊受到鼓舞，在同西班牙打交道时也表现得颇为好斗。在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之后不久，他就预言，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居民将很快要求归属美国管辖。他给门罗写信说：“我们并不期望同西班牙能有什么宽宏的或公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决心得到或取得我们应有的界线。”

到1804年底，门罗才动身去马德里。其间，门罗在巴黎停留，并发现法国已决定不再支援美国的努力了。杰斐逊在西佛罗里达建立了税收区，西班牙更感不快。加上其他一系列原因，差不多5个月过去了，门罗和平克尼与西班牙当局的谈判仍毫无所获。他们深信，只有动真格的了。于是他们向国务卿建议，美国应占领整个佛罗里达。

杰斐逊早就试图在欧洲外交的浑水中捞取佛罗里达这条“鱼”。他认为，东、西佛罗里达原本都该并入路易斯安那，其中他特别想要取得西佛罗里达。因为墨西哥湾唯一的海军良港莫比尔湾，以及流经密西西比领地和克里克人土地的许多河流的下游，都位于西佛罗里达境内。

杰斐逊于1805年8月初在蒙蒂赛洛得悉门罗使命失败的消息。他怪罪拿破仑，他给麦迪逊写信说，他深信“法国有意跟我们作对，背叛我们。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去得到比同英国的相互友谊更为重要的东西”。因此，他开始考虑联英抗法。

杰斐逊总统于1805年12月3日向国会提交了第五个年度咨文。他在咨文中把同西班牙日益恶化的关系描绘得暗淡无光，通知国会他已命令边境军队随时准备保护美国公民，击退任何侵略。

这时，美国驻巴黎公使却发来情报说，如果使拿破仑感到有利可图，或许可以说服他代合众国出面，向西班牙索取西佛罗里达。杰斐逊于是在1805年12月，递交国会一份秘密咨文，暗示他需要200万美元，以供“外交方面的交际”之用。过去对于路易斯安那问题的谈判，曾拨过一笔同样的款项。因此，他自以为这次拨款不会有什么困难。然而，这一次他错了。这份咨文成了民主共和党内产生分裂的信号。才智出众的约翰·伦道夫虽然行为乖僻，但在使杰斐逊得登总统之位的那种对理想的共和主义的信心方面，却是很坚定的。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对于党的纪律束缚深感恼火。这时，约翰·伦道夫作为接受杰斐逊提交秘密咨文的众议院那个委员会的领导，得知总统在为谈判寻求200万美元时，明确表示反对。他宣称，他决不支持推倭责任之事，总统如果需款，必须不带借口，直接索要。伦道夫应邀与国务卿会商，麦迪逊告诉他说：“法国要钱，我们非给不可，否则就得同西班牙和法国打仗。”伦道夫立即公布了这段话，他认为这是对法国的贿赂，他说：“在进

行谈判的努力屡遭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步骤将永远使我们蒙受耻辱。”

倍感压抑的联邦党人便以此大做文章。

然而，联邦党人和伦道夫反对并未能阻止杰斐逊要求秘密拨款 200 万美元。1806 年 1 月 16 日，众议院以 76 票对 54 票通过，3 个星期后又得到众议院的一致赞同。但是这笔钱在变化无常的欧洲，实际证明毫无用处。杰斐逊失去了部分弗吉尼亚民主共和党人的支持。民主共和党队伍中的破裂鼓舞了联邦党人，他们把这项计划说成是不光彩的阴谋，用金钱向法国宫廷行贿，以此来“购买和平”。

蔡斯法官和艾伦·伯尔被宣告无罪，标志着杰斐逊的时运和人望的转折点。他的第二届任期被约翰·伦道夫比拟为法老梦见 7 头瘦母牛吃掉 7 头肥母牛。据《圣经·创世纪》第 41 章所记，埃及的法老做梦，梦见 7 头瘦母牛吃掉了 7 头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约瑟解释说，这是神显明，7 个丰年以后要来 7 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全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而杰斐逊现在时去运衰、政策失败，过去的“功劳”已被人们忘掉了。弗吉尼亚的许多老民主共和党人感到，自从取得路易斯安那，杰斐逊便背弃了他自己的原则。事实上他的确是如此，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就曾建议用联邦的钱来修筑公路和从事其他国内建设。正如约翰·伦道夫所说，杰斐逊把联邦主义“曲解了 4 年”，现在通过采取他过去曾加以指责的那些政策，已开始正确理解它了。

所有这些争论，使民主共和党的团结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外交努力还是无果而终。西班牙人没有被吸引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对法国的戒心使塔列朗失去兴趣。1805 年底，欧洲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英国将军纳尔逊在特拉法加的胜利，打垮了法国的海军力量，英国人成了海上的霸主。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取得胜利，迫使奥地利求和，使俄国军队撤退。

杰斐逊开始依靠来自北部各州的民主共和党人的道歉和赔偿，并命令英国战舰离开美国领海。10 月下旬国会开会时，总统得到了供增建 188 只炮艇之用的 85 万美元拨款，并命令那支小小的远洋海军将它的 3 艘最大的船舰驶入海面。

英国人企图终止现行的一条惯例：允许美国商人把货物输入美国，而后作为中立货物再输出。英国人根据 1805 年春公布的《埃塞克斯决定》，拦劫了无数无辜的美国船只。

杰斐逊总统丝毫未提及开战或进行战争准备。因为在他看来，英国人的挑衅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已经扼住了英国的喉管，只消扭动一下手腕，就可置英国于死地。几年来，他一直在寻求机会，以便试用在商业上排除英国的做法来代替战争。杰斐逊推断，既然美国对于英国工业品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立运输者和主要市场，那就有可能使英国屈服。总统竭力主张：“让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给了欧洲这么多有益的其他教训以后，是否可以再增加一次教训，即向他们表明，制止不公正行为是有许多和平手段的，从而使侵略者感到行事公正合于他们的利益。”为对付这一局面，杰斐逊一方面建议国会增加炮舰来保护美国的海港，并通告议员们，他的政府已经调集各种材料准备建造军舰，只要国会认为合适批准建造就行。另一方面，杰斐逊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立贸易问题的特别咨文，同时附有美国商人的请愿书及其他的一些记载英国干预美国中立贸易和强迫美国海员服役的文件。

总统在 1805 年 12 月提交的第五个年度咨文中，指示对侵犯中立权利的情况进行调查，提出反措施。众议院一开始就辩论宾夕法尼亚众议员安德鲁·格雷格提出的决议：在同大不列颠就中立贸易和强迫服役问题达成满意的协议之前，禁止输入英国货物。两个月之后，最终通过了一项禁止输入英国货物具体名单的法令，但该法令一直拖到 1807 年 11 月 15 日才开始执行。

当时在欧洲，拿破仑和不列颠都力图用大陆封锁或海上封锁的办法，来饿死或扼杀对方。华盛顿和亚当斯过去每次仅须对付一个敌手；杰斐逊如今是同时面对两个交战国。可以想象到，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大概会以一支武力作为赌注，来拨弄于两国之间以收渔利。但是，不论杰斐逊或麦迪逊，都不能领会拿破仑欧洲的现实，而且总统甚至在与的黎波里请和之前，就已开始进一步缩减合众国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到了认定难免要与法国重新开战时，便立即恢复旧日的做法，在公海强征美国船只上的英国臣民，甚至还从纽约港外的美国船上把人拉走。不列颠从未声称有权扣留土生的美国人，但却宣布有权从无论何处发现的外国船上征用它自己的臣民。英国海员经常潜逃到美国的商船队和海军中来。美国船“宪法”号在 1807 年时有船员 419 人，其中 190 人公开承认是英国臣民，而自称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者仅为 241 人。当时两国均未承认公民脱离国籍的权利。

当一只缺乏人手的战船搜查一只美国商船时，登船的军官往往会把任何略带爱尔兰或英格兰口音、而面貌也近似英国人的少年强行征用。横暴和不公正行为的事例相当多，足以激起公愤，更不必谈法律问题了。英国人对杰斐逊要求他们不再强行征用人员和尊重中立贸易的呼吁置之不理。英国枢密院颁布一道谕令（1807 年 1 月 7 日），进一步限制了中立贸易的范围，同时又发生了一桩强征人员的暴行，使两国接近于战争边缘。

有一支英国舰队，留驻在切萨皮克湾两海角之间，监视湾内的法国快速战舰，但舰队因水手潜逃而大量减员，英国怀疑水手潜逃的主使人詹金·拉特福德已应募在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上服务。1807 年 6 月 22 日，“切萨皮克”号扬起司令官巴伦的大幅旒旗，起航驶离汉普斯停泊所。英舰“豹”号随即驶出英国舰队，在后面跟踪航行。两船来到海角以外约 10 英里处时，“豹”号抢上风超驶半锚链左右，并发出“急件”信号。巴伦以为它意在请他携带发往欧洲的邮件，这在当时原是两国海军之间常有的一种互惠。他转动中桅主帆使船停进，请英国舰长派小艇过来靠船。结果表明，“急件”乃是英国海军司令伯克利下令，要搜查和解回逃兵。巴伦不知拉特福德在他的船上，答称他的船员里面只有 3 个美国人是在被强征后从英国海军中逃来的，他不允许进行搜查。过了不到 10 分钟，“豹”号舷侧炮火齐发命中美舰。巴伦还没来得及回击，“豹”号又发炮两次；因为“切萨皮克”号甲板上堆积着许多杂物，炮都几乎尚未架起。有 3 个人已被击毙，巴伦于是下旗示降。他的船员由“豹”号的军官进行查点，3 个美国人和拉特福德均被带走。

国旗受辱的消息，使美国人表现出自 1798 年以来第一次同仇敌汽的情绪。甚至联邦党人也感到惊愕失措，而在此以前，英国海上强权每伸张一步，他们都要为英国进行辩护。杰斐逊这时如果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他立刻就能得到战争，而且会比后来 1812 年时宣布的对英国战争更得人心。实际上，当

时群情激愤，国会将必须在战争、禁运或者无所作为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杰斐逊保持住了沉着冷静，他不愿看到战争的发生。他认为，一生中经历一次战争就已足够了。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向国会表明：“我们的船只、船员和货物，在公海及其他地方，正受到欧洲交战国越来越大的威胁。”他提议采取行动，建议实施禁运，禁止所有美国船只驶离美国港口。

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都对拟议中的禁运能达到什么目标不明确，但两院都很快通过了。参议院以22票对6票通过了一项普遍禁运的法案。3天后，众议院以82票对44票通过了《禁运法》。第二天，杰斐逊就签署了这项法案。

《禁运法》规定：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船只都不得驶往外国；一切自合众国启运的对外出口，无论经由海路或陆路，均被禁止；某些特别规定的英国工业品不许进口。禁运立即生效，此后接连14个月，所有不在国外或未能逃出美国的船只，都只得停泊港内或仅从事沿岸贸易。

起初，一些国会议员对禁运抱有幻想。国会议员乔治·坎贝尔对他的田纳西州选民说，虽然美国人对这项措施将会身受艰难，但对英国和法国将会造成更大的苦难。他认为，禁运会使英法买不到足够数量的赖以生存的物品来维持生命。他预言，如果美国人民表现出他们支持禁运政策的决心，美国就将会赢得对其权利的承认。同样，议员约瑟夫·迪沙对肯塔基州选民说，禁运“不仅会起保卫我们资源的作用，而且还会强制我们的敌人改变从海上赶走我们从事商业的恶毒政策”。

禁运开始时得到了公众巨大的支持，一向乐观的总统甚至还希望，如果美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欧洲的事态发展也许还能使国家摆脱困境。他一向认为时间对美国有利，因而认为美国最高明的政策，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免受“目前欧洲发作的精神错乱”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禁运会有助于杰斐逊跟英国代表乔治·罗斯进行谈判。1808年2月底，谈判无果而终。杰斐逊却仍然认定禁运是一项必须持续的临时政策，下届国会也将必须在禁运和战争之间作出决定。

美国是一个海上贸易大国，其船只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在美国将近600万人中，有480万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诸州，他们直接和间接地靠海上贸易生活。此次禁运对美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使近年来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对外贸易，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自从1793年欧洲爆发战争以后，除英国以外的每一个交战国的船只都已经从海上消失了，从而使庞大的欧洲殖民地贸易留给了各中立国，特别是留给了合众国。为了避免截夺，载运食糖、咖啡、茶叶、胡椒、可可这些热带产品的船只，都先驶往合众国，然后再将它们的货物向外转运。从1790—1807年，美国本国的出口增长了一倍，这时期的转口输出则从30万美元增长到5900多万美元。对谷物和棉花的生产者来说，在这些主要产品的欧洲来源业已断绝时，战争就实际成为他们的一种福惠。在这段商业繁荣的时期，费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波士顿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巴尔的摩和纽约则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这种增长大部出自海运业和造船业，及其影响所及的各附属性工业，如缆索制造业、制帆业、伐木业、粮食供应业、海事保险公司甚至银行，等等。这一时期，这个年轻的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成长，主要乃是依靠它善于利用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守中立的地位。禁运断绝了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并使成千上万的海

员和造船工人失业。在那些新英格兰人看来，国会勒令他们“不许航海”，就如同它对南部说“不许种地”一样蛮横无理。

在禁运后的一年内，美国出口从 11000 万美元（一年）落到 2000 万美元。在 5 个月内，纽约市有 125 家商号破产。烟草、棉花及小麦无法出口，价格一落千丈，使农业人口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普通民众、水手、农民、小商人及工匠，受到的打击最甚。

固然不错，美国船只处在英国枢密院谕令和法国敕令的夹缝里，航行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难免使自己有可能被交战国的某一方掳劫。但是，美国商船队船主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英国海军给予他们的保护而已，欧洲所施加的种种限制，仅仅增加了获得利润所冒的风险，而且，有很多贸易路线都是对中立国船主开政着的，只要他们愿意忍受由英国进行检查和发给许可证。这同其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实行的一种类似的制度比较起来，还是很不严格的。

禁运使走私活动猖獗。英国货物和美国产品的走私活动，通过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边境不断在进行。失业的水手和造船工人大批迁往英属各领地，以致有一个爱讽刺的效忠派分子，把禁运称为“对美洲各英属殖民地予以较好的鼓励的一种行动”。一些在国外保有一支船队的较大的船主，经受禁运尚能维持下来；但是，很多小船主都倾家荡产了。有些较小的港口，如纽伯里波特和纽黑文，此后一直未能恢复它们原先的繁荣。杰斐逊甚至还曾试图用行政命令阻遏沿岸贸易，但是，当初为了抵制马歇尔而被他委任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威廉·约翰逊，却颁布命令状制止了这件事。禁运对南部也造成了损害，使那里的棉花跌价将近一半。于是国内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骂声四起，怨声载道，杰斐逊日益成为攻击、谩骂的对象。猛烈的攻击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因为那里受禁运之害最甚。杰斐逊收到从新英格兰寄来的一封信，措词尖刻：“你这个歹毒的恶棍，究竟想把饿死我们穷人的这该死的禁运维持多久？”全国反禁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新英格兰甚至威胁要退出联邦。

联邦党人把这次禁运看作一种地区性的和党派性的阴谋。有一个联邦党人写道：“天塌下来了。没有人能预言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我所毫不怀疑的是，政府一心只想抑制商业精神，并逐步地摧毁这种精神。我于是猜测到，它对法国政府是满怀好感的。”

若要把在商业上采取报复行动作为一种外交武器而取得成功的话，必须基于各种客观形势有不同寻常的结合——这是很少出现的局面，在 1807—1809 年时就不曾出现。这次禁运造成了法属西印度群岛粮食不足和法国缺少殖民地产品；但拿破仑没收了驶抵法国港口的每一只美国船，却还说他是在帮助杰斐逊执行禁运措施！在英国的工业区，禁运曾经引起一些苦恼情绪，但各种通常的出口物品很快便找到了经由加拿大进入合众国的途径，英国船主们则很欢迎消除了美国竞争对手的这项措施。

禁运问题占据了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年，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尖锐棘手的麻烦。其实，实施这个匆忙制定的《禁运法》，几乎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政府要求加强其实施，国会立即作出反应，赋予总统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对美国人个人的经济事务进行管制。实施禁运的困难越来越多，加勒廷领导的部门负有贯彻《禁运法》的主要责任。因此他于 7 月底从纽约给总统写信道，如果禁运要继续下去，那就需要更为严厉的实施措施。加勒廷最后说：“国会必须赋予总统最专断的权力和足够的

力量来将禁运付诸实施，否则，就干脆全部放弃掉。”杰斐逊认同这位财政部长的看法：“这次禁运法律确实是我们迄今执行的最令人为难的法律。”

杰斐逊虽然尚未放弃禁运会起作用的幻想，但潮水般涌来的要求撤销禁运的请愿书使他目不暇接。在8月底至9月初的两个星期中，他答复了38个城镇的请愿书。由于请愿书大多，他不得不指示在华盛顿的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印好格式信件，以便他能继续回信作答。到了12月，总统收到199份反对禁运的请愿书。

杰斐逊的错误成了联邦党人的大好机会。他们的势力原是在一直不断地削弱，甚至在新英格兰也是如此——1807年在新英格兰，除了康涅狄格州之外，所有的州政府都落入了民主共和党人手中。联邦党人一直无法洗刷民主共和党人加给他们的那种要实行君主制和军国主义的污名，而且他们还由于很晚才开始发展有效能的政党组织而处于不利的地位。1801年费希尔·艾姆曾写道：“我们必须博取民众的好感。我们必须研究民意，并按照民意所趋来制定措施。”但是到了1807年，他就哀叹道：“我担心联邦主义不久将会死亡，而且所有关于它的记忆都将消失。”现在却出人意料，杰斐逊竟给了他们一个题目来做文章，大可借以赢得民心了。1804年时的密谋者、参议员皮克林，发表了一封激起新英格兰舆论的公开信，断然指称这次禁运乃是受拿破仑指使而由杰斐逊实行的，其目的在于消灭海运业者并使新英格兰陷入贫困。

1808年11月8日，杰斐逊向国会提交了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度咨文。他搜肠索肚，试图谈些禁运的有利成效，如它拯救了美国的船员和财产，使之免遭损失，而且给了美国以时间准备以便防御等，但这些措词显得苍白无力、牵强附会。而对是否继续这项有争议的措施，他拒绝作出任何表示。国会为此吵得一塌糊涂。面对这骑虎难下的局面，杰斐逊似乎束手无策，只好暗自神伤。

1808年的大选又款款而至。联邦党人抱着很大的希望投入了竞选。有一个新英格兰人在日记中写道：“竞选运动开始了。小册子像风暴中的野鹅一样到处飞翔。”北部的民主共和党人处在禁运措施使他们的选民倒向联邦党人这种情况下，变得很难领导了；而在纽约市，禁运已造成了民主共和党内的分裂。当国会中的民主共和党议员会议提名麦迪逊为总统候选人时，纽约州议会竟另提名反禁运的民主共和党人乔治·克林顿。在弗吉尼亚，约翰·伦道夫的那一派“纯粹的民主共和党人”则提名门罗，门罗是自从他所签订的条约被弃置后一直心怀不满的。当时如果这几派人能同联邦党人实现联合，麦迪逊说不定就被击败。但联邦党的候选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几乎仅只赢得除佛蒙特州以外的新英格兰各州以及特拉华州的选举人票。麦迪逊以122票对47票的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统。

杰斐逊想要继续实行禁运。1809年1月，国会通过了《强制法案》，允许不带搜查令状的联邦官员对可疑为运往国外的货物予以没收，并保障这些官员不因其行动而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大西洋沿岸各处码头都有监查人员巡逻，税务官员则取走风帆和拆卸方向舵。新英格兰人民这时已进入第二个艰难困苦的冬季，他们便开始盼望他们各自的州政府予以保护；到了这时，新英格兰所有的州政府又都落入联邦党人之手。那些州议会公然用1798年时《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所提出的理论，来回敬杰斐逊和麦迪逊。康涅狄格决议声称，“无论何时我们的全国性立法机构被导致逾越其

经宪法规定的权力界限”，各州议会均有责任“在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和中央政府所僭越的权力之间，设置它们的保护屏障”。1809年2月，人们开始讨论召集一个新英格兰代表大会以求废除禁运的建议。

到这时，禁运已经实行了14个月。北部的民主共和党人造反了，新英格兰各地的人们纷纷发表抗议，有的甚至以脱离联邦相威胁，使杰斐逊大受震撼。国会匆匆通过了一项撤销禁运的法令，随即于1809年3月1日由杰斐逊予以签署。3天后，他任期结束，告退隐居，回到蒙蒂赛洛去了。

杰斐逊原本有意要使这次禁运成为他的第二届政府登峰造极的光荣，一如他的第一届政府取得路易斯安那，但它却实际表现为令人沮丧的失败。杰斐逊试图拯救国家使其免遭损失，结果禁运至少使国家失去了5000万美元的贸易收入；他试图使美国人免遭外国人的侮辱，但他的禁运却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和责骂。这样的结果是杰斐逊始料不及的：既未能影响不列颠或拿破仑的政策，也没有对商船队起到保护作用。它毁坏了杰斐逊第一次执政的成果——在联邦各州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全国性政党。它竟使很多善良的人相信，“弗吉尼亚王朝”是同波拿巴王朝勾结在一起的；民主共和党对美国海运业来说，是一个比英国海上强权更大的敌人。杰斐逊总统不管可能做出什么或者疏于做什么事，他都决不会得到杰斐逊在1807年时曾经拥有的那种联合一致的支持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禁运宣告失败，不幸而成为杰斐逊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

第二十三章 远离权力

人民的纵容和依恋之情，会使一个人在他年老之后仍旧在位，终生一再当选将成为惯例，结果便形成终身制。华盛顿将军在8年后树立了一个自愿引退的榜样。我将追随他。而且有了更多的先例，就会形成一个惯例，这就使得那些妄想延长任期的人无计可施了。大概它也许引发一种用宪法修正案来把它制度化的意念。

——托马斯·杰斐逊

早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古代哲学家韩非子写过一篇论文，阐明先王们为什么讲禅位，后王们为什么追求终身制和世袭制。清代的黄宗羲更通俗地引申了韩非子的论点。他说：“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在担任过总统职务的人中，各人对总统一职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有人接受这个职位，是作为过去为国效劳的一种报偿，比如像乔治·华盛顿；有人当上总统则是出于对权力的追求、对虚荣心的满足，如约翰·亚当斯；有人却把总统这个公职喻为“伟大的痛苦”，比如托马斯·杰斐逊。

200年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君主政体，美国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主共和政体。

当然，美国的历史是美国具体条件的产物，但也不能完全排斥美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幸运。幸运之一，就是美国人民选择了人品正直的华盛顿和笃信民主的杰斐逊先后出任总统。

1787年宪法规定美国为总统制，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华盛顿是制宪会议主席，他支持宪法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之事。

杰斐逊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他当时正出使法国。他在巴黎从麦迪逊那儿获悉宪法草案后，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宪法必须添加一个人权（或权利）法案；另一是，总统不应连选连任，以防野心家借机成为终身总统。他希望在任总统“4年期满时，他们能使他永远不能有资格第二次当选”。但杰斐逊后来一想，意识到第一任总统必然是华盛顿，而华盛顿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最可靠之人，此时就规定不连选连任将意味着反对连选华盛顿，是极为不妥的，所以后来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第二条建议了。

华盛顿任两届总统后坚决引退。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争取连任失败，因而不存在自动引退问题。杰斐逊继任第三任总统，他也在任两届后自动引退。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很少知道美国历史上曾因总统称谓而大费周折。美建国之初，如何称呼总统，是总统阁下、总统殿下，还是其他别的专用称谓？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第一届国会在美国建国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居然花了不少功夫讨论对总统是否应当确定专用的尊称。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尚未正式就职以前，参众两院就各自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考虑是否应当给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加上宪法规定以外的尊称”。在华盛顿“御临”参议院演说后，有些议员提出为了表示对于总统的谢意，应当给总统一个尊严的称号，如“民像的君主陛下”、“民选殿下”、“合众美国总统殿下”或“合众美国权利的保卫者”这类名称，才能表示出总统的庄严。增加尊称的提议不只限于总统，副总统也得享同样殊荣。对于

虚荣心极强的副总统亚当斯来说，参议员提出加一个“副总统陛下”的尊称，使他沾沾自喜。而参议员们认为自己都是“人民权利的保护者”，也应当荣膺“参议院议员殿下”的尊称。参议院议员还认为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在政治待遇上应有区别。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在开联席会议时，上议院议员有资格坐着，而下议院议员只能站着，美国国会也应当以此为榜样。两个委员会在一起讨论之后，得出结论：在宪法规定之外另给总统和副总统加上尊称是“不适宜”的。这个结论得到众议院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

尽管如此，以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亚当斯为代表的部分参议员，仍然坚持要给总统一个尊称，认为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和受到尊重的政府”所必需的。亚当斯是一位学历深厚的政治学家，但他的一大缺点便是有极强的虚荣心。他在充任驻荷兰公使时，曾看到每一个官吏都有许多荣衔，因而他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一个共和国若不设荣衔便不能受到尊敬！当时，已有好几个州的州长按照各州的宪法，被尊称为“阁下”；因此，难道合众国总统不应该享有更高贵的称号吗？亚当斯指出，总统所享有的尊严应超过外交官。如果外国的普通老百姓可以直呼合众国总统的大名，“他们将永远看不起他”。在亚当斯等人的坚持下，参议院成立了第二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总统的称呼问题。这次它建议应称总统“殿下”。亚当斯促使参议院作出一项表决，把总统称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兼护权公殿下”。

杰斐逊被任命为国务卿后，对这种在“民主政体”的躯壳里，培育滋润君主政体的精神的企图极为反感。他目睹了社会的贵族习气浓厚，“宫廷式”的礼仪和尊称大有泛滥之势，对此十分担心。在参加了几次华盛顿政府豪华的宴席之后，他忧心忡忡：“我不能描写出这些宴席上的谈论使我充满怎样的惊奇和抑郁。谈话的主题是政治，宁愿在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中选择后者是一般流行的意见。我不能做一个变节者，也不能做一个伪君子，因此在许多场合中，我发现我是共和主义唯一的赞助者。”

品格高尚、目光远大的华盛顿总统是不赞成给总统加尊称的，他认为“总统先生”就很合适。幸而众议院对参议院的决定未表同意，这才使华盛顿也许大感宽心地保留了“总统先生”这一朴实的称谓。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民主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其就职演说中，称华盛顿是“我们第一个最伟大的革命者”。

杰斐逊曾为华盛顿盖棺定论：

“我认为我对华盛顿将军有直接的了解，而且了解甚深。他的思想境界很高，具有根大的精神威力……他正直无比，洁身自好，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公正不阿的人，个人利害、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个人恩怨不会影响到他的决定。说实在的，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人，而且要从上述字眼的全部意义来加以理解，”

杰斐逊于1801年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杰斐逊是不适合当官的，他也的确不想当官。多少次他都想回避政治，远离权力，回到他那心爱的蒙蒂赛洛山庄，过一种摆脱尘世纷扰、超凡脱俗的、安宁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但是他反对权力过度集中，主张民主、人权、自由，所以被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前台，被抛上残酷政治斗争的浪尖。

他同麦迪逊一样认为权力“具有腐蚀性”，确信权力会腐蚀掌权者。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你我以及国会和各州众议院、法官和州长均成为恶狼。这似乎是我们的一般的本性的法则，尽管有个别例外情况。”

杰斐逊的看法是，“人民的错误危害小于国王、教士及贵族的自利政策”。在私人书信中，由于无需顾虑，他坦率地讲，“正直的共和政府在惩治叛乱时”应当“温和，切勿过分压抑之”。“不时发生一点叛乱实是好事，它对政治界的必要性恰如风暴之与自然界”。人民并不完全了解情况，即使因误解而使他们发生动荡，也比无动于衷要好——因为人民无动于衷就意味着共和国的死亡。杰斐逊的政治哲学还深刻而鲜明地体现在他自己这样一句名言之中：“我曾在神坛前起誓，对于任何形式的针对人的心灵的专制我都将反对到底。”

从他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杰斐逊对权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早在1806年11月初，即中期选举前夕，全国到处在举行民主共和党会议，纷纷通过决议，致函总统，恳求他在第二任期届满后不要辞职。各州州议会也提出了请求，先后有9个州和1个准州迫切要求总统再留任4年。在伯尔阴谋分裂联邦之事败露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这种呼声在美国跟英国的危机加剧时再次得到加强。

除了国家面临外来的危机外，民主共和党内的分裂也促使提出杰斐逊连选连任的请求。随着对联邦、对和平的威胁的日益显露，这些恳求声浪也就逐渐增高，而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一位有影响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利琅，在1807年“切萨皮克”号船被袭造成的危机期间，写信给杰斐逊说：“现在的事态和形势明摆着，你绝对不能拒绝再连任总统……人民拥护你的声音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

施加压力要他谋求第三任期的运动不断出现新的发展。直到1807年12月与1808年1月，杰斐逊才公开对前一年收到的信函和请求作出答复。当时他的答复仅限于对州议会的请求。他给州议会写信说，他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放弃他的职务，同他忠诚地担负起这个职务一样，都是他的职责。如果宪法和惯例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他担心总统的职务会变成终身的。他说：“我不愿当无视光芒四射的前任所树立的表率而开创总统职务超过两届任期先例的人。”

约翰·亚当斯在1804年大选结果揭晓之后，甚至推测杰斐逊到1808年参加第三次竞选，也一定有获胜的把握。但是，杰斐逊却没有参加第三次竞选的打算，他相信，一个总统如果连任两届以上，就会危害民主。在1804年那次选举计票之前，他就告诉朋友，他决不参加第三次竞选。

杰斐逊在1805年致约翰·泰勒的信中表明了他这个心迹：“我原来的主张，是合众国总统应当被选任职7年，然后永远失去被选资格。后来我开始意识到7年太长……而且如果在中途做坏事也应该有一个和平的方法去罢免他。在职8年，在头4年末可以离职——这个办法接近我根据经验所得出的原则。正是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我才决定在我第二任期届满后退休。”

此外，杰斐逊和华盛顿晚年一样，也感年事日高，精力衰退，不足以应付繁重的公务。他把总统视作“苦役”。1807年初他在写给约翰·迪金森的信中说：“还要再忍两年。对于现职，我不见得比其他许多人更能有贡献，我已厌倦了……说到我个人，总统职务除了使我终年劳苦以及朋友越来越少之外，还有什么呢？”1808年，他又写信给门罗说：“我盼望退休，如饥似渴；逐日面对劳苦的公务，简直不耐烦了。”

编辑托马斯·里奇十分钦佩总统的声明，他在里士满的《询问者报》上

写道，如果杰斐逊同意由于紧急情况而留任，那么“德行欠佳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遥远地平线上任何正在下落的微粒，或虚构某种假设的危险，利用同样的借口来掩盖他的野心。杰斐逊先生的引退，打掉了他后任者可以利用的这种巧言虚浮的借口。他们可从杰斐逊的榜样中看到，任何危机，不管有多大危险，也不管有多大的战争可能性，都不能证明延长任期是名正言顺的”。

杰斐逊毅然决然地退出这场竞争，使早在进行的继任总统的竞争不再受到约束。1807年11月，在民主共和党内，詹姆斯·麦迪逊在已确认杰斐逊无意参加竞选之后，忙于举办宴请，频频亮相，开始为争取提名做准备；詹姆斯·门罗正在自英国返回途中，忙于推举他的约翰·伦道夫正四处奔波，为门罗进行游说。

据民主共和党国会议员所作的非官方统计，表明麦迪逊将任美国下届总统。麦迪逊过去8年一直是杰斐逊的国务卿，他非凡的才智早已为党内外所公认。杰斐逊支持麦迪逊参加竞选，但他却非常谨慎地回避直接参与这场运动，唯恐给人造成利用总统之职施加“不公正的影响”之嫌。麦迪逊得到了民主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但是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和驻英公使詹姆斯·门罗的一些支持者都拒绝放弃他们的候选人。最后，大选结果表明，麦迪逊大获全胜，得了122张选票，联邦党人查尔斯·平克尼得47票，乔治·克林顿只得6票。

当杰斐逊得知国家总统之职的接力棒即将交给长期风雨与共的好朋友麦迪逊时，不禁心满意足，如释重负。事实证明，麦迪逊是杰斐逊的化身和延续。

杰斐逊自从公开宣布他决心第二任期届满即退以后，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甚至在他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有意放弃领导权，其部分原因可能是极为不满当初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做法。亚当斯总统在任期行将届满时，把空缺的职位都填补无遗，见缝插针地安插亲信，使继任者深受其累。而杰斐逊自己在1808年12月就对可以拖到第二年3月4日的空缺职位全部停止安排。但是，有人对他这种做法也颇有微词，称他这样做损害了总统的声誉。

杰斐逊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给国会和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就在杰斐逊引退前夕，国会议员约翰·雷亚在田纳西州向他的选民们发表演说时，情不自禁地称赞杰斐逊政府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政府”，并“尽量使美国人民体面、幸福、伟大和独立，乃是杰斐逊先生政府的目标”。这是杰斐逊可以感到满足和自豪的。

当卸任的最后一天终于临近时，他反复地表示日益感到的宽慰之情：“我将摆脱一件我不再适合的辛苦工作，恢复我的宁静生活，生活在家庭成员之中、朋友之中，这更适合我的年龄和本性的爱好。”在他结束办公的前一天，他这样写道：“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家、我的书屋和我的农场那里去了……解除镣铐的囚犯也绝不会像我摆脱权力的桂桔那样感到如此轻松，”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里，令人烦恼的禁运使杰斐逊心烦意乱，蒙蒂赛洛就更加令他神往。

杰斐逊对蒙蒂赛洛的怀念，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杰斐逊18岁以前，一直没离开过弗吉尼亚的边疆，从来没见过拥有20户人家以上的村庄。在杰斐逊看来，自耕农是美国平等观念的化身，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天赋人权的捍卫者和合适的继承者。他在《弗吉尼亚纪事》

中写道：“如果说上帝有选民的话，那么，那些在耕种土地的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他的胸怀为上帝所造，洋溢着上帝在那里撒播的最美好的品德。”

相反，他认为，那些居住在城镇的人，或从事商业、在土地之外从事制造业的人毫无美德可言。杰斐逊如是说：“这是一些人的特征，他们不像牧民那样依靠上苍、土地和勤勉获取生计，而是依靠坑害顾客、依赖顾客的冲动赚取财富。”这些人才背有道德败坏的罪名。这种人不仅品质堕落，而且是建立暴政专制的温床。“这种消极依赖的态度，导致阿谀奉承和唯利是图，窒息美德的萌芽，也是各种野心的温床”。

在杰斐逊看来，依赖性城里人、商人和手艺人主要的罪过，而独立性是美国小农的主要特点。在一个小农身上洋溢着鹿皮马裤散发出的气味，洋溢着砍伐树木和开垦田地留下的土地的芳香，洋溢着适应荒野的勤勉的气息。因此，杰斐逊一生都在寻求一种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大自然的质朴生活。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说：

“我们不难看出杰斐逊一生中伟大的信念——对于民主的坚定信念，是怎样降临于他的。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西方的人物；他和那些善于管理本乡本土的人，共同地生长起来……杰斐逊热爱着他们这些边疆的邻居，因此也被他们深爱着。”

1809年3月4日，杰斐逊带着他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乘坐马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前往国会大厦参加他的继任者麦迪逊的就职典礼。在新竣工的众议院大厅的站台上，杰斐逊坐在麦迪逊的旁边。举目望去，人头攒动。杰斐逊如此平静地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新总统的就职仪式上，与8年前的那一幕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是继任者时，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竟不顾礼仪，不愿看到权力由他手中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居然在那天早上凌晨4点就不辞而别，溜之大吉了。

如今，这位行将告退的总统注视着首席法官马歇尔主持他的继任者的就职宣誓，他兴许在回忆他自己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和自那以后的多少风雨、多少变迁，他可以感到满意的是，他基本上是成功的，实践了他就职演说中的诺言。他给国家指明了新的方向，使新生的美利坚删繁就简，拥有一个节俭而质朴的政府。他把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展了一倍，防止了分裂，面对英国和法国蛮横无理的挑衅仍耐住性子。他留下的是团结、和平的理念追求。他可以确信，这个有7000万人口居住的国家，有着可供子子孙孙扩展的空间，保证了“自由王国”的世代相传。

毋庸讳言，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禁运的失败给他长期的从政生涯带来了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结局。他曾遗憾地对弗吉尼亚州议会说，他离开时没有能使国家得到持续和平的保证。但杰斐逊仍不失为一位最伟大的总统，而且也是一位最富宽容精神的革命家。几乎不曾有人在他那样的程度上，将高尚的理想与执政的才干结合起来。他处心积虑地宁愿采取合乎理性的缓慢的进程，而回避诉诸暴力的捷径。

他对权力的淡泊完全可以使那些疯狂的权力追逐者自惭形秽！

仪式结束后，大家参加了麦迪逊的就职舞会，杰斐逊也饶有兴趣地加入其中。这是自妻子死后，杰斐逊第一次跳舞。

“我是否来得太早了？”他问一个朋友，“你得告诉我怎么跳，因为我已40多年未进舞场了。”客人们看见杰斐逊跳得兴高采烈，浅笑低语，再看

看麦迪逊那张苍白、若有所思的脸，有些惑然。杰斐逊微笑着打趣道：“我刚卸妆，他则刚刚上装。”

新闻记者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详细记录了在詹姆斯·麦迪逊就职舞会上所见到的杰斐逊。她在给她姐姐的信中写道：“麦迪逊在仪式上手在颤抖，但当我看到我们亲爱的令人尊敬的杰斐逊先生时，心怦怦直跳……当他看见我时，他从人群中挤过来，抓住我的手，足足五六分钟之后才松开。”麦迪逊“在开始讲话时脸色苍白，双手明显地抖动，但很快他便恢复了自信，声音才大了一些”。“而杰斐逊先生则仪态优雅、得体，如释重负，显然对其继承人极为满意”。

“先生，能赏光和我跳一曲吗？”一个悦耳的女声从身后传来。杰斐逊转过身去，发现是麦迪逊的夫人，他异常兴奋他说：“当然，夫人，我很乐意。”

多利·佩恩夫人知道杰斐逊先生平时缺乏幽默，感情藏而不露，难得他有这么好的兴致。

麦迪逊是杰斐逊多年来的好朋友、政治上的同盟者。杰斐逊为麦迪逊当选而高兴，当然他也为麦迪逊能有多利·佩恩这个好伴侣而高兴。1782年，麦迪逊向15岁的凯瑟琳·弗洛伊德求婚，遭到拒绝，情场失意使他很沮丧，从此锁住自己爱心的门户达12年之久。这期间，杰斐逊给予他许多关心和安慰。1794年，43岁的麦迪逊遇见了26岁的寡妇多利·佩恩，并一见钟情。

多利·佩恩1768年5月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22岁时同律师约翰·仕德结婚，生了两个孩子。1793年，她丈夫和一个孩子死于黄热病。后经当时为参议员的艾伦·伯尔介绍，她与麦迪逊相识。多利·佩恩比麦迪逊小17岁，她的个子比麦迪逊高出一头。她美丽端庄，性情活泼开朗，而麦迪逊却是干瘪瘦小，貌不惊人。身高只有1.64米，体重45公斤，外号“小吉米”。当时美国的名作家华盛顿·欧文干脆称他为“一个干瘪的小苹果”。麦迪逊的春天虽然是迟到的，却是最美、最灿烂的。麦迪逊夫妇两人性格迥异，但家庭生活却很美满。麦迪逊平时不苟言笑，因为有了活泼、热情、大方、善交往的多利·佩恩，他们的生活圈子一夜之间就扩大了，家里常常是鸿儒白丁，高朋满座。杰斐逊当总统时，因夫人早逝，常常请这位国务卿夫人作为白宫接待宾客和宴会上的女主人。

据说，1812年，在第二次反英战争中，多利·佩恩在英军即将进入首都华盛顿的前一刻，才从白宫撤离，表现得从容不迫。临走前，她还从墙上摘下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带走了美国《独立宣言》原稿和丈夫麦迪逊的许多重要文件。这些宝贵的重要历史档案，由于她的勇敢才得以保存下来。

麦迪逊卸任后，多利随夫返回弗吉尼亚，1836年麦迪逊去世后，多利·佩恩重返华盛顿，再次投入华盛顿的社交界。美国国会为纪念麦迪逊的功绩，在国会为多利·佩恩专设固定荣誉席，她是美国总统夫人中唯一获此项殊荣的人。1849年7月12日，多利·佩恩去世，享年81岁。

在华盛顿任职时，杰斐逊在书房里养了一只模仿鸟，他教这只鸟站在他肩上，甚至从他的嘴边啄食。杰斐逊不仅爱花，而且爱鸟，总之，他不能没有所爱的东西。1809年3月，杰斐逊终于告别白宫。当从他所称的“权力的镣铐”中解放出来时，他把心爱的鸟儿也放出了笼子，看着那只小鸟扑腾着翅膀，展翅高翔，杰斐逊心里百感交集，嘴里喃喃道：终于自由了，可以回家了。

归心似箭的杰斐逊等不到天气放晴，就迫不及待地冒着暴风雪踏上了回家的路。由于道路坎坷不平，马车常常深陷泥泞。

杰斐逊不得不解下马，弃车而去。他骑上马在迷眼的暴风雪中穿行了 8 个小时。这次是解甲归田，与 1794 年因与汉密尔顿争斗而被迫离开完全不一样。他这次回来欢欣鼓舞，心满意足，全副身心地准备叶落归根了。

家乡的百姓得知杰斐逊卸任而归，专门准备了正式的欢迎辞，欢迎他回到故乡。然而有些人却公开敌视他，闲聊他与黑奴情妇的风流事。因此，杰斐逊曾故意回避乡亲们热情欢迎，推辞说他不知道具体哪天才回到家乡。

但他发现家乡人民的欢迎辞恳切感人，回到家两周后，66 岁的他写了情深意切的回信：“亲爱的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到你们热情的欢迎，我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职位的浮华、混乱、奔忙和显赫，使人失去宁静的个人生活。我深知和你们在一起其乐无穷。我相信，我的邻居和朋友们，可以自由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这种欢乐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使我们感到幸福甜蜜。为了这些，我心甘情愿地远离权力。”

女记者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和丈夫在 1809 年 8 月 1 日，即杰斐逊退休后约 5 个月时，拜访了杰斐逊。杰斐逊带他们参观他的个人图书馆，雅兴甚高。谈到能自由快乐地安排生活，他由衷他说：“我的生活一直在和我的爱好、感情和愿望相冲突。家庭生活和文学爱好曾是我第一也是我最后的爱好……就像一把琴弓，虽然已很早就弯曲了，但当解去弦松开时，又会回到自然状态。我高兴地恢复了自然所赋予我的性格和爱好。”

玛格丽特说：“我见到了，聆听了，最了不起、最伟大的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真正的智者，他的心静如水，淡泊如镜。”

最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开创的两任先例，经杰斐逊再次肯定后，一直成为美国的惯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之需，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予以打破，并终于精疲力竭，病死任内。1957 年，美国通过宪法的第 22 条修正案，正式规定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即共两届）。在这一点上，杰斐逊又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十四章 寂寞高处

我已厌倦讲自己的事了。

——托马斯·杰斐逊

少年子弟江湖老。

回想当年凭着年少气盛，为寻找理想在外闯荡，负笈他乡，40个寒来暑往，弹指一挥间。虽然其间偶尔抽空回家一趟，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总觉像是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杰斐逊终于一路风尘回到了家乡。

然而，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当杰斐逊迫不及待地回到蒙蒂赛洛时，等待着他的并非全是幸福平静的晚年，相反却是无尽的烦扰和凄枪。就像一位年迈的远行者，当登上山顶环顾四周时，内心不乏自豪和骄傲，但同时也发现，高处不胜寒，孤独、衰老，囊中空空，前面的路更加困难重重。

杰斐逊在当总统期间，不时因传来的死讯而伤感。老朋友像萨姆·亚当斯、埃德蒙·彭德尔顿、斯蒂芬斯·梅森和曼·佩奇等《独立宣言》的签字者相继离去。就在杰斐逊当选总统之前的几个月，与他一样的年纪、在威廉-玛丽学院时与他形影不离、之后多年来又一直是他的忠诚车夫的丘辟特，在生了9天病之后也死了。他的死，给杰斐逊的日常生活留下了一处“没法填补的空白”。另一个家奴詹姆斯·赫明斯也死于1801年。

1801年，杰斐逊身患痼疾，他自认自己已来日无多，注定要早亡，但对医生保密，对自己的病缄口不言，以坚强的意志仍坚持每天骑马两小时，以使自己放松一些。后来他真熬过了这一关。1804年，杰斐逊的姐姐玛丽在1月去世。4月份，他心爱的小女儿玛丽早亡，同年7月，艾伦·伯尔在决斗场上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枪击毙。1809年，曾远征西部而成为英雄人物的梅里韦瑟·刘易斯自杀身亡。所有这些人，不论从哪方面讲，都对杰斐逊有影响。

年龄在增长，然而杰斐逊对上帝的相信却并没增加。小时候关于上帝的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减，宗教所宣传的病痛是对个人罪恶的惩罚的思想也渐渐消退。然而在个人悲剧一再出现时，似乎最初那种“好心”与“歹心”的所谓惩罚的冥冥之忧又回归了。

杰斐逊对其姐姐玛丽·博林并不十分喜欢。她的丈夫又是个酒鬼——用玛丽的话说，“酒杯在手，忧愁全无”。他们曾分居多年。杰斐逊曾给姐姐写信，要她容忍丈夫的恶习，以便让他离酒瓶子远一些。玛丽去世时，杰斐逊的二女儿玛丽已有身孕。

玛丽·杰斐逊是第二个得以长大成人的孩子，长得很像母亲，人们都认为她的样子十分可爱，家里人都叫她波丽。她的生活由于姐姐玛莎而显得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她总是生活在姐姐的影子里。为了使玛丽放心，并且消除她那种总是和玛莎竞争的恐惧心理，严厉而慈祥的父亲从白宫给她写信说：“不，你绝不要以为我对你们姐妹俩有什么偏心。你们俩都具有那种使我全身心地爱你们的气质，而且你们都是那么完美，绝不可能有哪一个能独占了我全部的爱。”他的这封信写在她去世前不久，那时，她正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无论怎样培养，17岁的二女儿玛丽与父亲的感情远远淡于大女儿玛莎和

父亲的感情。1797年，玛丽深深地爱上了她的表哥杰克·爱泼斯，却生恐父亲不同意，而苦于缺乏勇气告诉父亲。

果不其然，杰斐逊欣赏的是另一个人，那就是杰斐逊在议会中的朋友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威廉也对玛丽情有独钟，并积极向玛丽求婚。玛丽知道父亲的心思，不便直接告诉父亲，只好求助于姐姐玛莎。

当杰斐逊接到玛莎的来信、得知玛丽爱上杰克一事时，似乎感到受了伤害，这是因为玛丽没有直接给杰斐逊写信。于是他给玛莎，而不是给玛丽回信说，这取决于玛丽自己的选择。杰斐逊虽然对子女要求极严，但在婚姻问题上却是很开明的。

1797年10月13日，玛丽和杰克静悄悄地在蒙蒂赛洛举行了婚礼。杰斐逊给女儿的嫁妆是26个奴隶，一些马匹、耕牛和猪，以及800多公顷的土地。玛丽和杰克婚后住在埃皮顿，离杰克的父母不远。这桩婚事更进一步加强了杰斐逊家族与威利斯家族（玛丽母亲的家族）之间的关系。这些联姻家族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无疑象征着弗吉尼亚州乃至全美的首要权势的源泉。

杰斐逊姐姐玛丽的死讯，是二女儿玛丽写信告诉杰斐逊的。其实杰斐逊早已有所预感，但还是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他心里更惦记着女儿玛丽的生产，因此回信时竟对姐姐的死只字不提，却让女儿找一个好的接生婆。他还安慰女儿，以期减轻她的恐惧。他在信中说：听你妈妈的女性朋友们讲，分娩不过“像是被手肘敲击一下”。

接近临产的玛丽承认自己“心情欠佳，身体似乎也不太好”。但她又怕父亲担心，于是写信安慰父亲：“你给我的8棵刺槐树就放在寝室，长得很茂盛，它们象征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每当看着它们，我就对生命充满无限的热爱和依恋。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也会挺过这一关。”

殊不知，玛丽的生命之树已经枯萎。

1804年2月，玛丽产期临近了，杰斐逊要爱泼斯不必等到议会休会，应赶回家去照看。爱泼斯星夜兼程往回赶，但路遇大风暴，迷了路。当他终于赶到埃奇希尔时，玛丽已在2月15日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儿取名玛莎。

由于想起妻子患病后逐渐失去活下去的信心，杰斐逊对女儿的情况极为担心，只好每天祈祷：“上帝保佑你，我的宝贝，上帝保佑你平安，这将是我們全部的祝福。”

当国会一休会，杰斐逊就风尘仆仆地往家赶，4月4日到家，他希望自己的出现能重新燃起女儿的生命之火。4月13日是杰斐逊61岁的生日，他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但回天乏力：玛丽人事不省，仍然高烧不退。

4月17日上午8点，年仅25岁的玛丽心脏停止了跳动，追随她母亲去了。巨大的悲哀又一次向杰斐逊袭来，好久连话也说不出。女儿死后不到两个月光景，杰斐逊在给老朋友约翰·佩奇的信中写道：玛丽的死使我“失去了我的一半”。他甚至担心玛莎也会离他而去，那种油然而生的白发送黑发的悲痛和伤怀，久久萦绕在心里，他情绪低落，百无聊赖。“每走一步，我们的旅途就越短”，“我们的夏天已不多了，命运之神已在向我们招手”。这些令人伤心落泪的话，是他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如此一来，杰斐逊更强烈地一心热爱自己唯一幸存的孩子——玛莎，把她当作自己全部的感情依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共度余生。

玛丽之死还勾起杰斐逊一桩辛酸的往事，那就是他未能满足女儿当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个小小的请求：待雕塑家圣梅明来华盛顿画像和雕塑时，请

这位艺术家给父亲画两张像，一张给姐姐，另一张给自己。“由于常同你分离，要是能有一张肖像佳作，你知道我们会多么高兴啊！”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这么说，“我想你是不会拒绝的。这是我们一生中一直最希望得到的。”由于特朗布尔曾在巴黎画了一张杰斐逊的像给玛莎，玛丽希望有两张，是不想使父亲感到自责，因为玛丽一直就感到父亲喜欢姐姐胜过喜欢自己。然而，直到1804年11月，那位艺术家才辗转来到华盛顿作画，杰斐逊为自己安排了一次画像。这时，女儿玛丽已走了7个月了。

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他的法律老师乔治·威思被谋害，也使杰斐逊伤心至极。乔治·威思是杰斐逊最敬爱的老师兼朋友。1806年6月4日，杰斐逊收到威廉·社瓦尔从里士满写来的信，称威恩因被毒害，生命垂危。而下毒者竟是他甥孙乔治·斯韦奈因财产纠纷所为。威恩没有孩子，他在吃草蓷、喝咖啡时不知不觉地就中毒身亡了。

杰斐逊一生经受的死亡打击太多了。他不得不顶着高龄和苍老，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对自己极为重要的生命的消失，这其中，有同龄人，有年迈者，更有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亲人。

杰斐逊退休后的快乐生活，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大女儿玛莎。玛莎一家在1809年搬进蒙蒂赛洛。她俨然是这个庄园的“女皇”，掌管着庄园里的一切。她不断怀孕，在1818年之前，每一年或18个月就要生一个孩子，一直生了12个，其中11个长大成人。

不幸的是，杰斐逊与大女婿伦道夫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794年8月，伦道夫莫名其妙地患病。他四处求医，第一次就到波士顿，随后又从弗吉尼亚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到另一个矿泉疗养地。后来发现，伦道夫有些精神失调。有人认为，因为他和他岳父杰斐逊住在一起，加重了他这种精神上的压力。而对玛莎来说，父亲总是第一位的，她有意无意地总喜欢把丈夫伦道夫和父亲相比，伦道夫的缺点和不足就更显突出。

1795年10月7日，杰斐逊借了1248镑给伦道夫治病。他还准备把两个外孙安妮（4岁）、托马斯·杰斐逊（将近2岁）接到蒙蒂赛洛去照看。伦道夫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简直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让杰斐逊抚养他的孩子。玛莎也感到有些羞愧和难堪，因为她的丈夫从钱物上讲，几乎没有对孩子的成长出什么力，虽然伦道夫在华盛顿时病情大有好转。

1802年，杰斐逊的两个女婿双双被选进弗吉尼亚州议会。爱泼斯接替了因病离职的威廉·布兰奇·贾尔斯，他曾是玛丽的追求者。伦道夫在阿尔贝马尔的选举中轻易击败了杰斐逊忠实的朋友塞缪尔·卡贝尔。塞缪尔却指责选举有舞弊嫌疑，于是议会组成一个调查小组进行调查。5个月后，伦道夫才正式就职。当然，伦道夫的精神病十分保密，事实上，除家人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的许多邻居看来，伦道夫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农场主，特别是他首先使用了防止雨水冲蚀土地的循等高开沟法等富有创造性的农耕新工艺。

伦道夫也有过短暂的辉煌，那是1819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时候。1819年，他竞选弗吉尼亚州州长成功，1820年和1821年又以微弱多数连任。即使是在这段时间，他也从没给家里寄钱回去，而是不断地接济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挥霍无度的朋友。从他第二任开始，伦道夫开始酗酒，公共形象每况愈下。1822年11月21日，他甚至在给杰斐逊的信中暗示自己可能自杀。

同时，伦道夫的债务也是有增无减，当他离开州长一职时已欠下3.3万

美元。加之旧病复发，只好让儿子替他处理一切事务。他越来越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他拒绝去蒙蒂赛洛，直到最后断绝了所有与岳父和儿子的往来、交流。当他儿子被迫出卖埃奇希尔和瓦里纳地产时，伦道夫已成了妄想狂，他指责杰斐逊和他儿子联合起来阴谋害他。

伦道夫在妻子面前“易发脾气”。他对女儿充满慈爱，而对儿子，特别是大儿子（也许是因为大儿子也叫托马斯·杰斐逊的缘故），却常常以鞭相待，甚至儿子已长大成人之后，还得挨父亲的鞭笞。杰斐逊因自己已债台高筑，无力助大女婿一臂之力，只好安慰他，恳请他到蒙蒂赛洛去休养。但伦道夫直到杰斐逊会世也没去。

晚年的杰斐逊，其债务更是有增无减。早在 1795 年，杰斐逊欠债就已超过 7500 英镑，同年又增加了 1000 英镑。为此他常沮丧不堪。到了总统第二任期届满之际，他甚至不得不去借 8000 美元，以清偿他离职时在华盛顿欠下的债。1815 年，即国会图书馆在 1812 年战争中被英军付之一炬之后，他忍痛把自己苦心积攒下来的 6000 多册书，以 23950 美元卖给国会，其价还不到拍卖价的一半。他把卖得的钱用于偿还欠威廉·肖特和撒迪厄斯·科斯基科的债务。尽管如此，这笔钱很快也就用光了。

然而，杰斐逊发现空空如也的书架难以忍受——“我不能没有书”，因此，尽管他已捉襟见肘，却又开始拼命买书。仅 1816—1817 年一年中，杰斐逊就花了 480 美元来买书。

一年四季，蒙蒂赛洛门庭若市，来访者和亲朋好友在此短则数日，长则数周、数月。这笔招待费的开销，无疑使杰斐逊的债务雪上加霜。由于来往客人甚多，杰斐逊在其波普拉森林种植园建了另一幢房子，专门用来接待来访者。年轻的外孙杰斐逊·伦道夫眼睁睁看着父亲和外公都将面临破产，于是竭力说服父亲把埃奇希尔种植园全部种烟草，出卖一部分奴隶。杰斐逊和伦道夫对这一建议都“大吃一惊”。最后属于伦道夫的埃奇希尔和瓦里纳种植园还是被迫卖掉了，杰斐逊却不愿卖掉他的奴隶，直到他死之前，他庄园里的奴隶一个也没存被推到奴隶市场上去过。

杰斐逊在 1820 年写给阔别已久的玛丽亚·科斯韦的信中，称自己是“蒙蒂赛洛的庄主”，流露出除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外，他还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独享其乐。但这种欢乐却沉淀出疲惫和沉重。

在他退休之初，他的朋友们希望他能立即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他一再拒绝：“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这一点和亚当斯一样，亚当斯认为写自己毫无意义：“我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眼里是一个充满虚荣心理的小孩，我不能忍受这种形象。”

杰斐逊最后在 77 岁时还是开始写自传了。他对于讲述自己的个人生活很反感。他的自传只写了 60 页，当写到 1789 年告别巴黎时，他就再也不愿写下去了：“我已厌倦讲自己的事了。”

1823 年，二女婿约翰·爱泼斯去世，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杰斐逊的伤感是肯定的。

当外孙女安妮·班克黑德于 1826 年 2 月 11 日去世的消息传到蒙蒂赛洛时，杰斐逊又一次陷入悲痛的漩涡。他对着窗外清冷的月光，叹曰：“上帝为何把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我们头上？”最让人痛心的是，安妮是被她丈夫虐待致死的。据说，她丈夫班克黑德常常打她，甚至当着她妈的面打她，成天酗酒，有一次还企图拿刀杀人。

78 岁时的一天，杰斐逊想到外面去散步，不料一脚踩空在断缺的阶梯上，旋即摔倒，左手手臂骨折，红肿、僵硬了好长一段时间。34 年前他的右手也是如此。杰斐逊的信写得显然比以前少了，但仍不忘给约翰·亚当斯写信，倾吐衷肠。他说：“年轻和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前列腺肿大使他行走越来越困难，但仍坚持骑马。一次，他的马在激流中摔倒，杰斐逊被摔坏的手腕幸好被僵绳缠住，不然差点淹死。骑马成了杰斐逊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锻炼方式。82 岁时，他一天还骑 10—15 公里。另外，烦人的消息也真是太多了。遇上不快，他便上马扬鞭，飞奔而去，以发泄心中的郁闷。

被称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法国革命家拉法叶特，67 岁时被詹姆斯·门罗总统邀请访问美国，他在昆西与亚当斯聚了一天，却在蒙蒂赛洛和杰斐逊呆了 6 个星期。1824 年 11 月，人们看到拉法叶特和杰斐逊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重逢的情景，他们自 1789 年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不久就没见面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行动不便的杰斐逊坚持亲自出门迎接拉法叶特。当他们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得落泪。

虽然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自伦敦一别之后，再也没有重逢之缘，但杰斐逊一直惦记着玛丽亚，关心着有关她的消息。

1790 年 4 月 27 日，杰斐逊收到一封伦敦友人写的信，告诉他玛丽亚怀孕了：“这位小姐第一次有了孩子，她身体极差，现在已完全恢复了。”这时，杰斐逊的周期性头痛病发作，持续了差不多 6 周。病还未好，他又收到玛丽亚·科斯韦的信，她在信中责备之情溢于言表：“我担心亲爱的朋友已把我忘掉了吧！自从分手后，音讯杳无！”信中只字没提她怀孕之事。

玛丽亚于 1790 年 6 月生了一个女儿。3 个月后，玛丽亚就和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卢基·马凯希一起去欧洲大陆了。此后 3 年半中，她没再给杰斐逊写信。

由于杰斐逊和玛丽亚的兄弟、年轻的建筑学家乔治·哈德菲尔德认识，因此他偶尔从乔治那儿得知玛丽亚的情况。1793 年，玛丽亚进了一个修道院当修女，她让丈夫把女儿抚养成人，并信天主教。

令人惊奇的是，科斯韦还是继续给他的妻子寄钱去，直到 1794 年他一病不起。玛丽亚只得回来照看丈夫和女儿。

天真活泼的女儿 6 岁时猝死，科斯韦受到很大打击，开始出现精神错乱，最后完全精神失常。玛丽亚回到巴黎，她想再次树立起自己的画家形象。这一切都失败后，她又迈进了里昂一所修道院，后来又转到意大利的洛迪。她在那儿向不少有影响的意大利人筹资，以建立一所女修道院。她只是偶尔到伦敦照顾科斯韦。科斯韦已完全疯了，胡话连篇，语无伦次。在这段时间里，玛丽亚时不时地给杰斐逊写信。而杰斐逊的信则写得越来越少，有一次竟隔了两年才回信。

在这些最后的岁月里，1823 年杰斐逊收到玛丽亚·科斯韦的信，说她在意大利洛迪修建的修道院已经完成。但杰斐逊没有回信。1825 年 2 月 21 日，玛丽亚最后一次来信，请求杰斐逊给她寄一幅蒙蒂赛洛或弗吉尼亚大学的图画去。但杰斐逊仍然一直没回信，也许他觉得这些图画挂在她的修道院中太不相称。

杰斐逊在并不平静的晚年中，还得知一件震惊弗吉尼亚上层社会的丑闻：他大女婿的妹妹安妮·卡里·伦道夫和其表兄比扎雷·理查德·伦道夫，

因杀婴罪而被起诉。理查德·伦道夫和他的表妹朱迪思·伦道夫结婚。朱迪思·伦道夫因孩子死了而悲观失望，情绪低落，因而开始吸毒。小妹妹安妮·卡里成了第三者。她的私生子被发现死了，有证据表明理查德·伦道夫早些时候买过堕胎药。所幸的是，帕特里克·亨利和约翰·马歇尔为之辩护，最后宣判无罪。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年迈体衰的杰斐逊凭栏远眺，万千思绪皆化作满目苍凉。也许他的感受同中国古代文人们一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第二十五章 创办大学

知识就是力量，愚昧就是软弱。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爱好广泛，博学多闻，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更是情有独钟。

1818年，他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作用做了深入、具体的论证。他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所取得的知识和新发明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每一代人都把新的知识储存到这个知识宝库中去。这样，知识的积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因而人类幸福的增进是无止境的。的确，我们只要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这半个世纪内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步。其中某些进步使得物质要素本身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使得人们不但利用它去节省劳力，而且还能利用它去完成人类本身的微薄力量所无法完成的工作，因而大大增加人类生活上的舒适。”

杰斐逊不但重视科学技术，而且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出使法国期间，他定期向国内科学界的朋友寄送欧洲出版的最新科学技术书刊，提供新的科学信息。

为了促进美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应用，他又致力于创办一个“农业协会”，其宗旨是“推进这个技术的传播，并且借此用现在使用的劳动为我们同胞取得更多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和幸福”。

他还是“美国哲学协会”主席，为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公务倥偬之余，他还从事科学观察和创造发明活动。

他涉猎甚广，从认识论到机械学无所不包，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后者。他对计算、测量、观测都极其着迷。他有一次写信给女儿说：“每一簇嫩草都会引起我的兴趣。”他的价值标准是讲求实用，他说：“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其文化土壤上添植一棵有益的树木。”

如前所述，他自己动手设计住宅；深入有效地研究了手下奴隶的工作，使他所经营的农场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他在任驻法公使期间，就把种子和植物寄回国内，以供实验之用。他还是个有心人，注意改进农机。他发明了大麻纤维拍打器，还发明了一种阻力最小的铸板犁，这一设计“标志着由尝试错误的发明，过渡到按照科学法则的发明”。他因此获得了法国塞纳—瓦兹省法兰西农学院的奖励。他还设计了一种皮制轻马车车篷、一种旋转椅及一种旋转碗碟架。他对旅途上所见的农场、庭院、社会状况甚至风花雪月等自然现象，都有详细记载。一个名叫艾伯特·杰伊·诺克的人，对杰斐逊在这些方面的兴趣评价说：“对于西欧的一草一木，只要有用，他都研究，并且还要研究其栽培情况。”

杰斐逊长期坚持每日记录温度及气压数据。他津津有味地钻研改进新的犁耙、蒸汽机、节拍器、温度计、升降机以及诸如此类的器具，此外，他还研究过黄油和奶酪的加工工艺。他为国会撰写了一份论述美国衡具、量具标准的论文，以及一篇关于调查设计报表的精彩评论，其中对数据的收集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在欧洲旅行时，收集了欧洲12个大城市的详图，后来借给法国设计师朗方，供他在为美国设计首都华盛顿的蓝图时参考。他构想了美

国的 10 进制。所有这些，都称得上是他这个“重理论的幻想家”对实用技术所做的贡献。

博学多才的富兰克林博士在 1790 年去世后，杰斐逊这个美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又致力于研究在美国各地发现的化石的分类工作。可见，杰斐逊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杰斐逊有这么多的成就，在于他超人的勤奋。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来形容杰斐逊毫不夸张。他还把同样的道理告诉女儿：“要下决心永不怠惰，从不浪费时间的人不会抱怨时间不足。如果我们永远干下去，那将会干出多少事来啊！”

杰斐逊深信教育是通往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他相信教育的巨大的社会功能，认为发展教育可以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他在 1818 年写道：“除了教育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超越我们的土著邻居（指印第安人）的状态？”他又写道：“如果人类的生活如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样应该一步一步地改善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

那么为什么教育会促进人类生活的改善？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人们通过教育可以获得知识，需要用教育来“启发人民、教育人民，对身体和心灵的压抑将像精灵一样在天快拂晓之前，就逃之夭夭”。

杰斐逊还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1822 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把教化和教育的普及看作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促进道德和提高人们的幸福而最应该依靠的手段。……而且，我希望在当前把教育的好处扩展到人类广大群众的潮流中，可以看到人类幸福的巨大提高；而且这个提高将是无止境的。”

在同时代的美国，恐怕没有一个人像杰斐逊那样重视教育，那样深刻地领会教育的重大功能。

杰斐逊呼吁通过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和自由的报刊来教育人民，“这个新的国家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公民”，并使他们了解国家情况。他对国家抗腐败和堕落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在 1779 年《进一步普及知识议案》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经验证明，即或是在最好的政府统治下，委以权力者终将逐渐使政府蜕变为暴政。”但是，他希望并相信，可以通过群众教育来遏制这种衰败的过程。他深信，教育不仅将使共和国政治稳定，为其带来智慧，而且也会扩大机会，发挥普通百姓充裕的天赋才智。此外，在杰斐逊看来，人民的良知是伟大力量之源泉，人民有治理自己事务的能力，但他同时认为人民缺乏明确的辨别力，有时还可能犯错误，因此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人民的判断力”，以启迪人民。杰斐逊一生皆贯穿着对这种人本主义的关注，其宗旨是“追求幸福”，追求不受阶级限制的个人发展。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教育而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繁荣、强大和幸福。”

杰斐逊积极支持 1787 年的《西北土地法令》。这个法令要求美国西北领土的每个市镇为教育目的至少留出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以便培养对良好政府和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宗教、道德和知识。这项法令还要求这块领土内的每个州确定能够建造政府支持的高等院校的市镇。

美国人民在政治上进行的独立民主的实验，使得良好的教育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但选举权通常只限于那些拥有财产的奴隶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皆有能力为其子女上学支付日常费用。因此，杰斐逊提出为所有

男女儿童提供三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并为优等生提供进一步教育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他还设想了一个建大学的方案，虽于 1806 年提交州议会，但却如石沉大海。杰斐逊返家之后，建立学校的愿望再次占据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笔便是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他为这所大学倾注了几乎所有的热情和精力，给后人留下了又一座历史丰碑。

在参考了国外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并向海内外教育专家请教之后，1817 年，这位年近 75 岁的伟人正式开始筹建大学。他殚精竭虑地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周详全面的教育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把教育制度分为三个部分——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及大学。

初级学校向学生传授读、写、算术及地理知识。学生全部免费受初级教育。杰斐逊主张：政府有责任“使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与他们的生活条件及职业相称的教育”。

高级学校应传授古代和近代语言、高等数学、高等地理及历史。从初级学校的贫苦学生中选拔品行端正、头脑聪明的学生，使其免费接受高等教育。

大学是最高学府，它应该由许多职业性学院组成，专门培养建筑师、音乐家、雕刻家、经济学者、科学家、园艺学家、农学家、医生、历史学家、牧师、律师及各级管理人才。

当杰斐逊把这个计划交给弗吉尼亚议会时，却遭到了拒绝。在普及教育计划受挫后，杰斐逊毫不气馁，而是转而把力量集中到创办大学上来。

事实上，杰斐逊这一想法已酝酿了多年。早在 1800 年 1 月，他就开始征询并收集各种意见。他精心选址，认为威廉斯堡太闭塞，气候也不利于健康。

1818 年，弗吉尼亚州议会在杰斐逊的朋友约瑟夫·卡贝尔的推动下，接受了杰斐逊提出的创建一所大学的建议，并为此拨款 15000 美元。议会又指定一个 24 人委员会，责成它去研究大学的组织及地址问题。参加委员会的有杰斐逊、麦迪逊及门罗总统等人。而其中杰斐逊是被詹姆斯·普雷斯顿州长专门指定参加的。

1818 年他在自己起草的弗吉尼亚大学筹备委员会的报告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一代比一代更改进、更完善，人类历史便是一部进步的历史。而这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科学、文化知识，尤其依赖于教育。他指出：美国印第安人之所以过着悲惨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地崇拜他们祖先的所谓智慧，并且荒谬地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事物必须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似乎在渴望返回吃橡树皮的时代”。

1818 年 8 月 1 日，在蓝岭山的洛克菲什山口举行了监察委员会的会议，除杰斐逊之外，还有麦迪逊、门罗总统和卡贝尔等 21 人参加。会议首先讨论大学的选址。杰斐逊事先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带去一份拟好的报告，建议把大学建在夏洛茨维尔，也就是阿尔贝马尔县府所在地。理由是，这里的气候有益于人体的健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开列了阿尔贝马尔县境内 80 岁以上老人的名单。然后他又拿出地图，指出夏洛茨维尔是弗吉尼亚的中心。结果，委员会采纳了杰斐逊的建议。第二年 1 月，州议会也同意了，并且正式授权成立弗吉尼亚大学。议会任命杰斐逊为大学名誉校长。

杰斐逊很快来到院址进行勘查，根据地形调整了自己的设计，用桩标出了 3 块地坪，并决定了 6 个馆的馆址。选址标桩后的第二天，他写信给一位未在场的监察员约翰·拜克将军说：“我们的各个地区都已标出，制砖已经开始，周内即将平整土地。”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自里士满给杰斐逊写

信说：“我说学院是你的，因为你是它的真正创始人，只有你当之无愧。计划的批准完全是你大力推动和运用个人影响的功劳。”

从这时起，杰斐逊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筹建工作中。可以说，从此以后的6年中，他是为弗吉尼亚大学而生活的。他把与建校有关的一切重要工作，几乎都包了下来。如设计校舍建筑蓝图，他认为未来的大学不应只是一幢大楼，而应当是一个村，造有许多房屋，有教授上课用的教室和他们的住房，其间还有学生宿舍；所有房屋之间有走廊相连。他还积极建造第一个教学馆，并为筹集资金而开展一个募捐基金运动。

杰斐逊不仅是弗吉尼亚大学蓝图的设计者，他还亲自物色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监督建筑工程的进行，派人到意大利邀请大理石雕刻师，等等。

不仅如此，杰斐逊还要为建校经费四处奔走，绞尽脑汁。杰斐逊雄心勃勃，一心一意要把这所学校建成第一流的大学。但是谈何容易，议会的拨款俨然是杯水车薪。因此他要求议会再拨20倍于已拨的款项。

到1819年12月，杰斐逊向州长汇报说，7座馆和37幢学生宿舍（每间房住两个学生）的墙已砌好，但还要8万美元才能完工。第二年，议会还是不愿为大学拨款。从里士满送来的报告，使杰斐逊很失望，心想这辈子别想看见大学开学了。他原希望前一年的贷款能免于偿还，再增拨一些款项来完成校内建筑，包括建图书馆大楼所需的4万美元。但议会顶多只再从文学基金中批准贷款6万美元。建筑费用远远超过杰斐逊的预算，但他仍不懈努力去争取。议会每年开会时，他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拨款的要求。为了说服议会，他总是“巧立名目”，如爱国主义、弗吉尼亚的骄傲等。议会每次会议都拨一点款，积少成多，最后在修完主要建筑时，已花去30万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是议会一次次地拨给的，当然还有社会各界的捐赠，包括杰斐逊自己的倾囊相助。

杰斐逊不但为大学的创建付出无法计算的心力，而且也为办好大学花费了许多心血。杰斐逊要办的是一个“讲授所有科学学科的学校，并且要达到人类头脑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他不想办一个仅限于地方一级的学校。

工程还在进行中，杰斐逊又决定为将来把它变成更大的州立教育系统而努力。11月下旬，杰斐逊对乔治·蒂克纳说，他“现在一门心思地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教育系统”。

杰斐逊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加意识到，教授的学术水平对于办好大学至关重要。所以他又承担了物色教授的重要任务。聘请教授是一个难题，因为当时美国大学很少，优秀杰出的教授更是凤毛麟角。他不得不从欧洲聘请教授。他派美国学者弗朗西斯·沃克·吉尔默，到英国牛津、剑桥及爱丁堡等大学，物色第一流学者来美。吉尔默住在夏洛茨维尔附近，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杰斐逊认为他是弗吉尼亚同代人中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另外，他还通过个人与英国的关系来聘请教授。

杰斐逊在挑选教授时，不但重视学术水平，而且也重视其政治观点，特别是对于法律教授的政见。在杰斐逊看来，教授必须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殷切地期望这个大学能培养出有民主倾向的律师，并且通过律师来影响立法机关（大多数被选进议会的人都是律师），使立法机关倾向民主。

费尽周折之后，终于聘请到7名教授，除了2名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远涉重洋的欧洲人。托马斯·基教授数学；乔治·朗讲授古代语文；乔治·布

莱待曼讲授现代语言；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讲授解剖学和医学；查尔斯·邦尼卡斯尔教授自然哲学。同时，纽约的约翰·佩顿·埃米特博士被委任为博物学教授；弗吉尼亚的乔治·塔克当时还是国会议员，被委以伦理学教授之职。教授待遇甚为优厚，年薪 1500 美元，免费提供住房。杰斐逊说：“第一批教授的薪金应当是非常高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欧洲第一流的人来学校任教，为的是让它一开始就扬名在外。它将引来其他州的有志青年，使弗吉尼亚成为他们珍视热爱的母校。”

杰斐逊终日忙于起草各班的课程表、学生行为准则、教职员工作细则、考试的要求和学位的授予，以及各种其他细节。然后，他将所有这些都送交监察委员会批准。有一条基本规定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学院上课，而且只能由自己来选择。”杰斐逊对大学课程的设计，无疑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就。他计划讲授现代和古代语言、数学、军事、海军、建筑、机械、光学、天文学、气体力学、地理学、解剖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哲学、自然、历史、法律、纯文学和美术等。委员会规定了每一学院教授的科目，其中包括每一教授上的课程。委员会有责任“特别重视政府管理诸原则，因此规定要向学生反复灌输这些思想；并规定：凡与本州宪法和美国宪法的真正原则相抵触的思想，一律不得讲授”。因此，委员会指定法学院必须讲授政府管理诸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并且根据杰斐逊的建议，还规定了具体的读物。

委员会要求必须使用指定的课本。它们包括：约翰·洛克和阿尔杰农·西德尼的著作、《联邦制拥护者》、1799 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和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杰斐逊曾同麦迪逊和卡贝尔讨论过这个书单。杰斐逊十分骄傲地写道，这所大学“现在已经能够将在校的青年培养成任何其他州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科学人才；从学校鼓励思想自由的程度，从其他神学院受到飞扬跋扈的僧侣统治集团桎梏的限制，以及从那种死守旧习陋规的现象来看，这个优越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1824 年 5 月，弗吉尼亚大学经过近 10 年的筹建之后正式开学了。能容纳 218 名学生的 10 个帐篷形亭子和 109 间宿舍没有浮华的鼓噪，只有大约 30 名学生参加了开学典礼。当时，图书馆大楼的内部装修还没完，一座教学楼姑且被用作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终于在杰斐逊精心设计的环境中，开始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天。

杰斐逊开始主张学生自律自管。但后来爆发了一场骚乱，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之后，开除了 3 个学生（其中一个杰斐逊的外孙），11 人受惩戒。后来他主张严格的纪律是学校管理的根本。

开学数星期后，杰斐逊无比欣慰地写道：“以创办和扶植一所教育我们的后来人的学校，来作为结束生命的最后一幕。我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品德、自由、名声和幸福都起到有益而永久的影响。”他一直积极参与学校的事务，直至逝世前 3 个月，还出席了他最后一次的弗吉尼亚大学监察委员会会议。杰斐逊极珍视这一成就，他认为，创办这所大学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并亲自把它写进自己的墓志铭中。

受杰斐逊之托，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继杰斐逊之后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

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所学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样，受一个人的影响如此深远。在世界上，也许更没有一所大学是创建人在 75 岁时用全副身心创

建的。

第二十六章 哲人为王

我对于未来的梦想，比对于过去的历史，更为喜爱。

——托马斯·杰斐逊

未觉池塘春节梦，阶前梧叶已秋声。40年前，杰斐逊在蒙蒂赛洛这座小山上开始修建自己的庄园。他在从巴黎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就说：“我生性犷野，我喜欢蒙蒂赛洛的森林、旷野和独立自主的生活，而不喜欢这个淫乐放荡的首都的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欢乐。因此，我将怀着新的感情和对于它（蒙蒂赛洛）的优点的逾常的敬意，返回我的故里，因为尽管那里的财富更少，却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安逸、更少的忧患。”

但是，从那时起，他从来也没有安稳地长期住在这个家里。只有现在，在66岁时，他才有希望长期在此逍遥地生活下去。此后，不管外界如何洪水滔天，他再也不想离开这个美丽的家园。它已成了他的身躯，成了他内心世界的中心。

过去，他是凭借道义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度过那些扰攘和峥嵘的岁月的。世事的磨练，也促使他克服了在他人格中潜伏的弱点。现在从人世的纷扰中退出，远离政治，远离权力，他可以用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同时代人的意见和历史的判断，也能够用无上的智慧去洞察和审视世界了。正因如此，杰斐逊在晚年达到了哲学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和谐境界。于是，他被人们尊称为蒙蒂赛洛的圣哲。他是“哲人为王”这一柏拉图式理想的最有力的体现者。

杰斐逊酷爱读书，他自称年轻时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到了老年，其勤奋好学不曾稍减。他一生中收集过三批藏书，其中于1815年成了国会图书馆基本藏书的那一批，多达6500多卷。

杰斐逊的图书目录表明，它不仅包括了一般在科学和文学方面有重大价值的珍贵书籍，还包括了一个美国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全部文献，这是它更为珍贵之处。这批藏书，在外交和议会方面，资料尤其丰富。这位爱书老人亲自监督包装好这些书籍，把它们一一放在松木书箱里，目送着10辆满载它们的马车远去，心中暗暗道：这些书籍“无疑是美国最精华的藏书，我希望这些藏书将对我国的文献收藏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后来，美国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大型图书馆，即后来的国会图书馆。

然而，杰斐逊不能没有书。在他的书被运走之后，屋子里显得格外空旷和寂寥，杰斐逊心中的失落感悄然升起。他给约翰·亚当斯写信说：“没有书，我不能活下去。”同时他付给外孙187美元买书，并委托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学者乔治·蒂克纳在欧洲给他买一些古典书籍。就这样，这位老人又开始藏书，在他去世之前，他家里又收藏了1000多卷书。

杰斐逊虽然已至耄耋之年，思想却仍极为活跃，对未来更是寄予厚望，俨然约翰·亚当斯对他的嘲讽：“你很有鉴赏能力，热衷于未来的梦想，而不乐道过去的历史。”他知道，在平日公众活动的现实世界中，他的大多数崇高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指明社会发展的取向。他更清楚，不能指望这些理想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宁愿寄希望于社会的进步，希望在未来某一伟大时刻，人类终将实现他的理想。1816年8月1日，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他坦言：“我对于未来的梦想，比对于过去的历史，更为喜爱。”

作为杰斐逊的一项普遍原则，他从不给朋友和熟人谋公职、谋私利。但他还是有两次违背自己的信条，向詹姆斯·门罗总统求援，为他在里士满的学生伯纳德·佩顿和他坚定的辩护人威廉·杜安安排两个公职。这两次都被冷冷地拒绝了，他被门罗总统的“忘恩负义”惊呆了。“我的确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给佩顿写道，“我60年的忠于职守，对他们来说不过像是一条跛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答应别人的请求，我估计错了，我应当更有自知之明。”

尽管这样，他和门罗之间的友谊仍然相好如初。夏洛茨威尔的崇拜者在好几个场合看到三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在一起时，都十分激动。弗吉尼亚人弗朗西斯·吉尔默的话最具代表性：“我们崇拜杰斐逊先生，我们羡慕麦迪逊先生，我们尊敬门罗先生。”

杰斐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在81岁时给老对手亨利·李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他说：“从其构成而言，人可以分为两类：（1）那些担心和不相信人民的人，希望把所有的权力从人民那儿抓过来，掌握在更高一阶层的人的手里；（2）那些把自己当作普通人民的人，对人民有信心，珍惜人民，把人民看作最忠实、最安全的源泉，虽然他们并非公共利益的最佳受托人。”

杰斐逊对人民和民主进程从未失去信心和忠诚。他至死不信财富会使人道德高尚。1795年，他在写给曼·佩奇的信中说：“我不相信……15个中有14个人会是无赖……但我总看到上层社会中却有不少无赖。”杰斐逊的亲身经历告诉他，政治中的无赖常常是最有钱的人。他依然坚持不必用任何法律来保护财富。

杰斐逊对黑奴制度的反对态度是很鲜明的。他深信：“在命运之书里，没有另一件事比黑人应当获得自由写得更确切的了。”他认为黑人的智慧与白人的智慧并无悬殊：“有一种见解认为黑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都很低劣，这种武断未免太冒险、太胆大了。”买卖黑奴是一种“卑劣的行动”，“当我想到上帝应当正直不苟的时候，我一想到这制度，就为祖国而战栗起来”。

杰斐逊认为奴隶制度是对美国民主危害最深、威胁最大的祸害。他致力于减轻这个祸害的努力在当时无人可及。他既建议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一带发出禁奴令，又在弗吉尼亚鼓吹解放黑奴。1807年，他还签署过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他也曾计划运用政治的力量，在西部边疆的土地上永久铲除黑奴制度。

但是杰斐逊如何看待他岳父与女奴的暧昧关系却无人知晓。就在杰斐逊结婚后9个月，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岳父在《弗吉尼亚报》上登广告，从事贩卖奴隶的活动。他的岳父在广告中声称有400多个奴隶要出售，售完即止云云。

杰斐逊的外祖父艾沙姆·伦道夫也曾大发奴隶财。杰斐逊后来不仅鼓动停止贩卖奴隶的活动，而且要求最终完全禁止这类活动。尽管这样，他对岳父还是心存感激，并接受了他岳父的奴仆。贝蒂·赫明斯的一个儿子马丁，多年来一直是杰斐逊的贴身男仆。马丁善于察言观色，对杰斐逊的一举一动心领神会，深讨主人的欢心。杰斐逊去法国赴任时，把另一个“聪明伶俐”的混血奴詹姆斯·赫明斯带去，并希望他能学做法国菜，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国大厨。且不说后来杰斐逊又与萨莉·赫明斯有一段浪漫史。由此可见，杰斐逊对奴隶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

在杰斐逊的内心世界里，人的幸福是双重的，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他进一步说明他的幸福主要是在精神方面。他说：“我是在我的家庭的怀抱和家庭的愛中，在与我的邻居的交往中，在我的书籍中，在我那对身心有益的农场事务和家务中，在对于怒放的每一个花蕾的兴趣和感情中，在休息或活动、思考或不思不想的全部从容悠闲（这是由于我的时间和行动只是由我个人支配）中寻求幸福的。”

但是，对于杰斐逊来说，精神幸福的核心应该是来自家庭和睦的天伦之乐。在总统卸任后返回故里时，杰斐逊对乡亲们讲的发自肺腑的话最值得玩味。他说，他最羡慕的是“……大自然作为每一小时的调味剂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天伦之乐”。

在出使法国期间，他曾从巴黎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贝立尼，其中所言，表明他对于家庭乐趣有深刻的认识。他写道：在法国，“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在年轻人中间有之，在有野心的人们中间有之，在年事已高的大人物中间亦有之。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夫妇之爱，完全不知道以夫妇之爱为基础的家庭的天伦之乐为何物。在他们中间只有追求，这个追求助长和加强了他们全部恶劣的情欲，只带来片刻的狂欢，每天每月都处在不安和痛苦之中。这比美国坏得多了，因为美国家庭的温暖使得居民的大多数人享受恬静的、历久不变的幸福”。

最后，关于人的精神的幸福，杰斐逊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最为丰富的幸福的资源，我们可以平静地、安稳地享用这些资源。”“防止痛苦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反求诸己，满足我们自己的幸福。那些靠我们自己所享受的乐趣，才是聪明人所指望的唯一乐趣，因为别人可以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这就是说，人们的精神幸福是用不着外求的，也用不着用金钱去购买，它是为人民所固有的，人们可以自得其乐。

杰斐逊在人际关系的和谐中也看到了幸福。1784年在给友人麦迪逊的信中，他就表达了这个看法：“……和谐友好的交往，对于幸福和我们的生存价值来说，是有头等重要性的……要好好地衡量一下：和谐友好的交往和金钱利益相比，哪一个价值更大，并且问问您自己，在您一生中哪一个最能增加您的幸福？”

在1809—1826年期间，杰斐逊写了数千封信，这是留给美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光是1821年一年，他就收到1267封信。虽然他喜欢与人交往，喜欢信来信往，但他也感到要对这些信一一作答谈何容易，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负担，成天疲于复信。他形容自己像一匹拉磨的马一样，整天转圈，没有尽头，直至精疲力竭。尽管如此，他还是认认真真、耐耐心心、客客气气地一一回信。他不愿被别人认为自己吝啬，即便是对那些令人生厌的记者也不例外。

杰斐逊渴望友谊。他亲自写了几千封信，其中大多数是在一次事故后用摔伤的手写出来的。他渴求妻子、女儿的信，也渴望有朋友的信。当他们的信没能如期寄来时，杰斐逊便写信抱怨、责备。他给他两个女儿玛莎和玛丽的信总是充满慈爱和魅力，它们成了一扇窗户，使后人能看到窗帘并未被卷起的屋子。

他给朋友的信是给予的象征，纯粹是一种在友谊艺术中给予的反映。这使他赢得了从乔治·华盛顿到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友谊。约翰·昆西·亚

当斯 1785 年在巴黎的日记中写到：“和我爱戴的杰斐逊先生度过了一个晚上。”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的描述是：他的脸“荡漾着愉快的微笑”。

杰斐逊给詹姆斯·门罗写道：“我认为失去友谊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正因为如此，晚年恢复了与亚当斯的友谊，被杰斐逊认为是“一大乐事”。

从 1790 年开始，由于政见分歧，这两位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00 年的选举，亚当斯被杰斐逊击败，使这种友谊看来似乎永远结束了。

竞选的失败使亚当斯丢了脸，他满腔怨恨地回到马萨诸塞州；而杰斐逊对亚当斯的“午夜任命”大为不满，一上任就认定，他的前任的行动是一种有意的报复，旨在给他的政府设置障碍。

1804 年，在杰斐逊第一任期快要结束时，爱女玛丽去世。亚当斯夫人阿比盖尔得知后非常难过，于是写信给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表达了她自杰斐逊任驻法公使以来对玛丽一直怀有的深厚感情。

杰斐逊似乎相信阿比盖尔并不像她丈夫那样对他充满敌意。他在给二女婿的信中写道：“阿比盖尔所表达的同情是真诚的，她的依恋是始终如一的……表明我们之间的友谊，至少从她这方面来说还未完全破裂……我对她本人和亚当斯先生的友谊依然存在……很高兴这封信给我一个向他们表达我这一思想的机会。”

杰斐逊热情地给阿比盖尔回了信，试图以此为契机，恢复那断绝多年的友谊联系。杰斐逊在信中说，约翰·亚当斯一生中唯一使他深感痛苦的行动，或使他们分道扬镳的分隔线，就是他在最后一刻任命了最后一批官员，即“午夜任命”。而其中一些人是杰斐逊的“死敌”。他认为，这种举动是个人不友好的表示。接着，他表示已经原谅了亚当斯，而且会在个人生活中“对他表示始一的高度尊敬和友好感情”，同时对亚当斯夫人表示“诚挚的仰慕之情”。但这次并未取得共同的谅解。随后，他与亚当斯夫人的通信联系又持续了几个月。但她在写了第四封信之后中止了联系。1804 年 11 月，她才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原来，亚当斯夫人与杰斐逊的通信是背着亚当斯进行的。

一直到杰斐逊离开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才又有一次和解的机会。费城的本杰明·拉什是他们二人的朋友，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长期以来为这两位总统相互疏远而深感苦恼。他想方设法撮合这两个伟人消除旧怨，恢复友谊。

杰斐逊起初认为，要打破他们之间的隔阂并重修旧好，已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把 1804 年亚当斯夫人给他的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拉什。拉什则诠释她的信中有友善的一面，以期尽量缩小他们之间的仇视。1811 年夏，杰斐逊年轻的朋友、废奴主义者爱德华·科尔斯拜访了亚当斯，他热情地谈起对年迈的前总统杰斐逊的尊敬和爱戴。听到这些话语，亚当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我一直喜欢他，现在仍然喜欢他。”

如获至宝的科尔斯来到蒙蒂赛洛。当他给杰斐逊讲起这一故事时，杰斐逊记忆中所有的坚冰转眼就消融殆尽。他立刻给拉什写信，重复亚当斯对科尔斯讲的充满感情的话。激动不已的杰斐逊在信中说：“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只需要这能恢复我们生活中最为兴奋和热诚的时光”。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亚当斯再也坐不住了，他于 1811 年圣诞节给拉什写了信，而后在第二年的元旦提笔给杰斐逊写了封短信。他给杰斐逊寄去两件邮包，其

中有两本他的儿子约翰·昆西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写的书。由此终于打破了他们之间持续 11 年的沉默。其时亚当斯 76 岁，杰斐逊 68 岁。

早就多次表示希望和解的杰斐逊终于收到了亚当斯的信，这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于是欣然命笔，洋洋洒洒地给亚当斯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信的开头有些僵硬，简要地叙述了弗吉尼亚家庭工业的情况，但很快就自然地回忆起他们这“共同事业的共同劳动者”相处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你的信唤起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它使我回到那个年代，既有困难又有危险，我们皆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即争取人类最宝贵的权利——拥有自治政府的权利。在同一条船上，面对汹涌的波涛，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渡过那些风风雨雨，但我们的小船避风破浪，把我们驶向成功的港湾。”信中还谈到国家自独立后这些年来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及其他多方面的事情。最后他写道：“我用永远不变的感情和敬意向您问好。”

拉什对于自己的撮合成功很高兴，他说：“我很高兴你们能恢复联系……我认为你和他是美国革命的北极和南极。”

这封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此后，二人之间书信往来不断。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饱经忧患。在信中，二人共同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他们当政期间的情况；谈论他们广泛的兴趣；讨论政治理论和哲学问题，讨论他们读过的书；阐释他们对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思索，等等。这些信件往来，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不同寻常的文献交换，留给后代许多精彩的、引人入胜的宝贵资料。

他们总共通了 158 封信，其中亚当斯写了 109 封，杰斐逊写了 49 封。亚当斯有一种急迫感：“生命之分分秒秒如此短暂。虽然我写了两封信，然而却没有引起注意，我必须写第三封信。别介意，我亲爱的先生，如果我给你写了四封信，而你的一封却比我的四封信还值……在我们相互向对方解释清楚之前，你我都不能撒手而去。”

亚当斯年仅 49 岁的独生女内比·亚当斯·史密斯死于乳腺癌。杰斐逊早在巴黎时就认识内比。内比之死，又勾起他对二女儿玛丽的怀念。杰斐逊重又沉浸在对女儿的思念之中，因而好几个星期难以动笔。他对亚当斯说：“我理解这种深深的痛苦，无比同情，没有任何痛苦能比失去最亲爱的人更沉重。时间和沉默是唯一的药方，然而它们虽能减轻痛苦，却无力消除这种痛苦。这种悲痛深埋心里，唯有与生命一起消失。”

他们之间在通信中互吐衷肠。亚当斯的信轻快活泼、热情奔放，或喜、或悲、或怒；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比悲观的杰斐逊则要乐观得多。从信上看，他们的话题涉及广泛，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到拿破仑的性格、贵族的实质、科学的未来、人的理智、悲伤的效用、死亡的不可避免等，都有所涉。虽然亚当斯愿意讨论政治，杰斐逊却有意回避，担心会重提他和亚当斯之间的那段不快往事。

他们还相互谈起自己的家庭情况，诸如有多少孙子、重孙，每次骑马能骑多远等。亚当斯还感叹麦迪逊没有孩子是桩憾事。他说：“孩子使我们苦恼、担忧、伤脑筋，甚至受到羞辱；但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实际上，从很大程度讲，是他们使我们活着。”

当时社会上还出了不少书，有的附载了亚当斯批评杰斐逊的信；另外一些则收录了杰斐逊批评亚当斯的信。显然，这些都没有得到两位当事人的首肯。两位已和好如初的朋友，面对这种尴尬，一笑置之。

两位前总统捐弃前嫌、重修于好后，他们的朋友都一个个离开人世。这两位老人日益变得相依为命。亚当斯说：“你活着，我似乎就在蒙蒂赛洛有一个银行，当我高兴时，便可以提取一封友谊之信，并给我快乐。”杰斐逊则提醒亚当斯：“当心身体，你是我最亲爱的人。”

1818年10月，一直在讨论“悲伤的效用”的亚当斯给杰斐逊写信说，他的妻子已生命垂危。亚当斯在信中写道：“老弟，我悲伤之至！与我风风雨雨、相濡以沫54年的爱妻，已走到了生命之端。她已不能说话，也丧失了听力。如果人的生命是一个泡影，就无所谓多么短暂；如果是永恒的存在，那我们就应等待上帝的安排。”

杰斐逊伤感地回信说：“我亲爱的朋友，看到报纸刊登了你10月20日给我信中所提的那种不祥预感……我很理解，理解你所失去的，理解你的痛苦和你所忍受的一切。”

1819年，亚当斯问杰斐逊：“如果可能，你是否愿意再这样活70年？”杰斐逊的答复是肯定的，至少对大半生是如此。他说：“是的，从25岁到60岁我会说愿意；也许还可往前推，但不愿往后推。我想这个世界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以仁慈为原则，欢乐多于痛苦……我驶着希望之舟，把担心留在身后。”似言犹未尽，他又写道：“我的健康状况很好，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愉快，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今年、今日、今时就可舍下这一切而离去。这一点能够最好地证明主宰世界的上帝本来是很仁慈的。”

亚当斯回想起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和朋友之死，认为他却不愿意再这么活一次。他说：“与其再次忍受这些痛苦，不如一直往前，命归黄泉。”

这里反映出杰斐逊悲剧性气质的对立面。在他的全部工作中贯穿着一条清新的、潜流般的深刻信念：一切都会变好，生活自身会表现出来。这个前瞻性的乐观思想，使他能坦然面对任何不幸和悲哀。无论身在何处，他都能找到美好光明的一面；在晚年的岁月中，他从未感到有必要离开蒙蒂赛洛数英里之外。生活总是向他迎来，就像那些慕名而来的人们拜访他一样。对他来说，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暂时打断事物通向善终的畅顺之流。毕竟，他将离之而去的并非是经济或政治制度，也非一个政党，而是一种以不朽的言辞表达的不朽信念。

对耄耋之年的约翰·亚当斯来说，恢复与杰斐逊的友谊并互通鱼雁是其晚年的两大幸福之一；另外一大幸福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当上美国的国务卿，继而当上美国第六任总统。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他和父亲一样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20岁时就成了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欧洲多年，熟悉欧洲事务。1817年，门罗任美国第五任总统，他提升昆西为国务卿。昆西表现得很出色，美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是美国最佳国务卿之一。

1825年1月，昆西·亚当斯当选为总统。他和父亲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对父子总统。亚当斯曾在致杰斐逊的信中说，约翰·昆西“不仅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这话有双层含义。一是如实的，因为在驻法期间，杰斐逊经常到亚当斯家做客，小昆西与杰斐逊搞得很熟，一如杰斐逊的侄子。另一是形象的，那就是说，亚当斯同杰斐逊在政治上已成一家人，以前他们之间的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之争已烟消云散了。当约翰·亚当斯收到杰斐逊写来的贺信时，这位自豪的父亲称这是他所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杰斐逊还让外孙埃伦和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去马萨诸塞州替他拜访亚当斯。

两位久经风霜、华发满头的老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相依为命，相互支撑。约翰·亚当斯在一封给杰斐逊的信中，充满深情地说：“在我们相互向对方解释清楚之前，你我都不能撒手而去。”他们的友谊包含着对对方的牵挂和祝福。

也许正是因为失而复得而且感人至深，才使他们这种友谊演绎成一道震撼心灵、凄楚苍凉的最美丽的风景。

第二十七章 夏日挽歌

事业就是一个人留下的长长的身影。

——拉尔夫·爱默森

杰斐逊是美国所有伟大的总统中最有条理性和最求知若渴的人。他也是最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的女儿玛莎描述过她所见过的父亲一生中仅有两次发脾气。一次是当一个他十分信任的奴隶两次不听他的命令而使用拉马车的马时；另一次是当杰斐逊和他的女儿坐渡船时，两个梢公在船上争吵，使得船摇摇晃晃向湍滩上漂去。玛莎说，当时她父亲气得“像一头狮子”，以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朝两个人吼道：“如果你们不好好划船，就把你们扔到水里去。”

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杰斐逊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反对滥用死刑，反对虐待俘虏，主张释放奴隶，更反对战争。他的格言——“和平是我们的最爱”，充分体现了他的主张。他说：“关心人的生活 and 幸福，而非毁灭人类，是好政府第一的且唯一的目标。”他公开表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大多数破坏共和国自由的人，“均以献媚于人民起家，始为群首，终为暴君”。

作为开国先辈中最长寿者之一，杰斐逊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成了崇敬的对象。随着年事的增高，他很可能像罗马皇帝临死前那样说：“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神。”但他无意使自己及同代人成为后人的预言者。他喜欢说：“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人们。”世界会不断变化，日新月异，惟有真理不朽。

杰斐逊在其逝世前两年写道：“某些人带着伪善的崇敬心情看待宪法，以为它如同约柜（据《圣经》上说，这是装有两个十诫的箱子），神圣而不可触动。我们相信往昔时代有超人的智慧，当时的所为都无修改的余地。我深知这一时代；本人即曾属该时代，并曾为之劳作。这个时代与当时的国家极为相配；那个时代与现今很相似，但缺乏当今之经验；从政40年的经验胜读百年书；当时的人如果能死而复生，亦会这么说。我决无鼓吹频频随意修改法律及体制之意……但我也深知，法律及体制须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而进步。人类思想日趋发展、开明，新发现不断涌现，新的真理被揭示出来，习俗及观点随环境变化而改变，因此体制亦应前进，并与时代同步。如果我们要求文明社会停留于野蛮的祖制之下，则无异于要求成人仍着孩提时代的服装。”

“一切都可以变，惟有人类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变。”

在杰斐逊看来，每一个事物后面总有一个阴影。这一哲理也正好能体现在杰斐逊的余生。

谁也没想到，杰斐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圣哲，竟是在贫困的愁苦中度过他一生中最后光景的。

杰斐逊一生乐善好施，不惜借债以赠乞丐。他有点中国古代春秋四公子的作风，但他的生活方式及其慷慨程度，远非囊中财力之所及。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就用掉了32634美元，而其薪俸只有25000美元。那一年他出卖烟叶所得仅有3000美元，以致不得不借4000多美元来填补亏空。但他却同时花钱充善举，1801年约1000美元，1802年为1588美元。当杰斐逊8年任满走出白宫时，他已负债累累。

在总统任期内，他大幅度减少国家债务，而自己的债务却有增无减。他母亲 1770 年欠英国银行的钱，直到 1808 年才由他还清。他欠好朋友威廉·肖特和撒迪厄斯·科斯基斯科的钱也拖了数年，直到他把自己的书全部卖给国会图书馆之后，还没还清。

杰斐逊退休后，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原因之一是家口庞大，杰斐逊必须养活上百口的家人及亲戚，包括一大群外孙、重孙。更重要的是，杰斐逊晚年仍全然不顾财力衰弱，虽然自己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但对朋友仍旧异常慷慨，如曾为一个处境窘迫的邻人签付了借据而为自己的债台添砖加瓦，等等。而且杰斐逊的客人和来访者源源不断，花费早已入不敷出。农场收入只够缴税及支付利息。因此，欠债及穷困像梦魇一样压得杰斐逊喘不过气来。

但杰斐逊不愿忍受别人说他小气、吝啬，仍然对公共事业和朋友慷慨如故。

1817 年，他对中央学院慷慨捐款 1000 美元，而一年后，他就向一个夏洛茨维尔商人借了 100 美元，以便去蓝岭山的洛克菲什山口，参加推荐弗吉尼亚大学校址的委员会会议。

在杰斐逊 80 岁生日前数日，他为全家开了一个欠债、收入的帐目表。这个帐目表表明：1823 年他欠的债务高达 40262 美元，仅利息就达 2121 美元，占农场这年收入 10400 元的 1/5 以上。

杰斐逊还有一种维护大家庭的责任心，使他最终被拖进最具灾难性的财政负担的泥潭中。他最喜欢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和他的老朋友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的女儿结婚。1818 年时，尼古拉斯是弗吉尼亚的州长，同时还是里士满银行的行长。该银行有 30 万美元资本。杰斐逊为他签署过一份 2 万美元的贷款担保。为什么杰斐逊要这样做，恐怕谁也不知道，但当时相互担保在弗吉尼亚是一种骑士风度的举动。然而，已经债魔缠身的杰斐逊，如果不是因为尼古拉斯从某种程度上因儿女婚姻成为“家庭一员”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杰斐逊对债务的有增无减越来越担心，常常为此陷入孤寂。他在给大女婿伦道夫的信中就流露出这份无奈的心境，并说由于银行的破产，他很可能将承担尼古拉斯的“所有灾难”。结果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1819 年发生金融恐慌，所有弗吉尼亚的银行都关闭了，尼古拉斯则倒闭、破产，没过多久，他就一命呜呼了。这样，杰斐逊必须承担这 2 万美元的贷款，光利息每年就是 1200 美元。当杰斐逊得知他的朋友去世的消息时，突感消化不良和便秘，差点使他丧了命。

他知道农田耕作和其他副业挣不到钱来支付他的债务，所以他指望将他拥有的大片土地出售一部分来偿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819 年又遇大萧条时期，弗吉尼亚的土地价格骤然跌落，出售土地的办法已不可行，因为“这个州土地的卖价现在低到都不及一年的租金”。更不利的是，当时放宽贷款期限的合众国银行开始缩短期限。银行宣布所有票据再要延长时一律贬值 12.5%。杰斐逊没有现钱来承受这个要求，不得不又去举债。到 1819 年夏，这个仇视银行的老人在里士满的 3 家银行内已借了 5 笔款子。

为了还债，他不得不计划卖掉很大一部分奴隶。但即便这样，对于他庞然大物般的债务来说，无疑仍是杯水车薪；把波普拉森林卖掉，还是还不清，甚至得把蒙蒂赛洛搭上。这时，杰斐逊所欠的债务已超过了 10 万美元。

这位窘迫的老人最后的期望是来年有个好收成。不料，洪水泛滥，毁田、

毁作坊。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使他濒于破产。尽管负债累累，他却从不自怜，从不抱怨自己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他也不愿向别人求援，他对麦迪逊说：“我愿死于贫困，不愿失去自尊。”

债权人开始讨债了。1826年，杰斐逊眼看就要倾家荡产了，眼看心爱的蒙蒂赛洛就快保不住了。于是他授权他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通过弗吉尼亚司法当局，组织一次抽奖活动，来出售他的地产。他希望这样可以偿清所有债务，还能给玛莎和外孙们的教育留一部分积余。中奖者可以得到土地和奴隶，但蒙蒂赛洛可以保住。

虽然做了很多安排，但杰斐逊仍担心彩票发行不会成功，他怕一无所获。去世前几周，负债累累、身体日益衰弱而郁郁寡欢的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说：“我们之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们在政治原则和事业追求上的和谐，一直是我在漫长岁月中的幸福源泉。如果我不能再照顾这所大学（指弗吉尼亚大学），或者走出了生命本身的界限，学校留给你管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不可缺少的保证……对我来说，你是我一生的支柱。我死后也请你来照管（弗吉尼亚大学）。请相信我将自己最后的爱皆留给你。”这或许是杰斐逊那么多信中最伤感、最动情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那种无奈的困境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凉心绪。

麦迪逊对杰斐逊十分钦佩，他是杰斐逊一生最坚定的盟友。麦迪逊对杰斐逊的忠诚，体现在他的承诺中：“我要终生为他服务。”杰斐逊称麦迪逊和门罗是他的“两个幸福的支柱”。

尽管杰斐逊·伦道夫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彩票的出售却十分缓慢，令人失望。

到杰斐逊去世的那年，由于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破了产，负担更加沉重了。杰斐逊还得负担女儿和未婚外孙子女的一切费用。到83岁的那一年，亦即逝世的那一年，杰斐逊经济上的困窘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得不筹划拍卖大部分田产。只是到那时，他才了解到，要还清债务还得把他的蒙蒂赛洛也搭进去，那所房子当时约值10万多美元。这无疑是对杰斐逊的一大打击，因为蒙蒂赛洛是他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归宿。很难想象没有蒙蒂赛洛的生活会是什么情景。何况，他还得考虑为自己的女儿及子孙留一遮风挡雨之处。

然而，当杰斐逊要靠出售彩票来筹资抵债的消息传到北方后，人们开始自发捐资帮助他，几个州陆续开展了类似的活动。不久，全国各地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许多地方举行募捐大会。纽约市的居民很快就捐献8500美元，费城人捐献5000美元，巴尔的摩捐献3000美元，其他城市也纷纷解囊相助。国人的这一义举，使这位白发老人甚为感动，他说这是“纯真的、自发的爱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只好取消了出售彩票计划。最后两个月，杰斐逊才有了一丝安慰：蒙蒂赛洛将保留下来，黑奴可以全部留下了。

这期间，杰斐逊的身体也像其经济状况一样每况愈下。从1818年起，杰斐逊的健康状况就出现问题。这一年他到温泉去治疗风湿病痛，但温泉似乎并没治愈他的旧病，反而给他添了新疾。因为他从温泉回家后，就感到严重的下腹不适，而且经医治之后更趋恶化，曾一度处于死亡的边缘。这个病后来有所减轻，却未能根除。后来，各种病痛每天都折磨他。由于前列腺肿大而尿道阻塞，1825年当拉法叶特回法国之前去向杰斐逊道别时，他看到老态龙钟的杰斐逊疼得只好半靠在长沙发椅上，不能完全躺下，不能走，不能站。

拉法叶特告诉杰斐逊，巴黎有一种更好的导液管，回去后给他寄一些来。拉法叶特真寄来了 100 支导管，但在这些导管寄到之前，杰斐逊已经合上了眼睛。

1826 年 3 月，他自知来日无多，便起草遗嘱，布置后事。

杰斐逊晚年仍坚信农奴制总有一天会终止。1825 年，他写信给弗朗西斯·赖特说：“废除这一坏制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永远不应为之失望。应当制定每一项计划，做出每一样试验，总会有助于达到这一最终目标的。”所以，他身先士卒，在遗嘱中，他给予 5 个农奴以自由，这 5 个人都有手艺，可以在自由社会中养活自己。他吁请议会准许他们留在本州，因为弗吉尼亚法律规定，所有被解放的农奴，必须在一年内离开本州。

在遗嘱的附录中，杰斐逊将他的镶金手杖留给了麦迪逊，以纪念他们之间深厚长久的友情和多年的政治合作。

1826 年 6 月，杰斐逊收到请帖，要他在签署《独立宣言》50 周年的庆祝仪式上讲话。这时杰斐逊身体已极度虚弱，加上腹泻，连家门都出不了。

6 月 24 日，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公民，称他感谢邀请，但因健康原因不能去参加《独立宣言》50 周年的庆祝活动了。这是他亲笔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谈到根据《独立宣言》而实行的自治带来了许多幸福，其中有“无限制地运用理性的自由权利”，表现出指导他一生对理性追求的坚定信念，一直支持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这也是他最后一篇公开声明，因此他写得格外仔细、认真。但信中难以掩藏的信息是：他渴望去华盛顿参加纪念活动。

如果说历史上有两人能选择和控制着他们离开人世的时间，那么他们就是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虽然杰斐逊在 1816 年 8 月 1 日致亚当斯的信中就说“命各有期”，但他们都似乎决心一定要活到签署《独立宣言》50 周年的那一天。

就在临终前几天，杰斐逊请来了他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的解剖学和医学教授罗布利·邓格利森博士。据守在病床旁看护的邓格利森的记载：在 7 月 2—3 日以前，杰斐逊直言不讳地谈到他的死期已近；与他的外孙伦道夫先生就私事做了最后的安排与叮嘱；还念念不忘刚创办起来的弗吉尼亚大学，并相信麦迪逊先生和其他监察委员会为它尽力……7 月 2 日白天和夜里处于昏迷状态，间或苏醒片刻。但到第二天，就整天昏迷不醒了。

7 月 3 日中午刚过，杰斐逊就问道：“是 4 号吗？”第二天，守在杰斐逊身旁的尼古拉斯·特里斯特对他兄弟说：“自从昨天早上以来，他就一直处于临终状态，直到昨晚 12 点，我们担心他恐怕活不到他所希望的光荣的 4 号这一天了，他已停止服药，他喃喃道：‘噢，上帝！’‘不，什么也不要了！’”

7 月 4 日中午 12 点 50 分，即他起草的《独立宣言》获通过的 50 周年纪念时刻，托马斯·杰斐逊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在家人挽留的目光中，乘风而去了。

远在他乡的约翰·亚当斯 7 月 4 日的最后一句话是：“杰斐逊还活着！”这两位晚年重又携手的好朋友，最终在同一天离开了人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亚当斯和杰斐逊死后，《独立宣言》的签字者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即查尔斯·卡罗尔。

一星殒落，两界生悲！

杰斐逊死后，蒙蒂赛洛转眼之间便物是人非。玛莎和她的女儿一起去波

士顿，让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负责照看蒙蒂赛洛。大女婿伦道夫似乎得到了“解放”——大名鼎鼎的岳父死了，忌妒与仇恨的对象没有了；妻子到别处去了，他的病也渐渐好了，开始从事测量工作。他杰出的工作是测量了佛罗里达的边界。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结束后，他又旧病复发。

玛莎本和父亲相互支撑、相依为命，但是 1826 年杰斐逊的去世，使她一下失去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依靠。玛莎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债务是沉重的，她一度考虑要把蒙蒂赛洛卖掉或把它办成一个学校。丈夫伦道夫已经变得对家庭十分疏远了，他曾回到蒙蒂赛洛和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1828 年 2 月 20 日他郁郁而死，年仅 60 岁，只留下玛莎来承担对这个家庭和对蒙蒂赛洛必须承担的法定责任。蒙蒂赛洛卖出后不久，许多奴隶被送上了拍卖市场。

这时，黑奴萨莉·赫明斯已获得了自由，和她的儿子麦迪逊和埃斯东生活在蒙蒂赛洛附近一间租来的小屋里。萨莉于 1835 年 62 岁时去世。她的两个儿子搬到俄亥俄去了，埃斯东去了威斯康星。

1836 年，玛莎在父亲逝世 10 年之后卒于中风，死时 64 岁。但她并没有葬在和其丈夫共有的住所埃奇希尔，而是埋葬在她父亲的心爱家园——蒙蒂赛洛，她要求永远陪伴着父亲。她的一个儿子乔治·威思·伦道夫，在后来托马斯·杰斐逊·戴维斯的联邦政府内成为第一任陆军部长。

蒙蒂赛洛日益衰败，后来杰斐逊·M·利维对它进行了部分维修。1926 年 7 月 4 日，在签署《独立宣言》150 周年、杰斐逊逝世 100 周年时，蒙蒂赛洛被弗吉尼亚的妇女们集资买下，作为全国的一处圣地保护起来；并经艺术家和维修专家的修复、装饰，使之成为今天无数朝圣者心中的“民主的麦加”。

蒙蒂赛洛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杰斐逊形象：寡欲的、理智的、沉着的、典雅的。

络绎不绝的蒙蒂赛洛的来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蒙蒂赛洛墓地，瞻仰怀念长眠在这里的真正主人。他安详地与妻子相守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墓前竖立着亡者亲自设计的石碑，石碑上刻下亡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中最希望后人能记住的：

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执笔人，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安葬于此。

附录：

一、托马斯·杰斐逊年表

1743年4月13日出生于弗吉尼亚阿尔贝马尔县夏德威尔。

1748年在吐卡霍进入英语学校。

1752年进入道格拉斯拉丁语学校。1757年8月父亲彼得·杰斐逊去世。

1760年3月进入威廉-玛丽学院。1762年4月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在乔治·威思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

1767年取得律师资格。1769年3月当选为弗吉尼亚议员。1770年2月夏德威尔大火，房屋和藏书被烧。1772年1月与玛莎·威利斯·斯凯尔顿结婚。

9月第一个女儿玛莎出世。1773年4月参加通讯委员会会议。1774年4月第二个女儿简·伦道夫出世。

7月撰写《英属美洲权利概论》。1775年3月当选为大陆会议候补代表。

6月参加大陆会议。

8月再次当选为大陆会议代表。1776年6月为弗吉尼亚起草宪法。

当选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提交《独立宣言》草案。

10月向弗吉尼亚议会提交废除限定继承权的法案。

1777年5月儿子出生后不久夭折。

1778年8月第三个女儿玛丽·杰斐逊出生。

1779年6月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

向弗吉尼亚议会提交《宗教自由法令》。

1780年6月连任弗吉尼亚州州长。

11月第四个女儿出世。1781年1月命令民兵抗击英军侵略。

6月辞去州长职务。1782年5月最小的女儿露西·伊丽莎白问世。

9月玛莎·威利斯·杰斐逊去世。1783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

1784年5月被国会任命为赴欧特使。

8月到达巴黎。

9月安排出版《弗吉尼亚纪事》。1785年5月被国会任命为驻法公使。

1786年1月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宗教自由法令》。

3月离开巴黎赴伦敦。

5月返回巴黎。1787年底同意美国新宪法，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

1789年9月被提名为国务卿。

11月从法国回到美国。

1790年3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抵达纽约出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

1792年告知华盛顿想辞去国务卿职务。

1793年12月辞去国务卿职务。1794年1月回到蒙蒂赛洛。

1795年在蒙蒂赛洛建立制钉厂。

1796年发明模板犁。

1796年12月当选为副总统。

1797年1月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

3月就任副总统。

1798年7月反对《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

1800年1月构思弗吉尼亚大学。

5 月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1801 年 2 月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
3 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12 月向国会提交第一个国情咨文。
1802 年 12 月向国会提交第二个国情咨文。
1803 年 1 月就派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西部一事向国会提出特别说明。
5 月美法在巴黎签署《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
7 月拟就购买路易斯安那提出宪法修正案。
10 月提交第三个国情咨文。《路易斯安那条约》得到参议院批准。
1804 年 11 月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第四个国情咨文。
1805 年 3 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12 月提交第五个国情咨文。
1806 年 11 月颁发逮捕伯尔的公告。
12 月发表第六个国情咨文。
1807 年 1 月再次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
3 月签署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
7 月颁布反对英国战舰的公告。
11 月向国会提交第七个国情咨文。《禁止输入法》生效。
12 月签署《禁运法》。
1808 年 4 月公布《禁运法》。
11 月提交第八个国情咨文。
1809 年 3 月引退。回到蒙蒂赛洛。
1811 年 1 月为“美国农业协会”起草工作计划。
1812 年 1 月与约翰·亚当斯重归于好。
1815 年向国会出售图书。
1815 年 1 月提出弗吉尼亚大学纲要。
1824 年 5 月弗吉尼亚大学建成开学。
1826 年 2 月就发行彩票作出说明。
3 月立遗嘱。
6 月 24 日谢绝参加 7 月 4 日庆典的邀请。写最后一封信。
7 月 4 日与世长辞。

二、《独立宣言》

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于 1775 年 4 月开始。随着战争的延续，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1776 年 6 月 7 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6 月 10 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实际的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斐逊负责。7 月 4 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 13 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

大陆会议（1776 年 7 月 4 日）

美利坚合众国 13 个州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时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借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滥设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纠正；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

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三、《权利法案》

美国宪法的草创人没有在宪法中拟订一项权利法案。第一届国会集会后不久，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一项很长的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国会一共通过了 12 条修正案。但是，只有 10 条为各州所批准，并于 1791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些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

第一条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第二条修正案

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

第三条修正案

任何兵士，在和平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

第四条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第五条修正案

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力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第六条修正案

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第七条修正案

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者价值超过 20 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第八条修正案

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课以过高的罚款，不得施予残酷的、逾常的刑罚。

第九条修正案

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修正案

举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行使、而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

四、《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

美国革命时期，英国统治下的北美南部诸殖民地均以英国教会作为它们的国教。美国革命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政教分离。国教的废除遭遇激烈反对。反对不但来自英国圣公会教徒，也来自其他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教会；直到1786年12月16日，在詹姆斯·麦迪逊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共同努力下才使这著名的宗教自由法令在弗吉尼亚州通过。杰斐逊认为这一法令是他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一、全能的上帝既然给予人类思想自由，所以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做法，无论是凭靠人世间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法律规定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始者的旨意；他是躯体和精神的主宰，他无所不能，但是他并不强迫向我们的躯体和精神宣扬他的旨意；有些在世间的和教会中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他们本身不过是常有过失和没有得到圣感的人，而竟然肆无忌惮，以为他们有权支配其他人的信仰，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说成唯一的永无错误的真理，并强迫世人予以接受，这些人自古以来，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所建立的和所维持的，只是虚假的宗教而已；强迫一个人捐钱，用以宣传他所不相信的见解，这是罪恶和专横的；甚至强迫人出钱支持他自己所相信的教派中这个或那个传教士，也是在剥夺个人意愿的自由，使他不能把他的捐助赠予他所乐意赠予的牧师，而正是这位牧师的道德可以作为他的榜样，这位牧师的能力最足以说服他从事善行；同时这也是剥夺了牧师们应从世间得到的酬报，而这些由于他们个人的行为受到尊敬而获得的酬报，正足以鼓励他们认真地和孜孜不倦地向世人传教；我们的公民权利并不有赖于我们在宗教上的见解，正如它不依赖我们在物理学或者几何学上的见解一样，因此，如若我们规定，一个公民，除非他声明皈依或者放弃这个或那个宗教见解，否则就不许接受责任重大和有报酬的职位，因而不值得大众的信赖，这实在是有害地剥夺了他的特权和利益，而他对于这些特权和利益，正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是享有天赋权利的；有些人在表面上皈依一种宗教，并且也能依照它的规律而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给予他们独占权，使他们享受世界上其他人所不能享受的荣誉和报酬，那实在是一种贿赂，而这种贿赂不但不能促使这个宗教的真义得到发展，反而使之趋于腐蚀；这些不能抵抗诱惑的人，固然都是罪人，但是那些在路途上安放钓饵的人们，也不能算是清白无罪；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许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这个官吏做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他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一个政府要实现它的合理意旨，总是有充分时间的，当理论转化为公然行动、妨害和平及正常秩序时，官员们总是来得及干涉的；最后，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行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误的真正有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论；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危险了。

二、大会兹颁布，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

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讲并进行辩论以维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公民权力。

三、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大会，只是人民为了一般的立法目的而选举成立的，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以后的大会的法令，因为它们是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的，所以，如若我们此时声明这个法令永远不得废除，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由声明，同时必须声明，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今后如通过任何法令废除本法案或缩小其效力，该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